

历史名人与南皮

LISHI MINGREN YU NANPI

南皮历史文脉探研编纂委员会 编

南皮賦

英釣魚臺與寒冰井

八百年渤海郡三千載

古皮城黃河故道天蒼

地樸滄瀛一隅俊傑代興

華夏之詩祖詩社彙

大成英友築臺高

韻金谷結社魏晉風大運

河開柔暢脈通名相賈

耽涵泓萬頃繪海內華

夷地圖創天下第一盛

騰更甬張文襄公革故

鼎新清瀾抱冰慈恩學

堂舉世稱頌燕地英俠

寶句急留申

中州古籍出版社
· 鄭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名人与南皮 / 南皮历史文脉探研编纂委员会编. — 郑州 :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21. 11
ISBN 978-7-5348-9968-3

I . ①历… II . ①南… III . ①历史人物 - 生平事迹 - 南皮县 IV . ① K820.8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245361 号

LISHI MINGREN YU NANPI

历史名人与南皮

责任编辑 王小方 宗增芳
责任校对 梁郁
美术编辑 古青风
封面设计 王鹏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27号6层
邮编:450016 电话:0371-65788693)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山东黄氏印务有限公司
排版设计 济南冀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21
字数 300千字
印数 1—2000册
版次 2021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21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8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南皮历史文脉探研》编纂委员会

主 任：边 疆

副 主 任：张秀娟 常忠云 岳建玲 刘汉军

委 员：鄢越强 杜中洲 孙九如 赵永生

赵树森 戈延华 叶书龙

责任编辑：赵树森 叶书龙 戈延华

序 言

南皮作为千年古县、历史名城，向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而著称。历史上，许许多多的著名人物对南皮关注、与古城交集，这里面既有帝王将相，也有达官贵族；既有翰苑名流，也有文宗武豪；既有封疆大吏，也有隐士奇人……他们与南皮的有关史实、故事与传说，不仅仅是南皮悠久历史的见证，也是厚重文化底蕴的体现，更是南皮发展、繁荣、文明、丰饶的展示，让世世代代南皮人为之自豪，津津乐道。

南皮在炎黄时期就有人类繁衍生息，黄帝之师——封钜在这里留下了活动的印迹。其居所“封台”，是南皮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民居。商殷时期，南皮先民们就已经在聚落的基础上建立了城邑；春秋霸主齐桓公北伐山戎时，在南城缮修皮革，南城遂名“南皮”；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南皮置县，一直延续至今；东汉建武六年（公元 30），渤海郡治移于南皮，时间长达 500 多年。

悠久的历史聚集了厚重的文化积淀，孕育和陶冶了不胜枚举的仁人志士、社会贤达、国之栋梁。西周内史大臣尹吉甫因文治武功超群而受到宣王的赏识与器重；声名显赫的西汉大臣隗不疑，屡得汉昭帝的赞赏；北魏开发大西北的功臣刁雍，受到太武帝的颁诏褒奖；唐德宗李适旌表贾耽在地图学上的杰出贡献；宋太宗奖赏贾黄中清正廉洁；清乾隆皇帝在南皮诗祭尹吉甫墓，称赞他“清风永世属斯人”；慈禧太后为张之万寿辰题赠匾额：“枢衡介祉”。清末重



历史名人与南皮 ◎ 文化丛书 ◎

臣张之洞改革创新的精神得到了伟人的称道。孙中山先生赞之“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说“讲到中国的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清嘉庆年间，南皮知县蔡任有感于南皮人文渊藪、贤哲代兴，作《南皮观风启》赞曰：“风俗敦庞，人文彪炳。”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南皮境域胜景遗迹星罗棋布。这些美不胜收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使得姜太公在此驻足，悠然垂钓；魏文帝曹丕“燕友”，流连忘返；燕山窦十郎痴迷南皮风光，修筑别墅；纪晓岚慕名前往，拜师求学。更有各个时代的名士如王修、范丹、吴质、萧颖士等“落户”南皮，寓居于此。优美的环境，吸引着众多的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元代诗人萨都刺、“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任丘举人边向禧都曾在南皮徜徉、赏游；阮瑀、韩愈、嵇绍、苏轼等众多名家都赋写并留下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美丽诗篇。

南皮东观海、西临漕、南望齐、北朝京，为水陆要冲，素为兵家争锋之地。春秋时期，齐桓公大举修筑“齐堤”抵御外敌（一说障黄河之水）；成安侯陈馥领南皮等三县之兵奔袭常山；汉武帝遣“捕虏将军”马武驻扎南皮北城，以拒匈奴入侵；袁绍在南皮起渤海郡之兵，率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

历史悠久则文脉绵长。西周时期的尹吉甫，志载其“文以服众、武以威敌”“事业文章、炳然千古”，被尊为中华诗祖。西晋文学家石崇作《金谷园诗序》，对后世影响极大，为王羲之撰《兰亭集序》所效仿；欧阳建著《言尽意论》，推动了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发展。唐代贾耽开创了我国地图绘制和方志学的先河。被誉为“书画状元”的张之万、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古典文学研究家孙楷第，等



等，都在中国文化艺术的百花园里各领风骚，熠熠生辉。

南皮地连齐鲁，颇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自古以来便雅重文化。尤其是在汉末及魏晋时期，南皮的传统文化又在承袭中迎来一个高潮。

东汉时期，曹操计破南皮城后，曹丕、曹休、曹真、吴质与“建安七子”在南皮赋诗唱和的“燕友”活动，被南北朝时期的梁文学家沈约誉为“南皮高韵”。2006年版《沧州市志》在“概述”中记：“‘南皮高韵’与‘邺下风流’一起成为千古文坛佳话。”

“南皮高韵”与“邺下风流”是曹（操）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等文人在南皮、邺城两地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成果，唐代诗人陈子昂称之为“汉魏风骨”，诗仙李白赞之为“建安风骨”。“南皮高韵”的开创，是南皮传统文化的一大亮点，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南皮朝宴”“南皮之游”“南皮高韵”“南皮射雉”“南皮浮瓜沉李”等屡屡出现在历代典籍与诗作中。被誉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的清道光年间体仁阁大学士阮元，专书“采南皮之高韵，补东观之阙文”的联句，对“南皮高韵”丰硕的文学成果及深远的历史影响给予了高度评介。

更让南皮人难以忘怀的，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对刘喜奎、王金山等南皮籍艺术名家的关怀和嘱托，激励着南皮人民赓续传统、继往开来，让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与时代同行。这就是编纂《历史名人与南皮》的初衷和目的。

中共南皮县委书记

董继华

目 录

历史记忆

东汉著名学者应劭著述记封钜为黄帝之师	3
北魏太武帝颁诏褒奖刁雍	8
因蒙冤投归北魏	8
修艾山渠灌溉农田	9
首开黄河上游水运先例	10
筑“刁公城”屯粮安民	11
晋成帝颁诏为刁协正名复官	13
唐德宗李适奖赏贾耽在地图学上的杰出贡献	17
出仕为官 政绩显赫	17
收集资料 绘制地图	19
研究地理 撰写著作	22
宋太宗、宋真宗赐钱嘉奖贾黄中	26
任采访使 安定边区	26
廉洁恭谨 不隐遗财	27
掌管科考 选拔德才之士	28
幼年苦学成典故	28
忧国病故 母嗣蒙皇恩	29
清康熙皇帝驻蹕南皮白塔寺	30
清乾隆皇帝诗祭尹吉甫墓	32



附一：尹吉甫与《诗经》	35
相关链接：《诗经》概要	38
附二：兮甲盘铭文书法	39
附三：尹吉甫兮甲盘何以价值连城？	42
附四：兮甲盘铭文图片	45
清乾隆皇帝与南皮清风书院	46
清道光皇帝诰封张之万庶母	49
清光绪皇帝为南皮“大慈阁”题写匾额	52
清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为“慈恩学堂”题写匾额	55
慈禧太后为张之万寿辰题赠匾额	61
匾额牵出名臣往事	61
受慈禧太后赏识	62
几经流离幸运保存	63
伟人盛赞张之洞	65
创新教育	66
发展实业	69
强军御侮	70
清正廉明	73

往事回眸

毛主席、周总理亲切接见“南皮吹歌”演奏家王金山	77
周恩来总理向刘喜奎敬酒寄嘱托	81
春秋霸主齐桓公在南皮古城修整军备	87
古城兴衰	87
建邑辨析	89
迁址略考	90



汉武帝指挥使暴胜之礼请隼不疑	93
曹操、曹丕开创“南皮高韵”	97
相关链接:《宋书·谢灵运传论》	104
魏文帝曹丕对“南皮之游”情有独钟	108
附:“南皮之游”小议	118
史学家房玄龄撰《晋书》赞欧阳建:“赫赫渤海, 欧阳坚石”	123
著《言尽意论》阐明唯物史观	124
作《临终诗》袒露真实情怀	127
交恶权贵遭灭门之祸	130
慈禧太后的“御膳食品”: 南皮小米面窝头	131
张伯驹撰文赞誉张占福	134
清逊帝溥仪聘请霍殿阁为武师	137
孙中山任命刘之洁为大总统府高等顾问	143
附: 南皮集北头的“都督府”与鼎威将军刘之洁	146
罗章龙、刘格平颂扬张隐韬	157
张隐韬的铁血荣光	157

闻人觅踪

姜太公南皮垂钓	177
陈馥封侯于南皮	180
寓居南皮话吴质	187
出身寒门投身曹营	187
出谋划策助“丕”上位	188
“南皮之游”文留后世	189
“怙威肆行”谥号蒙羞	191
唐代进士萧颖士寓居南皮咏美景	193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赋诗咏南皮	195
元代河北道廉访司萨都刺游南皮古黄河堤留诗篇	197
清礼部尚书纪晓岚在南皮拜师求学	200
附一：纪晓岚的恩师——许翰	203
附二：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南皮情结	206
任丘举人边向禧赏游南皮赋“南皮十六咏”	212
附：古文诗作中的南皮八景	216
“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南皮凭吊“绿珠楼”	226
清直隶总督李鸿章为“范家坝事件”撰碑文	231
附：重修宣惠河记	231
清直隶总督李鸿章旌表南皮郭氏匾额	235

史海钩沉

“燕山窦十郎”在南皮建别墅	243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曾游“高乐城”	247
袁绍南皮起兵讨伐董卓	250
曹操横刀立马南皮城	252
汉献王之子在南皮修筑“五垒城”	256
汉捕虏将军马武屯兵南皮北城拒匈奴	258
汉代名士范丹“落户”南皮	262
曹丕在南皮“讌友”之“浮瓜沉李”	266
袁谭别驾王修在南皮义葬主公	270
苏轼赋诗叹惋石崇	273
好学不倦 力谏封赏	274
亦官亦盗 劫商致富	275
奢靡生活 登峰造极	276



炫富比阔 斗富王恺	277
建金谷园 结社交友	278
宠爱绿珠 遭政敌杀害	279
石崇之死 源于权力斗争	280
附：石崇所作《金谷园诗》序（全文）.....	281
明初 43 位翰苑名流题赞《积善堂记》.....	283
清内阁学士陈宝琛撰写张之洞墓志碑文并书丹	289
张文襄公墓志铭	289
附：张之洞墓及重修张之洞墓园纪事	292
康有为盛赞《刁遵墓志》碑刻	296
徐世昌撰文、华世奎书丹南皮张氏双烈女碑	300

逸闻传说

明正德皇帝纳妃钱庄村	307
穆桂英与南皮泊家村的传说	308
杨六郎在南皮大摆“牦牛阵”	310
林冲发配途经南皮“野猪林”	311
纪晓岚南皮建绣楼	313
《施公案》中的薛家窝	314
孙臆、庞涓斗法筑河堤	315
秦始皇修筑防水堤	317
后记	319



历史记忆





南皮为先秦古县，有着悠久的传承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远古时期，黄帝之师——封钜就在南皮留下了活动的印迹。其居所“封台”，是南皮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民居。

古往今来，在南皮这片古老而又文明的热土上，人文荟萃、灿若群星，彰显了人才济济、俊哲代兴的特点和优势。这些仁人志士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复兴、人类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北魏开发大西北地区的首要功臣刁雍，受到太武帝颁诏褒奖；唐代名相、地理学家贾耽因功业显赫被德宗皇帝下诏旌表；清乾隆皇帝南巡至南皮时，亲作《七绝》，诗祭尹吉甫，赞之：“清风永世属斯人。”

清嘉庆二十四年（1820），南皮知县蔡任在《南皮观风启》中侃侃而言、直抒胸臆：“兹邑星占箕尾，地界燕齐；风俗敦庞，人文彪炳”“文章华国，代有其人；经学传家，今犹夫昔”“人敦孝悌，户尚诗书”。

这些历史的记忆，使所有的南皮人都对此引以为骄傲和自豪。



东汉著名学者应劭著述记封钜为黄帝之师

东汉学者、名臣应劭（约 153—约 196），一生博学多识、著作丰富，平生著作 11 种、136 卷。其在著述《史记集解》中曰：“封钜，黄帝师。”封钜曾在今南皮境域居住，其居所名“封台”，在南皮县寨子镇丈二桥村东可见遗址。

这是远古时期黄帝之师封钜曾经居住的地方，为南皮县域最古老的遗址。据《汉书》所记，封钜为炎帝之后，生于渤海，为黄帝师氏，其居名“封台”。对此，清康熙朝《南皮县志》明确记载：“封台在（南皮城）东五十里，张（丈）二桥东。古封钜所居。”

南皮历史悠久，古老的南皮大地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并孕育了传奇名人封钜。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公认炎帝、黄帝为始祖。封钜既为炎帝之后，又是黄帝的老师，这两层关系使得封钜光芒四射、备受尊崇。因而，现在存世的古籍《南皮县志》，都将封钜置于南皮儒林之首。

虽然，由于历史久远，“封台”已然湮没，但其作为历史遗迹收录在了史书之中。清康熙朝、光绪朝及民国版《南皮县志》都分别在“古迹”“遗迹”中进行了专门记述。

—

南皮古籍县志在“记事”“杂记”“志余”中都记载了相同的内容：“远古黄帝师封钜起海水盘洄处，遂名渤海。”简短的 10 多个字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封钜的身份是黄帝的老师，渤海因封钜而得名。封钜吸引人们注目的就是他是黄帝老师的身份。黄帝的老师应是当时的大学问家，



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就是学界泰斗、国学大师。班固编撰的《汉书》列有古今人物表，表中记载有黄帝三位老师的名字，封钜便是其中之一。东汉学者应劭在他的史书注解专集《史记集解》里亦记载：“封钜，黄帝师。”但黄帝具体向封钜学习什么却没有交代，留下了猜想的空间。渤海因封钜而得名，但为什么因封钜而得名，古《南皮县志》没有介绍。因名人效应，根据封钜居处旁边海的盘洄情形起名渤（勃）海，抑或渤海之名就是封钜起的，这是两种可能性的合理推测。

“封钜起海水盘洄处”，一个“起”字尽显古人用字之精妙。“起”可以理解为出生、居住、发迹、起家等，或兼而有之。以居住推想可以有两种情况：其一，封钜的居住地“封台”离海很近，或者就是在海岸线上，能够观赏潮起潮落以及盘洄的海水、翱翔的海鸥。南皮大地属于冲积平原，黄河曾流经南皮600多年，滚滚河水裹挟大量泥沙由南皮流入海，因而，黄土地逐渐由西向东延伸。据记载，某次涨潮（可能是海啸），海水曾漫漫至献县境内。据专业方志工作者编纂《泊头鸭梨志》并深究泊头鸭梨生长的地质条件时，介绍泊镇一带就曾是海岸线。随着海岸线的东移，“封台”曾在海边就不足为奇了。其二，“封台”在近海的河流岸边高处，白天可俯视进进出出的渔舟，夜晚则仰观斗转星移的苍穹。

南皮古为九河下梢。王莽时曾改南皮县为“迎河亭”，迎河即逆河，河水入海的称谓。三国时，曹丕与建安文人集团曾“北遵河曲”（据《南皮县志》），从邳城（今临漳邳镇村一带）顺流而下至南皮。现在九河大多难觅踪迹，大海也东去数百里。像沧州境内的镇海吼、望海寺、望海楼等也已名不副实，这与沧海变桑田有关。

“封台”处黄河故道，今天仍是南皮县境内海拔最高的地方。封钜居住在海滨，耳濡目染，具有海洋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当在情理之中。黄帝发迹于黄土高原，曾在今河北涿鹿打败炎帝、击杀蚩尤，实现了部落融



合，死后葬陕北桥山（一说葬涿鹿像桥一样的山上）。黄帝部落距海洋较远，熟稔农耕知识，但对海洋了解不足。如此，黄帝可能向封钜求教海洋方面的知识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

南皮古县志都将封钜列为儒林之首，指出封钜是炎帝之后，但炎帝与封钜的具体关系不详。《姓苑》记载，炎帝裔孙名钜为黄帝师，认为炎帝有个儿子是神农氏，神农氏生子叫钜。炎帝的孙子是黄帝老师，这种说法不太靠谱。一种观点认为神农氏就是炎帝，炎帝之子钜是黄帝的老师，这就比较符合情理了。还有传说封钜善于驯化野猪，其部落以猪为图腾。封钜在黄帝时接管乐正，主桑林之祭。因此，黄帝也有可能向封钜学习畜牧、音律方面的知识。黄帝开创华夏文明，必定是集各部族智慧的结晶。黄帝向老师们求教，反映出部落融合、相互取长补短、文化大交融的社会进步。

整理百度网上的信息，“封”姓的由来与变迁比较清晰。封钜是炎帝的后人，出自姜姓。封钜一族的封姓是以地（国）名为姓，有两种传说：一种是封钜辅佐黄帝有功，黄帝将他分封在丰沮（今重庆丰都）。“丰沮”与“封钜”同音，称为封钜氏。后世又分为封氏、钜氏；钜氏中有的又改为巨氏，巨姓尊封钜为始祖。另一种传说为夏商时，因对封钜的尊重，将他的后代封到封父（今河南封丘），建立了封国，封国王族以国名为姓，钜由姜姓变为封姓。封姓的来源还有另外两支。即夏商时夔龙氏后裔夔掌乐正，被封为封伯，封伯之子伯封因支持夏朝的仲康而被杀，仲康之孙少康念他舍生取义之功，让伯封之子统领封丘的封人，后人即姓封氏；北魏时鲜卑族复姓是贲氏改为封氏，属于民族大融合中的封姓。显然这两支不是封钜一系人。百家姓姓氏都有自己的郡望（每郡显贵的世族，意即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封姓的郡望是渤海郡，沧县、景县



曾有很多封姓大户。封氏名人有神话传说中的风神封家姨、唐朝宰相封德彝、唐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东汉初在昆阳（今河南叶县）驱使虎狼熊豹作战的巨无霸等。任过渤海太守职务的有封懿、封孚、封之绘三人。

三

有人因渤海郡起于汉朝、对渤海之名起于封钜、对《万姓统谱》载封钜出于渤海郡提出质疑。的确，渤海郡是汉高祖（刘邦）五年〔前202。一说汉文帝十五年（前165）〕设置，但渤海郡与渤海并不是一个概念。秦始皇实行郡县制，但郡县制不是秦始皇首创的，郡县的建置和名称在春秋战国时就已经出现；渤海郡名之“渤海”亦非汉高祖（或汉文帝）发明的，在设立渤海郡时应该已经有了“渤海”的名字。虽然封钜时还没有南皮县、没有渤海郡这是事实，但封钜住地在现南皮境内、南皮曾是渤海郡辖县、南皮县城长时间也是渤海郡郡治、封钜为渤海郡南皮人的说法符合常规，毋庸置疑。

综合各种记载与传说，远古名人封钜有了较完整的人生轨迹。炎帝有一个儿子叫“钜”，原为姜姓。钜居住、发迹于南皮“封台”。钜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具有丰富的海洋知识、畜牧知识、音律知识。“封台”濒临大海，钜给大海起了个名字叫渤（勃）海。炎、黄部落相互融合，黄帝拜钜为师，虚心向钜求教学习。根据钜的特长，黄帝让他掌管乐正，负责主管桑林之祭。钜殚精竭虑，辅佐黄帝治理天下。由于功劳卓著，黄帝将钜封在丰沮，建立封国。封国王族以地（国）名为姓，钜被后人称为封钜。

对于封钜所居的“封台”，在清光绪及民国版《南皮县志》中还有其他诸多佐证。清光绪十四年（1888）编修的《南皮县志》在卷一之《舆地志》中的“丘墓”一节中记载：“张遴豸墓，在县（城）东南五十里，‘封台’之阴”；“张镕墓，在族遴豸墓北”。民国二十一年（1932）编修



的《南皮县志》亦记述了同样的内容。

张遴豸、张镛鏖皆出于宦宦之家、名门望族。张遴豸的先族张淮为明河南按察使，其官至云南大理府赵州知府。张鏖系张遴豸之孙，为清道光乙未（1835）科进士，仕至太常寺少卿。他们祖孙二人将墓葬选在“封台”的北面（之阴），能够说明两点：一是与“封台”相邻，应为风水宝地；二是其时（他们下葬时）的“封台”遗迹应保存完好，甚至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编修县志时，遗址尚存。否则，就不会那样明确的记载于县志之中。

在上古茫茫人海中，封钜作为著名人士留下了大量传说，对他的一生虽然仍是雾里看花，但他的影响已凸显了南皮大地的古老久远，凸显了南皮历史文化的璀璨辉煌。

（杜中洲）



北魏太武帝颁诏褒奖刁雍

北魏时期，渤海郡（今南皮县）人刁雍受命坐镇灵州（今宁夏灵武）11年，他修渠灌溉、发展水运、筑城囤粮，成为开发西北地区的功臣。太平真君十年（449）三月，在一座崭新的仓城建成后，太武帝特别高兴，下诏称赞刁雍能“深思远虑”，并将仓城命名为“刁公城”（故址在今宁夏永宁仁存渡附近），以示表彰。

诏曰：“卿深思远虑，忧勤尽思。知城已周讫，边境无不虞之忧，千载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即名此城为‘刁公城’以旌尔功也。”

因蒙冤投归北魏

刁雍（389—487），字淑和，北魏渤海郡（今南皮县）人。自少年时便胸怀大志，勤于学习，他既习武、又学文，且成绩超众，家庭寄予厚望，乡里人予以好评。

刁雍出身宦官世家，曾祖刁协跟随晋元帝南渡长江，居重镇京口，出任尚书令。父亲刁畅，官居右卫将军。早年朝廷征收赋税，北府兵将领刘裕，欠税钱1万，仗势违时不缴。刁雍的伯父刁逵，强执令其缴付，由此刁刘两家结怨。后刘裕任东晋北府兵将领，率军追杀代晋自立的桓玄，自己代晋称帝，国号宋，即宋武帝（南朝宋的创立者）。因有前怨，杀死刁氏全家，刁雍被人藏匿得免。刁雍遂投奔当时为地方政权的后秦国君姚萇之子姚兴及姚泓。后刘裕又起兵征讨姚兴、姚泓，姚家灭亡。于是刁雍与司马休等人投归北魏，并自请到南部边境为国效命。北魏明元帝晋封刁雍为建威将军，他在黄河与济水之间召集流散人员，并令示他们到边境服役。此举对安定内地起了很大的作用。



明元帝因事到南方巡察，刁雍不辞劳苦，长途奔驰，到行宫朝拜，被封为镇东大将军、青州刺史，诏命其筹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义军，并要求他洞察时局，随时听令，效命皇家。于是刁雍经广泛联络，精心挑选，召集到谯城、梁州、彭城、沛县等地（今河南、安徽、江苏一带）游散兵勇 5000 余人，编成 27 个营、队，驻在济阴，打败刘裕的南宋军。泰常八年（423）任青州刺史。太平真君五年（444），北魏皇帝拓跋焘封刁雍为西北宁夏黄灌区薄古律镇（今宁夏灵武西南古黄河沙洲上）将军。从此，刁雍在这里创建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事业，成为开发西北的首要功臣。

修艾山渠灌溉农田

薄古律镇为西汉时期的灵州县治（今灵武），北魏改为薄骨律镇，为北方六镇之一。其驻地西部，因天旱缺雨，造成土地干裂，禾苗枯死，百姓困苦，人心惶惶。

据《魏书·刁雍传》记载，刁雍一到薄骨律，就对当地情况做了调查研究。他认为：“欲育民丰国，事须大田。此土乏雨，正以引河为用。”他看到当地有个旧渠堰，考察以后，就在上北魏太武帝的表文中称：“富平（今宁夏吴忠）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东西四十五里，凿以通河，似禹旧迹。其西岸作溉田大渠，广十余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计昔为之，高于水不过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于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颓，渠溉高悬，水不得上，虽复诸处按旧引水，水亦难求。”

艾山也叫峡口山，是今日宁夏吴忠市、青铜峡市牛首山、青山的统称。为了集草储粮，发展农业，发挥薄骨律镇作为西部重镇的作用，刁雍决心在艾山黄河河西青山地区（今宁夏青铜峡）修建一条引黄河水灌溉农田的水利工程——艾山渠，渠首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青



铜峡镇。并提出了改造这条旧渠以利引水的办法：“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即沙洲），水分为二。西河小狭，水广百四十步。臣今求入来年正月，于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凿渠，广十五步，深五尺，筑其两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还入古高渠，即循高渠而北，复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大意是：在河西高渠之北8里，分河以下5里，另开一条阔15步、深5尺、渠堤高1丈的新渠，往北四十里和旧渠相汇，再往北80里，干渠总长120里，即可灌溉广大农田。同时刁雍还采取了在小河修坝拦水的办法，“从小河东南岸斜断到西北岸，计长二百七十步，广十步，高二丈，断绝小河”，把水逼入渠道中去。

刁雍所提出修建艾山渠的计划，于太平真君六年（445）春动工，60天完成，渠道长40里，下接古渠道，总长120里。艾山渠建成，可灌官田、民田4万顷。刁雍又对当地的农业生产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一个“节水灌溉法”，即每一旬（10天），灌水一遍；灌水四遍，谷得成熟。这就是说刁雍修建艾山渠采取了先进的引水技术，渠成以后，又采取了先进的农田轮溉方法。原先农夫终年劳动，所收连国家赋税都交不起；渠成后，这里国库充实，民户富足，宁夏平原农业经济获得恢复与发展，迅速成为北魏西北边镇的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艾山渠的兴修，在宁夏开发史和水利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首开黄河上游水运先例

由于艾山渠的建成，农业连年丰收，薄骨律镇从重灾区一跃成为北方输出粮食的大粮仓。

粮食多了，不愁没用处。当时北魏与北方少数民族柔然经常兵戎相见，军粮供应十分紧张。太平真君七年（446），刁雍奉诏调集5000辆车，将薄骨律镇囤积的粮食5万吨运往沃野镇（今内蒙古乌拉特境内），以解决边境军队缺粮的紧急要事。刁雍认为薄骨律镇到沃野800里地，



沿途道路要经过沙漠，还要渡过黄河，车行艰阻，加之逢烈日灼烤难耐，遇大风双目难睁，无法按时运达目的地。初步估算，把这么多的粮食全部运到目的地，至少要费劳力1万人、耕牛1万头，耗时3年时间。这势必影响农民种田，给下一年的农业丰收带来隐患，所以刁雍打算采用黄河水运。他计划在牵屯山（今六盘山北）就近伐木，通过清水河把木料运到黄河岸边，就地造船200只，从水路顺黄河而下，单程5日就可以抵达沃野，三至六个月，就能运粮5万吨，大大节省民力，不费畜力，也不废田。上奏获准后，刁雍调来大批南方造船匠，同年便在中卫香山黄河边一冬造船200艘，每艘载重达26吨。次年，这些船仅用半年时间，顺流而下400公里黄河航程，便将5万吨军粮运达目的地沃野镇。

在刁雍之前，历史上并没有黄河长途运输的任何记载。刁雍用木船在黄河运粮，这在黄河上游水运史上属于首创。

筑“刁公城”屯粮安民

由于宁夏黄灌区开发水平的提高，农业得到大发展，粮食连年大丰收，即使将大量粮食外运，这里囤积的粮食还是多得没有地方存放。太平真君九年（448），刁雍又一次向皇帝上表，他说：自古安不忘乱，薄骨律镇位居黄河平原，地接边城，现在积存的粮食都在露天堆放，安全上大有问题，建议修建一座粮仓城储备粮食。为了不误农业生产，他打算利用一年之内的三次农闲时间，分期施工建筑仓城，然后驻兵守备。得到批准以后，在太平真君十年（449）三月，一座崭新的仓城就建成了。北魏皇帝特别高兴，下诏称赞刁雍能“深思远虑”，并将仓城命名为“刁公城”（故址在今永宁仁存渡附近），以示表彰。

刁雍坐镇宁夏11年，为官清廉，不谋私利，政绩突出，使当地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兵民丰衣足食。他在宁夏历史的画卷中，留下了闪光的一页。他的功绩不但为当世人所颂扬，也为后来人所称赞。



如今，在宁夏银川市海宝公园就立有“刁雍——南北朝治水名臣”的雕像，雕塑展现给大家的是一位正在研究水利图纸、思考治水方案的饱经沧桑的老人。

兴光二年（455），刁雍奉诏还京，被封为特进，仍为将军。以后，刁雍屡次升迁至侍中，都督扬、豫、兖、徐四州诸军事兼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豫、冀三州刺史。

献文帝皇兴年间，刁雍与陇西王源贺及中书监高允等有功之臣，因年已垂暮，皇上特别给予优厚的礼遇，赐给刁雍可以配剑上朝的待遇，并定时派人探视，按季赐发衣服，每月供给上等美味食品。

刁雍性格柔和，待人和蔼可亲，无论官宦还是平民，都愿与其交往，家中经常宾客满座。刁雍关爱别人，尤其同情穷苦人家，凡有所请求者必有周济，晚年有慈善老寿星之称。刁雍信奉佛教，生活恬静寡欲，不随时俗；他崇尚文典，手不释卷，夜晚常秉烛披览，三更不眠。写有诗赋颂及其他文章计 100 余篇。其家教甚严，著《教诫》10 多篇以训示子孙。

承明帝太和八年（484），刁雍因病去世，终年 95 岁高龄，谥“简”。

（叶书龙）



晋成帝颁诏为刁协正名复官

东晋时期，成帝司马衍专门颁诏，为刁协平反、正名、复官。

诏曰：“协情在忠主而失为臣之道，故令王敦得托名公义而实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衔耻。致祸之源，岂不有由！若极明国典，则曩刑非重。今正当以协之有可书，敦之逆命不可长，故议其事耳。今可复协本位，加之册祭，以明有忠于君者纤介必显，虽于贬裁未尽，然或足有劝矣。”

—

刁协（？—322），字玄亮，渤海郡（今南皮县）人。刁协生于世宦之家。祖刁恭，仕曹魏齐郡太中。父亲刁攸，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曾任御史中丞。

刁协曾在成都王司马颖、赵王司马伦、长沙王司马乂下任职，后跟随东瀛公，官至颍川太守。晋元帝南渡期间，任尚书左仆射。朝廷的典章制度，都由刁协制定。为镇东军谘祭酒、长史。元帝时为抑制王导兄弟权势，任刁协为尚书令。

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诛刘隗为名，带兵攻打建康（今江苏南京）。晋元帝派刘隗、刁协、周顗领兵抵抗。刘隗兵败逃亡后赵，王敦攻进建康，刁协在出逃途中被叛逆者所杀。

刁协从小就聪明好学，“好经籍，博闻强记”（《晋书》本传）。成人后学问大增，担任濮阳王文学之职，后转任太常博士、渤海郡大中正等官。“八王之乱”起，刁协先后任成都王司马颖司马、赵王司马伦参军、长沙王司马乂司马及东瀛公司马腾的长史、颍川太守。



永嘉初年，刁协调任河南尹，但其不上任而避乱江东。当时仍是琅琊王的晋元帝司马睿任命刁协为镇东军谘祭酒，后转长史。建兴元年（313），晋愍帝曾召他为御史中丞，但刁协仍留江东不上任。建兴三年（315），司马睿进位丞相，任命刁协为左长史。

西晋灭亡后，刁协随王室南迁。刁氏于西晋末年南迁京口（今江苏镇江）。太兴元年（318），司马睿登帝位，刁协官拜尚书左仆射。当时政权新建，典章制度未立，因刁协曾在朝中任职，学识丰富，久历官场，经验较多，所以，在东晋初年，一切规章礼仪制度都由刁协主持制定，深受时人称许。太兴初，升任尚书令，后加紫金光禄大夫。

二

刁协为人刚正强悍，待人接物不习苟且，所以方正难犯，再加上他极力维护司马氏的皇权，推行崇上迎下、排抑豪强的一系列“刻碎之政”，以对抗王导等豪强势力，对当时的门阀士族参政者多有抨击贬抑，所以被王氏家族所憎恨。但刁协办事认真，尽心尽力，力图恢复晋室旧业，因而深受晋元帝司马睿的信任。不过刁协爱喝酒，酒后多放荡不羁，多次饮酒后辱骂欺凌其他文武大臣，搞得左右不睦，“见者莫不侧目”。再加上他为维护王权、削抑门阀，曾经“使奴为兵”。就是将中原南迁百姓在扬州各郡沦落为大族僮客（即家奴）的人免除其僮客身份，让这些人恢复平民百姓的地位。采取这样的措施，并不是为僮客着想，而是要把他们从大族手里挖出，用他们来为朝廷服兵役、劳役。这一措施使许多大族蒙受损失，引起他们的怨愤。刁协还曾“取将吏客使转运”，就是直接派军队去地方监督收取军费，以减少士族盘剥。这两条，使刁协四面受敌。但因有元帝庇护，也一时无虞。

东晋南渡后，实权操在王、谢等士族大姓手里，司马氏自然不甘大权旁落。晋元帝结纳了刘隗、刁协、周顛、戴渊等庶族子弟，引为亲信，



意图灭绝王氏。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由刁协提出的在扬州等地“使奴为兵”，将诸郡大族家奴调集以训练成军，充实军力以与王氏开战。王氏家族中拥有军权的王敦，不甘坐以待毙。永昌二年（322）一月十四日，王敦举起“诛刘隗，清君侧”的大旗，先发制人，从武昌（今湖北鄂州）起兵向建康（今江苏南京）进发。

三

在王敦起兵的同时，他的心腹、宣城内史沈充从吴兴（今浙江湖州附近）起兵响应，攻占吴郡，也向建康进发。这样，王敦军与沈充军就形成了合击建康的态势。

尽管元帝命令镇北将军刘隗、征西将军戴渊、尚书左仆射周顛、尚书右仆射王邃、将军周札、尚书刁协等多路兵马守城迎敌；又发诏令，让梁州刺史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广州刺史陶侃领江州刺史，各率兵马攻击王敦军的后方，自己也亲自披挂上阵督战。但由于众多不满刁协“征奴为兵”政策的门阀士族对王敦的支持，使得王敦进军神速，一路上没有遇到顽强的抵抗，兵锋直抵建康，很快便攻陷建康的军事要地石头城。

面临此种境况，刁协与刘隗仍护卫元帝于皇宫中，准备殉国。当时三人在太极殿东厢，元帝握住刁协、刘隗二人的手，痛哭流涕，劝他们赶紧逃走。刁协当即表示：“臣当守死，不敢有贰。”元帝几番劝解，又命人将马匹牵来，催其速逃。无奈之下，二人才乘马各自逃命，刘隗逃至西北胡人中。刁协年老体弱，骑不住马，请人帮忙保护，但因为平素得罪人太多而无人愿从，慌乱中在建康城外的长江边上，被乱兵所杀。士兵将刁协的头颅斩下送交王敦，由王敦派人收葬。元帝知道刁协被杀十分悲痛，秘密收买人员诛杀了送刁协头颅给王敦的人。不久，元帝也忧愤而死。然而，世人不知真相，都认为刁协是临阵脱逃而死。



历史名人与南皮 ◎ 文化丛书 ◎

王敦之乱后，被王敦诛杀的周顛和戴渊等都被恢复名位并获追赠，但刁协却因出逃而不能获同等待遇。刁协死时，其子刁彝尚年幼。因父亲蒙逃奔恶名，得不到朝廷体恤。刁彝暗下决心，潜心军功。成人后，斩杀害其父者数十人，持头颅前去刁协墓前致祭，然后投案自首，世人惊叹。

恰逢朝廷开议王敦之乱，在刁彝请求和丹杨尹殷融及左光禄大夫蔡谟、尚书庾冰请加褒典下，为刁协正名复官。晋成帝司马衍追赠刁协为尚书令，祀以太牢，赠金紫左光禄大夫、太尉，谥曰“威”。并免去刁彝死罪，一时举世皆知刁彝之名。

现在的南皮县刁公楼村，其村名即是因刁协修“尚书楼”而得。

(叶书龙)



唐德宗李适奖赏贾耽在地图学上的杰出贡献

唐代著名地理学家、方志学家贾耽为南皮人，他入仕 47 年、居相 13 载，在政务繁忙的情况下，博览各种有关图书资料，积 30 余年之功，先后绘制了《关中陇右山南九州等图》《大唐国要图》《陇右山南图》《海内华夷图》；并撰成《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 卷、《贞元十道录》4 卷、《皇华四达记》10 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 卷、《吐蕃黄河录》4 卷等著述，得到了德宗李适的赞赏。德宗还特意下诏赐贾耽锦彩 200 匹、袍缎 6 件、锦帐 2 个、银瓶银盘各 1 个、银榼 2 个、马 1 匹，并晋封为魏国公。

唐礼部尚书权德輿（字载之）在为贾耽所撰墓志铭中曰：

“……博闻强识通天下之志，斯不可及已。……撰《海内华夷图》及论次地理之书，凡五十有五卷。贡在中禁，传于域内。言方志者，以公名家。”

出仕为官 政绩显赫

贾耽（730—805），字敦诗，唐代南皮人。青少年时期勤奋读书，唐天宝十载（751），21 岁的他以两经登第（考中）走上仕途。乾元元年（758）授贝州临清（今河北清河）县尉。以后继任绛州正平（今山西新绛）县尉。处理日常政务中，表现出“器重识高，涵泳万顷”的良好素质，颇得太原尹王思礼赏识，授度支判官。后转试大理司直监察殿中侍御史。

上元二年（761），擢为检校缮部员外郎兼太原少尹、侍御史、北都副留守、检校礼部郎中。大历八年（773）迁汾州刺史。在郡 7 年，政绩



茂异。大历十四年（779），提升为鸿胪卿兼左右威远营使，负责接待入朝使者和出使归臣的工作。同年十一月五日，以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梁州刺史、山南西道节度观察度支营田等使，加朝议大夫，封广川男。时值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起兵谋反，贾耽受命领麾下沿江东讨伐，所向皆捷，荣立军功，给予加银并赐青光禄大夫的嘉奖。建中三年（782）迁任检校工部尚书、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使。兴元元年（784）迁任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东都畿汝州都防御观察等使。因德政兼优，得到德宗皇帝的信任，下诏特许贾耽在近郊狩猎。

贞元二年（786）平讨李希烈有功，加东都畿唐、汝、邓都防御观察使。同年九月十一日任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滑州（今河南滑县）刺史，充义成军节度使，郑、滑等州观察处置使。

贞元九年（793），贾耽以64岁高龄奉旨入觐，五月二十七日任尚书右仆射司中书门下平章事。“朝廷为之室，廊为之重，天下以之信向，蛮夷以之怀来，加金紫光禄大夫”。而后转任左仆射，依前平章事，迁检校司空，封魏国公。

贞元十二年（796），贾耽因健康原因，首次上表提出辞呈。表曰：“荏苒四年，昧于摄生，素有多病。眼有盲膜之疾，耳闻风雨之声。自赵憬云亡，卢迈染患，忽忽惊悸。旧疹顿加，尸素之中，视听不逮。……省躬量力，诚所不任。非求退让之名，实为官谤所迫。伏希圣鉴俯察恳诚，无任惶迫切之至。”辞呈未予获准。

贞元十三年（797）又以疾避相位，未允。永贞元年（805），贾耽的健康每况愈下，病疾日益严重，于三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七日、五月二十日、七月二十日、八月八日、十月一日，他接连6次上表，陈述“残年沉痾，渐不支持”“顾兹朽质”“枕席缠绵，形神清耗”“大病之期，晦明难保”“伏乞赐臣骸骨，收臣印绶”“无任量力恳迫之至”。请求乞退的表文，情真意切。可是，顺宗皇帝仍未批奏。最后，贾耽病逝于长安（今陕西



西安)光福里的私宅,居相位13年,顺宗皇帝废朝四日,册赠太傅,谥号“元靖”,享年76岁,葬于家乡南皮。

贾耽生活在唐王朝由繁荣昌盛的顶峰走向衰落的转折时期。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政治活动,长期在地方和朝廷任重要职务,目睹了国势衰落边疆多事的情景,深表忧虑。常说“率土山川,不忘寝寐”,盼望早日收复失地,恢复领土完整,胸怀强烈的爱国热忱。

收集资料 绘制地图

贾耽在年轻的时候,就好闻方言,喜欢地理。为官之后,更潜心研究地理近30年。他一生为官47年,其中居相位13年,事务繁忙,政绩显赫。并根据国家的需要,充分利用各种机会,结合政治、军事研究,考察地理。他注意搜集各种资料,一方面“采掇舆议”,进行广泛的调查采访。对邻近国家和部落及乘船前来朝拜的使者所提供的地理民俗,都认真加以研究考察,弄清来龙去脉;访求使者的居住之地、往来的商人、少数民族的遗老,认真听取他们叙述,选其重要的加以记录。对民间流传的琐语、风谣小说,也都去伪存真。在任鸿胪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凡外国派来的使者或出使国外回来的人,都向他们详细询问国外山川地理的情况,并对各国的地理、风俗进行研究,考究源流。在任山南节度使期间,对山南、陇右、关中的地理进行了仔细的考察研究。另一方面,他“寻研史牒”,经常查阅中央和地方保存的旧有图籍,收集文献记载的古名故地,对“九州之夷险西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从而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通过多年努力,积累起了丰富的地理知识,为以后的地图绘制与地理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代前期强盛。唐初,疆土急剧扩大,唐太宗征服突厥后,周边少数民族纷纷内附。为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在民族地区设立州县,规模较大的称为都护府,先后设立府州856个,称为“羁縻州”。随着羁



縻州的设立，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迅速增多。唐玄宗时，大宛国所贡骥骝宝马充乐宫中内厩。唐德宗时，泸南贡丽水之金，漠北献余吾之马。

由于少数民族叛附不定，唐朝对少数民族采取了叛者征讨、附者派使者安抚赏赐的方法。这样，唐朝统治者迫切需要掌握了解各民族活动地域的准确位置、羁縻州与内地的交通通道等情况。天宝年间，唐玄宗曾问诸番国之远近，鸿胪卿王忠嗣上《西域图》，图上只有十几个民族地区。贾耽顺应历史的需要，凭借自己丰富的历史地理知识和爱国热情，为了巩固边防需要，同时宣扬大唐圣德，对唐朝内地通往周边少数民族和国外交通地理进行了仔细研究，归纳出通往周边少数民族和国外的7条主要通道。这7条通道有：从营州入安东道；从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广州通海夷道。这7条道路上的山川聚落、封略远近，贾耽概举其目。《新唐书·地理志》卷七下记载了贾耽研究出的这7条道路的详细情况，根据这些记载，这7条道路可以通往高丽（今朝鲜）、东京（今越南河内）、中亚、印度、巴格达。《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成为后世研究边疆地理与民族史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天宝年间后，唐开始由强盛走向衰落，各少数民族纷纷叛唐。贾耽有感于吐蕃攻陷陇右多年，国家疆土内缩，人们对陇右地理已不熟悉，职方失其图记，境土难以区分，便绘制了《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牧场相连的洮湟流域、控带朔陲的甘凉右地、歧路的交通标记、军队防御的重要屏障，全都匠心独运地据实绘出。如果皇上要遣将守边，灵州、庆州所设立的险要从图上一看便知。如果重新下诏在这些地区设立邵州、原州、会州当时的疆域也可以在此图上找到。诸州诸军，需要了解其道里人物；诸山诸水，需要说明其首属源流，图上不能全部绘出的，又撰《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别录》6卷。另外，他还对四渎之宗的黄河、群羌



之师的西戎进行研究，著《吐蕃黄河录》4卷。贾耽将图与著作献给德宗，德宗看后大加赞赏。

兴元元年（784），贾耽奉德宗之命，着手绘制全国大地图。虽然他不久便充使魏州、汴州，出镇东洛、东邵，但他在繁忙的政务中始终不忘德宗之命。经过多年地不懈努力，到贞元十七年（801），终于绘成了《海内华夷图》。据后世学者估计，此幅地图所包括的范围，从东到西达3万里，从南到北达3.3万里。此图注重外域，故此称华夷图，其所绘国外部分，经当时外国使者验证，准确无误。

贾耽绘此图的目的是力图要把唐代统一强大的全貌表现出来，因而图幅很大，“广（宽）三丈，纵（高）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缩四级于纤縞，分西郡于作绘。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为了绘制此图，他花了30多年时间阅读文献，调查探访，认真选取资料。贞元十七年（801）图成，献给朝廷。此图今佚，但据贾耽写的献图表文及有关记载尚可得知此图有三个特点：

1. 图的幅面大，载负量亦丰。由于贾耽采取“多闻阙疑，讷敢编次”的严肃态度，图中内容当是翔实可信。除绘有国内及毗邻边疆地区的山川、政区形势之外，对域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名称、方位、山川等内容，亦有适量的记载，称它是小范围的亚洲形势图，并不言过其实。

2. 有统一的比例尺。图中采用一寸折地百里（相当于1:1800000）的比例尺绘制而成。图形轮廓比较准确。

3. 图中的地名古今并注，“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今古殊文”，开我国以两种颜色标注地名的先河，此法一直为后世的历史沿革地图所沿用。

贾耽在给德宗上书时称此图：以高山大川为框架，对中原与少数民族之地加以认真地区别划分，将四极之地、百郡分布画在地图上，九州



广袤，水陆交通之地，在此图上一览无余。宋神宗时期，宋人将贾耽的《海内华夷图》按 1/10 的比例缩小刻在一块石碑上，碑长宽各为 3.42 尺，图名刻在上边的中央，四边注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图上画有河流、湖泊、山脉、长城以及州府名称。长江、黄河、海岸线、洞庭湖等的轮廓大致相当。在图的四周，记载着边境国家的名称及他们内附的经过。在图的右下角注有：“其四方蕃夷之地，唐贾魏公所载，凡数而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又参考待记以叙其盛衰本末。”此段文字说明此图即为贾耽《海内华夷图》的缩本。此碑现存于西安碑林。

《海内华夷图》的问世，是晋地图学家裴秀首创的“制图六体”之后的创新和发展，在他之后 500 年间一直未被人重视和采用，濒临失传的紧要时刻，被贾耽继承下来。“制图六体”从此起衰振微，对后世的地图制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使贾耽成为继裴秀之后中国地理地图史上又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他主持绘制的《海内华夷图》以其独特之长，展现唐代的制图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峰，是中国地图史上一颗绚丽的瑰宝，其在世界绘图史上也享有盛誉。

研究地理 撰写著作

在绘制《海内华夷图》的同时，贾耽还撰写了《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皇华四达记》和《吐蕃黄河录》3 部地理书籍，充分证明贾耽是中国最早对南海部分岛屿作记述的人物。贾耽在书籍中的地理记述成为中国对外宣示领土和海权的重要依据，对今天维护中国南海领土完整具有现实意义。

《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 卷，形式上是《海内华夷图》的文字说明，但其图、说各自独立成篇，视它为总地方志性质的地理著述亦不为过。“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即班固《汉书·地理志》）发源；郡县记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凡诸疏舛，悉从厘正”。如“前



地理书以黔州属酉阳，今则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国为安息，今则改入康居”，可见贾耽对历代地理沿革、边防及城镇都会的变迁、各地人口增减的考订，大大超过前人。对当时政治、地理、物产、经济状况的叙述，也比较完备。此书已粗具方志特征，对后世地方志的编纂有深刻地影响，2006年版《沧州市志》在概述中称贾耽“在中国方志学和地理学史上做出了突出贡献”。

《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在地名、沿革、自然和人文、经济、地理等方面，有详细的考订与记述，但篇幅却过于冗长。因此，贾耽“又提其要会，切于今日”，将40卷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压缩、改写为《贞元十道录》4卷。书已佚。清代文学家、考据家王谟的《汉唐地理书钞》有辑本。

20世纪前期，在敦煌鸣沙山石室中发现了唐人手写古籍《贞元十道录》的残页，为现存地方志中的最早写本。所谓“十道”，指唐贞观元年（627）依自然形势分全国为关内、河南、河北、河东、山南、陇右、淮南、剑南、江南、岭南十道。“十道”是唐贞观年间的政区设置，贞元时已不存在。贾耽借用当年的政区概念，以便分卷叙述州郡的建置沿革，四至道里、物产贡赋、镇戍设置等内容。每卷有图，与文相应，开卷尽在，披图朗然。书中显见其擅于考订的深厚功力，并就当时图志中存在的错讹，提出12条订正意见：“若护单于府，并马邑而北，理榆林关外，宣隶河工；乐安自乾元后，河流改故道，宣隶河南。合州七郡，北怀隶陇坻、南与庸、蜀，回远不相应，宣于武都建都府，以恢边备。”订正之处多在边疆和四方蕃国。至于“《六典》地域之差次，四方贡赋之名产，废置升降，提封险易，因明制度，皆备于编”，并作详细叙述。该书粗具方志规模，对后世总志、地方志书的编纂，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皇华四达记》10卷，原书已佚。从《新唐书·地理志》的引文中，



得知此书的大概内容。贾耽常与域外来使及出使归来者接触，因而掌握了大量的域外地理资料。后来他将这些资料加工整理，编写成书。《皇华四达记》即属此类。书中有丰富的域外地理知识。其中写道，唐“入四夷之路与关戎走集最要者”有通道7条，通过这7条交通路线，与周围的亚洲各国保持着密切频繁的往来，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在《广州通海夷道》中，还详细记述了从广州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跨越印度洋，至印度、斯里兰卡，直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航线、航程，以及沿岸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方位、名称、岛礁、山川、民俗等内容。穿越马六甲海峡这段航路时写道：“又西日行，到军突弄山（即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峡（即新加坡海峡、菲利普海峡和马六甲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南（即马来半岛的南部），南岸则佛逝国（即室利佛逝国，指苏门答腊的东南部）。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词陵国（在今爪哇岛中部），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三日至葛葛僧祇国（全在不来罗华尔群岛中）。”这是中国关于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海上交通咽喉的最早记录。

航船进入波斯湾后，有这样一段记述：“又自提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在波斯湾头奥波拉以东近阿巴丹处），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船人夜行不迷。”海中立立的“华表”“夜置炬其上”，就像今天在航路上设置的指引船舶夜航的航标灯。夜间有此灯导航，船舶不至于触礁和迷失方向。唐代，广州港亦建有十数丈高的航标灯，时人称“光灯”。航标灯的出现，是古代劳动人民在与海洋的征战中取得的成就。

早期的丝绸之路。《新唐书·艺文志》记有地理学家贾耽所著的《皇华四达记》书名，全书已佚，原七道只剩下五：西安入西域道；六：安南通竺道；七：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录了唐代中国经交州、广州通西域、印度，远至巴格达的通道。



贞元十四年（798），贾耽完成了以黄河命名的著作——《吐蕃黄河录》10卷，这是《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的文字说明，包括《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别录》6卷和《吐蕃黄河录》或称《河西戎之录》4卷。此书图文并茂，记载吐蕃境内“诸山诸水”的“首尾源流”。惜其书和图均已失传，现已无法知道其中的具体内容。

《海内华夷图》和《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呈给德宗后，德宗特意下诏赐贾耽锦彩200匹、袍缎6件、锦帐2个、银瓶银盘各1个、银榼2个、马1匹，并晋封为魏国公。

除绘图与地理学成就外，贾耽还著有《备急单元》《翰林内志》《唐七圣历》等著作，这些著作也都已失传。

贾耽一生最主要的成就不仅在唐三朝为相，更重要的是绘制各类地图和撰写大量的地理著作。他创新的科学绘图方法，不仅为历史沿革地图所使用，而且在世界绘图史也享有盛誉，不愧为中国地图史上划时代人物。

（孙九如）



宋太宗、宋真宗赐钱嘉奖贾黄中

贾黄中是北宋名臣廉吏，仕至参知政事，赠礼部尚书。宋太宗赐钱30万给贾黄中，嘉奖他的廉洁无私。贾黄中去世时，真宗皇帝闻听他一生贫困，又特地赐钱30万。安葬以后，他母亲入朝谢恩，真宗又赐白银300两，用来表彰贾其母教子有方。

贾黄中（945—1001），字焞民，北宋南皮人。曾任翰林学士、给事中、参知政事、礼部侍郎、秘书监等职。贾黄中留给人们的记忆符号有三：一是“著作等身”，读书甚多，著述颇丰；二是廉洁无私、不隐遗财；三是举贤荐能，多选拔和推荐能文有德的贤士。

北宋建隆初，贾黄中15岁中进士（科举探花），被授为校书郎和集贤校理，又提升为著作佐郎、直史馆。建隆三年（962），迁左拾遗，历左补阙。开宝八年（975），通判定州，判太常礼院。多识典故，每详定礼文，损益得中，号为称职。雍熙二年（985），主管科举；不久，又掌管吏部对官吏的选拔。前后两次掌管科举考试，多选拔出身寒微而又有学才之士。咸平四年（1001）以疾卒，年56，赠礼部尚书。有《文集》30卷、《神医普救方》1000卷，《宋史》有传。

任采访使 安定边区

贾黄中是宋初有名的体恤民情的官吏。岭南地区平定以后，朝廷任命贾黄中做采访使，即掌管检查刑狱、监察州县官吏。贾黄中廉洁正直、处事公平、待人宽恕，使边远地区的人民感到安适。回朝后，上奏了几十条兴利除害的建议，都符合皇帝的心愿。适逢宋军攻克江表，贾黄中



被选拔任宣州知州。此地饥荒三年，百姓有很多人被迫沦为盗贼。为救济灾民，贾黄中拿出自己的俸禄买米熬粥给饥民，靠这种办法保全活下来的有上千人。同时，他还想办法禁止盗贼，消除匪患，于是盗贼全部解散离去。

廉洁恭谨 不隐遗财

贾黄中是宋朝廉吏。宋太宗时，贾黄中升为礼部员外郎。太平兴国二年（977），出任升州（即五代时的金陵，今江苏南京）知州，南唐国都就设在那里。当时金陵刚归附宋朝，贾黄中治理政务简便易行，所制区域治理得很好。

贾黄中初至任所，一天，巡视府衙时，偶然发现有一间闲置的屋子被锁得严严实实。他很奇怪，命随从打开锈锁，进屋查看。进到屋里，贾黄中和随从一下子都惊呆了，屋里并排放着几十个巨大的柜子，柜子上都贴着封条，上面落满了厚厚的灰尘。贾黄中问：“这是何时之物？”随从们摇了摇头。待拂去柜子上的灰尘，他才看清封条上的字迹，原来是南唐国主后宫的遗物。这时，负责管理财物的差吏凑到贾黄中的耳边道：“禀大人！从来无人知道这些存物，账目上也未登记。”其他差吏一个个喜形于色，准备动手开柜。贾黄中把脸一沉，喝道：“且慢！”他急命人把整个府衙里的僚佐差吏全部召集前来，然后当众启封开柜。柜内装的全是金银珠宝。经过清点，总价值在数百万金以上，贾黄中命差吏将这些财物一件不漏地登记造册，并如实上报了朝廷。

宋太宗看到奏章后，感叹道：“如果是贪官，连府库中登记过的财物也会被他盗入私囊，何况遇上亡国之遗物呢？”于是他赐钱30万给贾黄中，以嘉奖他的廉洁无私。



掌管科考 选拔德才之士

贾黄中父亲去世服丧，丧期未滿而复职。太平兴国五年（980）召回朝廷。有人举荐贾黄中博学能文，召赴中书考试，拜驾部员外郎、知制诰。太平兴国八年（983），贾黄中与宋白、吕蒙正等共同主管科举，后提升为司封郎中，充任翰林学士。雍熙二年（985）又主管科举，不久掌管吏部，负责对官吏的选拔。端拱初年，加官中书舍人；后又兼任史馆修撰。

贾黄中前后两次掌管科举考试，多选拔出身寒微而又才能杰出的人，除授拟定官吏，品评鉴定等级，十分恰当。淳化二年（991）秋天，与李沆一起官拜给事中、参知政事。宋太宗召见他的母亲王氏，让她坐下，对她说：“把孩子教育成这样，您真可以和孟子的母亲相比了。”并且作诗送给她，赏赐的财物也很丰厚。

举贤荐能。贾黄中一向看重吕端的为人，恰好吕端要出京镇守襄阳，贾黄中向皇上极力推荐挽留吕端，于是吕端留在朝中担任枢密直学士，后任参知政事。当时能文有德的贤士，多由贾黄中推荐，然而他从未向别人说过，人们也不知道这些事。由于贾黄中为人太过小心谨慎，中书省的政事常拖延得不到解决。淳化四年（993）冬，与李沆一同罢守本官。

幼年苦学成典故

贾黄中5岁就跟着父亲读书，有“等身书”之说；他在宋朝为官时，办事过分认真、谨慎，有时把大事拖得办不了。后由此引申了一些成语流传下来。

著作等身。贾黄中之父贾玘是进士出身，贾玘宋初褪去布衣开始从政。历任刑部郎中、终水部员外郎、知浚仪县，70岁故去。贾玘严毅，善于教子，士大夫子弟来拜见，玘必会谆谆教诲而引导他们。



贾黄中年幼时非常聪明，刚满5岁，便跟着父亲读书。每天清晨，父亲命他规规矩矩地站立着，把一天所要读的书展开来，量其长度，同他身体的高度相等，并名之曰“等身书”，用这样的方法督促他读书。后引申为“著作等身”，并作为成语流传下来。

小心翼翼。贾黄中办事过分认真、谨慎，遇到大事往往不能当机立断。淳化五年（994）为襄州知州，上言母亲年老请求留在京城，改为澶州知州。辞行之日，皇上告诫他说：做事恭谦，小心谨慎，不论是做君的还是做臣的都应该这样，但是太过分了，就失去了大臣的身份。原话：“夫小心翼翼，君臣当然，若太过，则失大臣之体。”贾黄中叩头拜谢。皇上因而对待臣说：“我知道他的母亲有贤德，70余岁未觉年老，每次与她交谈，聪明机敏。”

忧国病故 母嗣蒙皇恩

宋太宗曾叹言：贾黄中终日忧虑，必定在他母亲之前去世。皇上看着参知政事苏易简说：苏易简母亲也像她一样，自古贤母不可多得。苏易简上前道谢说：“陛下以孝治天下，勉励推及大臣的亲人；我是什么人，受到这样荣耀的恩遇。”至道初年（995），贾黄中患病，诏令返回朝廷。

立太子时，选择大臣中有道德威望的人做宾客僚友，贾黄中入选。因久病，改命李至、李沆兼宾客；贾黄中也特授为礼部侍郎，接替李至兼秘书监。贾黄中一向酷爱文献典籍，官居内阁以后，很是欣慰。

咸平四年（1001），贾黄中因病去世，年56岁，他的母亲还很健康，终究如同皇上的预言。赠官礼部尚书。

贾黄中去世时，在位皇帝为真宗。真宗皇帝素知他一生贫困，特地赐钱30万。安葬以后，他母亲入朝谢恩，又赐白银300两，用来表彰贾黄中为官廉洁无私；表扬他母亲教子有方。

（孙九如）



清康熙皇帝驻蹕南皮白塔寺

在民国《南皮县志》之《大事记》中记载：“圣祖康熙八年（1669）冬十月，车驾巡幸至境内，驻蹕白塔寺西两宿。因阻雪也。”

这段文字说明，清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在康熙八年（1669）出巡时，曾因大雪在南皮县白塔寺西住宿两天（两宿）。详细情况没有记述。

然而，在当地民间却有一个流传至今的故事。

南皮白塔寺是南皮见于史籍最早的寺院，位于县城东北25里处，现为大浪淀乡白塔寺村所在地。

南皮是全国少有的先秦古县，历史悠久，古迹众多，寺院、庙宇、坛祠曾遍布全县，史载为86处。至今，南皮县辖内以“寺”为名的村还有很多。如焦山寺、观音寺、王寺、白塔寺、龙门寺等。据资料记载，始建于汉代的白塔寺，是南皮最早的寺院，现遗址面积达4.5万平方米，土台高1.5米，文化层厚3米，砖、瓦碎片等随处可见。

曾经的白塔寺巍峨壮丽，香火极盛，尤其是白塔顶上的“风磨铜”，更是美轮美奂，越是刮风天越是金光闪闪，在几十里外就能望见。明永乐二年（1404），有山西过来的移民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就在寺北建宅居住，逐渐形成村落，遂取名“白塔寺村”。再后来，由于清廷皇家觊觎此宝，设计巧取豪夺。没有了“风磨铜”的白塔寺颓势日显，香火稀少，以致最后荒芜、倒塌、湮没。

关于清廷夺取白塔寺“风磨铜”的经过，当地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说是康熙皇帝在出巡时，被大雪困在了白塔寺，因而发现了塔



顶伞盖上的“风磨铜”及其奥秘。此事在民国《南皮县志》中曾有记载：“圣祖康熙八年（1669）冬十月，车驾巡幸至境内，驻蹕白塔寺西两宿。因阻雪也。”由此可见，清廷巧夺“风磨铜”的事并非空穴来风。

还有一种说法是，乾隆皇帝南巡时，沿运河行进路过南皮段，远远望见了白塔寺塔顶伞盖上闪闪发光的“风磨铜”，便命侍卫前去查看，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并将这个铜质伞盖运到京城，后被安装到了北海白塔的塔顶之上，使现在的北海白塔形成了“双层铜质伞盖”的奇观。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现在还难以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淳朴敦厚的白塔寺村民们津津乐道于这个传说，既是对辉煌历史的一种怀念，更是对美好前景的一种期许和向往。

然而，清康熙皇帝驻蹕南皮白塔寺应该是一个不争的史实。

（赵树森）



清乾隆皇帝诗祭尹吉甫墓

清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春二月南巡至南皮时，命吏部侍郎曹秀先祭尹吉甫墓，并立碑以志。

碑阳题曰：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春二月，侍郎曹秀先遣祭周尹吉甫墓。回召见，请题诗以表之。因成是章。诗云：‘表闾旌淑重时巡，古墓遣官例致禋。为请七言用彰德，遐思千载率驰神。刚柔还以山甫勗，孝友惟应张仲伦。虚说长年尚余树（乐史《寰宇记》载：墓有树二株，柯条郁茂，不觉其老，俗呼长年树。询之曹秀先，今无有矣），清风永世属斯人。’”

碑阴题曰：

“周卿士尹吉甫墓碑。大清乾隆三十有六年辛卯岁二月，皇帝南巡履南皮，命吏部侍郎曹秀先肃往周尹吉甫墓奠酒如礼。维时，候补知县张鉴、南皮知县颜天荣咸与于执事。於戏，吉甫周贤臣也。秉为宪之望，擅肆好之长。千余年后，圣人优异加礼，荣贵泉壤，以为臣鹄，其视此哉！凡厥里人，墓田不耕，樵苏有禁，即《烝民》诗之四言乎，允宜述其事以诏来者。新建曹秀先记并书，颜天荣视刻。”

尹吉甫墓位于南皮县城西5公里、南皮镇黄家洼村西南。此墓是南皮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座古墓，现封土高1.9米，东西长5米，南北宽2.5米，呈矩形。当地民众为了纪念这位非凡的历史人物，习惯称其墓为“将军坟”。2007年10月，南皮县地名委员会将县城的一条主要街道，即临近尹吉甫墓的京台高速公路南皮延伸线，命名为“将军路”。

尹吉甫（？—前780，一说前852—前775），即今伯吉父，西周封钅



(今南皮)人，姓兮，名甲，字伯吉父（亦作甫），西周宣王时为内史大臣，执掌周王室的政策法令。遗物有“兮甲盘”。

周宣王即位后，北方獫狁大肆入侵。宣王五年（前823）六月，大将尹吉甫受命率师北伐。由于其治军有方，用兵如神，周朝军队所向披靡，獫狁军闻风丧胆，很快把獫狁部队击退至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部），胜利凯旋。《诗经》中的《小雅·六月》就是记述、讴歌这次战斗的诗篇，全诗详述了征战的经过，称颂了尹吉甫的卓越才能和赫赫战功，其中有这样的词句：“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此役使尹吉甫威名大震，因功被宣王授予内史大臣。

尹吉甫班师回朝后，又奉命统率军队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东）一带，征收南淮夷少数民族的贡赋，为宣王中兴立下了汗马功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深受周王室的倚重。宋代南皮有西周晚期青铜器“兮伯吉父”盘（即“兮甲盘”）出土，内有铭文133字，记录了尹吉甫征伐北方獫狁和征收南淮夷贡赋的史实。

尹吉甫不仅武略盖世，而且文才超群，后人称赞其“武以威敌、文以服众”“事业文章、炳然千古”。他的诗作《崧高》《烝民》都收入《诗经·大雅》，诗中的“小心翼翼”“明哲保身”等作为成语流传至今。其子伯奇，遭后母之变见逐，作《履霜操》以明其志。相传死后化鸟，哀鸣悲切，闻者堕泪，名曰“伯劳”。

遗憾的是，乾隆表墓的碑刻中虽有“凡厥里人，墓田不耕，樵苏有禁”之语，但墓碑仍于“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毁坏，后重修。1982年7月，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尹吉甫墓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实际上，尹吉甫的文治武功，一直受到人们的推崇。自清康熙、乾隆年间始，在南皮现存的5部古今志书中都收录了尹吉甫的传记。在沧州市社科联主席商宗岳主编、于2005年出版的《沧州古今名人传略》中，尹吉甫作为沧州范围有记载的最早的历史名人，被收于传略之首。



历史名人与南皮 ◎ 文化丛书 ◎

2006年9—11月，沧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沧州日报社联合评选出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沧州十大名人”，其中入选的南皮3人（尹吉甫、贾耽、张之洞）中，尹吉甫居首。南皮县于2010年兴建，2012年建成的“香涛公园”，是南皮县城最大的开放性公园，在公园入口处，矗立由南皮县志编纂人员创作、经县人大常委会审定通过的石刻——《香涛公园赞》，其曰：“……古邑南皮，水陆要冲，渤海郡治，九州称雄。名人荟萃，文脉勃兴，太公垂钓，吉甫破戎。不疑鲍宣，史留直声，名相贾耽，制图尤精。……状元山水，神秀骨清，文襄勋业，伟人有颂……”记述和颂扬了姜太公（吕尚）、尹吉甫、隽不疑、鲍宣、贾耽、张之万、张之洞等南皮的历史名人。在公园内的文化墙上，塑有尹吉甫的铜像并附其生平简介，展示了这位先贤的非凡业绩，给后人提供了以资借鉴的历史启示，亦即墓碑中提及的“允宜述其事以诏来者”。

（赵树森）



附一：

尹吉甫与《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是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而《诗经》中唯一既是诗歌中的主人公，又是其中的作者和采集者的尹吉甫，就是西周封钜（今南皮）人。

《诗经》本来只称《诗》，儒家列为经典之一，故称《诗经》。与《周易》《尚书》《礼记》《春秋》并称为五经。又因《诗经》由毛亨、毛萁所传，故后人称毛诗。

对于《诗经》的成因，虽然在学术界存有争鸣，但传统的观点普遍认为，尊为“中华诗祖”的尹吉甫不仅是《诗经》的作者之一，而且还是主要的采集者（有台湾著名学者考证，尹吉甫是《诗经》全部305篇诗歌的唯一作者；清乾隆年间大理寺卿、博野尹嘉铨亦在瞻拜尹吉甫墓后赋诗云：“当年作诗存三百，奕叶清风启后人。”），史料记载他：“文以服众，武以威敌”“事业文章，炳然千古”。

尹吉甫（前852—前775，一作？—前780），即兮伯吉父，西周封钜（今南皮）人。曾辅佐周宣王修文武大业，实现周朝中兴，官至内史。

宣王五年（前823），尹吉甫受命率师北伐进犯的獫狁。由于他治军有方，用兵如神，将士英勇冲杀，所向披靡，周朝军队大获全胜，反攻至太原后凯旋。此役使尹吉甫威名大震，因功被授予内史大臣。

尹吉甫不仅是战功卓著的名将，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其诗篇为世人保留了西周时期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录。尹吉甫的诗，即有自传性，更具有历史性。比如，在《诗经》之《小雅·六月》中记述尹吉甫大败獫狁时，就有这样的诗句：“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尹吉甫的诗篇，是中国的伟大史诗。其写诗手法的多样性和独特性、遣词用句的灵活性和全面性、诗篇主题的历史性和责任感，确立了尹吉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尹吉甫诗篇独特的“赋、比、兴”写作手法，不仅是古



代诗篇的创作手法，更是中国从古至今的思维模式的反映。尹吉甫诗篇里所用到的丰富而寓意深刻的字词、成语，不仅是古代优秀文字语言系统的集成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一种体现，堪称中国文化的精华。在这些古老的诗篇中，“小心翼翼”“明哲保身”“穆如清风”“爱莫能助”“不畏强御”“轻而易举”“夙夜匪解”及“威仪”“喉舌”“邦国”等演变的成语、字词至今仍广泛应用于现代汉语中，流传在我们的文字里和口头上，已成为后人谈历史、讲哲学的典实。尹吉甫的诗篇不仅是中国诗歌历史的深刻记载，更是中国历史与哲学的升华。东晋政治家、军事家谢安曾问侄女谢道韞：“《诗》中何句最佳？”谢道韞答道：“《诗经》三百篇，莫若《大雅·崧高》‘吉甫作颂，穆如清风’。”清光绪《南皮县志》记载，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吏部侍郎曹秀先为南皮新建的一所书院题“清风书院”额，选取的是尹吉甫《崧高》诗中“穆如清风”之意。

“有德者必有言。”尹吉甫有很多诗受到周宣王赞赏，并令司乐官署诵唱。今传《诗经》尹吉甫所作的诗中，《江汉》歌颂召虎的丰功；《崧高》赞扬申伯的功劳；《烝民》表彰仲山甫的武略；《韩奕》赞颂周宣王任命韩侯，得到韩侯拥护。在这些诗篇中，《烝民》尤为精彩：“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监有周，昭假于下……”毛诗说该诗题旨是：“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烝民》的“烝”是众的意思。诗歌一开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很有哲理，万物运行皆有法则。著名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曾研究和考证过尹吉甫“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的思想，认为是老子、孔子时代之前的哲学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最初起源。“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民生存的常理常规就在于美好的道德。

总之，从尹吉甫写诗时间、写作方法、思想艺术对后人影响及他对《诗经》编纂成书过程中的贡献看，尹吉甫可尊为中华诗祖。

尹吉甫的诗篇，先是由东周乐师集词加谱得以残存，后幸得毛氏藏诗躲过秦火，即流传至今的毛诗。对《诗经》的研究，继东汉儒学大师郑玄的



《毛诗传笺》之后，重要著作还有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清代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等，不仅使《诗经》得以传承，也使之成为了华夏文化的瑰宝。

实际上，研究、传承《诗经》的应主要为汉代的“四家”：即鲁（申培公）、齐（轅固生）、韩（韩婴）、毛（毛亨、毛萇）四家。鲁、齐、韩三家为“今文诗学”；毛诗为“古文诗学”。西汉时期，河间献王刘德修古好学、卓尔不群，封毛萇为“经学博士”，并建立日华宫进行学术研究，使《诗经》得以流传后世。

在搜集整理儒家经典、传播传统文化上，刘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最为称道的，是他对于毛诗的辑传。

毛诗是指毛亨、毛萇所传的《诗经》。相传，毛诗为汉初毛亨、毛萇所传。据称其学最早出自于孔子及其弟子子夏，子夏作诗序以授曾申，曾申传授给李克，李克传授孟仲子，孟仲子传授根牟子，根牟子传授荀卿，荀卿传授鲁国人毛亨，毛亨传授赵国人毛萇。毛萇被刘德封为“经学博士”，给予优厚的待遇，提供幽雅舒适的环境，供其研究、注疏《诗经》。毛萇深感刘德的知遇之恩，通过辛勤耕耘，先后撰写了《诗古训》20卷、《诗经》10卷等。

由于毛亨、毛萇所传毛诗，对《诗经》注释简明、准确、可靠，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通才大儒的认同，流传越来越广泛，传授范围逐渐从河间一带扩展至燕赵地区乃至全国。毛亨、毛萇与刘德等人对于毛诗的传授与研究，使得毛诗完全取代了“三家诗”（鲁、齐、韩）而流传于世，确立了它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从而形成了《诗经》研究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尹吉甫去世后归葬南皮，其文治武功一直受到世人的推崇。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二月，乾隆皇帝南巡至南皮时，命吏部侍郎曹秀先祭尹吉甫墓，并亲笔题词：“表间旌淑重时巡，古墓遣官例致禋。为请七言用彰德，遐思千载率驰神。刚柔还以山甫勗，孝友惟应张仲伦。虚说长



年尚余树，清风永世属斯人。”

自清康熙、乾隆年间始，在南皮现存的5部古今志书中都收录了尹吉甫的传记，且列于儒林之首。在沧州市社科联主席商宗岳主编、于2005年出版的《沧州古今名人传略》中，尹吉甫作为沧州范围有记载的、最早的历史名人，被收录于传略之首。2006年，沧州市评选出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沧州十大名人”，尹吉甫仍居于首位。

1982年7月，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尹吉甫墓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南皮，尹氏家族纪念先贤、研讨《诗经》文化的活动始终绵延不息。

1997年农历正月初三，由南皮县尹氏族委会发起，来自南皮、东光、孟村、盐山、海兴、吴桥、黄骅7个县市的1000余位尹氏家族代表，在南皮尹吉甫墓园举办了“尹氏家族共祭中华诗祖尹吉甫大典”。并制定了三年一小祭、五年一大祭的活动计划。祭祀活动结束后，在尹官屯村共进“千人家宴”，进一步增强了作为中华儿女的尹氏家族一脉同根、文化同源、民族同心的信念与情怀。2017年4月，纪念尹吉甫诞辰2869周年暨中华尹氏宗亲会河北分区成立大会在南皮宾馆举行。来自北京、广东、福建等16个省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尹氏后裔代表300多人参加会议。尹氏后人表示，要经常吟咏《诗经》，继承祖先弘扬中华文化的精神，为推动沧州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赵树森)

相关链接：

《诗经》概要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为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原称“诗”或“诗三百”，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500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为最早的诗集。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



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

《诗经》总共有 305 篇诗歌，又被称为“诗三百”。“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风”又叫“国风”，是各地的歌谣。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 15 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 160 篇。“雅”包括小雅和大雅，共 105 篇。“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共 40 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

“赋、比、兴”是《诗经》描写、表现手法。

附二：

兮甲盘铭文书法

杭州西泠印社 2017 年春拍，“西周宣王五年青铜兮甲盘”以 2.1275 亿元人民币成交，有人戏称其为“史上最贵‘平底锅’”。兮甲盘铭文 133 字，记述周宣王五年（前 823）三月兮甲（即尹吉甫）征伐玁狁，并对南淮夷征收赋贡之事，尹吉甫受到周宣王褒奖赏赐而做此器纪念。兮甲盘能拍出如此高价，除了其自身的价值以外，其铭文的书法艺术，亦令人叹为观止。其书法有三个特征：

其一，用笔圆润含蓄，收放有度。任性奇肆是自然的本色，圆曲内敛是人为的结果。兮甲盘铭文书法审美和艺术便在二者之间寻找着适合自己内心的表达，即圆润含蓄。这与主人公尹吉甫的审美志趣有关。尹吉甫作为周宣王时重要辅臣，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诗人，也是《诗经》的主要采集者。我们通过《诗经·小雅·六月》与兮甲盘铭文，不难看出尹吉甫内敛的性格特征和圆熟的处心修为。《诗经·小雅·六月》生动记述尹吉甫挂帅出兵抗击玁狁的史实。诗曰：“戎车既安，如轻如轩。四牡既



佶，既佶且闲。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兪鳖脍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尹吉甫可谓文武兼备，左右逢源。我们再拿同为周宣王时期的青铜铭文书法做一下比较，兮甲盘铭文书法，既不像其前的“毛公鼎”那样婉通纵横，也不像其后的“虢季子白盘”那样棱角外露。正如西汉文学家扬雄所言：“书、心画也。”兮甲盘铭文书法以其线条语言来表达和抒发内心的真情实感。如“既”“甲”“积”“车”“百”“宝”等字，无论是直线、还是曲线，用笔不急不厉，藏头护尾，书风醇古。而这种圆润含蓄的用笔方法无疑与周人的人文性格有着直接的关系。据《帝王世纪》载：“（纣）囚文王，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烹为羹，赐文王，曰：‘圣人当不食其子羹。’文王食之。纣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文王胸怀远大，忍辱负重，成就了周人的伟业。尹吉甫可谓周人深沉与圆曲的典型代表。故此，兮甲盘铭文书法也呈现出圆曲、内敛、深沉和含蓄的艺术风格。

其二，线条遒劲生涩，凝重浑厚。此盘铭文书法的最大特点就是遒劲、生涩、凝重与浑厚，也许这与尹吉甫的人生历练修养以及那场征战的洗礼有关。观兮甲盘青铜纹饰及铭文，共同构成了那场征战宏大的“优美与壮美”的艺术风景。事实上铜器审美价值和意义，更多地凝结在铭文上，因为它是活生生的历史再现。我们不妨回到远古北伐路上，先听听尹吉甫率领的士兵出征时唱的歌《诗经·鹿鸣之什》：“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召彼仆夫，谓之载矣。王事多难，维其棘矣。”由于玁狁的侵扰，士兵们北伐的斗志格外旺盛。故征战中将士勇猛，一往无前，大获全胜。兮甲盘铭文开篇道出了那场血腥的战争场景。周宣王五年三月二十四，晚上看不见月亮，宣王带兵攻打玁狁。兮甲（尹吉甫）随王伴驾，杀死很多敌人，生擒很多俘虏……

战争的阴影或曰战争的凝重影响着书写者的笔墨心情，故铭文字法、



笔法、章法凝重深沉。纵观兮甲盘铭文书法，用笔老成，深厚沉稳，没有火气；线条遒劲生涩，浑厚静穆；起收笔藏锋，略呈钝尖状，然极为自然。细察兮甲盘的笔画形态，作者老谋深算，变化多端。有丰中锐末的，如“四”“王”“毋”等字；有侧锋入笔的，如“三”“方”“不”等字；有收笔出锋的，如“令”“用”“井（刑）”等字。但是，无论哪种笔画，均是一种自然生成的老境，称得上人书俱老，凝重浑厚，生涩慢行，瞻前顾后，体现出书写时的不急不厉与金属铸造的浑然天成，亦表现出制作者深沉含蓄的心机与智慧，不事张扬，即大美不言。从兮甲盘看，书写笔画已经形成了线条化、平直化，用笔已完全没有西周早期像“大盂鼎”等铭文书法的团块与胎记，这实际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变革，既提高了书写的速度，又反映了周人崇文尚实的文化审美观。

其三，结字紧密内敛，错落有致。兮甲盘铭文书法结字严谨，无论横、竖、曲、直的线条围绕中宫均收的比较紧密，可谓是有意识的收敛，或曰以守防攻。像“霸”“进”“寿”“敢”等字，笔画较多，极易造成散漫的感觉。然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每个字就像一个个全副武装、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士兵，武器装备在他们身上捆扎得紧紧凑凑，给人一种随时投入战斗状态的严谨感。从整体章法的排列组合上看，制造者就像组织征战返途的队形：纵成列，横成行，像一个方队阵营。细观之，整肃中不呆板，可谓外紧内松，外柔内刚。横行见自然起伏，纵列见左右错综，字中有错落，大小有参差，犹“大珠小珠落玉盘”，给人一种自然放松的感觉。在整篇珠玑璀璨的大效果中，人们也能够看到每一文字独立美的凸现：有的左高右低，有的右高左低，有的矮小歪扭，有的头重脚轻。这种参差略显零乱的变化，又俨然是尹吉甫带领的那支迎着纷飞的雨雪，告别战死疆场的同族，却步返程的远征军队。如“晦”“政”“司”“淮”“蛮”等字，东倒西歪，犹如队伍中的伤病员。尤其是“晦”字，“每”字左下角的“田”字像一士卒身上的装备由于患疾体弱将随时坠落。然而，它却成为整篇铭文中的“字眼”：生动、跳跃，



仿佛一个不服管理、生性调皮的士卒。以史为鉴，人们在欣赏兮甲盘铭文书法的同时，应该从铭文书法记载的那场战争中吸取经验教训。因为，追求和平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李建春)

附三：

尹吉甫兮甲盘何以价值连城？

2017年7月15日23时20分。杭州的“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虽说是已经半夜，这里却是人声鼎沸，大家都处在亢奋的情绪之中。今天晚上，这里举行的拍卖会要卖掉一个盘子。

起价1.2亿元，500万元为阶梯加价，很快加到1.65亿元。这时场外有人电话委托出价1.7亿元！全场一片掌声。

现场有人出价1.75亿元。几分钟后场外出价1.8亿元。在现场者显然志在必得，再出1.85亿元！

槌响，成交！前后一共20分钟的激烈角逐，这个盘子以1.85亿人民币的价格卖掉，加上佣金成交价达到2.1275亿元。

什么样的盘子能卖到这样的价钱！

这个盘子是一件国宝，叫“西周宣王五年·青铜兮甲盘”。盘子的主人是西周时期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有“中华诗祖”之称的大诗人——尹吉甫。尹吉甫为沧州南皮人，墓地在南皮黄家洼。称兮甲盘为“沧州南皮的一个盘子”即因此。

这个盘子为什么这样值钱呢？

第一自然是物以主贵。盘子的主人尹吉甫亦称兮伯吉父、兮吉父、伯吉父。此公名甲，字吉父，“兮”是其氏称，“伯”是其在兄弟间的排行。是西周宣王时代的辅弼大臣，武功文治都建有重大的功业，又是确凿可信的西周大诗人，比战国时代楚国的屈原要早400多年。这个人是《诗经》中至少



四首诗（《崧高》《烝民》《韩奕》《江汉》）的作者，又是《诗经》中《六月》一诗的主人公。在这首诗里他被赞誉为“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文武双全，是各国官员中的典范。

“兮甲盘”铭文：

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略伐狫狁于彭衡。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泯，王赐兮甲马四匹、驹车。

王令甲征治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晦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钺伐。其唯我诸侯、百姓、毕贾无不即市，毋敢有入蛮宄贾，则亦刑。

兮伯吉父作盘，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兮甲盘”译文：

西周宣王五年（前823）三月月晦之庚寅日，宣王最初下令讨伐狫狁于彭衡。兮甲遵从王命，克敌斩首执俘，将其泯灭，宣王赏赐兮甲良马四匹、驹车一辆。

宣王又令兮甲东去成周（今河南洛阳）征收和治理四方贡赋。至于南淮夷、淮夷原向我周朝交纳田亩贡赋的农人，不得欠缴其贡帛和粮赋，其商贸交易必须按次序就市。若胆敢不执行周王命令，则予以刑罚、钺杀或征伐。唯其提请各地的诸侯、百姓、商贾注意，在从事商贸时要在规定的市肆进行，不得到荒蛮犯上作乱的地方去做生意，否则也要刑罚。

兮伯吉父特此作盘记载这些事情，其眉寿（年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第二是这个盘子上有133字的铭文，而目前国内还没有发现过铭文超过100字的青铜器。铭文记录了西周王朝与狫狁的战争（《诗经·六月》记述的是尹吉甫征伐狫狁归来后饮宴的场面，可以互参）与南淮夷的贡赋关系，诏令诸侯百姓进行贸易的命令等，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其中反映了很多典籍中久已缺载的历史事实，更是十分宝贵。而且，这些铭文不仅有文献的



价值，在书法上也有重要价值：它用笔较粗，书体厚实壮美，在西周金文书法中具有独特的风格，开春秋时代金文用“肥笔”的先声。

第三是这个盘子曾经被当过烙饼的铛。这一条是说这件文物传承有自。这个青铜盘宋代出土，南宋时为宫廷旧藏。因战乱流落民间，后被元代官吏李顺甫买回家中。家人并不识货，于是拿这件国宝烙饼。更过分的是为了烙饼方便，他们掰掉了这个铜盘的足！元代宰相鲜于枢发现了，遂收藏了这件珍贵文物。经数代名贤收藏传递，清初被收入清河保阳官府。清末民初，兮甲盘辗转到了大收藏家、鉴赏家、著名学者陈介祺之手。后来，这只铜盘就不知去向。2010年，一位旅美华人在美国一家小型拍卖会上发现了兮甲盘，并花重金买下。2014年，兮甲盘回国，经多位权威青铜器研究专家鉴定为真品无疑。

兮甲盘至晚在宋朝出土，但是究竟出土于何处却一直找不到可靠的依据。查“搜狗百科”“尹吉甫”词条，第二节为“将军坟墓”。文中说：位于南皮县城西北5公里黄家洼村西南处，俗称将军坟。封土高1.9米，东西长5米、南北宽2.5米。曾有西周晚期青铜器“兮伯吉父”盘出土，盘上有铭文133字，记述了尹吉甫征北獫狁和征收南淮夷贡赋情况。清乾隆皇帝南巡，曾赋诗表墓“清风永世属斯人”。还命官员到坟前祭奠，并刻石立碑。今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桂茂)



附四：

兮甲盘铭文图片





清乾隆皇帝与南皮清风书院

在原南皮县城的东北角，有一座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书院——“清风书院”，是当时南皮的最高学府。书院的匾额即由吏部侍郎曹秀先遵照乾隆皇帝的旨意所题写。

南皮现存的光绪、民国年间的县志中，都对清风书院进行了记载。民国《南皮县志》记述：“清风书院系清乾隆三十六年创立，吏部侍郎曹秀先题额”；“清风书院在城东北隅。乾隆三十六年春，吏部侍郎曹秀先为题‘清风书院’额，盖取吉甫《烝民》诗‘穆如清风’之义”。

吉甫即尹吉甫，西周封钜（今南皮）人，官至内史大臣，传为《诗经》的主要采集者，被尊为中华诗祖。“穆如清风”出自《诗经·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说的是周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齐，尹吉甫作诗相送的事。“穆如清风”谓和美如清风化雨滋养万物。东晋宰相谢安曾问侄女、诗人谢道韞：“毛诗何句最佳？”道韞答：“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安马上称赞其“雅人深致”（很有情致的风雅之人）。南朝梁史学家、文学家裴子野《丹阳尹湘东王善政碑》中也有“不严之治，穆如清风”的记述。

“穆如清风”后演变为成语。对此，《辞海》中有两个词条予以注释：“穆，《诗·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引申为使和悦。”“穆清。《诗·大雅·烝民》：‘穆如清风。’谓陶冶人的情操，像清和的风化育万物。”

由此可见，书院是教书育人的地方，而尹吉甫又是南皮的先贤，所以，书院冠以“清风”之名既恰如其分，又在情理之中。



清风书院的命名当与清乾隆皇帝有关。早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南皮知县李正华曾创建瀛州书院，后废圮。对此，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重修清风书院碑文中记：“李君正华来尹兹邑，伤教化之就衰，兴人文之蔚起，特建书院以祀文昌，盖借神居而培地脉，甚盛世也。其名瀛州书院者，以属河间也。”按《畿辅通志》记载，瀛州书院当时有两所，一所在河间治内，一所在南皮县城东北。明万历年间因南皮属河间府管辖，故书院同以“瀛州”命名。

瀛州书院原在县城外东北角，新书院则建在县城内东北角。竣工后，适逢乾隆皇帝南巡，乾隆在为尹吉甫赋诗表墓后便驻蹕南皮。南皮人士求为新书院题额，乾隆皇帝的吏部侍郎曹秀先便遵旨意，根据尹吉甫诗中的“穆如清风”之句，撰写了“清风书院”的楹额。《重修清风书院碑文》中明确记载：“高宗纯皇帝法驾南巡，曹殿撰秀先扈从，驻节于兹邑。人恳书楹额以为南邑光，殿撰颜之曰‘清风书院’。盖本先贤尹吉甫‘穆如清风’之意。”

清风书院的规模不大，只有东、西书舍各三间供学生读书。民国《南皮县志》载：“清风书院内建文昌阁三间，东西书舍各三间，二门、大门。另有后院草房十余间。”建立学院的初衷为讲学育才，但由于书院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仍以学习四书五经为主。然而，由于南皮自古重视教育，所以历任山长（即书院的主讲兼总院务者。始见于唐末五代。宋元明官办书院设山长。清沿明制。清末改书院为学堂）多由知县担任或者知县选任。

清风书院建成后，严格按照清顺治九年（1652）钦颁学制条教及康熙四十一年（1702）颁行的《御制训饬士子文》管理，学生亦皆立志刻苦学习，因而为南皮培育了大批人才。《重修清风书院碑文》曰：“异日人文蔚起、贤哲代兴，孰不赖此培植之力也乎？”

清风书院临近兴化寺，兴化寺的主体建筑为大慈阁，清嘉庆十八年



(1813) 癸酉科举人张芝郁在《慈阁梵音》中曰：“别有文光起东壁，书声音彻夜红灯。”清道光元年（1821）辛巳科举人张全懋也在《兴化寺远眺》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左邻书院壁，吟咏涤尘襟。”

其后，清风书院因失于修缮而颓败。光绪十二年（1886）新任知县殷树森莅南皮后，“即拟重振祠宇，廓其规模……于是请款于上宪，商度于荐绅，审形缅甸，庀材鸠工”（据《重修清风书院碑文》）。意为知县殷树森到任后，即对清风书院进行重修。施工自春季开始，至秋季竣工，用了9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清风书院的重修工程，使之再现琅琅书声。

光绪二十六年（1900）后，清风书院扩充义学；三十年（1904）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义学停办。宣统元年（1909），在清风书院前院设立劝学所；民国二年（1913）改为县立第一高级小学。

由于清风书院的创立与发展，促进了南皮教育的兴盛，出现了人文荟萃、贤俊代兴的局面。据民国《南皮县志》记载，在清代，南皮共考中贡生195人，中举者177人，进士49人（其中状元1名、探花1名）。

对于清风书院及其成就，清咸丰元年（1851）辛亥科举人潘震乙曾作《忆清风书院同社诸子》以记：

文昌珠曜古城隈，一院清风构众材。
云集英才多士聚，月明潇洒故人来。
讲堂消暑三秋爽，慈阁凌霄百尺开。
记得诗成清入梦，放香雪里赋寒梅。

（赵树森）



清道光皇帝诰封张之万庶母

清道光皇帝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月十五日下诏，诰封张之万庶母为“安人”。诏曰：

“惠流及下先，赐庆于亲闱谊笃所生必推恩于母氏。尔李氏，乃前任刑部候补主事、今授翰林院修撰张之万之庶母。才堪篋室，范可宜家，执素业以效功时，亲蚕绩殫劳而训子，果缀鸳行。兹以覃恩赐赠尔为安人，赐之救命于戏，绿丝修洁久形洲慎之风，彤管清华长荷荣施之泽。”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张之万科考夺魁。因这一科取士中还有李鸿章、中国近代海军与航运的奠基人之一的沈葆楨、中国首任驻外大使郭嵩焘、被刺杀成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两江总督马新贻等名人，成为科举史上的第三大名榜、清朝第一名榜。故，张之万史称名科状元。

张之万官至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职务，又被称为状元宰相。习惯称宰相为相国，张之万也被称为张相国。

张之万成名与他庶母的家教分不开。张之万的庶母嫁到张家以后，身穿粗布衣服，与仆人婢女一样干家务活。祖父、祖母、公爹、公婆高兴得祝贺说：“这真是张家的好儿媳啊！”

张之万父亲张玉册在京师为宦近30年，官至工部主事，不携带家眷，经常对人说，孝敬两代老人的责任全靠家中的妻子。

的确，李氏留家赡养两代四位老人，亲自下厨房做饭，忙里又忙外，终日劳累，乐在其中。

李氏奉养老人之外，还担负教育二子成才的重担。长子即张之万；次子张之京，字菊垞，后官至湖北知府。张之万兄弟两个在家严格遵守



母亲的教训，毫无“官二代”的优越感，粗茶淡饭，不穿华丽的衣服。李氏训诫两子，每日习惯于勤俭，将来居官时才会体会到民间老百姓的疾苦。

张之万考中状元，出使河南学政、巡抚时，考虑到母亲的不容易，想将母亲接到官衙奉养。李氏坚决拒绝说：“忠孝难两全，时局危难，你应当全力报效国家，不要以我为念，一心为国即为孝。”李氏在家纺织操作一如既往，穿着粗布衣，手执大葵扇，与邻居老太太闲谈家长里短，同桌用饭，人们都忘记她是状元母亲、贵夫人的身份。

同治七年（1868），张之万督漕淮城，捻军张宗禹部进兵天津，南皮戒严，张之万派人用木板车将母亲李氏、弟弟之京接至官署。张之万为母亲送上锦衣华服，李氏严词拒之：“危难时期，荷戈执戟的士兵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死难料，哪有闲暇顾及这些。”仍和在家时一样布素粗衣，并让撤掉准备的床榻绸帐。当讲明南方的蚊子太多的情况后，才勉强答应应用纱帐。

张之万任江苏巡抚时，赶上灯节，首县周君准备安排节景，内外悬灯。李氏立即让熄灭，各自早早地就寝。她告诫说：“民脂民膏虽小也要珍惜。”

张之万奉命任闽浙总督时，因母亲李氏年岁已高，便辞官奉养老人，寄寓在苏州拙政园。李氏虽然春秋高，但仍纺织如故不少停。当人们劝她稍微休息一会儿时，她说：“我以纺织作消遣，而且让我的子孙知道种田的艰难，不忘记农家勤俭的风习。”

李氏 90 岁时无疾而终于苏州拙政园，一时吊客盈门，丧礼办得隆重风光。

封建时代，官宦富贵人家的丧仪必须为死者“题主”，制备一个木质形如小碑的牌位，上写某人之神主，主字先写成王字，出殡时请有声望的人用朱笔在王字上将点补上，成为“题主”。点主人为“鸿题”，再请



两位地位略低的人做“襄题”，如果请到状元公点主那是难得的殊荣。李氏丧仪竟有三位状元题主，按甲科年顺序，常熟翁同龢任“鸿题”，吴县洪钧、元和陆润庠为“襄题”。张之万中状元比翁同龢还早12年，三位状元题主已是绝无仅有；四位状元祭灵，更属旷古奇闻。

（杜中洲）



清光绪皇帝为南皮“大慈阁”题写匾额

清光绪皇帝曾两次为南皮题赠匾额，分别为“道达天人”匾和“慈恩学堂”匾。其第一块匾额，是于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为南皮兴化寺中的主体建筑——大慈阁书写的“道达天人”匾。寓意内炼修行至慧心清明、通透万物，使天意与人事和谐统一，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

南皮兴化寺为明初肇建。兴化寺巍峨壮丽，香火繁盛，居全县禅林之冠。清康熙朝《南皮县志》赞之：“斯寺之甲，胜于沧州”；“即黄鹤（楼）、岳阳（楼）诸名胜，宜不是过”。为著名的“南皮八景”之一。大慈阁分为台基、中、上三层，上层神龛中供奉菩萨一尊，上悬光绪皇帝亲书的“道达天人”匾；中层列十八罗汉像，上悬“慈云永护”匾额，为清道光丁未科状元、军机大臣、刑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张之万题撰。

兴化寺坐落于南皮县城的东北角。清康熙十二年（1673）《南皮县志》载：“明翰林编修永嘉王瓚碑记略曰：‘南皮有寺曰兴化，国初肇立僧会司。旧址在邑之东门通衢，市肆缭绕，修斋诵经弗便’。”

由于兴化寺声名鹊起，后人又修建了一处大悲阁，并成为了兴化寺的主体建筑。清康熙朝、光绪朝《南皮县志》都记述“复有义官汤澄出帑，续创大悲阁于殿后，甫十年而成。于是斯寺之胜甲于沧州。登慈航而望彼岸者，咸啧啧称赏焉”。

对于当时的盛况，南皮籍明万历己卯科（1579）举人徐升阶曾撰记曰：“邑东北隅旧有大悲阁。堪舆家以为风气所萃，一邑赖之。故当其时人文鹊起，科举蝉联，户口蕃息，闾井殷富，犹可想见其盛。”然而，他又接着记述，大悲阁“岁久而圯，邑人谋构之，弗果”。



重建大悲阁是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修建人为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就任南皮知县的李正华。对于李正华，多部南皮县旧志都对其大加赞誉，颂其“城衙庙祠，悉数鼎新”“视九载如一日，百废俱兴”。

清康熙朝、光绪朝《南皮县志》都曾记述：“邑侯李公正华于壬寅岁兴心重建（大悲阁），甫三阅月而竹苞松茂，峻阁重基巍然告成。……又谓皮人久悲阁之无存，而慈以使众者之不难于兴复为愉快也，更名其曰‘大慈阁’。”

此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兴化寺“岁久颓坏，康熙十一年义士张福蕴会众重修完备”（清光绪朝《南皮县志》）。

兴化寺造型优美，雄伟壮丽，巧夺天工，是当时南皮城内的最高建筑，也是县城的标志性建筑。在城外远望，只有兴化寺的大慈阁高出城墙，清晰可见。它东邻文昌阁，西邻八蜡庙，南有关岳庙，西南有城隍庙、戏楼。使之在市井的繁华中掩于清静，在超俗中彰显繁盛、辉煌。兴化寺的金刚殿为山门，两尊石金刚相向分立于殿之左右。石像雕刻精致，威武雄壮。奇特的是，两像只有一只鼻孔，且神色肃穆，怒目而视。

大慈阁建在金刚殿后，在前堂的柱上有两副对联，一是清南皮孝廉张之京题撰的楹联：“金刚怒目，菩萨低眉，一鼻孔呼吸相通，正果在三生石上；阁建大慈，寺名兴化，千眼中光明普照，法神现百尺楼头。”二是清道光时期南皮县令蔡任所题：“我只有一片婆心，抱个孩儿与你；汝须行百般好事，积些功德给他。”

大慈阁分为台基、中、上三层。上层神龛中供有菩萨一尊，为木胎与泥塑结合而成，形象为三头六臂（俗称千手千眼佛），手执各种法宝，令人望而生畏。其上悬有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御制“道达天人”匾。中层列十八罗汉像，正中为千手千眼铜佛。上悬“慈云永护”匾额，为清道光丁未科（1847）状元、军机大臣、刑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张之万题撰。左悬“福佑台山”匾、右悬“登临近日”匾，均未署名，传为



明人手笔。下层为基台，台前是一座小型牌坊，两厢为禅院、僧舍。寺院内松柏相映，古雅幽静，山门前有一泓清水——大慈阁湾，微波潋滟，水碧如蓝。此情此景，宛若世外桃源。因而，常有达官、士绅、骚人、墨客来此，吟赋抒怀。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癸卯科举人、曾任束鹿教谕的侯楹曾作《九日同郑如房、徐如泰登大慈阁》诗一首：

飞阁凌空法界高，登临暂尔息尘嚣。
郑玄老去名偏重，儒子狂来兴精豪。
多病漫容寻白社，百年殊觉误青袍。
持螯共效龙山饮，莫向霜华点鬓毛。

在民国版《南皮县志》中，收录了“工词翰、喜吟咏”的清嘉庆丙子（1816）优贡、道光举人张全懋的《兴化寺晚眺三首》诗，其中一首曰：

落日影沉沉，禅房静处寻。一声清磬响，四顾暮烟深。
苔蚀残碑字，松蟠曲径阴。左邻书院壁，吟咏涤尘襟。

清康熙十年（1671）任南皮知县的马士琮在游览了南皮各地的名胜、古迹以后，将兴化寺中的“慈阁梵音”作为“南皮八景”之一并各赋诗一首，收录于他于康熙十二年（1673）编纂的《南皮县志》中，其赞曰：“高阁凌空旭日辉，凭来已觉世环非。”

然而，自清末以来，由于连年战乱，土匪蜂起，兴化寺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至1937年前，已颓废不堪，原貌全非。以至于高阁凋敝，禅院荒芜，栋梁腐朽，无人问津，整个建筑被遗弃在了荒丘瓦砾之中，成了一片废墟，后荡然无存。

作为曾经风光无限的兴化寺虽已不复存在，但幸运的是，“大慈阁”湾还在，兴化寺山门前的两尊石金刚还在，仍然矗立在兴化寺的旧址，留给了后人以充分的想象空间。兴化寺的历史及传说，也已经收录于南皮各种版本的志书之中，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赵树森）



清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为“慈恩学堂”题写匾额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亲为张之洞在祖籍双庙村建造的学堂题写匾额。

光绪三十年（1904）初，张之洞在返乡祭祖时，为发展家乡教育，决定捐资建造一处学堂。历时三载，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建成并正式开学。学堂共耗银17000两，其中慈禧太后赐银5000两、张之洞历年廉俸12000两。为表达和彰显慈禧太后的恩赐，学堂遂定名为“慈恩学堂”。

“慈恩学堂”建成后，直隶总督袁世凯为之奏请，由光绪皇帝御书“慈恩学堂”校名，并将匾额悬于学堂正门的上方；慈禧太后题写了“振德育民”匾额，悬挂于学堂二门的上方。慈禧太后的题匾，既是对张之洞善举的赞许，也是对学堂及学子们的期许。

张之洞是中国历史上晚清时期一位很有影响的重臣，洋务派首领之一。他毕生重视教育，在其著名的《劝学篇》中提出：“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因而，他不论是任学政、巡抚，还是总督，都注重创办学院、培养师资、派出留学、革新教育。张之洞对家乡的教育也非常关切，光绪三十年（1904）初，在返南皮祭祖时，决定为家乡筹建一处学堂，定名“慈恩学堂”（取慈禧太后恩赐之意）。学校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建成并正式开学，迄今已走过了100多年的风雨历程，经过不断的扩建和拓展，后更名为南皮县第一中学。

—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别号壶公，又号香岩居士、无竞居士，晚



自号抱冰老人。原籍南皮县双庙村。他于 1837 年生于贵州，1909 年逝于北京，谥号“文襄”。

张之洞的一生，可以说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年攻读经史，熟谙科场门径，直至荣登探花。入仕之后，连续 10 年，出任浙江、湖北、四川三省考官、学政。身膺疆吏，抚晋、督粤，兴学育才；移督湖广、暂署两江期间，又主持创设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改造书院，开近代教育之先河。同时，广派游学，收“百闻不如一见”之利。晚年与袁世凯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实际主持制定学堂章程，制定出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系统完备、包括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的“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古稀之年，又奉旨掌管学部事宜。

张之洞虽一生未在河北任职，回南皮的次数亦不多，但对家乡的教育非常关切，他还在湖北创办学堂时，就时刻惦记为家乡培养人才。据资料记载，自光绪二十年（1894）即有南皮学子赴湖北学习。后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十年（1904）都有学生前去就读。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张之洞在天津府选招学生 200 人就学湖北各学堂，其中南皮县 100 人。张之洞捐献出俸银 14800 两作为学费，使家乡学子得以免费学习，有的学生还被选派到日本游学。因而，与南皮的渊源是很深的，对南皮的影响也是巨大和深远的。同僚称其为“张南皮”，他自己在多幅书法作品及联句中亦落款“张南皮”。孙中山先生赞之：“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曾在湖北学习深造的南皮县高庄子村的刘炯文，倡导和创办了直隶沧县第二中学（即沧州市第一中学之前身），为当时津南地区最高学府。在二中学有所成的南皮籍人士有：曾任周恩来总理军事秘书的周家鼎、著名学者孙楷第、原天津市委书记刘刚等。可以这样说，南皮近代教育的发端和人才的崛起，是与张之洞有着直接关系的。

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尤其是在湖北就读的南皮籍学生学成回乡后，



带来了一股办学兴教的新风，使南皮相继建起了高等小学堂、劝学所、模范小学等。黑龙江村绅士刘醴泉办起高级小学校，招生3个班，学生100人，为南皮第二高级小学。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画家叶访樵等，均在二高学习过。据《南皮县志》（民国版）记载，到1930年，全县初级小学校248所，在校学生5078人，另有高小、师范等学校。

二

除选招南皮学子外出就读和出国游学以外，张之洞还在原籍双庙村自费创建了一处学堂——慈恩学堂。

光绪三十年（1904）初，张之洞返南皮祭祖时与族人、乡亲欢聚，深感情谊之真切，遂用慈禧太后赐银（5000两）及历年廉俸（12000两），为家乡筹建一处学堂，定名“慈恩学堂”（取慈禧恩赐之意），命其孙厚璟回籍经手操办。在双庙村购土地17顷（除校舍外，余者出租，以租金作为学校经费）兴工建校，光绪三十三年（1907）建成并正式开学。

慈恩学堂系古式建筑，建筑工料十分讲究。木料多为红松，间量宽大，各房均有前廊后厦，院中天廊连通各室，屋顶起脊坡度很缓，覆盖灰色阴阳小布瓦，房檐有拦檐瓦，屋脊和屋檐装饰各种鸟兽图案。学校功能设施齐全，建有教室、寝室、伙房、餐厅、图书馆、议事厅、储藏室、警厅室等。

学堂大门坐北朝南，门前建有照壁，下为砖砌实墙，上为十字透景墙，东西各有上圆下方的月亮门。南墙照壁雕刻有二龙戏珠的团龙图案，墙壁粉白，两条鼓出的腾云驾雾的青色蛟龙，嬉戏中间一颗红光四射的宝珠，象征着吉祥。门前栽有两行国槐，每行四株，分东西排列。

门洞硕大宽敞，朱漆大门两边各有宽大的门框。正门上方悬挂有清光绪皇帝题写的紫檀匾额一方，上书“慈恩学堂”四个大字。二门是慈禧太后题匾“振德育民”。院门两侧各有两间配房与门洞相通。门房与二



门之间是一条东西窄长的院子，有天廊通向二门。二门两侧各有一排房，是为前排正房。甬路通向北大厅，向东、西两侧各有走廊，沿东、西厢房向北与北大厅的走廊相连。院子北面为正厅和教室，正厅为3间，两侧的教室各为6间，教室的两头各为一单间。院落东西各有厢房一排，房屋6间，自成一院，有月门与大院相通。整个建筑错落有致，古朴典雅。

慈恩学堂按新式学校体制设立。开始，招收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两部分，各定额30人。所招学生，本姓一半，外姓一半，共60人。后又增设中学堂，定额30人。续捐银1万两，存入钱庄，生息备用。学科一切照《奏定学堂章程》办理。

民国时期，学堂因无常年经费而停办，后因政局动荡，兵荒马乱，一直闲置。许多有识之士对学堂的荒废、冷落无限惋惜，曾有前人游慈恩学堂感而赋诗曰：“……花多庭作圃，屋破壁如山。名在乾坤内，恩施里党间，先贤仁厚意，回首愿追攀。”还有一位当时的教育工作者作诗曰：“培养人才忆当年，抚今追昔共凄然，万间广厦留基础，轮奂重新冀后贤。”可见人们在惋惜之余都寄希望于后来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于1952年创建了南皮中学（后更名为南皮县第一中学）。1954年中学迁入慈恩学堂（略加修葺即能使用）。开始先办初中，随即增设高中，至1961年已成为有初中8个班、高中6个班的完全中学。“文化大革命”结束，百废俱兴。面对因班级增多，教室、宿舍不敷使用的实际，学校几经扩建、改建和翻修，渐次把老房拆除，没能留下部分原来的建筑作为纪念。然而，慈恩学堂对南皮中学以及南皮教育发展的贡献却是功不可没。

三

南皮县第一中学从慈恩学堂建成算起，历经晚清王朝、中华民国及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跨两个世纪。百年风雨岁月，几代园丁浇灌，南皮一中这座历史悠久并寄托着南皮人希望的神圣学府，已是硕果累累、桃李芬芳。一个世纪以来，南皮一中为国家培养出数以万计的各级各类人才。2007年适逢建校百年华诞，为传承南中优秀历史，弘扬先进教育思想，总结百年办学经验，共谋学校发展大业，中共南皮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举办百年校庆活动。

2007年10月14日上午10时，南皮县第一中学百年校庆隆重举行。参加校庆活动的有湖北武汉“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湖北大冶矿业有限公司，河北省军区，河北省教育厅，中共沧州市委、市政府，南皮县四套班子的领导同志，沧州市各县市教育局、县市中学的领导。同时，邀请了历任健在的学校领导参加。受邀嘉宾、历届校友和在校学生及张公后裔张厚燊、张厚琄、张云等共计4000人参加了庆典仪式。原文化部部长王蒙、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邱金凯中将、著名书法家爱新觉罗·启骧以及湖北、北京等知名书画家为校庆活动题字、赠送书画作品。某集团军副军长吕敬正将军、张之洞嫡孙女张厚燊教授为校庆题词，还亲自参加了校庆活动并致辞。湖北警官学院、贵州省安龙县第一中学（张之洞幼年生活的地方）、中国教育报社等单位为校庆发来了贺电。在校庆仪式上，河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高义勋受托宣布南皮一中为“北京军区国防生源基地”，并颁发了匾牌。庆典结束后，举办了以“迎世纪盛典，庆百年华诞”为主题的大型文艺演出。

作为历史名人和建校先贤，南皮一中把张之洞的生平与业绩作为挖掘校本文化、打造名校战略的资源 and 品牌，先后矗起了张之洞的汉白玉塑像，修建了以《劝学篇》为名的“劝学广场”，创办了校报《香涛文化》，编写了《从慈恩学堂到南皮一中》的校本教材。

张之洞塑像立于2003年，材质为汉白玉，塑像位于学校正面大门以内，像高3米，重约6吨，为整块大理石雕制。塑像周围为圆形花坛。



南皮一中为张之洞塑像，不仅是纪念和赞颂他的重教之功和兴学之举，也是新生入学的第一堂教育课，意在启迪南中学子勿忘学校创建者，以刻苦读书，立志成才，报效祖国。“劝学广场”于2007年修建，广场面积2300平方米，总投资60万元。广场西侧矗立一10米高的不锈钢雕塑，刻有“奋飞”二字，寓意莘莘学子放飞希望，超越自我，不断创造辉煌。《香涛文化》为南皮第一中学校报，创办于2006年5月，为月报，设计为四开四版，分新闻、德育、教学、副刊4个板块。报头由张之洞嫡孙女张厚粲题写，每期印刷3000份，至2012年11月共发行67期。曾于2007年被评为全国中小学优秀校内报刊。校本教材是南皮一中校本教材委员会于2010年8月搜集、整理、编印的。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张之洞的生平及业绩简介，分设“绪言”“政治家张之洞”“实业家张之洞”“教育家张之洞”“军事家张之洞”“外交家张之洞”“儒臣张之洞”7章，并附录有深入浅出的阅读资料；第二部分为校园文化，分设“绪言”“慈恩学堂”“南皮一中”“南皮一中核心理念”4章，全书12万字。

从慈恩学堂创建至今，历经百年的风风雨雨，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工作者，传承历史，开拓创新，使办学规模日益扩大，教学水平逐年提高。到2020年，学校占地2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11万平方米，共有90个教学班，在校生5113人，专任教师354人。学校先后获得河北省“文明校园”“高考备考先进单位”“教育工作先进集体”“清华大学生源中学”等多项荣誉称号，入选中国县城“百强中学”。展望未来，古老的学堂正在焕发出蓬勃的朝气和盎然的生机。

（赵树森）



慈禧太后为张之万寿辰题赠匾额

在南皮县博物馆，收藏着一块清慈禧太后题赠状元宰相张之万的匾额。作为镇馆之宝，它的来历非同寻常。

慈禧太后题赠的“枢衡介社匾”，是其亲笔书写并赐给名科状元张之万的寿匾，赞扬他集权力与福气于一身。

“枢衡介社”匾额为樟木质地，长2.46米，宽0.95米，厚0.07米，四周蟠龙纹饰，上书“枢衡介社”四个鎏金大字，正中上方镌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朱印。此匾原悬挂于南皮县城张之万宅第“状元府”的正堂，后因动乱曾一度不知所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县电影管理站一工作人员发现并保管，1986年交由县文保所（今县博物馆）收藏。

匾额牵出名臣往事

张之万（1811—1897），字子青，号銮坡，南皮县南街村人。是张之洞的族兄，也是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

他4岁开始读书，18岁中秀才。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状元。光绪二年（1876），任河南巡抚，移督漕运，历任江苏巡抚、闽浙总督。光绪八年（1882），任兵部尚书，后调刑部。光绪十年（1884）到军机处，兼任吏部尚书。升任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光绪二十二年（1896），因年迈请辞回乡。光绪二十三年（1897）寿终，享年87岁，赠太保，谥“文达”，入祀贤良祠。

张之万可谓文武兼备，既治世显达，又戎马天下。曾有人评价他“儒臣治军，风采隐然”。

咸丰三年（1853），林凤祥、杨开芳率太平军北伐，张之万奏请直



隶、山东、陕西、安徽四省军队到河南镇压，并请派大员督办地方团练，亲自捐献军饷，致太平军北伐受阻。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进攻直隶，大败讷尔经额于临沼关，连克交河、献县、沧州、青县、静海等地，前锋逼近天津。张之万献计，在静海设防。咸丰六年（1856）调张之万回京，充日讲起居注官，入上书房。咸丰八年（1859）教授钟、孚两郡王读书，与恭、醇两亲王往来密切。九年（1859）补授翰林院侍读，充会试同考官。七月，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张之万奉旨与军机大臣焦祐瀛、御史陈鸿翊督办团练。

同治元年（1862）开始，张之万奉命率军进攻捻军，经几年的围剿，调兵设防致东捻军全军覆没，西捻军遭伏失败。因镇压捻军有“功”，被赏赐头品顶戴花翎。

受慈禧太后赏识

《沧州历史人物传》记载：“张之万平时好言政事，凡他对军政大事有何见解，就上疏奏请，因此多得嘉奖。”尤其是在清廷发生权力冲突中，他依附于慈禧和恭、醇亲王之下，襄助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并总摄朝政，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

咸丰十一年（1861）秋，咸丰帝病逝，八大臣辅政。幼帝生母慈禧太后欲总揽政务，被载垣、肃顺等八大臣予以拒绝。当时，光禄寺少卿董元醇奏请慈安、慈禧两太后垂帘听政，并请恭亲王辅佐。

张之万、李鸿藻大力支持董元醇的奏请，并经过他们的策谋效力，将“八大臣”或赐死，或斩首，或革职问罪，巩固了慈禧的统治地位，最终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同治”。张之万也由此受到了慈禧的信任，升任詹事府詹事，兼署工部侍郎。不久，擢内阁学士。同治元年（1862）升礼部侍郎，兼工部左侍郎。

张之万经常被诏与太常寺卿许彭寿等一起汇编前代帝王及垂帘的事



迹，将可以效法和借鉴的编入，书成后，被赐名为《治平宝鉴》，因而更得慈禧的欢心，被赏赐了很多珍品。

因慈禧太后的赏识，张之万先后获授兵部尚书、刑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赐紫禁城骑马，赏穿黄马褂。

作为状元宰相，张之万的书画也都是佳作精品，被赞称“书画状元”。慈禧太后曾赐给十三世达赖喇嘛一幅亲笔画，画中是一簇茂盛的兰草、两支茶花，在兰花、茶花中间，有一首张之万的题诗：

在山为幽芳，出山为国香。

茶兰得相会，御笔发其祥。

张之万的诗和慈禧的画相得益彰，一起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同时，从诗画中也可窥见张之万与慈禧太后云龙鱼水的和睦关系。

张之万重孝悌，61岁便主动辞去位高权重的闽浙总督一职，以孝敬老母为由，自请休致。其主动辞官的举动，在古往今来的为官从政史上十分难得，在官场士林赢得极高的声誉，众口一词赞扬他志趣高洁，事母至孝，令人敬佩。

张之洞也对这位族兄钦仰不已。在中国历史上族兄弟二人同朝入阁拜相的只有张之万、张之洞二人。张之洞出任封疆大吏、治鄂18年，推行洋务运动，张之万调京入阁为官给予了各方面的支持。

光绪二十二年（1896），85岁的张之万因年迈四次请辞，才免值军机回南皮家乡养老。慈禧赐予他“枢衡介祉”匾额。

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之万去世，清廷赠太保，谥“文达”，入祀贤良祠。

几经流离幸运保存

慈禧题赠张之万的匾额“枢衡介祉”，一直悬挂在南皮“状元府”的正堂，但后来由于时局动荡、兵荒马乱，匾也不知所终。



1974年，南皮青年教师魏春阁调任县电影管理站工作。不久，机修室里的一块硕大的工作台引起了他的注意。它长约两米半，宽约一米，尽管上面摆满了钳、扳等维修放映机的工具，以致油渍斑斑、一片狼藉，但仍难掩其古色古香的非凡气质。收拾干净后，“枢衡介社”四个斗金大字便赫然展现在面前，在正中上方，钤一方朱文大印——慈禧太后御笔之宝。匾四周装饰为浮雕九龙祥云图案，不时散发出阵阵幽香。魏春阁被这意外的发现惊呆了。

“虽然当时已进入‘文化大革命’后期，要想收藏这块匾需要勇气，并承担一定的风险。可倘若再不采取措施对该匾加以保护，这件具有很高价值的文物有可能毁于一旦。”魏春阁沉思良久，找到了当时的电影管理站站长，告诉了这一发现并提出收藏的想法，站长同意了他的要求，并一起守住了这个“秘密”。

后来，魏春阁与此匾朝夕相处了10年，3次搬迁不曾舍离。

1986年，魏春阁受上级委派筹建县文物保管所，他便带着这块“宝物”赴任了。至此，这块历经磨难的匾额终于有了自己的归宿。

随着岁月的流逝，张之万的宅第——南皮状元府已荡然无存，幸运的是，慈禧太后题赠张之万的匾额还在，它见证了历史，见证了张氏家族曾经的荣耀和辉煌。

（赵树森 杨静然）



伟人盛赞张之洞

孙中山：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毛泽东：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是中国历史上晚清时期一位很有影响的重臣，洋务派首领之一。他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政治家，还是一位革故鼎新的教育家、实业家、军事家，同时也是极负盛名的诗人、作家、书法家。他廉洁清正，克己奉公，在革新教育、创办实业、操练新军、兴建铁路等诸多领域颇有建树，其创建的业绩已经载入史册。

张之洞和他兴办的事业及培养的人才，在某种意义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历史车轮的前进，客观上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了准备，起到了重要作用，奠定了革命基础。孙中山先生称之：“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指出：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2006年，张之洞被评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河北省十大名人之一，沧州地区仅此一人。

后世有联赞颂张公，兹录于后：

抱冰握火仕途岁月峥嵘，督两广治两湖暂署两江，参军机佐朝政两袖清风，清流党、改俄约、索伊犁、克复凉山，运筹帷幄功德永为神州颂；

励精图治创业道路艰难，兴一汉开一治再建一萍，扶国危济民困一腔热忱，倡教育、修铁路、立新军、举办洋务，驰骋华夏劳歌已作楚人吟。



创新教育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他认为：“自强之策教育为先。”可见，他的教育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创办书院学堂。同治八年（1869），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商准湖北巡抚李鸿章，由省府拨银2万两，张之洞本人捐廉银1万两，修建了“经心书院”，这是张之洞入仕后创办的第一所书院。简放四川学政后，张之洞又商得总督吴棠的同意，于省城创建了“尊经书院”，并捐俸购置经史子集数千卷，建尊经阁收藏，供诸生借阅研习。公务之余，还亲临书院，为诸生讲经论史。光绪九年（1883），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大力整改吏治、发展经济的同时，创办了“令德书院”（令德堂），并捐赠书籍。

出任督抚期间，正值列强入侵，张之洞在接触与了解西洋科学文化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单凭“圣经贤传”已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遂于光绪十三年（1887）在广州创建了“水陆师学堂”，随后奏准增设矿业、化学、电学、公法学等学科。同年，创建了“广雅书院”，设“电报学堂”，课英、法各文，兼读经书。在督鄂的第二年（1890），又在武昌创建了“两湖书院”，开设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格物、史略法、兵法及兵操等新学科。这是张之洞引进西方教育的开端，为以后创设一系列新式学堂奠定了基础。

暂署两江总督期间，当时的南京、上海已成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得以更广泛地接触西方文化，从而认识到，欧美各国的富强，在于教育事业的先进与发达。于是，又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改“金陵同文馆”为“初级储才学堂”，将已趋破落的“水师学堂”恢复到原来的规模并附设“铁路专门学堂”，又在江西创办了“蚕桑学堂”。此时，其所实施的举措，已经使教育为趋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返任湖广总督后，张之洞便大举兴办新式学校。光绪十九年（1893），创办“自强学堂”，后又建“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算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及“湖北铁路学堂”等。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先后在今武汉市内办高等学堂45处，在乡下办高等学堂17处。晚年又在今武汉市内办小学堂5处。正因为张之洞的大规模兴教兴学，才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薄一波、宋教仁、黄兴、孙武、唐才常、李四光、鲁迅、黄侃、王亚南、冯友兰等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学者若群星灿烂，在荆楚大地卓然兴起。

兴办师范教育。随着各类新式学堂的相继开办，师资问题日显突出。于是，张之洞又先后开办了一批师范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于武昌宾阳门南开办湖北师范学堂，并设堂长、总教习。课程除普通中学堂所开设的诸门以外，另开师范专业必修的教育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学额120名，学制两到三年。为应对师资急需，又设速成科，一年毕业。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独立完备的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张之洞拨出库银43000两，将两湖文高等学堂改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同年又开办了湖北师范传习所（实为简历师范，开设教育法、教学法、学校管理等课程），这当属中国教师进修学校的开端。

在张之洞的倡导下，各府将所设中学堂一律暂改为初级师范学堂，或先办速成师范和师范讲习堂，以解师资不足之困。还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省城开设6所各府师范学堂，分府录取。同时，创办“湖北敬节学堂”（相当于现在的幼儿师范学校），培养幼儿教师；“创办湖北育婴学堂”，培养婴幼儿保育员。

各类师范学堂的相继建立，使当时的师范教育初步形成了独立的体系。

选派留学人员。清同治年间及光绪初年，清王朝曾派遣150名学生



赴欧美留学，但此后的 20 年间，几乎中断了派出留学，张之洞是重启这一工作、并且派出留学生最多的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奏陈《选派学生出洋肄业折》，并得以批准。

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工作再次启动后，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王朝选派 13 名学生到日本的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始，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逐渐进入高潮；到光绪三十一、三十二年（1905、1906）时，全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已经超过 8000 人。在留学生总数中，湖北学生占 1700 多人，为全国各省之冠。

在向日本大量派遣留学生的同时，张之洞也向欧、美等工业先进国家派出部分留学生，至光绪三十年（1904）共计派出 93 人，在各省同样位居前列。

同样，张之洞也是当时引进国外人才最多的人。在湖广总督任内，他除了大量引进国外的机器设备和科学技术外，还大量引进了国外的各种专门人才。据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之洞的升迁之路》所记，张之洞引进人才的总数不少于 250 人。其引进国外人才的规模和力度之大，在湖北近代史上绝无仅有，而成效也是十分显著的。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张之洞在辖内工业企业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兴建了一批蔚为壮观的机械工业企业群体。

废除科举制度。为推行教育革新，张之洞多次上疏，力请停止科举考试，推行学校教育，使自隋代以后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即行废止。他主撰了《奏定学堂章程》，并在分管学部事务期间，修订了学堂课程，普及和完善近代教育制度，确立了由初等、中等到高等普通教育的近代教育体制，逐步使学校教育走上正规化。

张之洞之革新教育，还体现在他训导、提携生童的良苦用心上。他在光绪初年编写了《书目答问》，对自己所看过的 2200 多部国学书籍作介绍、作评述；后撰《劝学篇》，提出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思



想；在《辘轩语》7000余字的通论读书中，类似经世、通经致用等语就有20多处。

张之洞辞世后，四川总督赵尔巽奏请为之设祠，奏折赞誉张之洞业绩，特别提到教育：“其生平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养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习。”

发展实业

张之洞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并身体力行、拼搏图强，所取得的创新业绩，在当时振聋发聩，现今仍是一份珍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在任湖广总督期间，他除建立纺织厂、兵工厂之外，在开发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的基础上，用三年多的时间主持修建了汉阳铁厂。汉阳铁厂是当时世界东方最大的钢铁厂，光绪二十年（1894）五月出铁，比日本八幡制铁所早投产7年。汉阳铁厂的建立为中国重工业的发展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20世纪中期，毛泽东主席在论及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时强调：“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湖北的工业基础，如汉阳铁厂、纺织厂、兵工厂、京汉铁路，都是张之洞带头办的。”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认为中国由张之洞发起的工业化开始了一个变革的过程。张之洞办工业的事迹被收入《世界经济强人》一书。

在张之洞创办的近代工业中，尤以汉阳铁厂的创办既引世人注目，又足以彪炳史册。

汉阳铁厂于光绪十七年（1891）初动工兴建，到光绪十九年（1893）底基本建成。铁厂东西三里多、南北大半里，包括炼生铁厂、炼熟铁厂、炼贝色麻钢厂、炼西门子钢厂、造钢轨厂、造铁货厂、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钩钉厂等大小10个分厂。汉阳铁厂建成以后，立即引起中外瞩目。日本人参观后，颇为惊叹汉阳铁厂雄伟的气势，认为该厂



“是为 20 世纪中国之雄厂”。美国驻汉口领事也盛赞该厂宏大的规模和先进的设备。

汉阳铁厂的兴建，对荆楚大地五千年农耕文明的触动是深远的，它的建成甚至被西方认为是中国觉醒的标志，它埋下的是中国近代化工业的种子，并在沸腾的熔炉中，成为华夏文明转向的催化剂。

在发展实业的过程中，张之洞特别注重铁路建设，而修建卢汉铁路又是他平生最关注的事业。

卢汉铁路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破土动工。此间，张之洞虽两次署理两江总督，但其对修路之事仍煞费苦心，遥秉其成。卢汉铁路原计划 8 年修成，因八国联军入侵的干扰，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竣工，次年全线建成通车，并改名为京汉铁路。京汉铁路由北京正阳门车站至汉口大智门车站，全长 1214 千米，是第一条连接京师、贯穿中部地区的铁路干线。它的建成，不但拉近了南北之间的距离，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改变了武汉在近代中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使九省通衢的武汉不仅贯通东西，而且缩毂南北，加快了武汉城市近代化的发展。

此后，张之洞又统筹规划，兴建粤汉、江宁等干线及支线并争回粤汉路权，督办川汉、江汉等线路。作为一位有创造性和开拓精神的清朝官员，他是中国近代铁路的开拓者之一，是当时主持规划和修建铁路最多的人。

强军御侮

张之洞的军事战略思想，始终立足于守备御侮。他在山西巡抚任内，就曾萌发了“筹巨款购外洋军以练晋军”的念头。督粤时，编练了习洋器操、配洋械的广胜军。其间，克复谅山，取得“镇南关大捷”是清廷对外战争的难得的胜仗。暂署两江总督期间，张之洞率先编练“江南自强军”，该军与胡燏棻在天津小站编练的“定武军”，同为中国最早的新



式陆军。

张之洞出任出西巡抚的几年间，中法关系因越南问题而日趋紧张。他虽正忙于整治山西，但心系南国安危，在光绪八年（1882）两次上奏朝廷，提出应当积极备战，并把重点放在两广。光绪九年（1883），在一天之内又连上三折，陈述自己对危机的看法。光绪十年（1884），慈禧太后召见张之洞，令其署理两广总督，办理广东防务。到达广东之后，张之洞首先整顿和强化广东的防务，使其能够抗拒法军可能的侵扰，并成为广西、云南抗法前线的稳固后方。

中法两国进入直接战争状态后，处在战争第一线的两广总督张之洞，肩负着买办饷械和调度指挥的责任。在陆路战场，张之洞把东线的桂越边境作为战略考虑的重中之重，并果断请出年近古稀的老将冯子材。光绪十一年（1885），法军大举进攻镇南关清军阵地，冯子材统一指挥全线各军。凭借十里长墙和堡垒群，与来犯之敌浴血奋战两天两夜，终于粉碎法军的进攻，继而挥师出关，乘胜追击，6天内向前推进200里，攻克谅山。西线清军也由被动防御转入主动进攻，大败法军于临洮。至此，整个陆路战局发生了有利于中国方面的战略性转变，初步实现了张之洞“争越南以振全局”的构想。

光绪二十年（1894），清王朝对日宣战，因张之洞有中法战争中积累的经验，所以清王朝命他署理两江总督。到任后，他一边调兵增援前线，一边竭力筹集饷械，保障了前线诸军的后勤补给。

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之洞回湖广以后，以更大的热情、更大规模地编练湖北新军。张之洞编练新军时坚持“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多、技艺必娴熟、勇丁必不当杂差、将领必不能滥充”。他把这七条称之为“军之体也”，目的是通过编练新军，“执干戈以卫社稷”。

几经与外敌交战，张之洞深悟武器为战争胜败之关键，于是，便“师夷长技”，推行新政，瞄准世界兵工业的先进水平，引进技术、引进



设备、引进人才，一开始就步入兴建近代兵工业之路。所以，史学界认为中国近代化兵工业应以张之洞为始。而建成汉阳枪炮厂，是中国建立起近代化兵工业的标志。

张之洞于光绪十年（1884）任两广总督时，为启动近代兵工业，采取了两个步骤：一是整顿旧有的手工业式的兵工企业；二是在旧有的军工企业基础上兴建近代兵工业。

光绪十三年（1887），张之洞上奏《创设枪弹厂片》，在广州大北门外番禺县属之石井设西局，创建枪弹厂。光绪十四年（1888），张之洞认为广东的军事工业规模太小，决定在广州筹建新厂，生产先进的枪炮。张之洞于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后，又奏准将在粤的炼铁厂和枪炮厂移至湖北，在汉阳设立炼铁厂和枪炮厂。光绪二十一年（1895），实现用自产的钢所制造的小口径快枪及自造的新式小口径锐形药弹成功，与国外最先进的最新式快枪无异。后又学习、引进了当时国外最先进的制作方法，制造出了最先进的最新炮——十二生新式长快炮。从张之洞创建军械工业的轨迹可以看出，张之洞一直在追逐着时代的脉搏，追赶着世界的先进水平。如：他在粤建厂时，看到连珠炮、后膛车炮领先，就决定建新厂生产；当枪炮厂迁到汉阳时，又增购德国新的步枪生产设备，改造制作快枪的设备；当看到世界上造枪炮用罐子钢，就进口炼罐子钢的设备；看到枪弹炮用无烟药，就开始建无烟药厂。通过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一座亚洲第一、世界瞩目的近代化汉阳枪炮厂矗立起来，制造出了中国最早的制式步枪，因而“汉阳造”也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第一枪”。

“汉阳造”在中国军事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晚清时，“汉阳造”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武器，在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都起到了主导作用，是中国近代以来使用最广、制造单位最多、服役时间最长的枪。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等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部队装备的就是“汉阳造”，起义部



队用“汉阳造”向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开了第一枪。197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纪念时，在南昌市区中心建立了八一起义纪念塔，塔顶就矗立着用大理石雕塑的“汉阳造”。

张之洞的一生，在改革军制、抵御外侮、修整军备、提高军队战斗力等诸领域多有建树，故逝后清廷谥号“文襄”。据《钦定大清会典》称：“辟地有德曰襄，甲冑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咸丰三年（1853），上谕更明令武功未成者不得谥“襄”。由此，足见张之洞军事成就昭著。

清正廉明

张之洞一生克己自爱，为官廉直。他认定“廉政无欲必有政绩可观”，在四川学政任上，他两袖清风，离任时竟无钱置装，及至“还都后窘甚，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衣为置酒”；升任督抚后，亦不讲排场，不事铺张，所到各省，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赠礼品。兼署广东巡抚时，于抚署后园辟畦种菜，筑草亭其中，其榜联云：“稼穡艰难君子教，菜根风味士夫知。”一时传颂士林，流为美谈；过50寿辰时，为拒收寿礼，紧闭府门，不纳贺客。调任湖广总督后，明禁官场赌博、宴会奢侈，规定宴客时菜肴不过5盘。

张之洞素性节俭，不尚奢靡，但遇有赈灾或设书院、创书局、刻图籍、建祠堂等公益善举，他总是带头捐款，动辄数百数千乃至逾万。史料记载，其一生捐献达27万余两俸银。张之洞耿介清廉，耻谋私利，但对于国事民瘼却恪尽职守，念念萦怀。中法战争时，他作为粤督主张抗法，在广东海防吃紧、饷需奇绌之际，仍竭力筹饷购械，援闽、援台；组军入越，接济滇、桂各军，并承担全部费用。中日战争时，对过境北上御敌诸军，无不供饷助械，耗银数十万两。山东威海危急，主动调兵赴援，并送去枪支弹药。山东巡抚李秉衡大为感激，遂向他致电感谢：



“我公统筹全局，谋国之忠，与人之厚，诸深钦佩！”

正因如此，张之洞谢世后，“竟至囊橐萧然，无以为子孙后辈计”，连他的丧礼都成了问题。张之洞为官 40 余年，甚是清廉，除了留下《天香阁十二龄课草》《辘轳语》《广雅碎金》《劝学篇》等大量诗文、著作外，却是身无积蓄，一贫如洗。以至于他的祭礼都是靠用朝廷所赏 3000 银两和门人同僚祭礼办理。张之洞大儿媳刘文嘉有一首颂清廉家风的诗《村居杂兴》传世：“廉吏子孙贫，家风旧如是！茅檐三五椽，门前一泓水。烟树拥柴扉，清旷颇可喜。……夜绩与晨炊，同心有妯娌。菜根风露香，真味土膏美。布衣足温暖，适体胜纨绮！”

正因为张之洞为官辛劳，廉而不贪，方受到了世人的敬重。布政使梁鼎芬敢怒敢言，曾疏劾李鸿章。当年在武汉任知府时，一省官员都惧怕他，但他十分敬佩张之洞。张之洞去世后，梁鼎芬每次乘火车行旅，一到南皮境内，必肃然起立，默默祷告，车出南皮境后，方垂泪落座。

张之洞活跃政治舞台之际，正值晚清社会向近代蜕变的过渡时期。历史选择了张之洞，而张之洞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姿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当然，他作为清王朝的重臣，亦有其局限的一面，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以上四个方面的业绩看，他当是清末封建官吏中的有识之士，是一位颇有作为、颇有影响的人物，因而，才得到了孙中山先生、毛泽东主席的赞誉。

（赵树森）



往事回眸



往事如烟。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南皮曾发生过许许多多重要的事件。春秋霸主齐桓公因在此地的南城修缮皮革，“南皮”因此而得名；汉武帝的直指挥使暴胜之以礼相待隼不疑，成就了一位智勇双全的京兆尹；曹丕、曹真、曹休、吴质与“建安七子”在南皮赋诗唱和的文学活动，被南朝梁文学家沈约赞称为“南皮高韵”，成为千古文坛佳话。“南皮高韵”的开创，是南皮传统文化的一大亮点，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在历史长河中踏出的深深印记，见证了南皮历史的悠久和岁月的沧桑。那些被历史名人聘任为警卫、侍卫、武师、顾问的南皮俊杰，更使南皮人为之津津乐道。

尤其让南皮人感到鼓舞和难忘的是，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南皮吹歌”演奏家王金山；周恩来总理向著名河北梆子演员、被评为“坤伶大王”的刘喜奎敬酒并寄语嘱托，从而激励和鞭策着南皮人民在挖掘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进程中，薪火相传、绵延不息。



毛主席、周总理亲切接见“南皮吹歌”演奏家王金山

王金山是“南皮吹歌”著名演奏家，曾获得“吹破天”的美誉。1960年9月，王金山应邀到北京怀仁堂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专场演出，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演出结束后，毛主席起立带头为他鼓掌。

王金山（1914—1974），南皮县张古风村人，出生于唢呐演奏世家。受其祖父王永吉影响，少时就喜欢唢呐演奏。后拜当地吹歌艺人张庆和为师，先从唢呐曲《一句半》《千秋岁》等入手，12岁就加入了本村鼓乐班为主奏，兼学笙、笛、板胡、板鼓等乐器。14岁便成为“小名堂”班的台柱子，闻名乡里。

在沟壕田野僻静处无师自练，做到了夏练“三伏”，冬练“三九”。音乐天赋极高的他在用心对唢呐的研习中获得了灵感，找到了感觉，技艺精进。

随着“小名堂”演出范围的扩大，王金山得以与沧南几县及山东北部地区的吹歌艺人们接触并交流技艺。虚心好学的王金山乐于以艺会友，博采众家之长，很快就掌握了山东“特大管”的演奏技巧及冀鲁地区多首民歌和曲牌，为演奏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金山声名鹊起，引起了冀东南及山东北部一些地主、豪绅、军阀的关注。1936年春，山东临沂有一国民党军官娶妻办堂会，慕王金山之名，三次派人重金邀其助兴演出，均遭拒绝，军官恼羞成怒，便派手下持枪找到王金山要将其活埋。后经人多次斡旋，才幸免一难。从此，王金山携艺背井离乡，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闯关东”游浪生涯。这也是



他唢呐艺术生涯中一段重要的人生经历。

1936年，初到长春的王金山便得到了南皮老乡、时任清逊帝溥仪武师霍殿阁、“御前侍卫”霍庆云叔侄的帮助，参加了当地的“吹打班”。经三年磨炼，唢呐演奏技艺更为精进，名气大增。

1944年，王金山应邀去哈尔滨，参加了六道街义合铺边庭克组织的“鼓乐班”。在此期间，王金山潜心学习、广结师友，吸收当地的吹歌技巧、风格，并巧妙地把东北民歌与河北民歌熔于一炉，深受当地民众的欢迎，获得“吹破天”之美誉。

东北解放后，王金山结束了“闯关东”的流浪生活，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随即入鲍官屯“李九和戏班”任乐队伴奏，又与倪官屯赵志华（筱五朵）组班献艺，服务乡里。

旧中国，由于吹歌艺人多为贫穷无产者，靠为民间婚丧嫁娶及参加当地的求神拜佛、祭祀祈福和节日庙会活动卖艺，挣得微薄佣金维持生活。所以常被贬称为“吃凉菜的”“蹬桌子腿的”“打差的”等。

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焕发了王金山的创作热情。接踵而来的音乐盛会和命运转折让他兴奋不已。

1953年，在同辈艺人刘书亭的推荐下，王金山加入宁津县（时属河北省）第一乐队任主奏。1955年，参加河北省在保定举办的全省民间文艺会演，他以一曲唢呐独奏《打枣》、味戏河北梆子《大登殿》，赢得满堂彩。会演期间，王金山多年的艺术积累得以迸发，娴熟的唢呐演奏技巧和绝妙超群的吹味艺术引起赛会轰动，获得大奖。1956年，调入河北省文化学院，先是进行文化课补习、再进专家组进行乐理知识和其他方面的系统训练。

次年，随着河北省歌舞剧院的成立，他成为了一名专业唢呐演奏员。从此，迈入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在这里，他的唢呐演奏和味腔艺术达到了其艺术生涯中的顶峰。



后经王金山改编创作的唢呐独奏《打枣》《欢乐的农村》以及味戏河北梆子《大登殿》、评剧《刘巧儿》、豫剧《拷红》等成为他艺术生涯的杰作，红遍大江南北。20世纪60年代，中国唱片社、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纷纷为其录制唱片，至今广为流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音响资料。

后来，王金山先生吸收了宫廷音乐的柔美技艺，把它用在唢呐演奏中，使唢呐这一艺术形式由广场演奏的艺术形式搬上了舞台，将这种民族乐器掌控的音律更加精准、音色更加柔美。在此基础上，王金山还发明了“箫音”和“三弦音”的演奏技巧（亦称扒拉音），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业内独树一帜。

一曲唢呐独奏《欢乐的农村》，使王金山获得了“北方第一支唢呐”的美称。1960年9月，王金山应邀到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专场演出，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演出结束后，毛主席起立带头为他鼓掌。随后，经郭沫若介绍，王金山加入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次年，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第二届青年联欢会上，他和笛子演奏家梁培印共同获得了赛会二等奖。奖品是一支金质管乐器，这是中国民族管乐器唢呐在当时国际性的大赛中获得的最高荣誉。

唢呐曲《欢乐的农村》，倾注了王金山一生的心血。它原是一首民间唢呐曲《艺勾勾》，王金山在保留原曲基本音调的基础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又充分吸收了河南的《河南呕儿》、河北的《哈哈腔》《武安落子》《丝弦》、山东的《两夹弦》等地方音调，将之改编成《欢乐的农村》。

改编后的《欢乐的农村》，在乐曲内容和演奏形式上都被赋予了新意，有了质的升华。演奏时唢呐和味腔两种手法的运用，不仅增加了乐曲音色的对比，烘托了气氛，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农村男女老少对话和笑声的模仿，把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和翻身当家做主人的一代新型农民欢歌笑语的热烈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

王金山的“味戏”技艺亦称一绝。而演奏河北梆子更是他的“拿手



好戏”。吹奏和唢奏两种手法交替使用，相得益彰。尤其他演奏的河北梆子《大登殿》，板式安排结构合理、人物形象鲜明生动。通过对剧中人物小旦、青衣、花脸唱腔的模仿，把河北梆子那种高亢、壮美、凄婉、奔放的音乐特色表现得惟妙惟肖。尤其是在演奏中运用唢呐的借孔技巧（即高音上借孔、中音下借孔），使唢呐的声音更加高亢、嘹亮，柔美动听，拨人心弦。

成名后的王金山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多次随中国艺术团演出，把唢呐金曲带到了福建前线部队军营，带到了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受到了部队官兵和外国朋友的热烈欢迎，把友谊的种子播撒到五湖四海。

（郭其武）



周恩来总理向刘喜奎敬酒寄嘱托

民国时期被誉为“坤伶大王”“女伶三杰”的刘喜奎，是南皮县黑龙村人，著名京剧、河北梆子演员。1950年，在文化部举办的新春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亲自向刘喜奎敬酒，称赞其为“中国戏曲界的明珠”，并嘱托她“要把技艺传给后人”。

2014年，在刘喜奎诞辰120周年、去世50周年之际，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编排的以刘喜奎为原型的剧目——《北国佳人》在南皮县进行了专场演出，引起了很大反响。2018年12月，由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演艺有限公司创编的、以刘喜奎为原型的大型河北梆子《大青衣》在石家庄市举行首演。

—

刘喜奎（1894—1964），原名刘志浩，后改刘桂缘，梨园界尊称刘大姑、喜娘。祖籍南皮县黑龙村，生于天津。

清光绪三年（1877），刘喜奎祖父携家带口到天津谋生。其间，刘喜奎的父亲刘贻文入清廷海军，曾参加“甲午之战”，战后寓居旅顺。

街坊有一戏班，年幼的喜奎常去看他们排演，耳濡目染遂爱上了戏曲。后因生活所迫举家返天津，途中，喜奎父亲病逝于营口，至天津后靠母亲针黹为生。

在天津，刘喜奎8岁时入李海科班学京剧青衣兼学花旦。10岁时，拜河北梆子演员毛毛旦为师。

河北梆子是河北省的主要戏曲剧种，流行于京、津、冀、鲁及东三



省一带，是由清代中叶传入河北的秦腔和山西梆子逐渐演变而成的，过去曾称京梆子、直隶梆子、卫（指天津卫）梆子，1952年始改名河北梆子。刘喜奎自拜师学习梆子戏以后，就把全部精力倾注于艺术的追求之中，在河北梆子的行腔、咬字方面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她把秦腔化为河北口语，形成了以河北字音、曲调为基础的高亢激越、婉转低回的“京梆子”。

当时，由于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戏曲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等角色都由男子扮演，女伶难登大雅之堂。然而，当人们对男艺人的表演看的久了，对清新俏丽的女伶反而更为推崇。刘喜奎身材窈窕、姿容秀丽，气质高雅，扮相俊美，原本就有相当造诣的她，经过“崇雅女科班”的调教及包装，在“中和园”剧场挂牌演出一举走红。此后，凡刘喜奎登台，京津冀那些捧角的粉丝们便趋之若鹜。对于刘喜奎的声名和美艳，有人赋诗以记：“远山之眉瓠犀齿，春云为发秋波瞳。娇羞灵艳妙难数，牡丹能行风能语。”

刘喜奎艺成出道后，曾先后在京、津、沪及哈尔滨、海参崴（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演出。她在沪与周信芳同台，在津、京与谭鑫培、杨小楼合作，均获好评。据传，当时颇负盛名的梨园巨匠谭鑫培曾感叹说：男有梅兰芳、女有刘喜奎，吾其休矣。

刘喜奎还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位演出新戏的女子。1914年，她在天津演出新编剧《宦海潮》《新茶花》《黑籍冤魂》等，抨击军阀官僚、宣传民主自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当时，在南开学校（今天津南开大学）读书的周恩来就是刘喜奎的热情观众。这些新戏的演出，不仅拓宽了她的戏路，也扩大了她的舞台影响力，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民初“梨园第一红”。此后，声誉日隆，与鲜灵芝、金玉兰并称为“女伶三杰”。

1918年，《顺天时报》主持评选伶界大王，梅兰芳以232865票获男伶大王，刘喜奎以238606票获坤伶大王。自此，“坤伶大王”的美誉便



不脛而走。戏剧大师曹禺曾著文这样说：如今戏剧界很少有人提到刘喜奎了。然而在一二十年代，她可是红透半边天的名坤伶。

二

成名后的刘喜奎在社会上备受关注，报纸刊物对其报道连篇累牍，各方赞誉纷至沓来。为她着迷的上至达官贵人，中有士绅名流，下至贩夫走卒，爱慕者、捧场者、追逐者如过江之鲫。

段祺瑞有一个侄子，单恋刘喜奎已到发狂的程度，有人与他打赌，赌其敢不敢当众搂抱刘喜奎。那晚，刘喜奎在“广德楼”饰演《西厢记》中的红娘，其绰约多姿的身段、婉转娇啼的念白，使得全场观众如醉如痴，段祺瑞的侄子看得更是灵魂出窍。散场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上前一把抱住刘喜奎不放，口中还念念有词：“心肝宝贝，可想死你了。”人们将之扭送至警察局，罚了他50大洋。当时，报纸对此事大加渲染，有人曾作诗一首：“冰雪聪明目下传，戏中魁首女中仙；何来急色儿唐突，一声心肝五十元。”

还有的资料记述，刘喜奎在“三庆园”演出《独占花魁》，散场后有人上前拥抱吻之，警察前来制止并罚洋50元。著名戏曲家张伯驹先在其名作《鬻鬻纪梦诗注》中记载了此事，还为此作诗曰：“独占花魁三庆园，望梅难解口垂涎。此生一吻真如愿，顺手掏来五十元。”

刘喜奎的声名和靓丽还引起了当时军阀政客的垂涎。北洋时期的几任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都曾打过她的主意。袁世凯与黎元洪几次邀请唱堂会，均被刘喜奎拒绝。

有一次，袁世凯以总统的名义请她去中南海唱堂会，刘喜奎在后台化妆时，一个听差跑过来对她说：“有人请。”她随着听差到了一间陈设华丽的屋子里，见房中无人，顿觉气氛不对，就问听差：“是谁找我？有什么事？”这时，袁世凯从门后走出来说：“没有什么事，请你来随便聊



聊。”刘喜奎见袁世凯不怀好意，便不卑不亢地说：“既然没有事，我还得去化妆。”说完就转身而去。

曹锟早就想纳刘喜奎为妾，他先是采取“银圆攻势”的方法，但刘喜奎不屑一顾，甚至以死抵拒。1921年，曹锟60大寿，邀北京名伶大演堂会戏。此时，为躲避曹锟纠缠已经两年没有登台的刘喜奎，经不住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陆绵的一再劝说和信誓旦旦的保证，勉强赴会出演。孰料戏刚唱完，曹锟就露出狰狞面目，硬把刘喜奎留下。幸亏一位正直的军官急中生智，找来了曹锟的正室大太太，刘喜奎才得以逃离。

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辫帅张勋，在拥立溥仪复辟后，以为大权在握，非要得到刘喜奎不可。所幸段祺瑞以反对复辟为名，誓师讨张。张勋兵败后逃入荷兰使馆，这又使刘喜奎躲过一劫。

三

在民初戏剧舞台上，有两位引人注目的旦角名伶。一位是男旦梅兰芳，另一位便是坤伶刘喜奎。

刘喜奎与梅兰芳堪称20世纪初中国戏曲舞台上的金童玉女，当时出版的书籍曾评介说，刘、梅皆有天仙化人之目，他们犹如两颗璀璨的双子星，焕发着让人赏心悦目的光芒。

对于刘喜奎当时的处境，梨园前辈田际云、孙菊仙很是为她担忧。两人认为，应该在梨园界找个好男人，让刘喜奎尽快出嫁，才能摆脱不怀好意的人对她的纠缠，而且也不影响唱戏。相传，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梅兰芳，梨园界的同行也都希望刘、梅能够结成连理。没想到，此事却遭到了刘喜奎的拒绝。后来，刘喜奎在一篇回忆录中披露了真情：当时我20多岁，正值青春年少，在艺术上也有一些成就。那些军阀阔少们，纷纷打我的主意。……看来，不肯牺牲节操，就得牺牲艺术。她认为，中国京剧艺术的发展不能没有梅兰芳。所以，只有割舍与梅兰芳



的情缘，才能消除某些权贵陷害梅兰芳的图谋，让他在京剧舞台上大放光华。

后来，刘喜奎迫不得已嫁给了一直苦苦追求她的一个崔姓下级军官，并悄悄地躲到天津租界居住，靠刘喜奎的一些积蓄维持生活。一年后，刘喜奎生下一子。不久，其丈夫因病去世。

刘喜奎从此洗尽铅华，告别了深爱的舞台，迁于北京的一小胡同内，闭门谢客、寡居抚孤，并改名崔刘氏，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1937年“七七”事变后，盘踞北京的日本侵略者，闻知刘喜奎的名声并探寻到她的隐居处，想以重金邀请到日本演出，刘喜奎坚辞不受。而在此期间，她先后多次为河北灾民义演，所得酬金，全部捐献。一次安徽水灾，刘喜奎慷慨解囊，捐献2000银圆赈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致力于发展戏曲事业，文化部决定筹建中国戏曲学校，由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田汉兼任校长。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始终没有忘记刘喜奎，委派田汉多方寻找刘喜奎下落。为此，田汉带人在北京警察署所辖的各个派出所找到了30多个“崔刘氏”的户籍档案，并骑着自行车逐户询查，终于找到了隐姓埋名长达30多年的刘喜奎。田汉向其转达了周恩来对她的关怀，随即聘请她为中国戏曲学校教授，同王瑶卿、郝寿臣、谭小培、姜妙香、萧长华等著名戏曲艺术家组成了学校“艺委会”。此后，刘喜奎还担任了北京戏曲界女艺人联谊会主任，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

1950年，在文化部举办的新春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走到刘喜奎跟前向其敬酒，并鼓励她：你应该把技艺传给后人。这让刘喜奎十分动容，也使她真正感受到了当家做主人的幸福和自豪。自此，重获艺术生命的刘喜奎便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工作中去，为中国的戏曲教育事业，尽到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1964年4月3日，一代坤伶大王刘喜奎在北京安详地辞世，葬于万



安公墓。

作为生活在旧时代的名伶，刘喜奎所表现出来的荣辱不惊、蔑视权贵的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中国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和大家说：刘（喜奎）先生不贪图富贵享受，所以她在旧社会能够这么坚强。戏剧大师曹禺在1980年著文记述刘喜奎：这位自尊自重高贵的艺术家，应该让人记住，应该有人记住！

2013年，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以刘喜奎传奇故事创演的《北国佳人》在北京长安大剧院举行了首演；2019年6月开始，由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演艺有限公司创编的、以刘喜奎为原型的大型河北梆子《大青衣》在全省进行巡回演出，都表达了对这位戏曲艺术家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赵树森）



春秋霸主齐桓公在南皮古城修整军备

在今南皮县城东北约10里处，有一处“古皮城”遗址。为商殷筑邑、春秋得名、秦代置县，曾为郡治500多年。

“南皮”，按字面的意思就是“南面的皮革城”。这个名字起源于春秋时期，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山戎攻打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出兵援燕经过现在的南皮境域。为了修整部队，便在当时的“南城”缮修皮革（古志《南皮县志》记述：“齐桓公缮皮革于‘南城’”），“南城”遂称“南皮”。需要说明的是，春秋时期这里有一对姊妹城，一个叫“南城”（即今“古皮城”）、一个叫“北城”（即今“马武岗”），两城相距约20里地。

齐桓公在修整军备时，曾在城北游猎并引弓射雉。后人将其射雉处取名“射雉台”。古志《南皮县志》记载：“射雉台，在（古皮）城北半里。齐桓公射雉处。”清康熙年间南皮知县刘址尝以《射雉台》为题赋诗曰：“小白当年曾中钩，登台射雉启雄猷。”

古城兴衰

南皮这座古城邑，曾经商贾云集，热闹繁华。三国时期，曹操、曹丕、曹休等都到过南皮，在此游赏射猎，吟诗作赋。曹丕为魏太子时携吴质、阮瑀（阮籍之父、建安七子之一）等人曾到南皮赏游并进行文学活动。曹丕记述为“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阮瑀怀念南皮之游时写下了《感旧》诗：“昔会渤海时，南皮戏清沚。今复河曲游，鸣葭泛兰汜。”（据光绪朝《南皮县志》）。曹丕在《与朝歌令吴质书》中回忆了南皮之游：“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



可忘……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冰（寒冰井）。”“浮瓜沉李”的典故便由此而得。曹丕、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等文友诸彦在南皮的文学活动深深地影响了南皮的文学发展，进一步引起人们对文学的兴趣与爱好，并为后世留下了成语“浮瓜沉李”，留下了讌友台（魏文帝曹丕为中郎将时，与吴质等人曾游赏、赋诗于此，即在南皮进行文学活动的地方，后称“讌友台”）。“南皮朝宴”“南皮之游”也屡屡出现在历代诗作中，“南皮”一词成为后世文人笔端诗赋酬酢的一个典实。

然而，由于后世屡遭战乱，这个声名鹊起、繁华兴盛的古邑，终至城毁人散，变为了废墟，后人称之为“古皮城”。

古皮城遗址在今南皮县城东北约5公里处，城址呈方形，东西长465米、南北宽426米，面积19.8万平方米。北城墙残高3—5米，厚20米。城内遍布灰、红陶（绳纹、方格纹、菱形纹）碎片。城南500米外有高大土丘数个，传为曹操攻打袁谭时所筑的假粮台。西侧土丘分别为石崇宅、绿珠楼及范丹居等遗址。

作为南皮人的石崇，是一个极富悲剧色彩的人物。他既是西晋时期的巨富，又是著名的文人、诗人，其著作甚丰，仅《金谷园集》就有10余卷。石崇、欧阳建（石崇外甥）在“金谷园”（石崇别墅）与名士陆机、陆云、刘琨、左思、潘岳等人结成诗社，赋诗唱和，史称“金谷二十四友”。南朝梁文学家、史学家沈约称之为“南皮高韵”。书圣王羲之写《兰亭序》时，就自比石崇的《金谷园序》。著名诗人杜牧、韦应物、张继等都写有“南皮高韵”的诗。北周文学家庾信曾有诗：“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南皮高韵”和由曹魏家族开创并维系的“建安文学”被唐代诗人陈子昂、李白盛赞为“魏晋风骨”。

然而，极富文采的石崇却惜因斗富而酿下“绿珠坠楼”的悲剧，但也流传下来了“十斛量珠”的成语。“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在南皮



写过一首《过绿珠坠楼故址》的诗：“古往今来岁月深，季伦（石崇字季伦）遗址漫登临，绿珠楼下香魂杳，径尺珊瑚何处寻。”

虽然，古皮城的辉煌历史已成为了过去，但它毕竟是全国在秦代置县存留至今的古县之一，是见于沧州史籍最早的城邑，它既见证了时代发展的变迁，也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留下了许许多多美丽的传说，留下了一些未解之谜。

建邑辨析

在古皮城尘封的谜团中，为首的当属何时建邑。有人认为，古皮城为春秋时期所筑，根据就是北宋地理学家乐史编著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其曰：“齐桓公北伐山戎，在此缮制皮革而筑。”唐代人颜师古在《汉书·地理志》中“渤海郡南皮县”下注有：“阚骃云，‘章武有北皮亭，故此云南’。”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河北政区沿革志》也沿用了《太平寰宇记》的史料：“春秋时期，山戎攻燕，燕求救于齐。齐桓公遂北伐山戎，至今南皮县地，因缮修皮革而筑城。其时，章武有北皮亭（章武在黄骠县和沧县境；《河北通志稿》称：南皮城北五十里有北皮亭），故称此城为南皮。”

而清康熙癸丑年（1673）编修的《南皮县志》则明确记述：“齐桓公缮皮革于南城，因曰南皮。”这就是说，齐桓公是缮皮革于“南城”，而非因缮皮革而“筑城”。该志在“建置”中进一步指出：“邑盖有旧城云。按春秋齐桓公北伐，于此缮皮革焉，因以名，城早矣！或曰：章武有北皮城，此以南皮别之。果尔？则《史记》载汉高祖封陈馀居南皮者，又何以称焉？”在“事记”中结论为：“论曰：皮之为邑三千余年矣。”

按这个时间上溯，南皮的先人筑邑当在殷商时期，这也是与史实和传说相吻合的。试想，如果当年这里仍是混沌蒙昧之地，姜太公不会隐居于此，悠然垂钓；而“文以服众、武以威敌”“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的西周内史大臣尹吉甫亦不会下葬于此。按此推论，殷商时期此地就已经有了城邑，逾千年之后的齐桓公只能“缮皮革于南城”，而非“因缮皮革而筑城”。

关于《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章武有北皮亭，故此云南”的观点，清康熙朝、光绪朝《南皮县志》都予以质疑。查1999年版的《辞海》，“章武”一条的注释为：“古县名。西汉置。治今河北省黄骅市西北。”南皮在秦代便已置县，章武是在西汉置县，在时间上明显晚于南皮，再加之《史记》载“汉高祖封陈馥居南皮”的史实，因而，“章武有北皮亭，故此称南皮”（《南皮县志》1992年版）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因此，笔者有理由相信，“皮之为邑三千余年矣”。

迁址略考

南皮县治是自何时迁往今址的，应该说，至今仍无定论。清康熙朝《南皮县志》对此就有存疑，在“建置”中记述：“不知何自而徙今治。”现据查阅有关史料，一般都认为是南北朝时移县城至现址的。1992年版的《南皮县志》对此的记载似乎更加具体。在其《地理》编中的“建置沿革”一节记述：“东魏时，南皮县治迁现址”；在《大事记》一编中记述：“（东魏）移县治于今址”；在《概述》中云：“东汉延光元年（122），移渤海郡治于南皮。东魏移郡治于东光，徙县治于今址”。2002年在政协南皮县文史委员会编辑出版的第4辑《南皮县文史资料》上，有一篇题为《南皮县城迁移今址考析》的文章断言：“今天的南皮城是从北魏分裂后迁至今址的，是史实，是根据。”有一报刊文章称“北魏时，渤海郡城移至东光，南皮县城也移至今南皮城”。还有著述确认南皮县城是北魏太安四年（458）迁于今址的。对此，笔者查阅了两方唐代墓志铭的史料，认为南皮县城迁址时间问题应该有待进一步商榷。

第一方墓志铭是清康熙朝《南皮县志》记载的：“万历时，今城东北



里许，土人耕地得方石一合，系唐义昌军节度驿使官夏侯义墓志铭。内云：葬南皮西南十里，东观乡庄东南百步。是指旧城为言也，录以备考。”在唐代，曾“以沧州领十二县，南皮隶之，属河北道，寻改隶义昌军（据清康熙朝《南皮县志》）”。上面提到，古皮城在现今县城东北约6公里处，夏侯义墓志铭提及的“南皮西南十里”（即“今城东北里许”处），这在地理位置上明白无误地证实，在唐代“南皮”并没有迁于现址。

第二方墓志铭是2007年4月发现的。当时，《南皮县志（1987～2006）》编修人员获悉，城关供电所在南皮镇康官屯村进行农网改造施工时，挖出一方形石块，经辨认为一墓志铭，便运至供电所。考虑会对研究南皮历史有一定价值，县志编修人员驱车到城关供电所，在征得同意后将其运到县志办公室。尔后对该墓志铭进行仔细冲刷擦拭，并逐字辨认，全文记录下来。

墓志铭呈方形，边长约50厘米、厚约15厘米，大青石质。墓志铭记载，墓主人为女性，68岁，为汉代名相张良的后代。因患痲疾于唐大中元年（847）闰三月二十九日病故，“十月二十六日葬于南皮县城东南五里平原之野”。而此墓志铭出土之地便在古皮城遗址东南5里处。此墓志铭的发现，证明南皮县城在唐大中元年（847）仍未迁址，比东魏（534）晚313年，比北魏太安四年（458）晚389年。

据百度搜索显示，有资料称古皮城遗址“已发现釜内托、铜箭镞、唐三彩等”。另据《南皮县志（1987～2006）》记载：“1990年，古皮城西侧整修水渠，挖出等距离砖竖井7眼和一些文物，县文保所共收回战国和唐代的铜、瓷、玉、骨等类器物15件。”试想，如果是在东魏（或北魏）就已迁址的古城遗址里，怎么会挖掘出唐代的器物呢？我们不妨这样认为：南皮县城迁于今址应是在唐大中元年（847）之后。当然，这需要专家、学者的进一步考察和论证。

（赵树森）



相关链接：

春秋前期，分布于我国西部、北部和东北地区的戎族开始强盛，灭亡了西周后，进一步向中原渗透，给中原诸侯国尤其是北边的几个国家，形成巨大侵害。公元前664年秋天，北方山戎再次南下，数万铁骑攻进燕国，烧毁房屋、杀死老人和敢于抵抗的男子，将妇孺和粮食、盐巴、玉帛等全都掳回北方。苦苦死守了三个月的燕庄公难以支持，于绝望中派快马冒死突围，向齐桓公求救。

齐桓公觉得事情很不好办，因为中原军队主要由车、步兵组成，戎族全为骑兵。行动迅捷，冲击力强。齐军越境出击，辎重庞大，行动尤为不便。因此一时难于决定，遂召来管仲密议。管仲想了想，对齐桓公说：“主公以‘尊王攘夷’号令天下，称霸诸侯，内靠实力、外靠信义。今燕国求救，若不救援，信义顿失，称霸大业岂不随水东逝？今日出兵虽有险阻，但燕、戎交战已三月之久，双方都已疲惫，我全力出击，可操胜算。”听了管仲的分析，齐桓公疑虑顿消，决定亲自统率，举倾国之兵与戎军决一死战。

蹂躏燕国三月有余的戎兵整日寻欢作乐，早已失去斗志。听说中原方伯齐桓公率倾国之兵赶来援燕，纷纷卷起掳掠来的财物解围而去。燕庄公绝处逢生，喜出望外，率领满朝文武出城迎接齐桓公。管仲乘隙对桓公说：“据探子报告，戎主性格残暴，周边被胁小部落都有离叛之心。如若齐燕合兵，趁其兵力分散、人心离析之际，全力追击、直捣巢穴，定可歼其实力，以绝后患。”齐桓公一听有理，连夜与燕庄公商议，依计实行。此时，抢得大量财物而归的戎主，根本没料到齐桓公会以全部精锐衔尾追来，仓促应战，屡战屡败；又因分赃不均，部属纷纷离散。齐兵紧追不舍，连克令支（今河北迁安西）、孤竹（今河北卢龙东南），山戎败亡。



汉武帝指挥使暴胜之礼请隽不疑

汉武帝末年，渤海郡盗贼蜂起。被武帝任命为直指使者的暴胜之到各地镇压盗贼、监察郡国吏政，其执法范围远达东部沿海。暴胜之久闻隽不疑在渤海郡一带的盛名，因此，他巡查到渤海郡后便派官吏登门邀请隽不疑与之相见，意在向他请教治国安邦的策略。

关于暴胜之与隽不疑会见的地点，后人称之为“遇士亭”，并作为一处古迹景观，收录于清康熙朝、光绪朝《南皮县志》中，其曰：“遇士亭在（古皮城）西北三里。暴胜之遇隽不疑处。”清乾隆年间举人边向禧在南皮赏游后，以《遇士亭》为题赋诗一首：

未论相遇作何语，遥向高风已感人。

不分马群空冀北，合应伯乐识麒麟。

—

隽不疑，字曼倩，生卒年代不详，汉渤海郡南皮人。隽不疑是西汉声名显赫的大臣，去世后归葬南皮（古皮）城南，隽不疑墓地处高台，规模宏大，林木参天。汉末，曹操讨伐袁谭、攻打南皮城时曾在此陈兵，所以，后人又称此地为“曹公固”[清康熙朝、光绪朝及民国版《南皮县志》俱载：“曹公固在（古皮）城东南百步。魏公曹攻袁谭时，以此为固。即隽不疑墓也”]。

隽不疑自幼天资聪慧，且学习刻苦认真。他博览群书，精心研读历代经典著作，对《春秋》一书尤为精通。他的一言一行都以经书为依据，并对史实的发展及演变，都有着独特的见解。因其才智过人，风度儒雅，成为当时渤海一带颇负盛名的“郡文学”（光绪朝《南皮县志》赞之：“治



《春秋》，为郡文学，进退必依理，名闻州郡”）。

当隼不疑应邀前去会见暴胜之时，暴胜之远远望见隼不疑容貌尊严、衣冠甚伟、神态自信，便倏然起立疾步出庭，亲自迎接隼不疑于大门以外，并尊敬有加，以礼相待，畅谈治国之道、安民之策。隼不疑坦然地说：我身处边远的沿海地区，很早就耳闻暴公的威名，但直到今天才有幸与您会面交谈。大凡为官，太刚直则容易受挫折，太软弱则容易荒废政务。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在实施威严的同时给予恩惠，这样就能够建功立业，永葆其位（光绪朝《南皮县志》载：“窃伏东海，闻暴公子名旧矣，今乃承颜接辞。凡为吏，太刚则折，太柔则废，威行施之于恩，然后树功扬名，永终天禄”）。

暴胜之听了隼不疑的论述后，非常钦佩，并以大礼设宴款待。接着，隼不疑又讲了很多齐家、治国、安民的道理，直至日落才告辞而去。光绪朝《南皮县志》记载：“胜之遂表荐不疑，征诣公车，拜为青州刺史。”也就是说，暴胜之在听了隼不疑的论述后，非常赏识他的才干，当即就向汉武帝上表举荐隼不疑，汉武帝即征召隼不疑到公车署，任命他为青州刺史。

二

汉武帝去世后，其子刘弗陵继位，是为昭帝。当时，齐孝王的孙子刘泽与郡中的一些地方势力勾结，妄图谋反。他们谋划先杀青州刺史隼不疑，后杀汉昭帝刘弗陵，篡夺帝位。隼不疑发觉后，及时平息了叛乱。汉昭帝因他的功绩卓著赐银百万并擢升其为京兆尹，成为京畿三辅之一。隼不疑为官清廉，执法严明，但却不残忍嗜杀，京都官员无不佩服。2009年8月版的《辞海》在“隼不疑”条目下的注释为：“初为郡文学，武帝末，任青州刺史。昭帝时迁京兆尹，为政严而不酷。曾以儒家经术治理伪戾太子狱。”



隽不疑的母亲为人公正慈善，隽不疑每次处理在押囚犯后回家时，其母当听到一些案犯被依法从宽处理、免以死罪时，便喜笑颜开，饮食大进；听到有人被处以极刑时，则面露不悦，为之不食。在母亲的训导下，隽不疑为官严而不残的行为，深得百姓的敬重（光绪朝《南皮县志》载：“京师吏民敬其威信。每行县录徒多有所平反，严而不残”）。大兴籍清代诗人王庭绍在凭吊隽不疑墓时，以仰慕的情感，作《谒隽不疑墓》诗一首，表达了对这位先贤的崇敬：“我亦司刑者，衣冠拜古祠。高名传汉代，酷吏鲜清时。血泪霜豪染，冰心铁砚知。回思慈母训，白日照寒碑。”

后，隽不疑又智辨假卫太子案，将之治罪并腰斩于市。此举，避免了一场朝廷大乱、社会动荡的严重事件的发生，轰动了整个京城。汉昭帝与大将军霍光及文武百官，莫不赞赏隽不疑断事之机智果敢（光绪朝《南皮县志》记载：“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喜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由是声名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为不及”）。从此，隽不疑名扬四海，为天下人所共知。

三

身为西汉的著名大臣，隽不疑政绩累累、声名显赫，而他又通晓经典、深明大义，其风范为后世敬仰，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纪念、所追思。由于年深日久，他的坟墓在历史上曾多次刻石修建，成为尽人皆知的“将军坟”。明万历年间，南皮知县李正华曾撰文刻石表之，铭曰：“卓彼隽公，琅琅国器。才济时艰，学深古义。……眷此丰碑，幽爽如寄。玉耶珠耶，山辉泽媚。不朽者名，昭兹来祀。”清乾隆年间，邑侯王漪亭对隽不疑墓又重新修葺。对此，清孝廉张奎震为之撰文曰：“邑城东南角楼外有汉隽不疑墓……今四十年来，墓址渐平，几与荒烟蔓草同湮。王漪亭侯慷慨仗义，重加封殖，巨冢岿然，既酌酒致祭，并禁墓侧取土，



盖表彰先贤之意深矣。”

清嘉庆二年（1797），南皮籍拔贡张景运因见李正华为隽不疑所立之石湮没，又为之立石仍刻李正华铭词，并缀文以记其事。文曰“……凭吊前贤，时加之意，亦可谓贤矣！景窃忝桑梓，仰止前徽，爰庇石书碑植之墓道，并录旧铭如右，敬告将来，幸保护而勿践履之哉！”

正因为人们对隽不疑这位先贤的尊崇，所以千百年来，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对其墓地都多有保护。清康熙十七年（1678）南皮县知事刘址在拜谒隽不疑墓时，触景生情，认为汉末的曹操将西汉名臣隽不疑墓作为“固”的做法，是对先贤的辱没，于是便以《曹公固》为题赋诗一首，对曹操进行了讥嘲和鞭挞。诗曰：

横槊争锋壮业驰，千秋战垒志南皮。

奸雄抔土今何在？马鬣独传隽不疑。

遗憾的是，在前人为隽不疑墓的刻石中，虽多次提及“禁墓侧取土”“幸保护而勿践履”的警世之言，但坟墓仍没能幸运地保存下来，后人只能从史籍中去寻觅它的踪迹了。

（孙九如）



曹操、曹丕开创“南皮高韵”

“南皮高韵”是由汉末曹（操）氏家族开创和维系的。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时，于建安十年（205）、建安十六年（211）两次携吴质及“建安七子”等文友到南皮游猎、朝宴、赋诗、唱和，创作了大量经典的文学作品。曹丕与众文士赏游南皮回邺城（古郡名。汉后为魏郡治所，今河北临漳西南）后，余兴未尽，又相聚西园继续宴饮游乐，赋诗酬酢，写有大量公宴诗。这些文学活动及成果被后人称为“邺下风流”，南朝梁文学家沈约称之为“南皮高韵”。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记：“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及江右”。这就是“南皮高韵”的由来和出处。

“邺下风流”即以邺城为中心蓬勃兴起的“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继承秦汉乐府使四言诗再度恢复青春，把五言诗推向顶峰，拓宽新路孕育了七言诗。同时也开创了文学批评和相互切磋作品的良好风尚，把文章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诗人陈子昂、李白谓之“魏晋风骨”。

2006年版《沧州市志》在概述中称“邺下风流”与“南皮高韵”为千古佳话。“邺下风流”在南皮的文学活动和“南皮高韵”的文学成果是南皮历史文化的一大亮点。

—

曹操、曹丕父子与南皮关系密切。他们在南皮，武曾横刀立马，文则游宴赋诗，踏下了深深的足迹。尤其是曹氏家族所开创的南皮高韵，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南皮的文化发展、文学创作



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南皮是建安文学的发祥地之一，南皮之游、南皮朝宴、南皮高韵成了后世诗文中代表建安文学的重要符号。

建安十年（205）正月，曹操破南皮城，追斩袁谭于城西南。下令“罹袁氏之难免今年租赋”。同时，曹操还斩了支持袁谭兄弟相争的谋士郭图，起用名士王修为魏郡（今河南安阳）太守。禁止士兵劫掠，鼓励工商业者安分经营，起用南皮士绅为掾属。曹操还制定法令，压制仇杀，反对奢侈陪葬以及建豪坟等陋俗，得到了百姓的拥护。曹操在南皮还创下了一项纪录：日射雉（野鸡）63只（一说为36只）。这一纪录，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南皮生态环境的和谐美好；一方面体现了曹操崇尚齐桓公的霸业，效法齐桓公南皮射雉的壮举，以展现自己的英雄气概和豪情壮志。明代陈琏、清代刘址都认识到这一点。陈琏在《雉台夕照》诗中写有“当年此校猎，射雉推豪雄。匪耽一时乐，要收九合功”的诗句。刘址在南皮古迹十绝之《射雉台》中指出“小白当年曾中钩，登台射雉启雄猷”。

南皮射雉台为齐桓公所修，小白是齐桓公的名字；诗写齐桓公，同样适用曹操射雉之举。曹操在南皮驻扎有10个多月的时间，除了以上事情还做了些什么，文献资料没有记载，但可以推想曹操一定为平定北方、征讨乌桓（也称乌丸）进行谋划和准备。北征乌桓时，南皮应是军需供给转运站。当时邺城至南皮水路畅通，为了方便转运军粮，曹操又开挖了平虏渠（一说为永济渠）。平虏渠的南口在什么地方，学界有两种观点，一是在青县东、一是在鲁城（今黄骅乾符村），两处均在南皮下游。平虏渠的工程设计应是曹操在南皮时经实地考察后确定下来的。

二

建安十二年（207）三月，曹操率军队从邺城出发北征乌桓，五月至无终（今天津蓟县）。因连降大雨，“滨海湾下，泞滞不通”。后由田畴为



向导，改道出兵卢龙塞（今喜峰口）。经白檀（今滦平县）、历平冈（今喀喇沁旗）、东向柳城（今朝阳南），八月至白狼山。袁尚、袁熙、辽西单于楼班率数万骑兵仓促出战，曹操则令大将张辽、张郃纵兵出击。经过血战，乌桓兵大败。曹操乘胜追斩乌桓首领蹋顿，胡汉降者 20 余万众，北方遂定。

九月，曹操率军由沿海路线回师。经过昌黎碣石山时，曹操眺望浩渺大海，不由豪情满怀，写诗《步出夏门行》。其中《观沧海》一章为：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鸟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时年 53 岁。诗作展现了大海般的胸怀，表达了对统一全国的渴望。1954 年，毛泽东主席在《浪淘沙·北戴河》词中，引用了曹操的典故，写下“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曹操亡故后，曹丕称帝，上曹操尊号魏武帝，魏武即指曹操。毛泽东在词中还引用曹操的诗，写下了“秋风萧瑟今又是，换了人间”的名句。

三

经曹操首肯与支持，曹丕于建安十年（205）、建安十六年（211），两次携建安七子等文友到南皮游猎、朝宴、吟诗作文，创作了一批文艺作品。

对第二次南皮之游，曹丕于建安二十年（215）写给旧交吴质的信中有具体的描述（即《与朝歌令吴质书》）。书信写的典丽温婉、文采斐然，公认是魏晋抒情散文名作。书信篇幅不长，全文照录如下：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无恙！途路虽局，官守有限，愿言之怀，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书问致简，益用增劳。每念昔日南皮之游，



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箏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均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今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行矣自爱！丕白。

曹丕与众文士游南皮回邺城后，余兴未尽，又相聚西园继续宴饮游乐和诗赋酬酢，写有大量公宴诗。这些文学活动及成果被后人称为“邺下风流”，南朝梁大文学家、史学家沈约称之为“南皮高韵”，也是大诗人陈子昂、李白大声疾呼提倡的“魏晋风骨”，又称“汉魏风骨”“建安风骨”，在中国文学史上则称为“建安文学”。南皮高韵、南皮朝宴、邺下风流、汉魏风骨都是建安文学的另外表述形式。建安文学是以曹操、曹丕、曹植为领袖，以建安七子为骨干，集聚邺城的近百文人集团在南皮和邺城两地所创造的文学奇葩。

四

建安文学继承秦汉乐府诗赋，使四言诗再度恢复青春，把五言诗推向顶峰，同时拓宽新路孕育了七言诗。曹丕的《燕歌行》是公认的最早的优秀文人的七言诗。建安文学开创了文学批评和相互切磋作品的良好风尚，并把文学创作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建安文学除了文学创作的贡献以外，还具有鲜明的三个特点：一是推崇文学。曹操在出生入死的战斗中，“朝携壮士，夜接词人，崇奖风流”。二是所创作的诗歌、文章具有强烈的现实色彩。三是文学名士们所表现出的任性自由。建安七子中的王粲爱听、爱学驴叫。王粲亡故，曹丕带领吊唁



的才子们一块学起驴叫，一时间驴声鼎沸，用以表达对死者王粲的哀悼之情。

钟嵘在《诗品》序言中，写有“降之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曹公指曹操，平原指曹植，兄弟泛指曹氏族人曹真、曹休、曹衮、曹彪等，主要指曹丕、曹植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贡献。建安文学由曹家开创和维系，按现时的说法，曹操应是建安文学的“文联主席”，曹丕则是建安文学团体的“秘书长”。

俞绍初综合分析各种资料，写成《南皮之游与建安诗歌创作》一文，证明建安七子除孔融外都参加了南皮之游。一般认为建安七子为孔融、陈琳、阮瑀、徐幹、王粲、应玚、刘桢。建安中，孔融在许都（今河南许昌）汉献帝前任职，未及参与邺下文人集团的活动。宋人苏颂《公说再和并前十五篇辄复六章用足前篇之阙》其四云：“追寻燕友南皮会，谁继曹刘七子诗。”曹刘指曹植、刘桢，苏颂所说的七子包括曹植而无孔融。唐代释皎然《诗式》“邺中集”条下亦曰：“邺中七子，陈王最高”。陈王即陈思王曹植，与苏颂说法一脉相承。

俞绍初详细论证了建安文人参与南皮之游的人员。《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曰：“太子即王位（建安二十五年），又与质书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丹龙飞，或将或侯。今惟吾子，栖迟下仕……’初，曹真、曹休与质俱在渤海游处。”这里的渤海即渤海郡，郡治南皮，实指南皮。上引《魏略》又曰：“河北平定，五官将为世子，质与刘桢等并在座席。”在建安十年（205）夏秋之间，曹丕、曹真、曹休、吴质、刘桢等参予了南皮之游。建安二十年（215），曹丕于孟津写给吴质的信中，提到同游者阮瑀已长逝。指出建安十六年（211），第二次南皮之游有曹丕、吴质、阮瑀。《文选》中沈约曾说“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李善注：“南皮，魏文帝之所游也。高韵，谓应徐之文也。”应、徐即应玚、徐幹。可见，曹丕第二次南皮之游除了



吴质、阮瑀，还有应玚、陈琳、徐幹参加。唐人吕温在《裴氏海昏集序》中说：“魏公子为南皮之游，以浮华相高，故其诗傲荡骄志，胜而专，勤而不安。”又曰：“观南皮之诗，应、刘焉得不夭？魏祚焉得不短？”从中我们得悉，建安文学集团的骨干们曾集聚南皮，而且都写有诗篇，所以沈约才有“南皮高韵”的概括。

建安十七年（212），阮瑀去世，相继王粲去世，加以曹丕、曹植为争立太子之事阍墙失和，邺下文人集团的群体性诗赋唱和日渐稀少。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魏郡大疫，徐幹、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文人集团自然解体，群体性的诗赋唱和的创作方式也就戛然而止了。虽有曹植一人仍专注于诗歌写作，因受政治迫害，与以南皮之游为标志的建安诗风大异其趣了。

五

南皮之游、南皮高韵、邺下风流在魏晋时期成为一种时尚，文人雅士争先效仿。魏晋竹林七贤结社竹林，高谈畅啸。南皮人石崇、欧阳建在河阳金谷园与左思、潘岳等名士结成诗社，宴游燕集，赋诗唱和，史称“金谷二十四友”。左思写出了《三都赋》，一时竞相抄录，洛阳为之纸贵。世人一提石崇，往往就会想到斗富夸宝、奢靡无度、绿珠坠楼等有关石崇的故事。而对作为文士、诗人的石崇则了解不多。其实，石崇著作甚丰，仅《金谷园集》就有10余卷，还写有聚财、经商、致富方面的书。石崇的外甥欧阳建，不仅是诗人，还是著名哲学家。欧阳建反对玄学，著《言尽意论》，主张客观事物是离开人们的概念和语言独立存在的，概念、语言是人们用来说明客观事物的相互交流的工具。魏晋时期的南皮之游、邺下风流、南皮高韵、金谷大会、兰亭之会、鸟衣之游等，都是一脉相承的。史载王羲之写《兰亭序》就借鉴了石崇的《金谷园序》的写作手法。



南皮高韵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诗词中大量引用的典实。诗文中描述、歌咏南皮的留传材料很多，说枚不胜举当不为过。除本文提到的以外，再摘录一些与南皮高韵有直接关系的例句，彰显南皮历史文化底蕴。阮瑀写有《感旧》诗，第四句为“昔会渤海时，南皮戏清沚”；齐梁时王僧孺在《谢齐竟陵王使撰众书启》中写有“摄齐下坐，有糅南皮之游”；梁武帝萧衍在一首五言诗中写有“小息尚青绮，总角游南皮”；梁元帝萧绎在太常卿陆倕《墓志铭》中，叙陆倕生平时说“南皮朝宴，西园夜游，词峰飙竖，逸气云浮”；隋朝陈良在《游侠篇》有“东郊斗鸡罢，南皮射雉归”的描写。《魏志》云：魏文帝为五官中郎将，与吴质重游南皮，筑其台讌友，故名焉。又名射雉台；唐朝萧颖士《清明日南皮泛舟序》记述“魏文为王太子，与朋友诸彦有南皮之游”；庾信著《杨柳歌》，写曹丕“昔日公子出南皮，何处相寻玄武陂”；韦应物在《金谷园歌》中曰：“嗣世衰微谁肯忧，二十四友日日空追游”；《宋书·谢灵运传论》摘录沈约“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的诗句；李商隐《为濮阳公论皇太表》亦有“南皮魏副，屡见飞觞”。2006年出版的《沧州市志》，在《概述》中第四个问题讲沧州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文化积淀。文中记述：“公元三世纪初，建安文人集团的曹丕、吴质等人曾在南皮进行文学活动，‘南皮高韵’与‘邺下风流’一起成为千古文学佳话。当西晋玄风劲煽之时，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南皮人欧阳建旗帜鲜明，与玄学的虚无主义对垒，并以其文才擅名北州。”可见，南皮高韵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闪光点。

南皮高韵的开创者曹丕，对南皮高韵等文学事业曾下过一个中肯的评语。其在《典论·论文》中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南皮高韵将继续彪扬中华文化的万古豪情。

（赵树森 杜中洲）



相关链接：

《宋书·谢灵运传论》

沈约

史臣曰：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或无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

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考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

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缙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有晋中兴，玄风独扇，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殫乎此。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迨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擢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

若夫敷衽论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



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

译文

史臣说：人承受天地之精华，蕴含五常之德性，刚与柔更替使用，喜与怒分为七情。心中受志意触动，则会以歌咏来表达。这是赋、比、兴、风、雅、颂这六义的由来，也是《诗经》中最初的四首诗歌所依恃的。歌唱之声音或高或低，风雅颂的歌谣缤纷繁盛。虽然虞代夏代之前，未见遗诗遗文，但禀气怀灵的人，心中有触动即表达出来，道理上是没有差别的。那么，歌咏的兴起，应是有人类时就有的了。

周王室无道时，作诗以讽刺王室的风气便兴盛起来了。屈平、宋玉开辟了很好的先路，后来的贾谊、司马相如获得了美好的名声。英美的文辞让用以铭刻诗文的金石增光生色，作者高洁的情操逼近云天。自那时以后，以诗文咏情咏志之人越来越多。王褒、刘向、扬雄、班固、崔骃、蔡邕这些辞赋家，在不同的道路上一齐向前奔驰，一个接一个地以前人为师祖。然而，虽然清妙的文辞和悦耳的曲调，时常见于篇章之中，但芜杂的声音和累赘的文气，原本也是很多的。张衡的文辞漂亮，文章跟着思想感情的起伏而变化，其文章堪称绝唱，有极高的造诣，很久都无人能与之相抗衡。至了建安年间，曹丕初始登基时，曹操、曹丕、曹叅三祖与陈王曹植，都具有文学才能且辞藻丰富，他们开始以情感来组织文章，以文辞来润饰内容。自汉朝至魏朝四百多年间，写辞写赋的文人才子，经历了三次文体变革。司马相如擅长写描摹物态的文章，班彪、班固擅长写抒情说理的文章，曹植、王粲则以文章的气韵为本体，并且表现出独具特色的才能，在当时光芒四射。因此当时的士子文人，各自相互仰慕与学习，推寻出汉魏四百余年的诗赋创作，莫不向《诗经·国风》《离骚》学习。只是各自的欣赏水平、爱好的文体有所不



同，因此写出的辞赋内容、体裁也有所不同。

到了元康年间，潘岳、陆机、陆云优秀出众，他们的文赋声律与班固、贾谊不相同，作文体裁与曹植、王粲也很不相同。复杂的文旨像星辰一样稠密，繁复的辞藻像绮罗一样协调。他们延续了司马相如当年在平台写《子虚赋》那样高超的才能，采续了南皮县文人那样不凡的文气。他们遗存下来的文风，在西晋时达到了极点。东晋之后，老庄之学独树一帜。为学之人穷究老子的学说，博览事物都在《庄子》的七篇之内。他们在文章中所谈的道理，莫不关乎老庄思想。自建武年间至义熙年间，经历了将近一百年。虽然文联辞缀的各式文章，如波浪层出、云朵相连那么多，却都是托言于老子的学说、庄子的思想，刚劲遒丽的文章，在此期间不曾听闻。殷仲文开始革变孙绰、许询的风气，谢混也大大改革了只谈庄老的玄言诗风。到了南朝宋代，颜延之、谢灵运的文声腾跃有名，谢灵运的情兴意会昂扬高亢，颜延之的体裁清晰细密，他们都与前代优秀的作家并驾齐驱，为后人传下作文的法式。

若是铺开衣襟、席地而坐谈论文心，探讨探讨前人的作品，他们或工巧或拙笨的章法，似乎是可以谈一谈的。青、黄、赤、白、黑五色相乎映衬，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的声律协调，依靠玄色来定色、律吕来定音，每一样都安排得当。要使五音交错，高音与低音互相节制。若是前面有浮泛的声音，后面便需有低沉的声音。五言诗的一句之内，音韵是全然不同的，两句之内，轻声与重声悉数不同。能轻妙地达到这样的旨意，才能开始谈谈文章。

至于前代文士的好作品，吟诵之人以为高妙，历代文人共同欣赏。曹植写“函京”的作品，王粲写“灞岸”的篇章，孙楚写“零雨”的作文，王瓚写“朔风”的句子，都是直抒胸臆，并非依傍历史上的诗句与史实而写的。他们正是因为音律合韵的缘故，取得比前人还高的成就。自从屈原以来，经历了很多个年代，虽然文体稍微精妙了些，但大家还未晓得我所讲的这个声



韵协调的秘密。至于高妙的言语辞句，音韵浑然天成，其内里都与我所讲的道理相合，不是自觉地经过思考达到的。张衡、蔡邕、曹植、王粲，并不曾有这种认识；潘岳、陆机、陆云、颜延之、谢灵运，离声律美还很遥远。世上有知音者，有这方面的感悟的，便知道我所讲的并非谬论。若是不相信，那就请等待后世的明智之人来判断吧。



魏文帝曹丕对“南皮之游”情有独钟

南皮向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而著称，悠久的历史积淀，留下了不胜枚举的文物、胜迹、遗址。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南皮拥有了许许多多美不胜收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吸引着众多的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因而也就留下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美丽诗篇和一个个浪漫而又传奇的故事。像东汉“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北宋进士、史学家、《资治通鉴》的著作者司马光，元代进士、河北道廉访司萨都刺，清康熙状元、礼部尚书严我斯，明末进士、后任清户部尚书的戴明说，清雍正大理寺卿尹嘉铨，清乾隆进士、“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等都曾在南皮流连忘返。然而，对南皮情有独钟的则是后为魏文帝的曹丕。

曹丕（187—226），字子桓，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曹魏的开国皇帝，即魏文帝。他在位期间，平定边患、击退鲜卑，与匈奴、氐、羌等外夷修好，恢复汉朝在西域的设置。

东汉建安十年（205）和建安十六年（211），时为五官中郎将的曹丕曾两次携建安文人集团来南皮游猎、宴饮、唱和、赋诗，其中包括曹修、曹真、吴质及“建安七子”等。

“南皮之游”给曹丕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记忆，使其“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以至于时隔数年后，他在写给吴质的三封信中都提到了“南皮之游”。可见，“南皮之游”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曹丕自己亦说“追思昔游，犹在心目”。

曹丕与众文士在南皮赋诗唱和，创作了一批名传千古的文学佳作。



他们赏游南皮回邺城后，余兴未尽，又相聚西园继续宴饮、赋诗。这些文学活动及成果，被后人称之为“邺下风流”，南朝梁文学家沈约赞为“南皮高韵”。他们的聚会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八大雅集”之一。

曹丕缘何对“南皮之游”情有独钟呢？

一、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

东汉末年，由于黄巾军起义以及后来各地军阀的混战，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百姓不是携带家眷流离失所，就是在战乱中死亡，这就造成了农业劳动力的严重短缺，致使大片田地荒芜，粮食产量大幅下降，造成了饿殍遍地、民人相食的惨剧；社会动荡不安，危及政权安定。更为严重的是，军粮的短缺，不仅直接影响了军队的士气，也极大地制约了军队的战斗力。

为使战乱中的百姓休养生息，建安元年（196），曹操向全国颁布了《置屯田令》。他在《置屯田令》中明确道：“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屯田制主要包括兵屯、民屯两种形式。兵屯的劳动者一般是佃兵或者屯兵，民屯的劳动者一般屯田客、屯民等。屯兵的来源一般是世代当兵的人家；屯田客或者屯民则一般来自百姓，方式是招募，所以又称募民。一旦百姓当上屯田客或屯民，则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不能自主迁徙。屯田客人均田地面积50亩左右。屯田所用的耕牛、农具，兵屯都是官府供给，民屯者或者官供或私备。屯田劳动者按“营”和“屯”为单位，耕种一定面积的田地，以分谷制缴纳收成物的五成、六成或者更多的地租。

曹魏实行的屯田制，在当时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大量的水利设施得到兴修，粮食产量大幅增长。农业的稳定发展带动了商业、手工业的繁荣兴旺，社会局面开始由动荡不安转为相对安定，户口数也开始不断增长。到曹魏末年，境内的户口数已超越吴、蜀两国之和，可以动员的军队作战力量也远超吴、蜀两国。



基于上述背景，此时的南皮也早已摆脱战乱的困扰，为曹丕一行“南皮之游”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二、较为便利的水陆交通

南皮处于漳水下游的渤海之滨，距离邺城约 500 里的路程。建安十六年（211）五月，曹丕率邺下文士从邺城乘船沿大清河顺流而下，两三日便到南皮。如此顺畅的水路交通，得益于曹操为运输战略物资而开凿贯通的这条运河。

历史上，南皮境域河流众多，密如织网。相传大禹于公元前 21 世纪成功治理黄河。据《禹贡》记载：“导河积石……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黄河在孟津以下改向东北流，汇合漳河后一起向北，流入邢台北的大陆泽，再往下黄河分为九支（即北播九河）。而南皮则为九河下梢。古时，华北平原的河流，大多自然形成，顺势而流，在天津、沧州地区有清河（今南运河）、滹沱河（今滹沱河与子牙河）、洵河（今大清河）、治水（又称漯水，今永定河）、潞河（又称沽水，今北运河）、鲍丘水（今蓟运河）等，各行其道，互不沟通。

建安五年（200），曹操大败袁绍于官渡，解除了来自华北对中原的威胁。但是，曹操对于继续北上还是南下一直犹豫不决。最终采纳了荀彧的建议，下定决心北伐。但是北伐有两大困难：其一是袁氏势力仍然顽固，人多势众、兵精粮足，恐难取胜；其二是官渡之战已经暴露出曹操势力向北方供给后勤的困难，继续北伐难以为继。这其中第二条是更重要的。从中原到华北，没有很好的天然水道，水运不济。陆路运输耗费巨大，是无法支持长期战争消耗的。鉴于此，曹操从谋划北伐开始，即同步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

曹操为围攻袁尚（绍幼子）占据的邺城的需要，于建安九年（204）正月，在淇水入黄河的黎阳，用大木枋做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粮



道；二月，兵临邺城门下，围攻半年有余并决漳水以灌邺；八月，攻克邺城。建安十年（205）十月，曹军继续北上，剑指盘踞在清河下游南皮的袁谭（绍长子）。《魏书·武帝纪》载：“讨谭时，川渠水冻，使民锥冰以通船。”由此可知大军军粮转运是依托白沟到清河的水运补给线，成功斩杀了袁谭。公元205—207年，曹操开平虏、泉州二渠，为下一步北伐乌桓、彻底肃清袁军的残余势力做准备。军粮沿水道直达辽西前线。《魏书·武帝纪》载：“三郡乌桓承天下乱，破幽州。……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凿渠自滹沱入泲水，名平虏渠，由洵河口入潞河，名泉州渠。”当年四月，曹操率军北上，八月的白狼山一战，大败乌桓数万大军，并屠乌桓都城柳城（今辽宁朝阳南），斩蹋顿单于遂灭乌桓。袁氏兄弟从乌桓再次北逃投辽东太守公孙康。公孙康慑于曹操的军事压力归降，将二人梟首。自此，袁氏一族灰飞烟灭，北伐战争以此告终。

从以上可以看出，经由曹魏时期开凿的一系列运河，如利曹渠、白马渠等，特别是因为北伐需要，开白沟、平虏、泉州三渠，从而形成了一条由邗沟、汴渠、白沟、平虏渠连接起来的由江淮直通北方、南北贯通的运河系统，不仅为曹操部队的补给运输，也为曹操赢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证，还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和交流，更为曹丕等文人集团的“南皮之游”创造了便捷的交通条件。

三、怀念与友人驰骛北场、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的快乐时光

“一勺清泉古帝开，浮瓜不用望林梅。自惭劳吏非消渴，日取冰壶玉液来。”清康熙十七年（1678）南皮县知事刘址的《寒冰井》诗，把“寒冰井”的来历及对井水甘甜似玉液的描述，让人翘盼向往、垂涎欲滴。难怪曹丕如此怀念那段与友人游历南皮的时光。

志载，古皮城西南百步有一口古井，相传为黄帝时穿凿、伯益所修。井水清澈甘冽，故名“寒冰井”。东汉文学家吴质曾寓居南皮，曹丕率建安文学集团到南皮后与吴质一起赏游，弹箏设棋，吟诗作歌。他们常到



南皮城（今古皮城）北“射雉台”游赏射猎，赋诗、唱和，后人遂称此台为“讌友台”。在他们打猎、游赏、吟诗后，便去寒冰井处憩息，并将甘瓜、朱李掷于井中，而后取出食之，去暑解热，不亦乐乎。多年之后，魏文帝曹丕对这段生活，仍难以忘怀。就在吴质任朝歌县令以后，曹丕还在《与朝歌令吴质书》中说：“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箏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

曹丕与“建安七子”中的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都是过从甚密的好友。然而，建安二十二年（217），瘟疫流行，徐幹、阮瑀、应玚、陈琳、刘桢同时病亡；同年，王粲也逝去了。曹丕内心悲楚，于是，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又给一起同游宴饮的吴质写了第二封信。下面是信中的一段译文。

“前一年流行疾疫，亲朋多遭不幸，徐幹、陈琳，应玚、刘桢相继都去世，我内心的悲痛怎么能用言语表达啊！过去在一起交往相处，外出时车子连着车子、休息时座位相连，何曾片刻分离！每当我们互相传杯饮酒的时候，弦乐管乐一起伴奏，酒喝的痛快，满面红光，仰头吟诵自己刚作出的诗；每当沉醉在欢乐的时候，恍惚间却未觉得这是难得的欢乐。我以为百年长寿是每人应有的一份，长久地相互在一起，怎想到几年间，这些好朋友便撒手西去，说到这里非常痛心。近来编定他们的遗著，合起来成为一个集子，看他们的姓名，已经是在阴间死者的名册。追想过去交往的日子还历历在目，而这些好友却已逝去化为泥土，怎么忍心再说呢？”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又作《与吴质书》：“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龙飞，或将或侯。今惟吾子，栖迟下仕，从我游处，独不及门。”



从以上三次写给吴质的书信中。曹丕都无一例外的提及“南皮之游”，可见他对南皮的眷恋和对友人的怀念。

以曹丕为代表的邺下文人集团在南皮进行的文学活动，写出了大量代表建安时期最高水平的文学作品，不仅昭示着建安文学创作高潮的到来，还深深地影响了南皮文化的发展。“南皮朝宴”“南皮之游”屡屡出现的历代诗作中，“寒冰井”“射雉台”“讌友台”也成为了后世文人笔端诗赋酬酢的一个典实。

晋代南皮人石崇、欧阳建在金谷园与名士左思、刘琨、陆机、陆云、潘岳等人结成诗社，赋诗唱和，史称“金谷二十四友”。他们在“金谷园”的集会，也被列为中国历史上的“八大雅集”之一。著名诗人杜牧、韦应物、张继、庾信等都写有咏“南皮高韵”的诗。唐代文学家陈子昂、大诗人李白更是大声疾呼，赞之为“魏晋风骨”。

四、追寻父辈足迹的英雄气概

建安十六年（211）正月，被封为中郎将兼副丞相的曹丕踌躇满志，欲展示其文韬武略。于是，在征得曹操的同意后，遂与邺下文友来到南皮。其间，追寻父亲的足迹，演绎父亲的故事，深切体会到了父亲的雄才大略。

学父壮举。建安十年（205），曹操率军包围南皮城，并派遣曹纯带领虎豹骑精锐征战。通过“假粮台”之计，除掉了心头之患袁谭。获胜后的曹操心情大好，在齐桓公引弓射猎的“射雉台”打猎放松。《魏书》记载：“（帝）尝于南皮，一日射获六十三头（一说三十六头）。”曹丕性喜田猎，又对其父南皮射雉的壮举心而向往之，来南皮正是“四五月射雉之际，此正乐猎之时”（曹植《猎表》），故曹丕等文友们便在“射雉台”游赏射猎，缅怀父亲的壮举，体验当时的生活。

学父格局。汉献帝初平元年（190），渤海郡（郡治南皮）太守袁绍起兵，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推举袁绍为盟主。袁绍是豪门出身，四世



三公，有一定的号召力。可是面对精锐的西凉兵团，袁绍缺乏必胜的信心和勇气，对于战争前景一片茫然。他问身边的曹操：“如果我们讨伐董卓失败，则有什么地方可以据守？”曹操说：“你有什么打算？”袁绍说：“我南靠黄河，北依燕（河北北部）、代（山西北部），整编戎狄众多精兵，南下争霸中原，也许可以成功吧？”曹操说：“我搜罗天下的英才为我所用，用正确的方法加以领导，在什么地方都行，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两个人的对话高下立判：袁绍强调的是地势和兵力，曹操选择的是人才和管理。

学父计谋。在古皮城四周，环绕有 32 座土台子，名为“草粮台”。就是这些“土疙瘩”，为当年曹操计破南皮城立下了大功劳。

官渡之战后，袁谭兵败南皮，曹操率 10 万大军乘胜追击，兵临城下，企图在这里一举灭掉袁氏。袁绍依仗城池坚固、粮草充裕，固守不战。曹操远道而来，利在速战速决。可几番攻城，都被打退。

这样一直相持了十几天，城没有攻下，曹军的粮草却成了大问题。夜风送寒，更鼓声声，曹操闷闷不乐，便带着几员战将巡视各营。他来到城北的“射雉台”，居高临下，俯瞰城郭，突然心生一计。回营后，立刻下令固守营寨，偃旗息鼓。袁谭见曹兵受挫后不再攻城，非常高兴，嘉勉众将官道：“我今以逸待劳，城固粮足，不消几日，曹军必将不战自退，你等只需努力守城便是。”

这天早晨，袁谭还在梦中，军校急报：“曹营一夜之间粮草堆积如山。”袁谭心中疑惑，便派了几个心腹化装出城，探听虚实。曹操料定袁谭必有此招，早已“如此这般”地吩咐下去做了布置。虽说几个探子报的一样，袁谭还是将信将疑，为了弄清真假，第二天又派亲信出城打听。探子再探后回来惶惶不安地说，他化装成曹军混进大营，亲眼看见曹军从粮垛上背走一袋袋粮食。就连曹军马匹喂的也是精草精料。袁谭听了长叹一声：“天败我也。”这时众将官纷纷禀报，曹军连连向城内射信箭，



惑我军心，军士们无心再战。袁谭见大势已去，决定弃城而逃，后被斩杀。

曹操是怎样计破南皮城的呢？原来，那天晚上他与几员战将巡营到城北“射雉台”上，猛然发现这“射雉台”是当年齐桓公北伐山戎时，为引弓射猎而筑。当时一员大将跺着脚说：“我军要是有一座粮山就好了。”一句话提醒了曹操：是啊！兵不厌诈，我何不来个以假乱真！他深知袁谭多疑，绝不会轻易上当，于是经过精心策划，定下了造假粮台之计。这就是后人传说的假粮台破南皮城的故事。

五、景色秀美的南皮风光

南皮是秦代置县存留至今的古老县份。悠久的历史聚集了厚重的文化，在县境内，胜景、遗迹不胜枚举，这些美不胜收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吸引着许许多多文人墨客纷至沓来，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美丽诗篇。在清康熙朝《南皮县志》中收录了曾为南皮知事马士琼的《南皮八景》诗。无独有偶，民国二十一年（1932）编修《南皮县志》时，在将马士琼《南皮八景》入志的同时，又收录了南皮籍“博学工诗文，著收甚富”的嘉庆癸酉（1813）举人张芝郁的《南皮八景》诗作。其中包括：

钓台风苇。在南皮县城西10里有一村庄，名为“钓鱼台”。相传殷商时期，姜太公吕尚为商纣王的大夫，随朝听用。纣王要建造鹿台，姜太公直言相谏：鹿台工程浩大，劳民伤财，不可兴师动众，贸然施工。纣王因此而动怒，下令要杀太公。姜太公闻讯，愤然离去，隐居此地。其时，这里因是九河下梢，所以河道遍布、碧波荡漾，芦苇丛生、群鸟栖息，太公便常在水边的高台上悠然垂钓。此地便被后人称为“南皮姜太公钓鱼台”，《人民日报》（海外版）将之列为全国十大钓鱼台之首。清末，“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南皮探胜时赋有《过姜太公钓台》的诗，感慨“万载惟存一钓台”。

九河烟草。古黄河曾在南皮境内流淌600余年。据《禹贡》记载，



其时黄河流到河北平原中部后“又北播九河”。《尔雅·释水》曰：九河即是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絜、钩盘、鬲津。清康熙朝《南皮县志》记载更为详尽：“九河故道，渠岸尚存。徒骇在西北，太史在南皮城南，马颊在城南，覆釜在东南，胡苏在西城下，简、絜在城西，钩盘在西北，鬲津在东南。”南皮有九河故道，上述诸河均是在县境流经，汇入渤海。“九河烟草”就是对九河入海处景色的描写。马士琼诗曰：“支派尚留神禹绩，薜荔犹带汉时烟。”“槎沉碧落邀明月，雁背斜阳下暮天。”

五垒斜阳。据清康熙朝《南皮县志》记载：“五垒城在城东五十里，夙呼为垒城村，汉河间献王五子封侯处。今尚有梳妆楼遗址。”相传，汉宣帝（刘询）封河间献王子雍为景城侯，其五子分居城中，俗称“五垒城”。此城建筑恢宏，景色秀丽，为当时之大观，常有人游此。清代举人张芝郁还在赋诗遥想彼时的盛况：“歌舞当年乐五侯。”

台山雨霁。南皮县是一个平原县，史料记载的域内有大台山、小台山，实为一处高岭。清康熙朝《南皮县志》记载，“大台山在城北，隐隐隆隆，起伏断续。为一方胜概。形家云，此太行分脉，自西南来。”明代进士、弘治十五年（1502）南皮知县邓翰作《登大台山》诗记：“太行表西岳，发地来东州”“盘纡转林薄，合杳隐芳洲”“白云满丹嶂，终然结绸缪”。康熙年间的推官邑人李腾鹏曾作《过山村》诗一首，既描述了大台山的风景，也表述了当时的风尚：“我爱山村好，民风太古前。屋随崖上下，路逐涧湾环。灌蔬引泉水，树禾垦石田。催租无暴吏，门掩日高眠。”

寒冰沉李。南皮古城（古皮城）西南有一古井，名曰“寒冰井”。相传为黄帝时所穿凿，伯益所修。此井泉水清澈甘冽，即魏文帝曹丕与诸文友沉李浮瓜之处。

龙井晴云。据《南皮县志》载，在城东南50里处有一五龙岗，岗下



有一古井曰“龙井”。相传，此井为商王武丁（前 1250—1192）的大臣傅说所穿凿，因井中时常出现云雾而得名。“龙井晴云”就是对这一奇观的真实记述。古人在诗中记述：“一从霖雨济殷商，万古晴云护此乡。掘井深功传传说，覆盆遗址尚龙岗。”

当然，古老南皮的胜景及传说远不止这些。清康熙朝十七年（1678）南皮县知事刘址在编修《南皮县志》时，将“寒冰井”“讌友台”“曹公固”“太史河”“刁公楼”“莲花池”“覆盆井”“射雉台”“钓鱼台”“古皮城”十大景观赋《古诗十绝》并收录志书中；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举人、清直隶任丘边向禧曾在南皮赏游，将“大台山”“太史河”“清泉井”“钓鱼台”“古皮城”“射雉台”“遇士亭”“五垒城”“史云居”“曹公固”“讌友台”“石崇宅”“夜珠高”“窰家岭”“莲花池”“大慈阁”十六处名胜古迹作《南皮古迹十六咏》诗，一直流传至今。

由此可见，南皮古城深厚的底蕴和秀丽的景观是曹丕对之情有独钟的一个重要方面。

清代诗人刘天义对曹丕的“南皮之游”推崇备至，赋诗表明了自己的仰慕之情：“前人之游乐，人犹说子桓（曹丕字子桓）。一时夸讌友，此地共追欢。瓜李消天暑，文章耐岁寒。诗林多继起，可续赋骚坛。”

曹丕及其文友的“南皮之游”，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巨大的。2006年版《沧州市志》在概述中称“南皮高韵”与“邺下风流”是千古文坛佳话。“南皮之游”的文学成果是南皮历史文化的一大亮点，也成为了文人墨客们宴饮聚会的代名词。

（戈延华）



附：

“南皮之游”小议

南皮处于漳水下游的渤海之滨，西去邺城约 500 里路程。曹丕在写给吴质的三封信中都提到了南皮之游，可见南皮之游在曹丕心中的分量。他自己亦说：“追思昔游，犹在心目。”

史载：“太子南在孟津小城，与质书曰：‘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博弈（陆博），高谈娱心，哀箏顺耳。驰骛（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沉）朱李于寒水。’”

这是史书有载的曹丕写给吴质的第一封信，据张可礼《三曹年谱》可知，此封书信写于建安二十年（215）。也可从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写于建安二十三年（218）中的信“三年不见”中得出与张先生一致的结论。

建安二十三年（218），曹丕作《与吴质书》：

“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常须臾相失！”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又作《与吴质书》：

“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龙飞，或将或侯。今惟吾子，栖迟下仕，从我游处，独不及门。”

在三次写给吴质的书信中，曹丕都无一例外地提及南皮之游一事，那么南皮之游到底发生于何时，参与者谁，举行了何种活动，下面将具体阐述之。

一、南皮之游举行时间

纵观曹丕的三封《与吴质书》，最早的应写于建安二十年（215），表达对南皮之游的追忆，可见南皮之游发生于建安二十年（215）之前。后两次书信的写作时间稍后，其中涉及南皮之游的仍是对其场景的感怀与追慕。但是南皮是建安十年（205），曹操征袁谭时才攻破。据《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曹操围邺，袁谭走保南皮，十年正月，攻谭，破之，斩谭，诛



其妻子，冀州平。”由此可知，南皮之游可能发生于建安十年（205）至二十年（215）之间。又从建安二十年（215）《与吴质书》：“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可省（见）南皮之游，阮瑀参与了。但是《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卫二刘傅传》：“瑀以十七年（212）卒。”所以南皮之游发生的时间范围可缩小为建安十年（205）至十七年（212）。

再看建安二十三年（218）曹丕写信给吴质，提及“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信中曹丕痛惜徐幹等人的早逝，紧接着又回忆昔日与他们游玩时的亲密情状，愈加悲痛难任。这也说明了当初徐幹等四人参与了南皮之游。

《三国志》卷二一载：“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幹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楨字公幹并见友善。”

观上得知，曹丕是在为五官中郎将时，与徐、陈等的交往才日趋频繁，关系日益友善。而曹丕是建安十六年（211）才担任五官中郎将一职。至此我们可推断南皮之游应在建安十六年（211）至十七年（212）。接着看建安二十年（215）《与吴质书》，《四库全书》中的是“五月二十八日……方今蕤宾纪时（辰），景风扇物，天意（气）和暖，众果具（俱）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明确指出此信写于建安二十年（215）五月二十八日。信中写到“蕤宾纪时”“节同时异，物是人非”。蕤宾为农历五月，蕤宾节即是端午节。这就表明此信写作的节气与当年南皮之游一致，奈何物是人非。这是曹丕今昔对比后的深切体悟，“节同时异，物是人非”。以“方今”为界，前面是南皮之游的情形，后面是如今宴游的情状，突出“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无奈与伤痛。据此我们不能明确写信之日就是南皮之游举行之时，但可以说写信之时



节与南皮之游举行的节气一致。所以说南皮之游的举行时间不是建安十六年（211）五月就是建安十七年（212）五月。再据《三国志》注引《魏略》曰：“五官将为世子，质与刘楨等并在座席。楨坐遣之际，质出为朝歌长，后迁元城令。”坐遣，是指刘楨失敬于甄氏被处以刑罚一事。《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建安十六年，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刘）楨随侍太子。酒酣坐欢，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座上客多伏，而楨独平视。他日公（操）闻，乃收楨，减死，输作部。”“减死”是免除死刑之意，“输作部”是说把刘楨运送到“作部”服刑。作部是古时制作兵器的部门，后刘楨凭借其聪慧又被曹操赦免了。此事发生于建安十六年（211），其后刘楨、吴质都不再随侍曹丕，因此排除了南皮之游发生在建安十七年（212）的可能，因为刘楨、吴质不能参与，而事实上刘楨、吴质参加了。所以可得出结论，南皮之游的发生时间应是建安十六年（211）五月。

二、南皮之游参与者

毋庸置疑，曹丕以其特殊的政治身份与文学才能，组织者舍他其谁。他是主的话，其他参与者就是宾，其在建安二十年（215）《与吴质书》中亦云“輿轮徐动，宾从无声”。

曹丕《又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说明南皮之游的成员起码有徐、陈、应、刘及曹丕与吴质。

建安二十年（215）《与吴质书》：“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可看出阮瑀参与了南皮之游。

建安二十五年（220）《又与吴质书》：“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龙飞，或将或侯，今惟吾子，栖迟下仕，从我游处，独不及门，瓶罄罍耻，能无怀愧。路不云远，今复相闻。初，曹真、曹休与质等俱在渤海游处，及太子即王位，休、真以宗亲，并受封爵，出为列将，而质故为长史，王顾质有望，故称二人以慰之。”



由此可明，当初曹丕未即王位时，与曹真、曹休和吴质在渤海游，也就是南皮游。因此曹真与曹休也应是南皮之游的组成成员。曹丕所说“南皮之游，存者三人”应是指宾客而言，未包含他自己这个东道主。由于阮瑀于建安十七年（212）离世，徐、刘等四人在建安二十二年（217）猝死于疾疫。《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卫二刘傅传》：“幹、琳、瑒、桢二十二年卒。”所以说参加南皮之游的阮瑀等人逝世后，昔日与曹丕一起出游的就只剩下了“或将或侯”的曹真、曹休和“栖迟下仕”的吴质。那么作为曹丕胞弟的曹植是否参与了呢？依据现有资料，笔者以为曹植并未参与。因为曹植建安二十五年（220）仍在，如果说曹植参与了南皮之游的话，那么曹丕在写给吴质的信中，不可能不提到“存者”不只有吴质、曹真、曹休，还应有曹植。但是曹丕并未提及，因此笔者认为曹植未参与此次的南皮之游。

综上所述，参与南皮之游的除主人曹丕外，宾客至少有阮瑀、徐幹、陈琳、应瑒、刘桢、曹真、曹休、吴质等。

三、南皮之游的活动

南皮之游的参与者建安七子就占了五位，所以说文学活动是南皮之游的应有之义。曹丕《与吴质书》：

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博弈（陆博），高谈娱心，哀箏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沉）朱李于寒水。嗽（皎，白）日既没（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輿轮徐动，宾（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

曹丕《又与吴质书》：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由是可观，曹丕他们举行了内容丰富的宴游活动。分别有：

1. 文学类：妙思六经；仰而赋诗。
2. 益智类：弹棋闲设；终以博弈（陆博）。
3. 宴饮类：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沉）朱李于寒水；觞酌流行，酒酣耳热。



历史名人与南皮 ◎ 文化丛书 ◎

4. 音乐类：哀箏顺耳；悲笳微吟；丝竹并奏。
5. 游猎类：驰鹜北场；同乘并载，以游后园。

南皮之游活动如此丰富，不仅白天有，晚上也有。昼夜相继，活动不止，何其快哉！其中游玩之人互相唱和，高谈阔论，无疑是一场“头脑风暴”式的聚会。南皮之游的形式与内容后代文人宴会无出其右，遂成为历代雅士宴游的范式。

（应超）



史学家房玄龄撰《晋书》 赞欧阳建：“赫赫渤海，欧阳坚石”

唐代名臣、曾监修国史的房玄龄奉诏组织重撰的《晋书》，为纪传体晋代史，是中国二十四史之一。其在卷三十三《欧阳建传》中记：“欧阳建，字坚石，世为冀方硕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擅名北州，人为之语曰……‘渤海赫赫，欧阳坚石。’”意思为，欧阳建世代为冀州地方大族，他很有思辨力，才思文采优美丰富，在北方地区赫赫有名。由于南皮时为渤海郡治，所以人们赞誉说：“渤海赫赫，欧阳坚石。”

2009年版《辞海》在“欧阳建”词条下记：欧阳建（？—300），西晋哲学家，字坚石。渤海郡南皮（今河北南皮东北）人。历官尚书郎、冯翊太守。后被赵王司马伦所杀。提出“言尽意”的学说。认为“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益彰”，客观世界是离开人的概念和语言而独立存在的。肯定语言概念是人们用以说明客观世界的工具，说：“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还提出“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语言概念是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变化的。著作有《言尽意论》，载唐欧阳询编的《艺文类聚》卷十九。

欧阳建（269—300），字坚石，石崇之甥。西晋渤海郡（今南皮）人。历任山阴县（今河南焦作东南）县令、尚书郎、冯翊（今陕西大荔）太守。为“金谷二十四友”之一，雅有理思，才藻美贍，且为人正直，不纵私欲，因而扬名一时，人赞“渤海赫赫，欧阳坚石”，是西晋著名的哲学家和颇负盛名的诗人。著有《临终诗》以及《言尽意论》，提出了古代唯物辩证观点，对朴素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



提出的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推动了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发展，中国诸多著名学者都给予极高的评价。长期以来，在《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和各种专著或论文中，都把欧阳建的唯物主义反映论作为论辩的主要论据。

著《言尽意论》阐明唯物史观

欧阳建一生的文章，较著名的是《言尽意论》。此文立论鲜明、语言简洁、逻辑推理十分严密。《世说新语·文学》记载王导过江，“止首‘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可见欧阳建此论受到“清谈家”的重视。

欧阳建流传下来的《言尽意论》全文只有268个字，现全文照录如下：

有雷同君子问于违众先生曰：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乎通才达识，咸以为然。若夫蒋公（蒋济，魏人，著有《万机论》，其论眸子之著作已佚）之论眸子，锺傅（锺会、傅嘏，《三国志·魏书》“傅嘏传”载：“嘏常论才性同异，锺会集而论之。”《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言：“锺会撰《四本论》”）之言才性，莫不引此为谈证。而先生以为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时行焉；圣人不言，而鉴识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已彰。然则，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而古今务于正名，圣贤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辨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苟其不二，则无不尽，吾故以为尽矣。

欧阳建这篇文章，假借雷同君子和违众先生之间的问答，批评言不尽意之说。意思是说当他们在品评或鉴识人物时，都碰到了人的言谈举



止等外在行为与内在本质的矛盾，因而都认为言不尽意。欧阳建一反其说，认为语言是能尽意的。首先，他肯定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是不以人们对他们的名称和语言认知为转移的。春秋四时如此，或方或圆也是如此，都是先有其事其形而后有其名称。名之于物，言之于理，语言能够反映客观对象。其次，他认为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和手段，言谈旨在畅志，名称在于认识和分辨事物，语言和思想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就像形体和影子一样，二者不能分离也不可分离。再次，他从发展的观点去看待语言和思想的进化，指出语言不是僵死不变的，人的认识也是不断进步的，由于事物在发展变化，语言和思想认识也在日益丰富和深刻。这就是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最后，他毫不含糊地认为，既然是有形才有象、形存而影附；有形才有名，形迁而名变。那么，语言和思想二者不可分离，语言是能够表达思想的，言能尽意这个道理也是无疑的。

欧阳建的《言尽意论》虽然很短，但明确地阐明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反映论。在当时玄学贵无论的影响下，很多人都主张言不尽意，这些人就是欧阳建所说的“雷同君子”。在这篇论文中，欧阳建首先明确地肯定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客观性。在中国哲学史中，“名”与“实”的关系是一个传统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欧阳建坚持了唯物主义路线。他在这里对于“名”和“言”作了区别。“名”所指的是一种一种的事物，“言”所讲的是关于一个一个理的判断。“名”的对象是事物，其内容是概念。“言”的对象是事物的规律，其内容是关于规律的判断。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欧阳建再一次说明，在主观和客观这两个对立面中，客观是主要的。

欧阳建在《言尽意论》中的基本观点是：

提出客观是第一性，主观是第二性。为了攻破玄学家们虚玄的“谈证”，欧阳建把他们的言意关系问题还原为心物（名实）关系问题，即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与何晏正相反，他认为，名之于物，无施



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认为物与理不依赖于名和言，名不能给物增加什么，言也不能对理有所作为。事物在命名之前已方圆昭著，颜色在人们称谓之先早已黑白分明，即所谓的“形不待言，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已彰”。先有方圆之形，然后才有方圆之名；先有黑白之色，然后才有黑白之称。客观的形色是第一性的，而主观的名称是第二性的。

阐明语言概念与客观世界的关系。言意之辩，即文字语言与文字语言所要表达的意义（此意义非文字语言的表面意义，而是其内容的根本思想或道理等）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更是玄学家们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欧阳建提出“言尽意”的学说，认为“理”是靠“言”表达的，假如“言”不能表达“理”，人们就无法交流。“物”是靠“名”识别的，名不分辨事物，人们也无法识别事物，即“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辨物，则鉴识不显”。就是说，客观世界是离开人的概念和语言而独立存在的，但语言概念又是人们用以说明客观世界的工具。由此论证了“名”“言”对表达“物”“理”以及交流思想的必要性。驳斥了当时玄学家认为语言概念无法表达事物真相的一种看法（“言不尽意”，如后来不久南朝佛教之“不可说”论）。

认为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欧阳建认为“物”发生变化，“名”也要随之变；“理”有变化，“言”也要随之变化，犹如声响、形影相伴一样，名物无不相副，言理无不相称，不得相离为二。

欧阳建基本观点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欧阳建的这篇《言尽意论》在当时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两条路线斗争中，阐明了反映论、批判了先验论，具有时代意义。在中国哲学史中，欧阳建的《言尽意论》和裴頠的《崇有论》，同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长期以来，在



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和各种专著或论文中，则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欧阳建唯物主义观点引用其论辩的论据，并给予极高的评价。

作《临终诗》袒露真实情怀

欧阳建因“八王之乱”受司马伦所害，临终前作《临终诗》，诗文哀楚。录原文如下：

伯阳适西戎，孔子欲居蛮。
 苟怀四方志，所在可游盘。
 况乃遭屯蹇，颠沛遇灾患。
 古人达机兆，策马游近关。
 咨余冲且暗，抢责守微官。
 潜图密已构，成此祸福端。
 恢恢六合间，四海一何宽。
 天网布絃纲，投足不获安。
 松柏隆冬悴，然后知岁寒。
 不涉太行险，谁知斯路难。
 真伪因事显，人情难豫观。
 穷达有定分，慷慨复何叹。
 上负慈母恩，痛酷摧心肝。
 下顾所怜女，恻恻心中酸。
 二子弃若遗，念皆遘凶残。
 不惜一身死，唯此如循环。
 执纸五情塞，挥笔涕洟澜。

诗的前十二句，诗人叹悔自己身处乱世，不能明哲保身而招致祸难。首先，诗人叹悔自己不该离家游宦。“伯阳适西戎”：“伯阳”，老子的字；“适西戎”，据传说，老子去过流沙（中国西北沙漠地带）之西。“孔



子欲居蛮”：“蛮”指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亦称夷。欧阳建是渤海（今南皮）人，其地近海，远离中原，比较荒僻，他以老子、孔子的故实发端，是为了说明自己的家乡也不“陋”。“苟怀四方志，所在可游盘”：“四方志”，经营四方之志。一个人若有这样的志向，任何地方都能有所作为。言下之意，自己也应该留在乡梓，不该到京师去游宦。通观这四句诗，虽无悔字然悔意豁然，用典贴切深婉，起到以少胜多的效果。

“屯”“蹇”：《易》二卦名，都是艰难困苦之意，后因称挫折不顺利为“屯蹇”。古人，指春秋卫国的大夫蘧伯玉。据《左传》记载，卫献公无道，于鲁襄公十四年（前557）被大夫孙林父所逐，至二十六年（前569）又由大夫宁喜迎回复位。孙林父流亡国外，宁喜后也因专权为卫献公所杀。孙宁二人在谋变时，都曾同蘧伯玉商议，伯玉两次都预见到祸乱将起（即“达机兆”，明达事物变化的先兆），“从近关出”。近关，是距离国都最近的边关。取道近关，可见他急于出国避乱。这两句，是赞赏伯玉的识时务、明哲保身，以对比出自己的无见识。

“抢责”以下四句，自悔自己没有急流勇退，反而因谋诛赵王伦不成而终遭杀身之祸。“抱责守微官”，语本《孟子·公孙丑下》：“有官守者，不得其责则去。”（有固定职务的，如果无法尽其职责，就可以不干。）诗人这里化用其意，说自己处在这种乱世，按孟老夫子的教导，早该弃职隐退了，却执迷不悟，死抱着官职不放，与古人的“达机兆”相比，诗人不由得深深地自叹自责了。“冲且暗”，年幼而不明事理。“潜图”，密谋，指谋诛赵王伦。关于欧阳建遇害事，王隐《晋书》说：“欧阳建为冯翊（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太守，赵王伦之为征西，扰乱关中，建每匡正，不从私欲，由是有隙。及于伦篡立（指司马伦废惠帝自称帝事），（建）劝淮南王允诛伦，未行，事觉，伦收建及母妻无少长皆行斩刑。”是为“咨余”四句诗很好的注释。也可以知道欧阳建的“守微官”，并非贪图爵禄，而是为了对时局有所匡正。作为一个正直之士，到头来却为自己



的正直叹悔，益发令人痛感这个黑暗时代的是非颠倒。

中间十二句，诗人慨叹仕途险恶，人心难测，并抒发豁达的人生观。“恢恢”四句，空间的宽阔广大与“投足不获安”的局促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提示了世道极端、阴森恐怖。“投足不获安”五字，语虽平实，却是全诗最为精彩之处，因为它表现的不仅是欧阳建一人的喟叹，也凝聚着魏晋文人普遍的忧患情绪。通览魏晋诗歌，至迟从何晏、阮籍起，这种情绪就在文人的诗作中广泛传染，直到“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风大畅时，才趋于式微。紧接着诗人通过两个比喻，提示仕途之艰险：第一个比喻，化用孔子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极言时势之严峻恐怖，笔法灵活有深致；第二个比喻，用涉太行道说明、映衬仕途之险，语简理明。“真伪”二句隐含对屠杀者、抑或告密者的愤慨之情。自然，作为在统治集团各派系激烈倾轧中的牺牲品，欧阳建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到罹难根源的，因而他对自己的悲剧命运，尽可能做出豁达的解释，并以豁达的态度处之：“穷达有定分，慷慨复何叹。”在统治集团的内讧中丧身，现在看来并无什么价值可言，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吐此达观之辞，欧阳建还算不失常士风度。

诗的最后十句，写诗人对亲族牵连被刑的至哀至痛。欧阳建尽管对自己的悲剧命运还能处之豁达，但在另一方面，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充满感情的普通人，因而当他念及与自己同赴刑场的老母及儿女时，满腔悲痛喷涌而出，一连用“摧心肝”“心中酸”“如循环”“五情塞”“涕洟澜”五个词组，淋漓尽致地抒吐了他的深沉悲痛。尤其是“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环”两句，古直悲凉，意绪绵远，令人千载之后，犹生凄然之情。

在欧阳建的《临终诗》中，透露了魏晋士人的真实情怀。与世人所看反，魏晋人士诸如“竹林七贤”以降，其实缺的是风骨，而多的却是对气节、对礼、对道德的看重。在图谋失败，临终的时候，欧阳建终



于露出自己的内心，其实自己并不在乎这些玄学，其实自己和阮籍感叹“世无英雄”一样，真正在意的是“人世”而不是“出世”。欧阳建写成这首诗，便死在刽子手的斧钺之下。如何评价魏晋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系及其参与者的是是非非，那是史学家的工作，兹不置论。作为文学作品，这首临终抒情诗真实完整地表现了诗人临刑时复杂的思想感情，从而反映了魏晋时期“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的险恶现实，确是一首好诗。

交恶权贵遭灭门之祸

欧阳建历任尚书郎、冯翊（今陕西大荔）太守。曾与赵王司马伦亲信孙秀有仇，赵王司马伦为征西将军，多次在关中扰乱百姓。欧阳建每加谏止，司马伦因此怀恨，到司马伦专权时，欧阳建每匡正，不从，欲立楚王，于是与司马伦有隙。欧阳建的舅舅石崇有一宠妾名叫绿珠，美艳绝伦，擅长吹笛。中书令孙秀派人向石崇索取，石崇不允。孙秀大怒，劝司马伦诛杀欧阳建和石崇。石崇和欧阳建获悉后，与黄门郎潘岳劝说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攸除去司马伦和孙秀。因谋事不密，被孙秀发觉，于是孙秀就借皇帝的诏命逮捕了石崇、潘岳、欧阳建、张化、裴頠等一批名士，后被司马伦诛杀。欧阳建的老母、妻子、儿女等全家老少都被斩首。欧阳建临刑时所作的《临终诗》，对西晋末年的政治形势作了揭露。《隋书·经籍志》录有《欧阳建》2卷，已佚。今存诗文收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及逯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中。

（孙九如）



慈禧太后的“御膳食品”：南皮小米面窝头

南皮小米面窝头在清末被定为“御膳食品”而进贡朝廷，成为声名远扬的地方传统名吃。2013年，南皮祁家小米面窝头制作工艺被列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小米面窝头的做法与玉米面、高粱面等杂粮做窝头的方法一样，加冷水和匀，略做圆锥状，形如塔，上有尖，底下有个窝儿，以便于蒸熟。熟后呈米黄色，故有雅称“黄金塔”，过去是南皮老百姓的主食。

南皮小米面窝头之所以成为贡品，这里面还有一个轶事趣闻。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在一次召见军机大臣张之万时，问及农村百姓常吃什么饭，张之万回答：家乡农民的膳食多以窝头为主。对于从没有听说过“窝头”二字的慈禧来说，颇感新鲜，当即动了风味雅兴，就想品品窝头的滋味。张之万即派人回老家南皮，专门精工细作，蒸好两锅窝头，驰送京城，进奉给慈禧太后品尝。

慈禧吃腻了宫廷的御饌珍馐，待小米面窝头呈上后，她看着色泽嫩黄，闻着清香扑鼻，吃着香甜可口，心中大悦，遂赐予一些大臣品尝，将南皮窝头定为“御膳食品”。由此，南皮小米面窝头走进了深宫大院，并名声远扬。

南皮小米面窝头的制作方法非常讲究，首先在原料采选上就十分严格，所用的小米、黄豆都由人工精心挑选；然后需用石磨推碾成面，按照一定比例与花椒、大料、茴香籽等为原料的五香粉掺在一起，搅拌均匀后，再用石磨细磨细罗。磨好的面，不能放得过久，在常温条件下，夏天随磨随蒸，不能隔夜；冬天最多只能放置三天，否则蒸出的窝头就



会影响口感。另外，和面、抻制的技术也很讲究。面团要均匀，在捏抻时速度和用力也要均称；蒸笼以竹笼为好，蒸制火候要掌握的得恰到好处，稍有偏颇就难以达到最好的食用效果。新出屉的窝头要光亮黄润、气味清香，入口细腻、沙暄、爽滑。

当然，呈贡的窝头都是经过精细制作而成的，作为以粗茶淡饭为主食的寻常百姓，能够填饱肚子实属不易，这样讲究的吃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一些家境殷实的富裕户才有可能吃上这样的精食。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窝头曾是艰苦生活的象征。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活跃、市场繁荣，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鸡、鸭、鱼、肉已不再受追崇，而以乡土风味为特点的地方小吃则受到大众的喜爱。在这种环境之下，南皮传统小米面窝头又出现在街头，成了人们争相购买、品尝的“抢手货”，并且还走上了大饭店的餐桌。

作为晚清御膳名点的窝头，当时是出自于南皮县城南门外东小庄祁天明掌柜之手。成为贡品以后，很快便声名远播，许多人都以亲自品尝为快，其珍贵程度也令人唏嘘不已。据传，祁掌柜每天只蒸一担窝头，早起担窝头进城，他不像其他商贩那样需要沿街叫卖，而是走固定的路线——从南门里至状元府（清状元张之万宅第，俗称状元府），再经十字街到西街县衙门前，一路只吆喝两声，窝头便被抢购一空。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食品营养价值观的改变，粗粮又成为现代人群首选的绿色原生态食品，曾一度销声匿迹的小米面窝头，又受到了大众的青睞。

2013年，南皮祁家小米面窝头制作工艺被列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祁树江获邀参加了第七届河北省民俗文化节，他家传的小米面窝头成为文化节上颇受欢迎、竞相品尝的“佳肴”。为满足广大消费者对“祁家御膳窝头”的需求，祁树江不仅自己开起了专卖店，还在南皮多个市场、商店里零售，并制作成礼品盒对外销售，周边县市的人经



常慕名前来购买。祁树江还采取了加盟的营销方式，进一步扩大了经营规模，就连天津的塘沽也能吃到正宗的品牌窝头。

南皮小米面窝头的历史传承，使人们产生了许多许多的感慨和联想；小米面窝头，不仅是一个年代的印记，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见证和折射了时代的变革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品尝的是美食，而品味到的则是厚重的历史与珍贵的文化。

（赵树森）



张伯驹撰文赞誉张占福

在清末、民初时期，南皮县河北梆子武生演员张占福（俗名张黑），在京、津一带久负盛名，有“满天飞”之誉。现代著名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张伯驹在《甍甍纪梦诗注》中，以《武丑张黑》为题，予以记载。

全文如下：

武丑张黑

燕子身轻水不沉，念来口白尚乡音。

不平路遇多扶弱，疑是当年出绿林。

武丑^①张黑^②，身段^③矫捷，惟念白^④仍多乡音，似为京东^⑤人。性豪侠。相传腊冬封箱^⑥，彼还家，路遇数盗徒拦截一商人，彼将数盗徒打跑，救护商人上路。人疑其为出身绿林^⑦而隐于伶者^⑧。

——张伯驹^⑨《甍甍纪梦诗注》

简注：

①武丑：传统戏曲角色行当，丑行的一支。扮演擅长武艺、性格机警且语言幽默的男性人物。着重翻跳武技，也讲究口齿清晰有力，俗称开口跳。

②张黑：指张占福。张占福自幼学习河北梆子文武丑兼皮黄老旦，把杂技与气功融入武戏中，自成一种表演绝技。清末曾在北京玉成班与黄月山搭戏。擅演《战宛城》《巴骆和》《九龙杯》等。

③身段：戏曲演员表演的各种舞蹈化形体动作。

④念白：戏剧中的道白。



- ⑤京东：北京东边地区，此处指南皮。
- ⑥封箱：封起行头箱子，指戏院停止演戏。
- ⑦绿林：聚集山林间的反抗官府或抢劫财物的人。
- ⑧伶：旧时指戏曲演员。

⑨张伯驹（1898—1982）：本名家骥，字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文物收藏家、戏剧家、诗人。曾任上海盐业银行常务董事。从余叔岩等学戏10多年，并在什刹海演出《空城计》《二进宫》等，成为著名票友。著有《丛碧词》《甓龕纪梦诗注》《素月楼联语》等。

译文：

武丑张黑，身段矫健敏捷，只是念白的时候仍然带着家乡口音，似乎是北京东边一带的人，性格豪爽仗义。据说，冬天腊月里，戏班停止演戏的时候，他在回家的路上遇见几个强盗正在打劫一个商人，他就把那几个强盗打跑了，救起商人，保护着他起程。人们怀疑他是绿林好汉出身，后来才藏身在梨园行的。

相关链接：

张占福（1854—1919），又号张黑，艺名春长，河北梆子艺人。南皮县半壁店（今店子）村人。

清同治五年（1866），张占福12岁时，由于家境贫寒，与二哥一起去东光县找王科班学艺，工武丑、武生。出科后，他搭班唱戏，经常在东光、南皮、吴桥一带跟班演出，颇有名气。

光绪十六年（1890），军机大臣张之万（南皮人）80大寿，张占福与状元府（张之万的府邸，在南皮县城）的河北梆子戏班一道进京，为张之万唱堂戏祝寿，从此留在北京。他先是在玉成班搭班，后又入瑞胜剧社。在入宫演戏时，颇得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欢心。



有一次，张占福随戏班进宫演戏，在演出《张三跑马》时，主演突然病倒。因剧目已经皇帝过目，不能更改，班主极为惶恐。这时，张占福毛遂自荐，主演此戏。在演出中，张占福以其娴熟的演出技艺和武功根底，胜过原主演，博得喝彩，也为戏班争了光。皇帝看罢甚喜，封张占福为“御戏子”，食宫廷俸禄，御前供奉。从此，张占福声名大震，经常进宫演戏。

张占福轻功奇绝，戏路甚广，在北京、天津有“满天飞”的绰号。其代表剧目有《盗银壶》《疯僧扫秦》《佛门点元》《紫霞宫》《大卖艺》《丑表功》《连环套》等。晚年，在北京天桥一家小戏院自挑头牌，以武丑戏压轴，上座率始终不衰。

张占福因系南皮人，乡音不改，文丑切口，常念南皮土音。清末，受改良主义影响，颇有进步思想，念白大有改进。他和刘喜奎（南皮人，民国时期被评为“坤伶大王”）同演的时装戏《烟鬼叹》，大段唱腔，一字一泪，感人至深。张占福演出中的“吊小辫”“仙人脱衣”“挂画”“云里翻”等技艺和武功，冠绝一时。他在演出《大卖艺》时，将辫子拴在舞台吊环上，在空中旋转飞舞，花样迭出，令观众叹为观止，誉满全场；有时还加入技巧“仙人簸米”的绝技，即端半簸箕米，上插燃着三炷香，两腋下再各夹两个鸡蛋，以“云里翻”的功夫，从三张叠起的桌子上以筋斗翻下。做到米不撒，香不动、不灭，鸡蛋不破，其独具的风格和魅力，赢得满堂彩。

（赵树森）



清逊帝溥仪聘请霍殿阁为武师

出生于南皮县鲍官屯镇小集村的霍殿阁（1886—1942），为八极拳门六世先贤，也是八极拳在南皮的第二代传播者。他在1927—1937年间，曾连续10年担任清逊帝溥仪的武术教师兼护卫。其侄霍庆云为溥仪的“御前侍卫”。

霍殿阁幼年时即酷爱武技，后拜武学大师李书文为师并随之游历江湖。1927年在天津张园比武力挫日本武士后被选为溥仪的武师，其侄霍庆云被选为“御前侍卫”。1932年，叔侄二人随溥仪到“新京”（即长春）。

霍殿阁大半生客居他乡，虽有子嗣在原籍生活，但其除了在武术界享有盛誉外，家乡人对他知之不多。20世纪80年代，描写霍殿阁生平事迹的长篇传记体小说《“皇帝”武师——霍殿阁》出版发行，继而，长春电视台拍摄、制作并播出了36集电视连续剧《康德第一保镖传奇》（后在全国多家电视台热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轰动，这才为南皮人所熟识并对其扶危济困、行侠仗义，不惧倭寇挑衅、勇挫东瀛武士的生平业绩而津津乐道。

1994年，霍殿阁的弟子及家族、传人在小集村为其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

—

霍殿阁（1886—1942），字秀亭，生于南皮县小集村，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二。当时，地方习武风盛，酷爱武技的霍殿阁常和一些小伙伴在僻静之处无师自练。15岁时，村中长者从外地请来一位武师——“抄白虎子”李五爷，殿阁便随李五爷学练飘洒拳。两年后，李五爷又引荐来



八极拳一代名师“神枪李”——李书文，教练八极拳、六合枪。由于霍殿阁品质淳厚，练功刻苦，殊得恩师器重，指点格外精心。而霍殿阁也更加专心致志，奋发锐进。

霍殿阁家门前有一棵对抱粗的枣树，他每次经过不是三拳两脚，就是一个“抱肘”。天长日久，树皮都打光了，树也震死了，干脆就成了他练功的“专用桩”。冬季，农事不忙，更是他习武的黄金季节，天不亮就到村北的松林里练拳，走行步、穿树、靠树、打树；夜间在场子练后回家再接着练。尤其是在练枪上更是入了迷，昼扎铜钱眼，夜扎香火头。特别是练“催枪问准”这一招，开始对树练、对墙练，进而对着镜子练，竟把妻子陪嫁的大小镜子都扎得枪痕遍布。由于他入魔般苦练，终于达到了出枪迅准、触而不伤的境界。

霍殿阁苦练12年后，李书文见其根功已经十分牢固，便带他外出游历、闯荡。遇有过招的对手，开始是老师自己应付，对手走后，就结合实际情况，再指导霍殿阁如何接招、拆招、出招的要领。后来，逐渐让他与来访者直接过手，以积累实战经验。

李书文与奉系将军许兰州有旧交，许兰州在沈阳时，李就把霍殿阁推荐到那里，担任了军中的武术教官。其间，结识了教务主任刘卧白。儒雅风流的刘卧白非常爱好武术，更佩服霍殿阁功力深纯、人品尤厚；两相爱慕，遂结金兰之好。刘卧白曾亲书条幅赠霍殿阁：“大鹏飞、英雄起，天下乱、几时止，好男儿、莫休息。”

霍殿阁在军中任教时，便主张“天下把式是一家，人不亲艺亲”，并广交武林朋友。他与别人过招时，从不用狠手，又不伤对方情面，使得对方口服心服；而且，交心换艺也不保守，所以他友众仇寡，一时名扬关东。

在多年的习练和竞技的实践中，霍殿阁在继承传统八极拳术的基础上，又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创新并组编了实用价值较高的“应手拳”，并广授弟子，使此拳法在东北三省及其他一些地区广为流传。同时，又



将八极拳中的“六大开”增补为“八大开”，进而形成了霍传八极拳的完整体系，体现了霍传八极拳在套路、招式、练法、技艺和风格上特有的风貌，其弟子、门人都称之为“霍传八极拳”，奉霍殿阁为创始人。

二

1924年奉军入关后，许兰州公馆设在天津，一生爱武的李景林（与霍殿阁兄弟相称）任直隶督办，也在天津，霍殿阁遂携侄霍庆云盘桓于许、李等处，传功授艺。霍殿阁在天津又广交武林高手，再加之他纯于功、重于义的作为，很快又名噪津门。

1927年，由许兰州、商衍瀛（清末翰林）二人介绍，霍殿阁与霍庆云到张园应试清逊帝溥仪的武师。

原来，已经退位并被逐出宫门的溥仪（即宣统皇帝，1909—1911年在位）此时正潜居在天津日本租界住处张园，他对两个保护自己的日本武士心存芥蒂，又想学点武术健身、防身，还妄图效仿祖上做“功夫皇帝”，便提出要请中国武师。日本人当然不愿意，于是就提出：请中国武师可以，但须能胜过日本武士者，否则不必。

当时，天津武术界也有高手前去应召、比试，但均铩羽而归。这次，霍殿阁是在溥仪所设的宴前应试。落座后，他左手端着酒杯，向右稍侧身，然后伸出右手的中、食二指，对众人说：“日本武士如能把我的二指扳弯，我就算输了。”日本武士宫滕三郎听了，抢身上前便往下扳，但是没有扳动；尔后又迅即改为往上扳，想趁机把霍殿阁的手指扳折。没承想使出了吃奶的劲还是没有扳动。此时，霍殿阁腰间发力，右手指向前一穿，扣住了对方的“合谷”穴，使其半身不适，再难施展，与此同时，左手放下酒杯，矮身进步，将对方举起并使其动弹不得。

霍殿阁仅以二指神功就轻松地战胜了日本武士宫滕三郎。但由于这些动作连续起来非常快，众人并未看清详情。另一个叫岩田一雄的日本



武士感到不可思议，自恃技艺精纯、力大无穷，也想来扳手。心狠手辣的他当扳手不成欲使诡计伤人时，早有防备的霍殿阁也是仅用一招就将其制服并高高举起。

溥仪见后当即赏退了两个日本武士，随后聘任霍殿阁为自己的武术教师兼护卫，再任霍殿阁的侄子霍庆云为“御前侍卫”。

其实，学武健身、防身只是溥仪的部分目的，主要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所以，霍殿阁除了教他练武外，还组织了部分徒弟，在霍庆云的带领下，常住张园，白天练武，晚上轮流值守护卫溥仪。

三

1932年，在侵华日军的筹划下，溥仪任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称满洲帝国“皇帝”），霍殿阁基于狭隘的愚忠思想，也随之到东北的“新京”（即长春），并被擢升为宫内府少将武官。他除了在宫内以徒弟为骨干组织“护军”，既护卫溥仪安全又按时练功外，还同时在宫外开场授徒，传授八极拳技艺。

一次，府内“护军”在夜间搞“护驾”演习，遭到日本人的蛮横干涉，溥仪却对人家非常客气。由此，霍殿阁开始认为“皇上”这件事办得窝囊。以后又遇上一些类似的事，更使他逐渐感到，这个“皇上”不似自己原来想象中的那个“皇上”了，处处还得看日本人的眼色。后来，他的这种郁闷情绪，逐渐转变为对日本人的仇视。

一天，在伪满陆军当连长的徒弟边廷杰回来后，悄声地说：“老师，这次我在山里，遇上个姓李的，是抗日联军的联络参谋。他知道您痛恨日本人，现在指望‘皇上’是不行了，如愿进山跟他们一起打鬼子，他们欢迎。”霍殿阁沉思良久，长叹一声说：“我哪里也不去了，抗联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就别管人家；他们要真打鬼子，暗中帮忙也可以。”边廷杰领会了老师的意思，此后曾多次暗地里给抗联送子弹。



1937年的6月28日，“护军”中的霍家弟子到大同公园游玩，与同去游玩的日本关东军发生争执。因平时深受老师的熏陶，“护军”不甘受辱，愤而反抗，双方各自集合自己的队伍，继而发生了打斗。由于是假日游园，双方都未带武器，但日本人持有练武用的竹剑，明显占据了优势。“护军”中的人一看，便把卖船票的木屋拆了，手拿木板参与助战。混战中，“护军”打伤了一名日本关东军大佐和十几个宪兵。关东军见有人受伤，为挽颓势，便放出训练有素的军犬，企图撕咬“护军”，扭转败局。可是他们没有料到，那狼狗刚一蹿出，就被“护军”刘宝森一脚踢死。

这一仗，使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大日本帝国关东军”颜面尽失，社会为之哗然。《新京日报》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上海等各大城市的报纸也相继转载，皆为鸣快。但是，这一仗虽然打出了“护军”的民族自豪感，却也为霍家子弟埋下了祸端。

日本人原本就对以霍氏门徒为主的“护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但苦于抓不住把柄，这次就利用游园事件借题发挥，以反满抗日的罪名，逼迫溥仪遣散了“护军”中的霍氏门人，霍庆云被迫到奉天（今沈阳）避难，霍殿阁本人也接着被排挤出宫内府。

对此，霍殿阁虽屡次去找溥仪直谏，但溥仪只是摇头叹息，根本无计可施。

对溥仪已经彻底绝望的霍殿阁回到家后，常饮闷酒，不住地大骂“小日本”。越骂越气，越气越骂。

后终因郁结成疾，于1942年秋衔恨去世，时年57岁。

四

霍殿阁一生广收门徒，倾心授艺。仅正式收为弟子的就有200余人，徒弟徒孙多达上万人，生徒遍及天津、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地。1994年6月2日，为纪念霍氏八极拳创始人霍殿阁先生，霍家弟子及族人、



门徒 194 人捐款为他修建了纪念碑，并在其家乡小集村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是日，中共南皮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国部分地区武术组织，霍氏家族、弟子及村民 1000 余人参加了仪式；日本、加拿大及长春、公主岭、沈阳、徐州、天津等地的八极拳社和八极拳后学敬献了花圈和挽幛。《沧州日报》、沧州电视台对此做了详细的报道。此举以缅怀霍氏先师为初衷，旨在激励后人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武术优良传承，弘扬八极拳技艺，振奋民族精神。

站在逝者墓前，作为当年揭牌仪式的参与者和霍殿阁生平事迹的撰写者，笔者也不由产生了很多的感慨：这位命途多舛的一代武学宗师，曾经叱咤武林，英名远播；但也有着很多的坎坷、纠结与悲愤。

此时此刻，电视连续剧《康德第一保镖传奇》中的主题曲《只见君去不见君还》那凄怆、悲壮而又激昂的曲调仿佛又回响在了耳畔：

风凛凛刀寒寒，
虎狼声声吼，浓雾重重暗。
风凛凛刀寒寒，
虎狼声声吼，浓雾重重暗。
虎狼声声吼，浓雾重重暗，
是男儿剑柄按，是女儿真情伴。
明知险山恶水，早知身陷危难，
浓雾不散心不甘不甘不甘！
谁想衣淋斑斑血，
只见君去不见君还，
只见君去不见君还……

然而，值得欣慰的是，霍殿阁虽已逝去，但具有霍氏风格特点的八极拳已经广泛流传于世，且社团林立，俊杰辈出。他一生刚毅豪放、行侠仗义的许许多多的传奇故事，也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赵树森）



孙中山任命刘之洁为大总统府高等顾问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时任江苏水陆军总司令兼陆军第五师师长、前敌总指挥的刘之洁，在进攻固守南京的清廷江南提督张勋的战斗中，亲自率部攻下聚宝门外的制高点雨花台，最终攻克南京。12月29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在南京举行，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刘之洁被任命为大总统府高等顾问。

刘之洁（1872—1938），字聿新，世居南皮县集北头村。刘氏家族为当地的名门望族、书香世家。

在沧州一带，素有“南皮张、北头刘”的说法，“南皮张”即张之万、张之洞家族；“北头刘”就是指集北头村的刘氏家族。据刘氏宗谱记载，北头刘氏自明万历年间到近代，中进士者14人，中举人数十人；国民革命军少将、中将8人。其中，刘果实，年13岁中秀才，康熙己未（1679）科进士；刘凤翔，江西道监察御史；刘仲海，甘肃凉州府知府；刘子镜，汉中府知府。在近当代，当以刘之洁为最。

刘之洁自幼随祖父读书，少有大志，后因屡试不第，遂决定效法班定远投笔从戎。光绪二十一年（1895），已娶妻生子的刘之洁在家人的支持下考入位于天津小站的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因其品学兼优、文武具备，被选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学成归国后，历任北洋陆军第三镇教官、管带，吉林陆军统带，东三省督练公所参议。1910年，随原任奉天巡抚程德全调任江苏，先后任江苏督练公所参议官，陆军部一等咨议官，江苏陆军第二十三混成协协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刘之洁劝说时任江苏巡抚程德全响应，并宣布成立江苏军政府，程德全任都督，



刘之洁任江苏水陆军总司令兼陆军第五师师长、前敌总指挥。在进攻固守南京的清廷江南提督张勋的战斗中，刘之洁亲自率部攻下聚宝门外的制高点雨花台，最终攻克南京。12月29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在南京举行，刘之洁代替程德全与会并作为代理江苏都督参加投票。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刘之洁被任命为大总统府高等顾问。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历任江北扩军使、江苏清乡督办、苏州镇守使、江苏督军公署咨议厅厅长。曾获授二等文虎章、二等嘉禾章，鼎威将军，陆军中将。后因不满袁世凯篡国造成的军阀混战、相互割据，愤而辞职引退。他晚年生活拮据，境况窘迫，1938年病逝于湖南常德，由好友冯玉祥出资理其殡葬后事。

刘之洁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行动中做出了贡献，他虽不属于革命党人，但思想倾向革命，武昌起义时，他极为赞同推崇孙中山，主张共和，他的事迹长期以来为家乡人所称道和自豪。由于他曾代理江苏都督，所以，乡里人就尊称他的宅第为“都督府”。

刘之洁当时府第的原貌是什么样子，史料没有完整的记载，但据20世纪70年代一位曾在集北头中学学习并到过都督府旧址的同学撰文介绍，便可窥见一斑。文章说：“当我和两个同学走进青砖瓦房的门楼时，那真是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这样一个四周高高的屋脊、院子深深的古老房子，站在院中，显得人很矮小。东厢房、西厢房虽有残缺，但也不失它的旧貌（原文如此——笔者注）。正厅三间，坐北朝南，是合作社（在新中国成立后，此宅被作为供销合作社——笔者注）的正房。据说正房是都督府的客厅。客厅的门窗雕花刻虫，正厅檐下几根红漆明柱也显示着它的威严、浑厚。迈上青石的台阶，进入房中，更感觉着它的古朴和辉煌。”——这就是“北中”学子40年前亲眼所见的“都督府”。

刘之洁退隐后，原籍府邸曾托人代管。1933—1937年，刘之洁回乡



主持编修《刘氏家谱》，住“都督府”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都督府收归国有，先是改作学校，后又将产权划归供销社，作为北头门市部的经营地点，每年由供销社出资维修。“都督府”是一座典型的清式建筑，至2006年，仅剩三间客厅。客厅坐北朝南，高高的屋脊，青砖青瓦，屋顶“U”形小瓦环扣，屋檐下两根明柱，是南皮保存下来的唯一名人故居。是年，“都督府”被河北省政协定为河北省名人故居。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都督府”因疏于管护，遂日渐衰败，最终导致在2008年初以1.1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房后的邻居。此事经媒体披露后，立即引起了县、市领导及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沧州市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都督府”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和名人故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加以保护，绝对不能随意破坏。刘之洁的长孙刘毓煊曾为《益世报》《大公报》总编，《北京科技报》创始人，他坦言：希望政府部门能收回并加以保护。

为切实保护好南皮现存的这个唯一名人故居，南皮县人民政府专门召开县长办公会议进行研究，决定将“都督府”收回，并予妥善维修与管护。此后，有关部门领导会同镇、村干部，共同找到买主做工作，几经磋商，最终将这一名人故居又买了回来，并将此作为文物保护单位，正式移交给南皮县教育文化体育局。南皮县国土资源局已将核发的宅基地证从买主手中收回并注销。

而今，当年的“都督府”只残存了3间客厅，已不见了昔日的辉煌。但是，它毕竟是时代发展变迁的见证，是不加粉饰的历史记忆，无论对集北头村或是南皮县，都是不可多得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南皮县志办公室的编修人员予以拍照并连同文字记述，一起收录到新编《南皮县志》的“古迹遗址”一节中，以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史料。

（赵树森）



附：

南皮集北头的“都督府”与鼎威将军刘之洁

南皮县王寺镇集北头村，位于县城东 20 多公里，镇政府北 2.25 公里处，这个村偏西北的地方，有一处青砖古瓦的老宅，当地村民叫它“都督府”。僻巷的小村哪来的都督府？断壁残垣荒草迷离的后面隐含着什么秘密？盛夏的一天，笔者专程去集北头村探访，解读“都督府”背后的故事。

投笔从戎

走进集北头“都督府”的那天，是在夏日的一个上午，阳光以无法丈量的高度，落在其尚存坐北朝南三间正房上，其建筑是硬山式四梁八柱砖木结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起脊挂瓦出厦的屋顶有一半已露着天井，一半还挂在房脊上，门前有两根楹柱还坚挺在那里，不过柱上的红漆早已脱落。通廊墙壁上“文化大革命”时期写的标语依稀可辨。屋前的小院里有几棵长疯了枣树，将整个院落遮掩，树下荒草没膝、垃圾满地。在杂草丛中，有一块县文物管理所于 2014 年 12 月立的石碑，石碑正面刻着“集北头都督府”，背面是“都督府”简介。“都督府”的东厢房还残留着断壁，西厢房已荡然无存。它像一位饱经风霜的暮年老人，旧衣长袍黧面苍发，拄杖站立在阳光之下，身影面目无不显示着阅历的沧桑。

在一位村干部的引领下，我们就这样踩着历史的烟云走了进去，一扇内容丰富的故事大门朝我开启了。此时，感觉自己正在走进一段历史，走进刀光剑影的沙场，走进一段传奇的历史。

随同我们参访的村干部介绍说：过去“都督府”是一个很大的宅院，占地几十亩，四周有高高的围墙，院子深深。东厢房、西厢房配套建筑里通外联，回廊叠置。台阶是青石铺就，据说正房是“都督府”的客厅。客厅的门窗雕花刻虫，正厅檐下数根红漆明柱更显示着“都督府”的威严、浑厚。随着岁月的流逝，加之管理不善，“都督府”的建筑拆得拆，改得改，仅存的



正房也已成为断壁颓垣，但它是历史发展的活见证。它是真真切切的、不加粉饰的历史记忆。

“都督府”的主人刘之洁，出生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集北头村的刘氏家族乃津南望族，明永乐年间，其祖自山东即墨移民北直隶，先迁武清县，继居沧州。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渐成殷实大户，继而由耕入读，诗书传家。到明万历年间，八世刘生中、刘生和兄弟二人相继荣登甲榜，从此家族显赫。到清光绪年间，刘氏家族共出了14名进士，秀才举人不计其数。民国建立，刘氏跟上时代潮流，倾心新学，截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第三次续修《刘氏家谱》，刘家又出了4名留学生，22名国立大学生，25名陆军专门学校毕业生，8名国民革命将军。

刘之洁的祖父刘璧奎（号蕴山）出身贡生，成为名传乡里的塾师。父亲刘锡智没有功名。叔父刘锡光光绪庚寅（1890）恩科进士，官至内阁中书。祖父希望刘之洁能继承家风，登科入仕，光宗耀祖。然而，到刘之洁成年时，时局已经大变，清王朝已陷入内忧外患之中。为挽救国家危亡，各种思潮纷纷涌现，维新派、洋务派、革命派不一而足。刘之洁深知循规蹈矩地埋头读书已于世无补，于是课余时间常常匹马短衣，练枪舞剑，准备有一天学习汉朝班超，投笔从戎，为国效力。在他的文章里也常带有几分豪气。祖父指出，此为科场之大忌。要他向叔父学习，变通格调，以便参加科考，铺通仕途。之洁当面不好违拗，私下里却说：“安邦定国，并非尽以文显，文各有体，人各有志，岂能改易？”

当时清王朝刚刚遭到甲午惨败，一些朝臣深感旧式军队之衰腐，主张创建新军。先是胡燏棻在青县马厂建“定武军”（后移天津小站），继而张之洞在南京建立“自强军”。光绪二十一年（1895），袁世凯到天津小站接管“定武军”，主持编练新军，招募有文化的学员兵。刘之洁心向往之，但当时他已娶妻生子，又有所顾虑，犹豫再三。妻子尹淑珍对他说：“大丈夫不能以文学显，投笔从戎安知不可致公侯？”坚决支持丈夫投军。



1896年，袁世凯将编练的新军扩编为新式陆军，选拔有文化的新兵，设立速成武备军官学校，培养新式军官。刘之洁文武兼备，顺利进入武备军官学校。1903年，又被选拔出国留学，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外派留学生是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志青年也把出洋学习作为报国途径之一。刘之洁顺应时潮，取字“聿新”，表明弃旧图新的志向。

响应革命

刘之洁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先到东北任第三镇教官，之后提升为营管带，协助吴禄贞筹办边务。新军仿照德国陆军建制，按镇、协、标、营、队、排设置。光绪二十九年（1904）朝廷设练兵处，第二年提出统一军制，计划在全国编新军36镇，以新军逐渐取代旧军。吴禄贞是一位民主革命者，和刘之洁一同留学日本，他先后参加过兴中会、华兴会，回国后在练兵处任监督。他到东北帮办边务，与刘之洁关系契合。刘之洁带兵驻琿春，在对俄防务上征抚兼施，使得那一方边陲安宁。数年后，刘之洁调任东三省总督府督练公所参议官。他对军队训练、国家防务多有建言，后袁世凯的亲信陈宦来任总参议，陈宦来嫉妒刘之洁的才能，听不进刘之洁的意见，并处处排挤刘之洁，刘之洁一气之下离开总督府另寻去路。

刘之洁离开东北南下投奔江苏巡抚程德全。程德全是四川云阳人，在东北为官多年。任奉天巡抚时，对参议官刘之洁的才能早有了解。1909年，程德全调任江苏巡抚，刘之洁到了苏州（当时江苏省会在苏州），见之洁来投，十分高兴，即请刘之洁任江苏督练公所参议官，继而任45、46两标的统带。“标”是新军的编制单位，镇之下为协。协之下为标。三营为一标，相当于后来的团。刘之洁又有了用武之地。由于他军法严明，训练有方，又关爱下属，深受官兵的崇敬和爱戴。他所统帅的两标军队成了江苏的劲旅。

1911年随着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顷刻土崩瓦解。武昌起义之后，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等省纷纷响应，相继宣布脱离清廷而独立。面对复杂的时局，程德全徘徊观望，一方面他对朝廷不满，



有心脱离；一方面又觉得势单力薄，对南京等地的清兵有所顾忌。他跟清廷虚与委蛇。武昌起义15天后还上奏说：“自武昌失陷，苏省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既虑革党之构煽，又防伏莽之窃发。”刘之洁则旗帜鲜明的为武昌起义叫好。

11月4日上午，刘之洁从苏州巡抚衙门出来，到操场上集合第45、46两标全体官兵发表讲话。当时刘之洁年方40，精力旺盛，气宇轩昂。他登上操场西边的土岗，高声说道：“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响应者络绎不绝，天命人心，已可概见，清王朝推翻，可立而待。如今苏州起义条件已经成熟，今夜程德全巡抚即召集各方开会商讨办法，不日即可正式起义！”官兵们听后欢呼雀跃，纷纷剪下长辫以表决心。

当夜程德全召集属僚和士绅开会，会上出现不同意见。省布政使左孝同流着眼泪说，大家都是朝廷命官，不应辜负朝廷的盛意而脱离朝廷。刘之洁的部下、时任督练公所科长的章驾时，拔出手枪拍在桌子上，怒视左孝同等反对独立的人说，今天之事，应从人民方面考虑，不应为私人恩惠而贻误大事。会议气氛剑拔弩张，主张独立的占据主流。最后形成决议，明日正式宣布独立，并公推程德全为江苏都督。

1911年11月5日，江苏省巡抚衙门口挂上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的大木牌，门前悬起“兴汉安民”的白底红字大旗。原23混成协协统艾忠琦因不同意起义而连夜潜逃。程德全遂任刘之洁为协统。随后，全城贴出安民告示，宣布“共和政体成立，大家共享太平”。同时贴出一张临时军律：“临阵退缩者斩，强奸妇女者斩，造谣惑众者斩，抢劫钱财者斩，伤及外人者斩，泄露军情者斩，纵火殃民者斩，杀伤妇孩者斩。”

江苏宣布独立后，两江总督所在地南京已处于包围之中。城内主张独立的呼声四起。两江总督张人骏在清朝遗臣张勋的支持下，反对脱离清王朝，主张固守南京。张勋时任江南提督，率江防营20个营驻在南京城内，占全城兵力的一半。张勋等人在城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发现谁家藏有白布，就



说那是为投降革命军做白旗用的。学生有剪辫子的，就指为革命党人，格杀勿论。

1911年11月8日，徐绍桢率领新军攻打南京，被张勋击退。于是他联络镇江、上海、苏州等地民军组成“江浙联军”，围攻南京。联军在镇江会合后，任命刘之洁为江苏水陆军总司令，浙军司令是朱瑞，沪军司令是洪承点，镇军司令是林述天。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联军水陆并进，声势浩大。面对联军强大的攻势，坐镇北京的袁世凯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忙给张勋发电报撑腰打气，“东南半壁，悉赖我公”。

刘之洁率部从苏州向南京开进，沿途受到民众热烈欢迎。11月26日，部队接近城南，由淳化镇进攻上方镇，下午占领高桥、龙桥，第二天凌晨攻占七桥瓮和上方镇。11月29日，联军分四个纵队陆续到达南京城下，刘之洁的苏军为第四纵队，总攻开始后，刘之洁负责攻打雨花台和通济、洪武二门。

雨花台正是张勋的防地，双方展开激战。刘之洁身先士卒，冒着弹雨阵前指挥，激战中突然一颗流弹打在刘之洁的肋下，刘之洁不顾伤痛，指挥若定。经两天两夜的激烈争夺，刘部拿下雨花台。江苏军在雨花台上架炮向城内轰击，一时四面火起，秩序大乱。张人骏逃到长江日舰上避难，之后逃到上海做寓公去了。张勋派人向刘之洁求和提出四个条件：1. 不伤人民生命财产；2. 不杀城内驻防旗人；3. 准许张人骏等官员离宁；4. 准许张勋将其江防营带走。刘之洁当即对张勋送信的的代表说：“前两条是表面文章，本军历来爱护人民生命财产，不像张勋那样无法无天，为害人民。第三条可以商量，第四条万难办到。”刘之洁请示总司令徐绍桢并与各方商量后回复四条：1. 张勋暂行拘留；2. 张勋所部兵士徒手出城；3. 将张勋搜刮的库款交出，以充军饷；4. 张勋所部枪械装备，一律放在小营操场，有联军点收。时间定在明天中午，到时不应，重炮轰城。此时城内守军已无斗志，张勋眼见大势已去，随带几个亲信连夜潜出南门逃往徐州去了。



孙中山评价攻克南京之役称：“革命大局，因以一振。”

拥戴孙中山

南京被民军攻克后，缴获很多，有人主张要以库银分赏将士。刘之洁立即召集全军会议，他严肃地指出：“我军今日之战，乃响应孙中山先生之革命而战，王朝既倾，应遵从孙先生意旨，建立民主政权。库银为民之血汗所积，随意分散，得此银者，何异吸取民之脂膏？功尚未成，岂非为民而为己也！”分银之事遂息。民军出榜安民，士民乐业，秩序井然。

东南各地民情，共和呼声最高。此时宣布独立的各省急需成立一个中央政府，推举一位有威望的领袖人物主持政局。联军司令部拟出电文，准备通过上海向国外发电，邀请孙中山先生到南京组建新政府。

孙中山最早提出了通过革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并为此坚持不懈地斗争了10多年，让孙中山先生组建新政府是众望所归。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即启程从海外回国，12月25日到达上海。得知孙先生已经回国，独立的各省代表集聚南京。在他到达上海后的第四天，即12月29日，聚集南京的17省代表在江宁咨议局投票选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参会代表共45人，每省投一票。刘之洁代表江苏省参加会议。孙中山以16票当选（浙江省代表没投他的票）。12月31日，孙中山先生乘火车到达南京下关火车站，受到各界人士热烈欢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1月16日，孙中山下令颁行陆军部制定的《陆军暂行编制》，规定各级建制单位的名称为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原新军中的镇、协、标、队、棚等称谓废止。1月26日任命第一至第六师师长。刘之洁任陆军第五师师长，兼江苏参议厅厅长，护理江苏都督。

忧患时局痛失军权

南京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引起袁世凯的惊慌。他凭着强大的军事实力，玩弄政治手腕，一方面软硬兼施分化瓦解南方革命阵营，一方面借助南



方革命力量威逼清廷就范。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布退位。当时，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力量等方面均无法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抗衡，加之一些人缺乏革命的彻底性，认为清廷退位就是革命成功了，对袁世凯采取妥协政策，南北议和的结果最终是袁世凯任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孙中山解职。这看似实现了南北统一，但只是停留在表面上。袁世凯借此逐步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

袁世凯和孙中山这两股政治力量终于无法调和。革命党人于1912年8月在同盟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委托宋教仁代理党务。国民党采取合法议会斗争。1912年底，各省开始进行国会议员选举。国民党获得了国会议席中的大多数，引起袁世凯的恐慌。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的亲信暗杀。随后袁世凯又把南方三个省的国民党都督撤免。并且调动北洋军队南下攻击。

孙中山、黄兴彻底丢掉了对袁世凯的幻想，被迫实行“二次革命”，号召南方各省起兵讨袁。江苏都督程德全面对南北交恶的局面，无所适从。他主张南北调和，曾亲赴上海处理宋教仁被刺案。当被革命党人推举为讨袁军南军总司令时，又弃职不就，逃遁上海。之后退出政界，闭门诵经。

7月15日，黄兴以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名义在南京起兵。袁世凯派冯国璋、张勋攻打南京。张勋两年前从南京败走，被清王朝授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袁世凯上台后，将张勋所部改称武卫前军，驻山东兖州。他的军队仍然穿着蓝袍，梳着长辫，打着张字旗号。9月2日，张勋辫子军率先攻入南京。入城即大肆烧杀淫掠，不少妇女不堪其辱，投秦淮河自杀。

孙中山、黄兴被迫出走海外，张勋任江苏总督。1913年12月，改由冯国璋任江苏总督，坐镇南京。

面对南北失和、互相厮杀的局面，刘之洁痛心疾首，他不属革命党人，但是思想倾向革命，推崇孙中山，主张共和。他早年投军袁世凯麾下，但又



不是北洋军嫡系，在南北战争中他左右为难。面对孙中山败走，张勋的辫子军卷土重来的种种变故，使他心中不快。他的表现也让袁世凯很不满意。

1913年底，袁世凯派亲信马玉仁到清江浦接替刘之洁。马玉仁，江苏盐城人，原为盐匪，后受清廷招安编入缉私武装。1911年民军联合围攻南京时，他曾作为一名营管带随镇江军攻打南京，战后擢升为标统。二次革命发生，马玉仁倒向北军。他致电袁世凯，愿为攻打南京效力。袁遂下令把马提升为混成旅旅长。在与讨袁军作战中，马玉仁非常卖力，战后被授予扬州游击统领、江苏第一混成旅旅长兼淮扬镇守使（江北护军使改），到清江浦接替刘之洁。刘之洁开初坚决不交印。马玉仁军纪最差，清江人久闻他的臭名，也不愿他的部队进驻。以清江浦商会会长闻溥为首的各界人士，联名呈请省府挡驾。马拜会闻溥，以利相诱惑。北京政府传来命令，委任刘之洁为苏州镇守使、江苏督军公署咨议厅厅长。刘之洁不得不交出江北护军使大印。

刘之洁离开清江浦赶向苏州的途中，接到要他到北京任职的命令。刘之洁心中清楚，这是变相褫夺了他的兵权。随行的一营卫队愤愤不平，鼓动刘之洁仍回驻地统率部队。刘之洁无意抗争，无奈地说：“吾初效班定远，略展己志，今当改学张子房矣！”

他安抚卫队，将他们带到苏州交给当局，自己带上家眷去北京复命。陆军十九师长的职位也被蒋雁行所占。此后，十九师屡换将领，卷进军阀混战的漩涡之中。1925年初奉军南下时，十九师被缴械遣散，不久取消番号。

到了北京，刘之洁任大总统府顾问。1914年6月成立将军府，刘之洁任将军府将军，1921年2月5日授“焕威将军”，1924年4月23日授“鼎威将军”。

当时的将军府，内设将军若干，无定额。将军府向每省派出将军一人。一般派往各省督理军务的将军称“×武将军”，将军府内的将军称“×威将军”。“威”字号将军是没有实权的虚衔。



倡修《沧县志》

刘之洁到北京后的几年，中国政坛接连发生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事件。接着是军阀混战，狼烟不息。刘之洁干脆辞职做了寓公，先到南京住了一段时间，1929年回到沧县，住县城李家花园（在今沧州市顺城街）。

他从此不问政事，专心读书，但十分热衷公益事业。《沧县志》就是由刘之洁倡修并出资相助的。刘之洁是民国时期的“鼎威将军”，是杰出的一代名将，他出生于集北头村，当时集北头村属于沧州。民国二年（1913），沧州改为沧县，史料记载刘之洁为沧州人或沧县人（现在集北头村已划归南皮县）。当时，刘之洁看到国家千疮百孔，各地军阀为争夺地盘互相厮杀，历史文化惨遭破坏，于是，便倡议并出资襄助修志。在他的倡议下，《沧县志》1930年开修，他出任协修；1933年编纂完成，分疆域、河流、建置、古迹、赋役、行政、职官、人物、艺文、宗教、升计、礼俗、金石、轶闻、志余、大事年表共16部分90余万字。这是沧州天文地理、经济物产、人物风俗、建置历史的一部全景式的沧州历史书籍，对于“资政、教化、存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特别是当时国家、民族正面临日本军国主义的觊觎，且于1931年9月18日悍然入侵我国东北，侵占东三省。能够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之下，静心编修《沧县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刘之洁爱好书法，回到乡里更有了研习和时间。还是在任江北护军使时，他的秘书长兼军法处长刘文玠就是知名的书法家。刘之洁喜欢书法或许受他的影响。刘之洁学书法从王右军（王羲之）入手，楷、行皆秀丽超拔，后归汉隶，又习魏碑，苍劲遒健。苦学精练的同时，他还收徒授课。沧州当代书法家贾子贞先生在《贾子贞墨迹选》书中记载，自己曾得解甲归里的刘之洁将军的真传。他说刘将军收藏了很多珍贵碑帖和名家真迹。他对贾子贞精心传授，深论法度，明指优缺，使之大开视野，技艺飞跃，终于练就精功。贾老晚年魏碑书法在全国大展中屡屡获奖。成绩面前，他常常思念当年南迁避难、杳无音讯的良师刘之洁将军。



业绩不泯，英名常在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大举南侵，沧州很快沦陷。刘之洁离乡南下，辗转寓居湖南常德。晚年的刘之洁有感于中国动荡、国破家亡，年近七旬又无法再操兵戈、抗敌保国，心灵受到极大创伤，郁郁成疾。

1938年秋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受命检阅湘、黔、川后方军队。冯玉祥到达长沙，向张治中将军问起刘之洁的情况。冯玉祥早年在北平与刘之洁相识，刘之洁南下后曾在武汉与避难的原西北军老医官邓鉴三、河北省原教育厅长陈哲甫和冯玉祥住在一起。当时日本飞机日夜轰炸。冯玉祥打电报给张治中，要他在长沙给刘之洁找个住处。张治中在长沙银行公会安排了几间房子，准备接刘之洁等人住到那里。

此时的刘之洁却生病住院。冯玉祥听说后就赶到医院看望。刘之洁患的是痢疾，已经有所好转。当冯玉祥视察完湖南回程到了益阳，却传来刘之洁病情加重的消息。冯将军预感不妙，就派参谋赵力钧携款到常德探望，并嘱咐赵参谋，如有不测，帮助料理后事。原来刘之洁的病本来已经痊愈，因为吃东西不注意痢疾又复发了，结果再没治好，悄无声息地与世长辞了。

赵力钧帮助置办了棺木寿衣，装殓埋葬，在坟前竖立了一块简单的小石碑。一代名将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冯玉祥将军评价刘之洁说：“辛亥革命的时候，刘聿新先生首先攻破南京，赶走张大辫子张勋，可说是创建中华民国的老英雄。后来他做江北护军使，袁世凯因为他是革命英雄，就把他调往北京闲住，不给他事做。这老先生学问、品行都是一等。字也写得极好。”冯玉祥把刘之洁的事迹报告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国民政府颁发命令对刘之洁予以褒奖。

探访集北头“都督府”，老房子虽已破旧，但它还是顽强地在那里挺立着！希望人们能从它身上读出主人那段曾经辉煌的历史。因为刘之洁将军病逝于乱世又葬于他乡，他的事迹长期以来不为故乡人所知。他的子孙后代也都成才：长子刘树枝，是一位国民革命军少将；次子刘树砥，官至县长。只



历史名人与南皮 ◎ 文化丛书 ◎

是后人都远离家乡，分居各地。

《北京科技报》创始人刘毓焯先生是刘之洁将军之孙。据他介绍，刘将军在家乡的故居有两处：一处是沧州城李家花园，早已旧迹无觅；一处是集北头村，就是那处老房子。值得欣慰的是，如今“都督府”已经被南皮县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老房子虽然破旧，但它可以承载历史。作为一处有形的标志物，它能给人们留下一点念想，引发一缕幽情，也是对这位民国名将的哀思和祭奠！正所谓“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鸿飞不计东西，指爪偶留痕迹。刘之洁临终没留下只言片语，但是历史的风尘没有把将军的辉煌业绩湮灭。历史是公正的，有人被钉在耻辱柱上，有人则被镌刻在名誉榜上。刘将军属于后者。

（李忠智 孙福军）



罗章龙、刘格平颂扬张隐韬

张隐韬（1902—1926），原名张宝驹，又名张仁超，南皮县西唐家务村人。张隐韬是中国共产党一大时期的党员，曾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张隐韬1925年12月创建津南农民自卫军。他探求真理、追求光明，无私无畏、忠诚革命，惜因遭敌伏击被俘，光荣就义，年仅24岁。罗章龙诗赞他为“燕地侠”“人中豪”；刘格平誉他为“伟大人”。其存世的《张隐韬日记》已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张隐韬的铁血荣光

他从李大钊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由罗章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一大时期的党员；他与邓中夏、王尽美、邓培等一起参加领导了北方工人数次大罢工，是中共北方早期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与徐向前、王尔琢、左权、陈赓等共产党员同期入学，在东征广东军阀陈炯明的战斗中因作战勇敢受到周恩来召见鼓励；他组建了北方地区第一支由中共领导的农民武装，亲手点燃了津南农民运动的烽火。

他就是曾被罗章龙评价为“易水奇男燕地侠”的张隐韬。1926年2月5日，他被反动军阀弓富魁杀害，牺牲时年仅24岁。“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千古同叹。

一、受教于李大钊、罗章龙等共产党创始人引导，成为中共一大时期的党员

蜿蜒曲折的漳卫新河和宣惠河，在南皮的东南部折向东北流淌。在两河中间，有一个始建于明代的村庄，这就是南皮县唐家务村。1902年，



张隐韬就出生在这个偏僻村庄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时，中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腐败无能的清王朝成为被外国列强欺凌宰割的羔羊。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平民百姓遭到外国列强和清王朝的双重压迫和蹂躏，日子更加煎熬。偏僻的唐家务村也不例外，深受地主恶霸的欺压。张隐韬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终年给地主家当长工，由于劳累过度，贫病交加，在张隐韬还未出生前就去世了。母亲为了将儿子拉扯成人，取名宝驹，寓意为容易养活。后来，寡母为生活所迫，将年幼的宝驹寄养在本县郝庄外祖母家，自己去天津给人家当佣人。

8岁那年，尽管家境贫苦，姥姥、舅舅还是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挤出钱来供他上学。小宝驹自幼聪明，且很懂事，幼小的他就懂得母亲在外做佣工挣钱和外祖母及舅舅抚养自己的艰辛，深知求学不易，便暗下决心，好好学习，做一个有志气、有出息的人。因此，他发愤读书，成绩优异，加之活泼机敏，待人诚恳，很有组织才能，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1918年秋，宝驹高小毕业，因家庭生活困难，无力资助其继续上学，而他也不忍心让母亲和外祖母再为自己劳神操心，决心到外面去闯世界，走出一条自己理想并追求的人生道路。于是，进津见到母亲后经人介绍，谋得一个铁路见习警察的差事。由闭塞的穷乡僻壤来到繁华的十里洋场，他很快就发现了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亲眼目睹了露宿街头、饥寒交迫的失业工人和灾民；同时也看到了灯红酒绿、锦衣玉食、携妻拥妾的资本家的穷奢极欲。

面对政府腐败、外国入侵、洋人横行、人民蒙难的现实，16岁的张隐韬从心底发出了强烈的呐喊：个人前途何在？中国的出路、民族的希望在哪里？从此，他逐渐树立起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为了激励自己，他将自己的原名“宝驹”改为隐韬，意思是要韬光养晦，做一个有雄才伟略的人。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天津，张隐韬由此看到了革命的曙光，



积极投身到这一爱国运动之中，结识了于方舟、安幸生、安体诚、于树德等一批著名的北方学界领袖。他们向张隐韬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荐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感到茅塞顿开，找到了革命的方向与目标。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11月，该研究会公开接纳全国各地倾心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进步人士，张隐韬成为该会在天津的通讯会员。

研究会得到北京大学进步教授、教师的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经常给会员们做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演讲。研究会还经常召开讨论会、讲演会，研究《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俄国革命及其建设等。张隐韬以铁路警察的身份，有幸直接聆听到了中共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给会员做的关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学说等演讲。李大钊的演讲犹如拨云见日，使他的思想产生了质的变化，在思想上从寻求个人出路转向为普天下的穷人、为国家和民族找出路；在政治上也更加成熟，以火一般革命热情投身于工人运动之中。

1922年春，张隐韬在天津地纬路铁路工人业余学校当教师，利用课堂向工人宣传革命，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这时，中共北京区委负责组织工作并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罗章龙到天津巡视，党组织安排张隐韬协助罗章龙工作，张隐韬和罗章龙同吃同住。晚上，两人一起谈论马克思主义，谈论军事，谈论安邦定国大事。经过一段斗争考验和接触的加深，罗章龙见他对革命工作忠心耿耿、满腔热忱，能够出色地完成艰巨任务，便和天津早期工人运动负责人安幸生培养、介绍张隐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张隐韬犹如黑夜中探索行进的航船发现了航标，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方向更明了，革命热情更高了。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张隐韬被任命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在中共北京区委领导下，还经常参加北京大学党支部的一些工作。他和共产党员



于树德、施存斋、安体诚等在天津积极举办业余补习学校、工人图书馆、“五五代卖社”、“工人乐群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活动，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教育。

1922年9月，张隐韬介绍沧县大堤东村（现属孟村回族自治县）在天津求学的回族青年刘格平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年冬，刘格平受党团组织派遣，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发展刘子芳、王俊峰和刘景良等人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2月，主持建立了津南地区第一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一大堤东支部，刘子芳任书记、王俊峰为宣传委员、刘景泉为组织委员。这是津南地区第一颗革命的火种，使津南地区成为中国北方革命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二、领导北方工人数次大罢工，是中共北方早期工人运动的先驱之一

20世纪20年代初，全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1921年11月，先是陇海铁路工人为反对资本家的压迫、剥削而发动了全路大罢工；次年的8月24日，长辛店铁路工人举行罢工。与此同时，山海关、唐山铁路南厂、徐州、郾城、信阳等地也积极响应。在共产党的领导和京汉铁路等地工人的大力支持下，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在工人阶级中宣传自己的主张，教育、团结工人进行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北方地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重点活动的地方，同时也是北洋军阀政府军事力量集中的地区，因此，北方的革命斗争存在着随时遭受敌人武力镇压的威胁。而在其军阀内部，也是互相倾轧、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极不稳定。北洋军阀内部下层士兵大都来自农村贫苦农民，为争取其下层官兵，中共北京区委决定成立军事工作组，罗章龙任组长，张隐韬和张兆年、茅延桢、李之龙等人为成员。后来，该工作组发展为军事工作委员会。由张隐韬代表该工作委员会出面与北方的各军事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清河陆军军官学校、烟台海军学校及其各省讲武堂）中的进



步学生联系，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交流军事知识和情报，秘密建立党组织。同时，张隐韬还对北洋军阀内部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和研究。他尤其对《步兵操典》一书颇有研究，并主张以此书为教材，训练工人纠察队，保护工人斗争。由于张隐韬潜心研究军事，很快成为中共北京区委中的军事行家。

1922年，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已迅速发展，成为领导数十万工人斗争的司令部。书记部工作涉及范围甚广，指导北方12个省和16个大城市的工人运动，工作任务繁重艰巨，人力、经验均感不足。为此，中共北京区委决定，北方区党员全力参加书记部工作，张隐韬被吸收为书记部的特派员，频繁地活动在京奉、京绥、正太等铁路线上。

开滦矿物总局是由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唐家庄五矿组合而成的。原为官僚资本所创办，后被英帝国主义者侵吞，矿工们深受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工时长、工资低，劳动条件恶劣，生活非常困苦，故该矿有“人命一条，不如一马”之说。在全国风起云涌的罢工运动鼓舞下，尤其是在山海关、唐山铁路南厂罢工胜利的影响下，开滦五矿工人纷纷要求组织起来，为获得政治自由和经济解放而斗争。

1922年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北京区委、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决定发动北方铁路工人和开滦五矿（林西、唐家庄、赵各庄、唐山、马家沟）工人大罢工。罗章龙、王尽美、邓培、张昆弟等为罢工委员会主要成员。因张隐韬熟懂军事，组织派他担任工人纠察队教练员，负责训练以及罢工期间的组织指挥。8月24日，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这时，张隐韬因母病正在家乡，听到消息后，立即赶赴长辛店罢工现场，同邓中夏等罢工领导人一起指挥了这次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并最终取得了罢工斗争的胜利。

10月25日，开滦五矿5万名煤矿工人为反对英国资本家的剥削，进行总同盟大罢工。五矿工人举行大集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劳工神



圣”“要求经济解放”“打倒一切剥削者”等口号。五矿工人还以俱乐部的名义发表了开滦煤矿工人总同盟罢工宣言，向全国各界陈述矿工们牛马不如的生活，揭露英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反动军阀虐待矿工的种种罪行。

在这次总罢工斗争中，张隐韬负责组织指挥 2000 余人的工人纠察队配合罢工行动。五矿总同盟罢工的发展，引起了中外反动派的深深忧虑，仅一天之内，矿局资本家就一连发出三封电报，催天津方面急速派兵来唐山援助。军阀曹锟急速派出一个师的兵力来矿镇压；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派出 3000 人的“保安队”进矿；英帝国主义还派一个由 100 多人组成的联队驻守秦皇岛。中外反动派大兵压境，图谋武力镇压。此时，张隐韬带领 2000 人的工人纠察队面对近万人且荷枪实弹的中外敌人，力量相差悬殊。但张隐韬无所畏惧，指挥工人纠察队监视工贼，维持秩序，巡逻救护，防止反动军队和外国人的破坏。同时，组织纠察队员接近下层兵士和矿警，宣传革命主张，争取他们同情罢工，保证不向罢工工人开枪。张隐韬与邓培、王尽美夜以继日的工作，研究情况、制定对策。在斗争过程中，工人们吃不上饭，张隐韬和罢工领导人在生活上先人后己。大家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敌人见利用镇压的手段难以奏效，又生一计，他们让“保安队”招募临时工人代替罢工工人复工，张隐韬带领工人纠察队封住井口，阻止开工，挫败了敌人的图谋。

经过反复较量，终于使敌人无计可施。其间，罗章龙和邓培被敌人抓去，张隐韬率工人纠察队又把他们抢回来。罢工斗争持续了 25 天，虽然工人被打死打伤 57 人，但最后矿方答应了改善抚恤、提高工人工资的条件，给英国资本家和封建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张隐韬在罢工斗争中的突出表现和卓越的指挥才能，赢得了中共北京区委的称赞。

北京区委领导的罢工斗争如燎原烈火，势不可当。1922 年 12 月 15 日，张隐韬又参与组织领导了正太铁路工人大罢工，并再次负责工人纠察队的工作。有了前两次罢工斗争的经验，罢工委员会发出正式罢工宣



言，要求铁路局履行工人加薪、减少工时等条件。为对付工贼拉拢罢工工人、回击资本家的挑衅，张隐韬率领纠察队员昼夜巡逻，严加防范，拦截欲开的火车，罢工斗争坚持10多天后，资本家只好答复了工人提出的条件，再一次取得了罢工斗争的胜利。张隐韬也在数次罢工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考验，成为一名富有罢工斗争经验、有威望的工人运动的领袖。

1923年1月，张隐韬随同罗章龙、孙云鹏等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部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2月1日上午，军阀吴佩孚得知京汉铁路要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的消息，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在郑州全城戒严，下令禁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是，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奋不顾身，他们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在郑州普乐园剧场举行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当天，全副武装的军警严密地包围了会场，强行解散会议，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并驱赶代表。

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转移到汉口江岸，并决定全路自2月4日起举行总罢工。

2月4日这天，全路两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1200公里铁路顿时瘫痪。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慌。吴佩孚、肖耀楠等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派出军队对罢工血腥镇压，当时现场枪声如沸，弹雨纷飞。张隐韬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奋不顾身指挥纠察队，最大限度地掩护工人脱险。但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等人慷慨就义。工人被杀40多人、伤200多人、被捕60多人，遭开除1000多人。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在这次大罢工斗争中，张隐韬的表现赢得了北京区委的高度评价。



罗章龙赋诗赞扬：

易水奇男燕地侠，朱家郭解人中豪。

北方区委抒筹略，二七英风万古高。

“二七”风暴后，北洋军阀政府勾结北京军警机关，到处张贴布告：“主张共产，宣传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张隐韬毫不畏惧，在王尽美直接领导下的中华铁路全国工会筹备委员会工作，经常奔波于北京、张家口和京绥铁路的各个站点，恢复建立工会组织，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时常每天仅休息三个小时。1924年“二七”罢工周年之际的一个多月里，他在京绥铁路工人中建立了8个CP（共产党）秘密小组。为更好地掌握革命理论，他挤时间认真学习《社会主义史》《革命哲学》等书，并与何梦雄、邓中夏等探讨在全国革命胜利后社会改造问题。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要“珍惜光阴，多做实事；唤起民众，推翻军阀政权”。在另一篇日记中记道：“我们再不内清政治、外御外侮，种种危险，已经迫在眉睫！”

三、受中共党组织派遣考入黄埔军校，在上海聆听了毛泽东的教诲

“二七”大罢工的失败，使共产党人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中共北京区委决定必须掌握自己的武装，用枪杆子回击敌人的残酷镇压。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以后，在我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1924年3月，张隐韬受中共北京区委派遣，和杨其纲、江震寰、唐澍等4名直隶省青年一起报考黄埔军校。能够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使他喜出望外，热血沸腾。当他接到北京区委的通知后，连家也没顾上回，就匆匆上路了。临行前，任国民党一大中委委员的中共党员于树德等人对他们大加鼓励，借予川资，希望他们在军校学到知识本领，为挽救祖国危亡有所作为。

3月14日晨到上海，让张隐韬想不到的是，在上海负责接待招生学员的竟是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宣传部代理部长、中共中央秘



书的毛泽东。过去张隐韬只是听别人说过毛泽东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听过毛泽东许多闹革命的故事，也读过毛泽东的文章，他对毛泽东非常敬仰，做梦也没想到今天竟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毛泽东。在这里，他看到了毛泽东为接待共产党考生的热情，也看到了毛泽东为了革命日夜操劳的憔悴面容，更看到了毛泽东不管工作多么紧张，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为他们办好报考的手续，叮嘱好好准备，迎接考试，为共产党积蓄军事人才。毛泽东的教诲使张隐韬热血沸腾，终生难忘。

5月份，张隐韬经考试被正式录取。因为在上海耽搁了一些时间，随带的川资用尽，又通过罗章龙和南皮同乡张继资助路费赶往广州。黄埔第一期学员共有近500人，其中有中共党员、共青团员56人，约占该期学员总数的1/10，徐向前、王尔琢、左权、陈赓等中共党员同是军校第一期学员。一期学员共编四队，张隐韬被编入二队，和周士弟、黄维、郑洞国、李奇忠为同队同学。队长为中共党员茅延忱。张隐韬1922年就随茅延忱一起在北京区委的军事工作小组。二队还有李奇忠、赵一楠等中共党员。在黄埔军校，他不仅刻苦学习政治、军事、战术等军事理论，而且积极参加地形作业的野外实习。他还认真学习了《世界革命史》《中国国民党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书籍以及军事等十几门课程，每门功课学得都很好，使张隐韬的军事技能和战术素养得到很大提高，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这期间，张隐韬加入了左翼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CP”小组），经常秘密开会，交流对形势的看法。他们不计较权位，不营求私利，努力实干，相忍为国，把完成国民革命视为当前的迫切任务，成为学生中的中坚力量。

随着学校学习的深入，张隐韬的政治素质进一步提高，他以敏锐的洞察力，看穿了以国民党左派自居的蒋介石的独裁面目。蒋介石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对学校中几十名中共党员严加限制。张隐韬对蒋介石



石把持军校、飞扬跋扈、任人唯亲的作风非常不满，他在1924年6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蒋介石以校长的身份命令，“关于下级干部的事，学生是不准提出质问，若有替下级干部说话的，官长和学生都要枪毙”。张隐韬对此十分不满，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看法：“此学校之中，发生此等压迫不平之事，真是为人民争自由、为人民争平等的革命党的怪闻。既以此等手段施之于本党同志，亦可以此种手段施之于将来全国国民。然一般国民今日所感的痛苦，正是此等不平之压迫。若经一次革命，还是和现在一样，那么，这等革命的工作可说无有再革命的必要了。”

尽管如此，但张隐韬为了既定的革命目标，还是一如既往地努力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素质，无论多么艰难困苦都能勇于面对和克服。一个北方人到南方就学，不仅生活上不习惯，蚊叮虫咬和酷暑潮湿更难以忍受。他身上起了严重的湿疹，两手麻木，每日汗流浹背，还经常在夜间执行警戒保卫任务，更是困累交加。

面对这些困难，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若非要我拯救这些群生，抱定的救民主义，简直军人的生活我便毅然决然的不干。只为我决定要以彻底的革命改造社会，虽然受了这种深刻的印象，更足以振起我坚决毅力！”所以，他不为蒋介石假革命、真反动的那一套而左右，不管风吹浪打，革命的意志坚定不移。无论在平时的军事训练，还是在执行任务时，他都表现得十分突出。同时，张隐韬在军校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1924年8月23日，他从《护党特刊》123期上看到国民党右派攻击共产党的言论，联想到此前国民党右派散发一本《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的小册子，意识到他们的险恶用心。他立即给北方区委的有关同志寄去一份，请他们“在大会对右派提出抗议”。他不止一次提醒党组织注意动向，警惕时局变化，驳斥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

正如他在1924年8月28日日记里写道：“所以我看，如若无产者的革命爆发于最近的将来时，必严防南方的资本家之结合。北方倒还比南



方好办得多，如果时期还远，则民众必都是进化。则无论南北的资产者，都严格监视而实行主义之建设。故今日‘CP’之军事活动，必普及于全国，遂一有举动，而全国的军事行动足以压制资本家，而致其死命！故我认为是应特别注意的一件事。”

从这里可以看出，张隐韬对党抓武装的战略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决心。这个思想产生在1924年我党幼年之时，实在是难能可贵、眼光远大的。

四、参加东征讨伐，因作战勇敢受到周恩来的召见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在我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高潮。在北方，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群众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有了蓬勃发展。在南方，为了培养更多的能够献身于农民革命运动的干部，在共产党人彭湃等人倡议下，从1924年7月起，决定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名义上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但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彭湃亲任广州农讲所第一任主任，毛泽东任第六期主任。周恩来、林伯渠、恽代英、李立三、萧楚女、于树德、阮啸仙、周其鉴、罗绮园等著名的共产党人担任教员。讲习所主要讲授中国革命斗争形势、农民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打倒军阀、建立平等自由的新中国等，特别是毛泽东讲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从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革命理论和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中国革命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只有唤起广大农民，使农民和工人及其他劳苦大众一起，向压在他们身上的统治阶级进行斗争，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解放、夺取政权。周恩来、萧楚女等共产党人讲授的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等课题，生动活泼、富有感染力。特别是讲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当时的“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等现实斗争，更是慷慨激昂。听他们讲课，如身临其境，激发了人们对帝国主义的满腔仇恨，同时认



识到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力量。农民运动讲习所共举办了6期，至1926年9月结束，培养了772名毕业生和25名旁听生。

在校期间，张隐韬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听课，同时，也帮助广东农民协会训练农民自卫军。他在日记中写道：“黄埔附近的农民，成立了讲习所，他们乐欲受点军事训练，特在本校之假期到本校（来校月20余人）学习。”军校对这些农民进行了军事知识训练。黄埔军校半年来的学习和战斗实践，以及广东农民觉醒后的革命行动使张隐韬逐渐萌发了武装农民的思想。

1924年7月23日，为追悼帮助中国革命的苏联将军柯洛夫，广东工会、农会等团体纷纷参加。张隐韬在这天的日记中记述：“一些农夫赤足短裤、头戴草笠，手持‘为东方民族独立而牺牲’的标语参加追悼。”张隐韬看到这些，高兴地喊出：“世界革命的血钟敲响了！苏俄的灿烂赤光已经到黑暗的中国来了！中国被压迫的工农已经很衷诚地来追悼解放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驱，而惊醒中国的无产者来参加世界运动了！继续奋斗啊！前进啊！努力啊！”

1925年1月，盘踞在惠州、潮州、汕头一带的军阀陈炯明所部，在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支持下，趁孙中山北上商定国是的机会，自命为“救粤军总司令”，在汕头召集军事会议，以其7个军6万余人进攻革命根据地广州，妄图摧毁革命政权，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支持下，为了打破陈炯明进攻广州的反动企图，巩固基地，决定清除叛逆。随即组成有黄埔军校学生组成的军官教导团参加东征，张隐韬作为教导团的一员，心情无比振奋。黄埔军校官兵师生，纪律严明、军装整齐，衣领上系着红领带，背包上挂有“爱国家、爱人民，不贪财、不怕死”字样的牌子。东征途中。沿途两旁的老百姓，热情地送水、送煮鸡蛋、送烤红薯。工农群众的支持更加坚定了张隐韬和军校学生讨伐叛逆的坚强意志。以教导团为骨干



组成的右路军向潮汕地区进发。张隐韬与战友们奋勇拼杀，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的支援下，一路势如破竹。2月1日，校军与粤军联合行动，首先肃清广九路的敌军，随后向淡水城疾进。接着直下虎门、东莞、石龙、樟木头、塘头厦、平湖、龙岗，迫临淡水城。

淡水城是一个小城镇，在今深圳市的东北不远。东征时期的淡水城四周筑有高6米、厚3米的石头城墙，可以抵挡枪弹的射击，并设有上、中、下三层枪眼，形成立体射击火力网；城墙下是一道又宽又深的城壕，再外面是300多米宽的洼地，地势开阔一览无遗。如果做个比喻的话，从空中鸟瞰城墙高立的淡水城，它的外形极似一个长方形的石头匣子。守城的敌军为熊略、林烈、翁辉腾的部队，约有4000人。淡水城距离敌军洪兆麟所部驻防的惠州只有70华里的路程，陈炯明的副总指挥洪兆麟已急遣所部2000余人赴援淡水，援军可朝发夕至。因此，黄埔校军必须赶在援敌到达之前，速战速决，攻下淡水。否则，胜负难料。这是联军东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块硬骨头，也是校军东征以来接触的第一场大的战斗。

2月14日，指挥部下达了进攻淡水的命令。教导第一团和第二团从淡水城南三个方向对城内发起一次次猛烈进攻，从拂晓一直打到下午6时，但敌人依据坚固的城墙顽强抵抗，教导团伤亡较大。指挥部决定挑选奋勇队做开路先锋，突破敌人坚固防线。挑选奋勇队员攻城，名称上说是奋勇队，其实也就是敢死队。但挑选奋勇队员的消息一传出，教导团官兵立即沸腾起来，张隐韬积极报名，坚决要求参加奋勇队并被批准。在黄埔一期学生中，报名参加被选中的还有陈明仁、关麟徵、左权、陈赓和杜聿明。最后挑选了105名学员担任奋勇队员，8名担任连党代表的中共党员和两名国民党员为奋勇队官长。

2月15日7时整，涧井高地上，苏联炮兵顾问、原苏军炮兵师长夏斯特洛夫挥动着指挥旗，两门山炮在他的指挥下，准时向淡水城的东南角开始轰击。炮弹呼啸着飞向城墙，守城敌军一部分被榴弹炮击中，没



有被击中的敌军四下躲藏，敌军一片混乱。城墙很快被炸开一个缺口。奋勇队员一跃而起，冒着浓浓的硝烟，冲向城根。隐蔽在城墙下的校军官兵的步枪、机枪一齐开火，掩护奋勇队挟梯攻城。云梯不够，就搭人梯爬城。敌人凭险顽抗，城根下到处是奋勇队员和双方官兵的尸体。张隐韬与全体奋勇队员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以一当十，勇猛冲杀，迫使敌人后退。奋勇队员趁机打开城门，教导团的官兵立即冲进城里，与奋勇队员合并一处，聚歼残敌，解放了淡水城。接着，取得棉湖大捷，再攻兴宁、五华，不到两个月，东征军就荡平了东江，扫平了潮、梅地区。随即，挥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发动的商团叛乱。

1925年10月，张隐韬又参加了第二次东征，东征军势如破竹，完全攻克陈炯明的老巢惠州。而后又回师助剿南路军阀邓本殷。革命军渡海作战，消灭残敌于海南岛。至此，广东全省获得完全统一，为北伐奠定了基础。在两次东征中，张隐韬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冲锋在前。东征结束后，受到负责指导东征军战时政治工作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亲切召见和鼓励。

五、组织领导津南农民起义，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尝试

1925年3月，张隐韬于黄埔军校毕业，受党组织派遣，以左派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到驻河南开封的国民二军中搞兵运工作。同去的还有其他4名中共党员。在开封，遇到了同样受天津党组织派遣来河南搞兵运工作的刘格平。两个沧州老乡见面后心情格外激动，想不到是执行同样的任务。在开封城宫角的一家旅馆里，两人彻夜畅谈，从当前中国的现状到中国革命和战争问题，从打倒军阀到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张隐韬对刘格平说：北方主要问题是反对奉系军阀，国民军多是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旧部，未加改造，一遇风吹草动便靠不住。他还谈到了东征中由我们党、团员组成的黄埔



军官革命团，在战斗中攻无不克、锐不可当。这充分证明，我们党必须组织自己的军队，像苏俄那样，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张隐韬对时局的精辟分析，令刘格平十分佩服。

张隐韬和刘格平先后到驻新乡的国民军二军二师四旅旅长史可轩那里开展活动。史可轩任命张隐韬为副旅长，刘格平为上尉副官。他们在四旅先后发展了军事教练所所长任警哉、独立营营长许权中等为中共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在连队建立党团支部，积极发展进步军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秋，国民军一军、二军一部和三军决定联合攻打盘踞在天津的奉军李景林部。张隐韬认为创建革命武装的时机成熟了，于是经请示当时郑州的地下党组织同意，张隐韬主持召开了四旅党支部会议。会上，张隐韬批驳了“共产党不宜搞武装”的观点，并以自己在黄埔军校东征时，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和黄埔军校的学生协同作战，发挥了极大作用，并以此证明党独立领导武装的极端重要性，而发展农民武装是中国革命的必然选择。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后，一致通过决议，由张隐韬去津南农村建立农民武装；刘格平去天津组织工人武装，以策应国民军对奉军的军事行动。然后两支部队在津南会师，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革命政权。

在国民二军中，史可轩是最进步的一名旅长，后经天津党组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隐韬等人的行动，得到了史可轩的支持，并拨给张隐韬一部分人和枪支弹药。10月，张隐韬携同国民二军参议陈秀福和一部分人，乘火车离开新乡北上，在石家庄藁城东集结，有四五十人、三四十支枪。新组成的这支小部队，打着国民二军的旗号，一路向东，沿途招兵买马，途经晋县、深县、武强、交河，到达泊镇后，又收编了一部分败逃的奉军散兵游勇和地方民团，部队达到四五百人。

1925年12月，张隐韬在泊镇召开了有当地群众参加的大会，宣布



“津南农民自卫军”成立，举行武装起义。张隐韬任司令兼党代表，陈秀福任副司令。自卫军制定了军纪，宣布了“驱逐帝国主义，铲除封建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纲领，并提出了“保护农民利益”“打倒反动军阀”“镇压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等革命口号。张隐韬宣布的政治纲领和提出的革命口号，充分显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革命理想，也标志着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在津南地区的诞生。

津南农民自卫军成立大会后，张隐韬率部队自泊镇出发，浩浩荡荡，挥师东进，首先占领南皮县城，收缴了守城警察、地方民团的100多条枪支。张隐韬找到县长给他约法三章：供给军费，发足军饷；不准横征暴敛，取消苛捐杂税；打击侵犯农民利益的土豪劣绅。这个县长是国民二军委任的，根本不把张隐韬放在眼里，反唇相讥：“不收捐税，不征不敛，谁有钱给你们？”张隐韬一听非常气愤，掏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拍，一把抓住县长的脖领子打了几个耳光，一顿呵斥：“不遵守自卫军约法，就枪毙了你！”县长连忙赔情，当即交付了5000元军饷。

部队路过南皮县唐家务、郝庄时，乡亲们听说张隐韬当上了司令，争先恐后涌上街头。只见村口摆放几张桌子，墙上、树上贴着征召自卫军的标语。张隐韬身着军装，外披大氅，向人们宣传革命，动员参加自卫军。一些有志青年积极参加了他的队伍。

张隐韬率部经盐山县城，进驻旧县镇。经过短暂整顿，又进军庆云县。县城内驻有奉军张宗昌的守军一个营，他们闻讯弃城而逃。自卫军占领庆云，收编了地方民团的100多人。自卫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到之处专门打击土豪劣绅。队伍开到乐陵黄夹镇时，当地百姓反映一个包税商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张隐韬立即将他抓起来，痛打一顿，严令其不许欺压百姓。自卫军名声大震，青年踊跃参军，队伍很快发展到1200多人，编成三个大队和一个50人的手枪骑兵团。一大队留守庆云县城，二、三大队和骑兵团以旧县镇为中心，活动在盐山、沧县、南皮、



庆云、乐陵等冀鲁边广大地区。

六、自卫军遭到反动军阀的围剿，张隐韬壮烈牺牲

张隐韬领导的农民自卫军驻扎在河北省盐山县旧县镇。为了扩大影响，以“快邮代电”的方式向全国发出《津南农民自卫军宣言》，全国震动，北方军阀一片惊恐。国民二军司令、河南督办岳维峻和国民三军分别下达命令，消灭自卫军，通缉张隐韬，并就地正法。接着，国民三军门致忠旅进驻盐山一带布防，国民二军弓富魁旅亦由吴桥桑园移防泊镇、南皮一带，对自卫军形成四面包围态势。自卫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在这紧要关头，张隐韬一面急电在天津的刘格平速来共商对策；一面又亲赴天津找党组织，与驻天津的史可轩商定，将自卫军拉到四旅驻杨柳青的许权中、任警哉处合编，以保存这批革命火种。而后，张隐韬立即返回旧县镇自卫军司令部驻地。这时，刘格平已受天津党组织派遣前来，张隐韬任命刘格平为农民自卫军参谋长。他们分析了形势，决定率一大队和骑兵手枪队作为先遣队，拟经南皮县城到泊镇乘火车北上。1926年2月4日上午，部队到达南皮县城时，史可轩派副官韩成西送来急信，说岳维峻命令弓富魁剿灭这部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弓富魁派骑兵先期进入南皮县城。

情况突变。张隐韬和刘格平商定，部队改为到砖河乘火车，当部队行至南皮县城北徐庄时，突遭弓富魁部伏兵截击，双方展开激战。尽管农民自卫军英勇奋战，但由于双方兵力悬殊，自卫军又多系入伍不久的农民组成，缺乏实战经验，很快被敌骑兵队冲散。激战中，张隐韬手持勃朗宁手枪，一连打倒了六七个敌人。但终因子弹打光，寡不敌众，不幸被俘。

敌人用铁丝将张隐韬捆绑起来，连夜押至农民自卫军司令部所在地旧县镇。守城的农民自卫军两个大队和手枪队700多人，向副司令陈秀福请战，要求冲上去救出自己的司令。陈秀福借口说：“我们上去一打，敌人就可能先杀死张司令。”下令按兵不动。



敌人把五花大绑的张隐韬押到旧县镇的西门外，用刺刀和枪口对着张隐韬的后背，逼他向自卫军喊话，让自卫军缴枪投降，张隐韬大义凛然，严词拒绝。敌人又以枪毙威胁他，张隐韬回答道：“枪毙我嘛不要紧，我要当众讲话，我讲完了，随你们的便好了！”接着，张隐韬面对在场的群众和国民军官兵，慷慨陈词，大声宣讲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讲述中国人民劳苦大众的苦难，指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的黑暗统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工农苏维埃新中国，劳苦大众才能获得解放。

张隐韬的演讲慷慨激昂、气贯长虹，声声震耳、句句动人，一直讲演了两个多小时。围观的群众无不为之落泪，国民军中的不少官兵也都为之感动，就连受命行刑的敌营长也被他的演讲所打动，不忍向他开枪。张隐韬最后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时敌军中有一个特务跳出来，向他射出了罪恶的子弹，张隐韬随着枪声倒在血泊中。那天是1926年2月5日，年仅24岁。

张隐韬牺牲后，自卫军失去了正确领导，多数战士对副司令陈秀福按兵不动、不组织营救的行为义愤满腔，纷纷离队回家，一支初露锋芒的农民自卫军就这样夭折了。

张隐韬虽然牺牲了，但他创建领导的津南农民自卫军的英勇业绩，在津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1985年，刘格平捐资在南皮县烈士陵园为张隐韬筑墓并立碑一通，同时，南皮县还建立了张隐韬纪念展室。2004年4月5日，沧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在沧州市烈士陵园为张隐韬塑像揭幕。1986年，90岁高龄的罗章龙为纪念张隐韬牺牲60周年赋诗一首：

北国之强张隐韬，开滦正定显英豪。

津南起义风云壮，功耀千秋渤海涛。

（赵树森 孙福军）



闻人觅踪



置县 2200 多年的南皮，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

南皮地处九河下梢，黄河流经县域长达 600 多年，境内曾水草茂盛、物产丰饶、风光秀丽。南皮县城（今古皮城）不仅是南皮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还曾为渤海郡治达 500 多年。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南皮拥有了许许多多美不胜收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明、清两朝，南皮都有“八大景观”收录于县志之中。清康熙十七年（1678），南皮知县刘址将南皮十大景观赋《古迹十绝》，一直流传至今。

南皮的景观，不仅使众多仁人志士、社会贤达包括姜太公、吴质、萧颖士、纪晓岚等驻足、寓居、求学，流连忘返；更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像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元代诗人萨都刺、“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任丘举人边向禧等，都曾在南皮赏游，并留下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美丽诗篇。



姜太公南皮垂钓

在南皮县城西 10 里地有一村庄，名为“钓鱼台”（今属泊头市），是商殷时期姜太公在南皮境域垂钓的地方，后人称其为钓鱼台村。“钓台风苇”曾为明、清时期的“南皮八景”之一。清康熙《南皮县志》记载：“钓鱼台，在城西十里。姜太公困棘津时钓此。”“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在南皮赏游并作《过姜太公钓台》诗：“往事萦情日几回，况逢古迹更徘徊。阴符功业今何在，万载唯存一钓台。”

姜太公钓鱼的故事，美丽而又传奇，不仅载于史籍，也走进寻常百姓家。试想，一个七八十岁的白头老翁，隐于草莽之间，以钓鱼度日，鱼钩是直的，愿者上钩，是多么的不合情理。其实这种怪异的举动，恰恰是一种高超的自我包装、自我推荐的手段。老天不负有心人，居然直钩钓到了贤主周文王，成就了姜太公助周灭商的大功绩。

直钩钓鱼是一奇，得遇贤主是一奇，老年出仕是一奇，一举灭商兴周更奇。以钓鱼开始，姜太公逐渐名扬天下，头上挂满了各种桂冠，成为中国历史上千古完人。人们崇尚他的人格，怀念他的功绩，不断美化他，神化他。明朝许仲琳《封神演义》小说的问世，姜太公又成了分封诸神的主，被塑造为祛邪扶正的偶像。民间闾巷流传有“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姜太公成了老百姓的心理依托，变成老百姓心中的护佑神灵。这些超出了历史真实，反映出的是姜太公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姜太公的传奇人生留下了他钓鱼的很多遗迹和传说。

姜太公钓鱼的起点在南皮，终点在陕西宝鸡市陈仓区的蟠溪。姜太公在南皮钓鱼的地方叫南皮钓鱼台，在陈仓钓鱼的地方叫蟠溪钓台。



在历史的长河中，后人又不断给这两处增添着文化元素，使之名声显赫。姜太公南皮钓鱼台在公认的全国十大钓鱼台中列首位（见《人民日报》），从历史时间排序上看当之无愧。蟠溪钓鱼台遗迹保存得很好，今天仍是旅游参观的一个景点。其他姜太公钓鱼的地方，因缺乏人文支撑，知道的人很少，大多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商末，姜太公曾任下大夫，商朝出现的种种问题摆在眼前，对殷商将走向亡国的征兆他应当有所感觉。更因为劝阻商纣王修建鹿台，引起纣王的不满，为免遭杀身之祸，逃避到棘津。“棘津”是古代黄河津渡名。《孟子》记载，姜避纣“居东海（今沧州渤海）之滨”。从字面上看，棘津应是南皮境内一个草木丛生的渡口。商朝前期，古南皮城就已经从聚落发展为城邑，姜太公避祸时应该已是较发达的城邑。南皮城东临海，处九河下梢，河水环绕，景色秀丽。当时南皮一带称得上是水乡泽国。流水潺潺、鱼跃鸭肥，花红柳绿、鸡鸣犬吠，云淡天蓝、青草如茵，祥和安谧的田园风情使人流连忘返。南皮古城西 10 余里的洼淀中有一高台，台周围波光粼粼，芦苇摇曳。高台之上，姜太公头着草笠，手执钓竿，凝视碧波水纹，宛若老僧入定。其实心中翻江倒海，分析天下大势，决定以后个人的去向。他清楚地认识到，商已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缜密思考后，下定了与商割断关系的决心。思量着另择贤君名主发挥自己智慧才能，谋划着另择名主的方法途径。一经决断，便走上了寻访贤君的征程，南皮姜太公钓鱼台是姜太公寻明主旅程的起点，走走停停，直至归西岐依文王。

后人在姜太公钓鱼的高台上立村，取村名就叫“钓鱼台”。姜太公南皮钓鱼台引来很多名人雅士探访，文人的诗词歌赋不断地提高姜太公南皮钓鱼台的知名度。

《河间府志》收录了明吏部右侍郎陈璉的《钓台风苇》一诗：

太平未遇时，钓台烟波中。身应熊黑兆，青社起齐封。



台基久荒废，草色空蒙茸。芦苇岁还长，日夕起凄风。

诗作感伤物废人亡，时光飞逝，流年如水。

沧州市政协编的《历代名人咏沧州》中，载有清乾隆朝举人、学者边向禧的《钓鱼台》诗：“何事鹰扬困棘津，经纶大业隐丝缙。我来不见占熊者，徒倚荒台赋古人。”诗前两句说姜太公的雄才大略，经纶伟业系于细小的钓鱼绳上，点明姜太公南皮钓鱼的意义。

《南皮县志》等文献资料收录吟咏南皮钓鱼台的诗很多，有的诗中引用钓鱼台典故，有的则专题写。赋诗者有郑板桥、戴明说、马士琼、刘址、张芝郁、张天衢、张扩庭等名士文人。

清南皮县令刘址的《钓鱼台》，是赋南皮古迹十绝之一：

谁识鹰扬困棘津，非熊梦叶老谋新。

寄言皮相休轻士，富泽淮阴代有人。

刘诗寄言告诫人们不要轻视处于逆境中的落魄人生。

南皮文人学者张芝郁《钓台风苇》诗写的是南皮八景之一：

西京王业未经收，东海鹰扬已白头。

臣主同心渭滨梦，风尘回首钓台秋。

垂纶自系清明志，投饵空看芦荻洲。

功立试从三青社，棘津非困可封侯？

张诗末句申明姜太公日后封侯，源于南皮垂钓。

（杜中洲）



陈馥封侯于南皮

古志《南皮县志》记载，汉高祖元年（前206），项羽以环南皮三县封成安侯陈馥。次年，陈馥以南皮三县之兵奔袭常山（今元氏一带）。那么，陈馥是如何被封为南皮侯的呢？

—

陈馥是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他喜欢儒家学说，多次造访赵国。有一富人名公乘氏，知道陈馥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就把女儿许配给他。陈馥的同乡张耳，因为得罪了人，隐姓埋名逃到了外黄（古县名，秦置，今河南民权西北），后来还做了外黄的县令。生逢战乱，陈馥和张耳成了生死之交。张耳年长，陈馥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对待他。

秦国灭亡魏国以后，听说陈馥和张耳是魏国的名人，就悬赏捉拿他们：捉到张耳赏1000两金子，捉到陈馥赏500两金子。张耳和陈馥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就隐姓埋名逃到陈县（古县名，秦置，今河南淮阳），在县里充当里门看守来谋生。有一次，一个小官故意找茬，拿鞭子抽打陈馥，陈馥立刻火冒三丈，当即要与那小官拼命。张耳就偷偷踩了他一脚，用眼神示意不要反抗。小官打累了，扔下鞭子就走了。张耳把陈馥拉到一棵桑树下，责备说：“当初我是怎么对你说的？这么点委屈就忍受不了吗？鞭子抽了几下就想杀人，你还有没有大志？”陈馥非常惭愧，承认了错误。

后来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东南）起义，攻打到陈县的时候，队伍已经发展到好几万人。张耳和陈馥求见陈胜。陈胜早就听说他俩很有贤德和才能，只是一直没见过面，现在他们竟然找上门来，感



到十分高兴。那时，起义军力量已经很大了，所以有将士对陈胜说：“将军身披铠甲，手拿利器，威风凛凛，气度不凡，率领将士反抗残暴的秦国，恢复了被秦消灭的楚国，按常理说该称王了。再说，要想统率天下各部将领，不称王也不行啊，希望您能自立为楚王。”陈胜把这话告诉了陈馥和张耳，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听后说：“秦朝很残暴，侵犯别的国家，断绝别人的后代，百姓生活很苦。将军您舍生忘死为民除害，大家都衷心拥护您。可是您现在就称王的话，天下的黎民百姓就会认为您有私心，这样对以后的发展很不好。所以，请将军暂时不要急着称王，应该率兵西进，派人扶助六国的后代，聚集一些兵力，壮大自己的力量，给秦国增加敌人。朋友多，力量就强大；敌人多，力量就分散和薄弱。这样大王就可以借攻打秦国的名义到咸阳称王，对各国诸侯发令也更合乎情理，最后就能成就大业了。如果按照原来的计划只在陈县称王，没有多少人会服从的。”可是，陈胜是个急性子，不管张耳和陈馥怎样劝说，最终还是在陈县称王了。

二

陈胜称王后，陈馥拜见他说：“大王想攻打关中，来不及收复河北，我曾去过赵国，对那里有势力的人物和地形都很了解，请大王让我出兵，攻取赵地。”陈胜同意了，就叫自己的好友武臣当将军，邵骚当护军，张耳、陈馥为左右校尉，率领士兵 3000 人，向北进军。

他们的部队过了黄河，向那里有势力的人说：“秦朝残害天下已几十年了，刑罚十分残酷，百姓生活很苦，天下不能相安。现在，陈王要反抗秦国，为天下人作战，很多人愿意配合，吴广等人已经率军西进了，秦朝马上就要灭亡了！如果不趁这个时候成就功业，还等什么！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请各位考虑考虑吧。”大家听后觉得有道理，纷纷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这支队伍渐渐发展到好几万人，赵地的十几座城邑



很快被他们占领了。

之后，大军又向东北范阳（古县名，秦置，今北京）大举进攻。

范阳人蒯通，善于言辞，在当地很有名气。他找到范阳县令，说：“县令近来可好？听说你快要死了，所以我提前来看看你。不过，你得庆幸有我蒯通在，可以保住您性命。”范阳县令闻言大怒。蒯通说：“您先别生气，听我慢慢说。秦朝的法律很严酷，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当官的没有一个不伤天害理。您当范阳县令已10年了，不知杀了多少人、害了多少家庭，断脚的、刺字的数不胜数。您做了这么多坏事，可那些对您恨之入骨的人竟没有来报复您的，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那些人害怕法律。可是现在天下大乱，战争接连而起，残暴的秦朝马上就要被消灭了，秦朝的法律已经没有用了，那些对您心怀仇恨的人即将翻身，马上就会来刺杀您，既能报仇，又有了名声。现在各路诸侯正反叛暴秦，武臣的军队马上就要杀过来了，城里的人正准备提着您的头迎接武臣呢！如果你马上派我去见武臣，我可以帮您转危为安，不能再拖了！”范阳县令听后，吓得两腿直哆嗦。

蒯通于是来找武臣。对武臣说：“将军南征北战实在是太辛苦了！总要先打了胜仗才能获得土地、先攻破守敌才能占领城邑，这样又劳心又费力，实在不可取。如果您肯听从我的计策，就不会费那么大的力气，只要一声令下，就能平定千里。”

武臣惊讶地说：“真有这等好事？快说来听听！”

蒯通说：“范阳县令贪生怕死，特别想马上投降，但又怕投降后像以前那些秦朝官吏一样被杀掉。现在范阳城里的年轻人都想着杀掉他，然后自己守城对抗您。你为什么不趁机封赏范阳县令呢？这样，那些年轻人也就不敢杀他了。范阳县令能活命，得到财产和俸禄，就会很感激您、很听您的话，把县城完完整整地交给您。这样，燕赵两地的官员听到后肯定也争着投降。而你只需一声令下，就平定千里啦！”



武臣听从了蒯通的主意，封范阳令为侯。赵地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有 30 多个城邑的官员主动投降。

三

武臣的军队到了邯郸以后，张耳、陈馥听说陈王杀了很多有功之臣，心里对他不满。二人又怨恨陈王当初不采纳他们的计策，不让他们做将军，只当校尉。他们一起劝武臣说：“陈王从蕲县（今安徽宿州南）起义，到了陈县就称王，不一定会拥立六国诸侯的后代。将军已经攻占了赵地几十座城邑，如果现在不称王，这么大的地方肯定守不住。另外，我听说陈王对自己的手下并不仁慈，一旦弄不好，就会功成身死。所以您不如现在就自立为王，或者拥立赵王的后代。时间急迫，请将军赶快定夺。”

武臣若有所思：“真的这样吗？”

张耳、陈馥说：“陈王什么都干得出来！您尽快自立为王，就安全得多！”

于是，武臣自立为赵王，陈馥当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安排好以后，武臣就派人通报陈王。陈王一听很愤怒，用拳头使劲捶桌子：“岂有此理！没想到小小的武臣竟然敢顶我的位子！我非杀了他不可！”他下令杀掉武臣等人的家属，灭了他们的宗族，并准备出兵进攻赵国。

陈王的谋臣进谏，认为秦朝还没有灭亡就自我树敌，于己不利；不如先去祝贺，后派他西进攻打秦朝。陈王听从了他的意见，派人假意去祝贺。

张耳、陈馥劝武臣：“大王在赵地称王，陈王其实心里很气愤，来祝贺大王，只是个权宜之计。等秦朝灭亡后，他必定会对赵国用兵。所以大王您还是不要听他的，现在我们应该向北攻取燕、代两地，向南收复河内（古地名，泛指黄河以北地区），来扩大自己的地盘。如果赵国占据



了黄河以北及燕、代，那么陈王即使消灭了秦朝，也不敢压制赵国。”赵王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就派韩广攻打燕地，派李良攻打常山（古郡国名，治今元氏一带），派张廩攻打上党。

韩广到了燕地，自立为燕王。赵王就派张耳、陈馥率兵围攻燕国。

李良平定了常山，赵王又派他攻打太原。秦军封锁了井陘关，李良不能继续前进，就赶回邯郸，请求增援部队。

赵王的姐姐外出游玩，正好与李良相遇。李良看见场面十分宏大，以为是赵王的车马，于是赶紧在路边跪拜。而赵王的姐姐因为喝醉了酒，不知李良是个大将，就随便叫了个随从请他起来。李良看到自己受到冷落，心里很不高兴。这时李良手下人说：“整个天下人背叛了秦朝，很多有能力的人已经自立为王了。想当初赵王的地位一向在将军之下，如今他强大了，连他姐姐都不肯下车还礼，简直不把你放在眼里！让我去杀了她！”李良本来就想反叛，听这么一说，更加气愤，一怒之下就把赵王的姐姐给杀了，然后进军邯郸杀死了武臣。

四

张耳和陈馥在赵国提前知道李良反叛的消息后就逃脱了。有人劝张耳：“你和陈馥都不是本地人，想让赵国人归附很难啊！只有拥立原来赵王的后代，才能成就大业。”张耳和陈馥找到了赵家后代赵歇，立他为赵王。

李良听说张耳和陈馥拥立了新的赵王，就出兵进攻。陈馥迎战，打败了李良。李良看到自己的兵力不强，就归附了秦将章邯。

张耳跟赵王歇逃到巨鹿，秦将王离立刻包围了巨鹿。当时陈馥驻军巨鹿北边，兵力不强；章邯驻军巨鹿南边，给王离供应军粮。王离兵多粮足，强攻巨鹿。巨鹿城里粮尽兵少，支持不住，张耳十分着急，就派人向陈馥请求救援。而陈馥当时兵力也不足，害怕抵挡不住秦军的强攻，不敢前往。



几个月后，张耳实在撑不住了，心里恨起陈馥来。随后张耳派张廩、陈泽到陈馥那里，对他说：“当初，我们结下了生死之交，现在我和赵王处境十分危险，您有几万兵力却看着不管，还说什么生死与共！我们的情谊哪里去了？秦军就那么厉害？您的性命就那么宝贵？”陈馥说：“我怎么能忘记咱们的情谊！我只是想，就算我出兵也救不了赵，反而还要失掉这几万兵。我不想和秦军同归于尽，是想以后为赵王和张君报仇。如果一定要我去和他们拼死，就像拿肉给饿虎一样，有什么好处？”张廩、陈泽说道：“现在情况危险，顾不得那么多了！”陈馥没办法，最后无可奈何地说：“我不是怕死，舍不得这条命，这么做实在是一点好处也没有啊！”陈馥没办法，最后只好出兵硬拼，结果全军覆没。后来，赵国在燕、齐、楚的帮助下才打败了秦军，俘虏了王离。

后来张耳见到了陈馥，埋怨他袖手旁观，又打听张廩和陈泽的下落。陈馥正在生气，说与秦军同归于尽了。张耳不信，以为是陈馥把他们杀了，不停地追问。陈馥说：“咱们一向如父子，可我没想到，您这么恨我！您是不是想当将军？”说着解下将印并把它塞给了张耳。张耳大吃一惊，不肯接受。在陈馥起身如厕之时，有人趁机对张耳说：“我听说要是不接受上天赐予的东西，会受到惩罚。陈将军把将印给了您，您要是不接受，就是违背天意啊！还是赶快收下吧！”张耳于是就戴上陈馥的将印。陈馥回来发现将印不见了，知道是张耳收下了，就说道：“您还真不客气啊！”然后就气呼呼地走了。陈馥走后，张耳收编了陈馥的军队，陈馥只好带着几百人到黄河边捕鱼打猎。

从此，张耳和陈馥就结下了仇。

五

汉王元年（前 206）二月，项羽分封诸侯。张耳向来好交友，很多人替他说好话，项羽也常常听人说张耳是个有贤德有才能的人，就从赵地分



出一部分土地，封张耳为常山王。而赵王被封到代地，成了代王。有人劝项羽：“陈馀和张耳同样对赵国有功，现在张耳当了王，陈馀也不能什么也不给啊！”项羽想了想，就封陈馀于南皮，领三县。陈馀知道后，心里很不满意，生气地说：“我的功劳一点也不比张耳小，凭什么封他为王，而我只封个侯？项羽也太小看人了！”不久，齐王田荣反叛项羽，陈馀就派夏说到田荣那里，对他说：“项羽一统天下，太不公平了，他把自己的人都安排了好位置，剩下不好的位置全给了别人，请大王借我一些兵力，我愿意拿南皮担保。”田荣也想在赵地发展一股势力来反抗项羽，就答应了这个请求。

陈馀发动三县的兵力，攻打常山王张耳，张耳战败。他想到诸侯王之中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便说道：“汉王刘邦是我的老朋友，但现在项羽势力最大，还让我当王，我想去楚国。”甘公说：“汉王刘邦进入秦地的时候，天上有五颗星星在闪耀，显示他必定成就霸业。虽然现在楚国很强盛，但最后一定归属于汉。”张耳于是投奔汉王。

陈馀打败了张耳以后，收复了全部赵地。又把赵王从代地接回来，让他仍然当赵国的国王。赵王很感激陈馀，让他做了代王。

汉王二年（前 205），汉王进攻楚国，派使者告诉赵国并且希望赵国也一起攻打楚国。陈馀说：“汉王如果能把张耳杀了，我们就随同汉军攻打楚国。”汉王于是偷偷找来一个和张耳长得很像的人，把他杀掉并提着头去见陈馀。陈馀见后立即发兵，跟汉军一同出征。不久之后，陈馀发现张耳没死，就又背叛了汉王。

汉王三年（前 204），汉王派张耳与韩信出兵攻赵国，陈馀没能固守井陉天险，低估了韩信的主力，轻易出兵与汉军决战。不料韩信部队背水死战，井陉大营又遭汉军袭击，回军无依。结果汉军攻破了赵国，杀掉了赵王和陈馀。

（李士利）



寓居南皮话吴质

汉末著名文学家吴质曾寓居南皮，他以文才受知于曹丕（《三国志·魏志·吴质传》：“以文采为文帝所善”），与建安诸子驰名当世。

吴质用谋略把曹丕推上世子之位，不仅成为曹丕的心腹亲信，而且在文学上的交流也非常融洽。这从曹丕写给吴质的《与吴质书》《与朝歌令吴质书》和吴质写给曹丕的《在元城与魏太子书》中可以见到端倪。

当年，曹丕带领建安文学的中坚与吴质在南皮赏游，并创作大量著名诗文，促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

他们在南皮的文学活动，既留下了“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曹丕）的深切怀念，也有着“昔会渤海时，南皮戏清沚”（阮瑀）的感旧思绪；同时，造就了“浮瓜沉李”“赋诗燕友”的成语及故事，成就了“南皮高韵”这一千古文坛佳话。

出身寒门投身曹营

吴质（177—230），字季重，东汉兖州济阴郡（今山东菏泽定陶区西北）人，汉末三国魏文学家，曾寄居南皮。官至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

曹操在担任兖州牧时期，招贤纳士，广揽人才。吴质前往应聘，从那时起即投身于曹氏。吴质开始事的地位并不高，这可能与他的出身有一定的关系。根据裴松之在《魏略》的注引可以得知，吴质出身“单家”，即“微贱之家”。为了出人头地，感到低人一等的吴质“少游邀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沈浮”。也就是只喜欢和那些有钱的人来往，而忽略自己老家的亲戚；而有钱人原本就看不起他，穷亲戚肯定又在到处说他



的坏话。此时的吴质，空有一身才气和智谋却无处施展。

但是，机会总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时常诗酒唱和，书信来往。遗憾的是伴随着公元217年陈琳、刘桢、应玚、徐幹先后歿于瘟疫，“建安七子”大都离“三曹”远去了。此时，文采出众的吴质便成了曹丕、曹植都想拉入其阵营的人物。其间，曹植写了一封《与吴季重（吴质字季重）书》，希望吴质能够和他站在一起。然而，深谋远虑的吴质却选择了曹丕。原因有二：一是深知就政治能力而言，曹丕远在曹植之上；二是作为文友，吴质与曹丕相处融洽。这从曹丕写给吴质的两封书信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与吴质书》中记：“虽书疏往返，未解其劳结。”（意思为，虽然书信来往，但不足以解除郁结在心头的深切怀念之情。）“追思昔游，犹在心目；因此诸子，化为粪土，可复道哉？”（意思为，追想过去交往相好的日子，还历历在目；而这些好友们，都逝去化为了粪土，怎么忍心再说呢？）在《与朝歌令吴质书》中，既道出了“途路虽局，官守有限；愿言之怀，良不可任”的思念情怀，也回忆了在南皮时“同乘共载，以游后园”的美好时光。两封书信都写得情深意切，这也看出二人的情谊是笃深的。

所以，吴质就给曹植就回了一封《答东阿王书》，婉言谢绝了曹植的邀请，正式跻身于曹丕谋士之列。

出谋划策助“丕”上位

在曹丕与曹植夺取继承人的争斗中，吴质自然成为曹丕的主要支持者和幕后策划者之一。

吴质在帮助曹丕赢得魏国世子之位上，谋划了两招妙计：一招是以“哭”感人计。用恸容的泪水，获得曹操的好感，让曹植的文采相形见绌、黯然失色，为曹丕上位打下了感情基础。在曹操出征汉中时，曹



丕和曹植都去送行。曹植当时颂扬曹操功德，说的感情丰沛、极有条理，曹操觉得十分受用；此时的曹丕因被曹植抢了风头而纠结、怅然。吴质则附在他耳边献策，让曹丕只管大哭就可。曹丕闻言，当即哭倒在曹操面前拜送。许多人都感到唏嘘，认为曹植虽言辞华丽但内心不及曹丕真挚诚恳。

另一招是瞒天过海计，骗过曹操、挫败杨修，终使曹丕坐上了世子之位。其实，吴质这一招曹操早年就用过。曹操年轻时整天和袁绍等人一起斗鸡走狗，他的叔父对此非常不满，就总是在大哥曹嵩（曹操之父）耳边吹风，数说侄子的不好。某天，曹操假装疯癫并故意让他叔看见，于是他叔就跑去给曹嵩报信儿；可曹嵩转眼见到儿子曹操时却发现他好好的，从那以后再也不信他叔的话了。吴质计挫杨修用得也是这一招，只不过曹操是自导自演，吴质属后发制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曹操似乎打算立曹植为世子，曹丕闻讯后惶恐不安，便让吴质藏在装绢的车中进府商量对策，不巧被曹植的心腹、主簿杨修看见了，杨修便到曹操那里告了曹丕一状；曹丕知道后害怕了，问吴质怎么办，吴质道：“这有什么？明天再把绢放在车中运进府来便是。”

第二天，曹丕依计而行。杨修窥见后又去向曹操告密并且请求派人去查。结果，看到的却是车上装载的满是绢布。这样，曹丕躲过了麻烦，而杨修却被曹操认为心怀叵测，为其日后被杀埋下了伏笔。

“南皮之游”文留后世

建安九年（204）底，曹操征讨袁谭，袁谭败逃至渤海郡治所南皮。建安十年（205），曹操发兵进攻南皮，曹丕也参加了此次南皮之战。可能是因为曹丕的关系，吴质也随着来到南皮。

“南皮”的意思就是“南面的皮革城”。这个名字起源于春秋时期，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山戎攻打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出兵援燕经



过现在的南皮境域。为了修整部队，便在当时的“南城”缮制皮革（古志《南皮县志》记述：“齐桓公缮皮革于‘南城’”），“南城”遂称“南皮”。需要说明的是，春秋时期这里有一对姊妹城，一个叫“南城”（即今“古皮城”）、一个叫“北城”（即今“马武岗”），两城相距约20里地。

袁谭之父袁绍曾任渤海郡太守，郡治就是南皮。所以，南皮当为袁氏的根据地。

建安十年（205）初，曹操攻克南皮，袁谭被杀。曹操下令在南皮进行修整。其间，曹操曾效仿齐桓公的壮举，创下了一日射雉六63头（只）的记录（一说36头）。

曹丕、吴质等人也驻进了南皮城。战事结束，这群年轻人就流露出了活泼浪漫、放荡不羁的天性。他们相聚在一起，在城西的“寒冰井”旁憩息、在城北的“射雉台”上饯友，十分惬意。并流传下了“浮瓜沉李”的成语和“饯友台”的典故。

建安十六年（211），曹丕率建安文人集团再次到南皮游猎、宴饮、唱和、赋诗，其中包括曹休、曹真、吴质及“建安七子”等。在其后的曹丕、吴质往来信件中，不止一次提到“南皮之游”。

其中一次，曹丕在给吴质的信中写道：每想起当年的南皮之游，实在难以忘怀。当时大家一会儿沉浸在经籍学问里，一会儿又玩玩弹棋游戏，下几盘围棋，弹奏一曲古筝；或者投身大自然怀抱到城北郊游，或者在城南饭馆里聚餐。甜瓜、李子浸在井水里随时取用，消渴解暑，这样的游乐夜以继日；最后大家共同乘坐车子畅游后园。夜风徐徐，胡笳低昂，怎不令人乐极而哀、怆然伤怀！曹丕还写道，此情此景让人激动，并在车上回头对这些年轻的伙伴们说：“斯乐难常！”（据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

曹丕在两次写给吴质的书信中都追忆了“南皮之游”。由于文章存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北朝时的梁朝文学家、史学家沈约对



建安文友游历南皮及所作诗文赞为“南皮高韵”。

“怙威肆行” 谥号蒙羞

吴质年长曹丕近 10 岁，而曹丕竟在 40 岁壮年之时撒手人寰。曹丕当政 7 年，这 7 年也是吴质恃才傲物、肆无忌惮的 7 年。据《吴质别传》记载：曹真、朱铄一内一外，皆位极人臣，吴质竟敢当席折辱抗衡，可见吴质在曹丕跟前的地位。

那是在建安十九年（224），吴质从任职的河北回到京城洛阳向皇帝曹丕述职，曹丕安排众将军到吴质府上为他接风洗尘。吴质自恃为曹丕心腹，且飞扬跋扈惯了，根本不把众武将放在眼里，他见皇帝这么给他长脸，心中的狂气愈发汹涌。当时在场的魏国军界举足轻重的曹真是个大胖子，掌管禁军的朱铄则是一个竹竿似的瘦子，他们两人不幸成了吴质搞恶作剧的对象。

正当众将觥筹交错、举杯畅饮之际，两个说书艺人在吴质的安排下走上了舞台，作揖施礼后就开始一唱一和，声情并茂中，有意识地把众人的目光往曹真、朱铄身上引，使得武将们一个个笑得挥手顿足、前仰后合。

身为魏国宗室的曹真回过味来后感觉深受其辱，站起身来怒视吴质，质问对方此举何意；吴质居然毫不示弱，手按宝剑怒斥曹真无事生非。朱铄见状便上前想打个圆场，目中无人的吴质丝毫不给他面子，让他哪凉快哪待着去。朱铄见吴质如此狂妄，恼怒异常，就气冲冲地拔出宝剑插在地上。结果，一场欢迎酒会弄得剑拔弩张、不欢而散。

吴质就是这样的一个狂人，除了地位、才华远胜于他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他好像谁都不放在眼里，以至于人际关系搞得都十分紧张。

如果，吴质死在曹丕前面，那也算得功德圆满、名利双收了；不幸



的是曹丕先他而去。待吴质于太和四年（230）去世时，那些非常讨厌他的文武群臣和对他“不感冒”的皇帝曹叡便以“怙威肆行”给拟定了一个充满嘲讽的谥号——“丑侯”。

面对如此恶谥，吴质的儿子吴应一再上书申辩，为父亲叫冤，魏明帝曹叡则不理不睬。直到嘉平六年（254），也就是吴质去世24年后，朝廷才更改谥号，由“丑侯”改为“威侯”。

吴质以魏文帝为太子时的幕僚而获重用，但时人对其评价似乎不高，有为人骄矜、无礼之非议，死后更封为“丑侯”。当然，魏晋时期士族对政治的垄断，也可能是吴质遭到不满其寒门出身的士族的渲染的结果。

（戈延华）



唐代进士萧颖士寓居南皮咏美景

萧颖士，字茂挺。4岁能属文，10岁补太学。观书一览即诵，通百家谱系、书籀（大篆）学。唐开元中进士，天宝初年补秘书正字，社会资达裴耀卿等皆推崇萧有大器之才，于是萧颖士名播天下。尹征、王衡等人亦拜萧为师，当时尊称萧为“萧夫子”。萧颖士亡故后，门人们上尊号“文元先生”。

萧颖士曾寓居、游览南皮，其所写《清明日南皮泛舟序》存世。泛舟序全文200多字（文载《唐史》），词语华丽、文句优美。

全文如下：

昔建安中，魏文为王太子，与朋友诸彦有南皮之游。颺鸣葭、浮甘瓜，清泉齑（水回旋貌）沦，千古一色，此城隅托胜之旧也。由小而方大，则贵贱之欢可齐；以今而喻古，则风流之事不易。矧（况且的意思）乃日清明，时升平，眈庶阜海滨之利，讴吟动齐右之曲，亦明一方之乐也。邑宰东海徐君洎英，僚二三，皆人杰秀出吏，能高视郊驿，继当时之欢。濠梁重庄叟之兴，相与矫翠帘腾清波。红装屡舞，绿醕徐进。管丝迎风以响亮，士女环岸而攒杂。可以娱圣泽、表人和也。层城景移，碧潭阴起，荡暄妍之气象，纵鱼鸟之游泳。其思夫阙塞崇崒、昆池清冷、关河千里，帝京不见斯兴情之极致也。爰命墨客纪他乡之胜事云尔。

文章描写了当时泛舟与往日曹丕等南皮之游的胜景，称赞两次游览均为文化盛宴，推崇南皮景致的优美。尤其对濠（护城河）、梁（桥梁）、层城（城楼）等景物都进行了拟人化描写、形象生动，以文字形式将南皮景物定格在史册中。当时泛舟达到兴情之极致、泛舟序文字文采达到



历史名人与南皮 ◎ 文化丛书 ◎

极致、南皮自然生态也达到环保水平之极致。泛舟、畅饮，载歌载舞、物阜民丰，一派祥和景象。萧颖士所写题为《清明日南皮泛舟序》，既然为序，当时肯定会有其他泛舟文章。今天，虽然难觅这些文章的“庐山真面目”，但南皮历史上的文化盛事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杜中洲）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赋诗咏南皮

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曾赏游南皮并以《重经车辋谷》为题赋诗一首：

昔车道经车辋谷，直上七里监南皮。
 今年行役复到此，方春流汗如翻波。
 中涂太息坐盘石，涕泗不觉双滂沱。
 我生微尚在丘壑，强若麋鹿婴虞罗。
 人逾三十只有老，后时过此知如何。
 云泉佳处须速去，登上筋力行蹉跎。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以文著名，亦能诗词。著有《资治通鉴》《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涑水记闻》。

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15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名列“元祐党人”，配享宋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从祀历代帝王庙。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故事称赞他聪明睿智。司马光的博学来自多方面，一方面他好学强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司马池也着意



历史名人与南皮 ◎ 文化丛书 ◎

培养。他既诚实聪明，又十分懂事，深得父亲喜爱。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各地为官，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所以，司马光在15岁以前就跟随父亲走过好多地方，在这些地方访古探奇，赋诗题壁，领略风土人情，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社会知识。

同时，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谈，司马池总好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还是见识方面，都“凛然如成人”。好多当时的大臣、名士，都很赏识司马光。

从司马光《重经车辋谷》的诗作中可以看出，因为是“重经”，所以他不是第一次赏游或经过南皮；而“车辋谷”也可能是一个比较出名的地方。问题是，南皮古籍县志并无“车辋谷”的记载。

笔者揣测，“车辋谷”当在南皮（古皮）城北。因为史料记载，南皮境域内曾存在“大台山”“小台山”，皆为高岭。清康熙《南皮县志》记述：“大台山在（古皮）城北。隐隐隆隆，起伏断续，为一方胜概。”或许，这高岭之间回环的低洼通道，就有一处叫作“车辋谷”的地方。

（赵树森）



元代河北道廉访司萨都刺游南皮古黄河堤留诗篇

据史料记载，自周定王五年（前 602）至北宋绍圣元年（1094），黄河先后流经南皮县域 603 年。清康熙《南皮县志》记述，故黄河在南皮县城东南 50 里，境内回环 30 余里。后来，由于黄河改道，这里便留下了逶迤蜿蜒的古堤。元泰定四年（1327）丁卯科进士，官至河北道肃政廉访司经历的诗人萨都刺（字天赐），就曾在南皮吊古咏怀，留下了《过古黄河》的诗篇：

迢迢古黄河，隐隐若城势。
古来黄河流，而今作耕地。
都道变通津，沧海化为尘。
堤长燕麦秀，不见筑堤人。

在寨子镇黑龙村西南有一道高 3 米、宽 30 米、长约 3 公里的土筑岗台。其后，又在此台东北方向的堤口张、董村、小丈桥、小薛等村，相继发现了多处类似的土岗。经文化部门考证，这应为修筑于春秋时期的堤坝遗址—齐堤。

齐堤又称长城堤、齐长城。由于是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所筑，故史称“齐堤”（今称堤崖）。据史料记载，元、明时期，当地人在齐堤上种植了排排杨柳，每到阳春时节，枝条摇曳、临风绰约，柳絮杨花、景足怡情，使“齐堤杨柳”成为邑中八景。

齐堤在南皮境内呈西南—东北走向，逶迤延绵，贯穿全境，已有 2600 多年的历史。齐堤遗址的发现对研究黄河古道齐堤文化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南皮地连齐鲁，又近燕赵，春秋时隶属齐国。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公元前664年，齐桓公救燕而北伐山戎，获胜后南归返齐，燕庄公在相送离别之处筑“燕留城”以纪齐桓公的功德。“燕留城”址在长芦（今沧州市西）之北，所以，南皮境域在春秋时当属齐国。

齐桓公北伐山戎时，曾在南皮城故址南城（今古皮城）缮修皮革，所以此城后称“南皮”，沿用至今。这是沧州境内载入史籍最早的城邑。

春秋时期，齐国的北部（含南皮境域）曾河道密布，水患频仍。相传，齐桓公为填塞八（九）河之流，扩大耕地（一说为拓展疆界，一说是为抵御外敌入侵），用夯土修筑了一道延绵几百里的长堤。据民国《南皮县志》《沧县志》记载，长堤呈西南—东北走向，由今东光砥桥村经南皮的黑龙村、堤口张、董村、小丈桥、小薛、芦庄子、龙堂村，过盐山的璋璧、孟村的罗疃等村，再入盐山、海兴、黄骅直抵海滨。长堤宛如一条巨龙，百回婉转，巍然壮观。长堤每隔几十里便设一个堤口，以利路人通行，当洪水来袭时，又可迅速将堤口堵塞。在各个堤口旁都设有烽火台，派兵驻守，遇到敌情时，烽火台上夜间点火，白天放烟。南皮县的“堤口张”即是因此而立村。

在旷古久远的春秋战国时期，南皮境域内荒野苍茫、人烟稀少。齐堤在此设有堤口，堤上灌木茂密，堤下野草丛生。后来，有几户张姓人家迁此垦荒为生、占产立庄。因村庄散落于古堤口两侧，过往行人称此地为“堤口张家”，后取村名为“堤口张”，这个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齐堤”在南皮古县志中称为“长堤”“古黄河堤”，当地村民称之为“大堤崖”“防水堤”。此堤的修筑，当与黄河北徙有关。

历史上，黄河常常决堤、泛滥成灾。相传，大禹于公元前21世纪治水成功后，黄河在孟津以下，改向东北流，汇合漳水流入邢台北的大陆泽，再往下到达河北平原后，黄河分为九支，即《禹贡》中记载的“又北播为九河”。



南皮地处“九河”下梢，黄河先后三次流经县域长达600多年。这里曾经水草丰美、群鸟栖息，流传下来的古诗文中即有“禾稠小燕掠流泉”的记述。商周时期，姜太公在域内的高台之上悠然垂钓，后人称此地为“钓鱼台”。齐桓公北伐山戎时，也在此地引弓射猎，后将其射猎之处称为“射雉台”。

东汉时期，曹丕与“建安七子”等泛舟南皮，在射雉台赏游玩乐、赋诗唱和，后世又将“射雉台”改称“讌友台”。此后，由于沧海桑田的变迁，黄河改道，就留下了那道长长的大堤。

按清康熙《南皮县志》记载，古黄河在今南皮县城东南50里，外岸高丈余，境内回环30余里。志书所指的方位，即是而今发现齐堤遗址的地方，也应该就是黄河故堤。因为，“齐堤”在南皮古县志中称“长堤”。清康熙《南皮县志》还明确记述：东南长堤，高峻曲长。而修筑齐堤的作用（起码是作用之一）就是防止黄河之水泛滥。由此可见，黄河堤即便不是齐堤的全部，也应有部分的重合。

黄河淤废后，经多年的风雨剥蚀冲刷，加之人为的开垦、耕作，逐渐成为平地。也正因如此，南皮志载古诗中就有了“此日离离黍覆堤，几番沧海易桑畦”的记述。而今，在这一带仍有部分突兀的高地，因是黄河挟带大量泥沙冲积而成，当地人称之为“沙土包”“金沙岭”。

元泰定四年（1327）进士，曾任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经历使的诗人萨都刺（字天锡）曾在南皮黄河古堤徜徉，尝作《过古黄河堤》的诗：“迢迢古黄河，隐隐若城势。古来黄河流，而今作耕地。都道变通津，沧海化为尘。堤长雁麦秀，不见筑堤人。”而明正德六年（1511）进士、四川提学副使卢雍在赏游古黄河堤后，也触景生情，发出了“苍茫沙草接天低，不见黄河见古堤。九曲西来经此界，一从南徙遂成蹊”的感慨。

（赵树森）



清礼部尚书纪晓岚在南皮拜师求学

清礼部尚书纪晓岚早年曾在南皮拜许鹓为师求学。此事在南皮古县志明明确记载：“出其（许鹓）门者多通儒，河间纪文达公、同邑张兼山都转其最著者也。”

在南皮县城南、许庄村西，有一座清乾隆年间的古墓，至今保护完好，墓碑字迹清晰可辨。

此墓为清雍正元年（1723）癸卯科举人许鹓墓葬。让许氏族人引以为豪的，不仅是这位先贤“生平学养兼优，无愧笃行君子。家居教授，慨然以名教化为己任”（民国版《南皮县志》），也不单因为他的墓碑分别由三位进士、朝廷命官撰文、书丹、篆额，人们看重的，还因为在为许鹓立碑的一众生徒中，赫然有纪晓岚的名字。在许鹓墓碑碑文后，刻有50位为之立碑弟子的名录，纪晓岚以入学先后顺序，排在了第44位。

许鹓，字南金，号比庵，一生命运多舛。他在3岁时失父、8岁丧母，幸得叔父抚养，为之延师课读。自此，许鹓便“克己振拔，发奋攻读”（光绪版《南皮县志》）；“潜心笃志，学行日进……前后学使者，无不推为的首选”（许鹓墓碑文）。然而，许鹓在雍正元年（1723）癸卯科中举以后，又接连三次考试都不及第，自此就转而以教授生徒为己任。

清光绪朝《南皮县志》记载：许鹓在连试礼部不第后，“专务理宗家居，教授生徒，不治生产，慨然以振名教、维风化为念。性情和平，蔼然长者。与人解说，必反复譬喻，恒娓娓终日忘倦”。对此，许鹓墓碑碑文记述的更为具体：“先生德性宽厚，充养和粹，平易近人，终日怡悦。学者侍侧，如坐春风。及其发明理政，通透简要，令人寻味不尽，高下



皆有所得。又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是以及门之士多所造就。”南皮古县志明记载“出其门者多通儒，河间纪文达公、同邑张兼山都转其最著者也。”

志书记载的在许鹪这两个知名的生徒中，“同邑张兼山”即南皮的张受长。张受长字英军，号兼山，清雍正丁未（1727）科联捷进士，曾任林县知事、陈州知府，后任河北道、江西驿盐道、督粮道。许鹪墓碑碑文即为张受长所撰。“河间纪文达公”即河间（今为沧县崔尔庄）的纪昀。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号观奕道人。卒后谥“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纪昀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考中进士，为官50余载，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先后任贵州都匀知府、内阁学士、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乾隆三十七年（1772）受命担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次年开馆纂修，经10年编纂书成。《四库全书》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为保存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总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纪昀还历时8载撰写了200卷的《四库全书总目》，并在此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被后世称之为“一部非常伟大的学术著作。”

纪昀不仅在清代被公认为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宗师，在世界文学史上也不愧为文坛巨匠。

纪昀一生著述颇丰，其中的文言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在当时享有与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的盛誉。书中内容多是鬼怪神异的故事，然而却在诙谐与幽默中给人以警示与启迪。

在《阅微草堂笔记》所描写的约1200个故事中，有关南皮的占13则，其中两则是关于许鹪的故事。纪昀在两则故事的描写中，对授业恩师许鹪的尊重推崇之情溢于字里行间，表达了对老师苦学通儒，正派公道，慎独操守，不信邪魔的赞许。如，在《如是我闻》（一）中，描写



许鹗过阜城漫河，在一树下打盹，梦见黄保宁妻汤氏自述 40 年前，途遇三个健盗，力不敌，啮噬受玷，以死捍拒，被数刃而死。盗伏法，汤氏不得旌表，求许鹗为申冤。行文中表达了作者的妇女观。嘉庆二年（1797），纪昀复为礼部尚书，上疏请求：妇女遇暴，虽受污，仍给予旌表。暗喻许鹗明理正派，扶持弱者，勇为冤者申诉的正直品格。在《滦阳消夏录》（六）中，描绘了许鹗不怕鬼的故事，无论思想性、艺术性都是一篇上乘佳作。文章短短 200 多字，集中折射出许鹗“检点生平，不惧鬼魅”的道德情操。用句俗语说就是，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原文上半段描写许鹗“在僧寺读书，与一友共榻，夜半，见北壁燃双炬，谛视，乃一人面出壁中，大如箕，双炬其目光也。友股栗欲死，先生披衣徐起曰：‘正欲读书，苦烛尽，君来甚善。’乃携一册背之坐，诵声琅琅，未数页，目光渐隐，拊壁呼之，不出矣”。精彩妙文歌颂了不怕鬼，歌颂了勤读书，更歌颂了老师许鹗先生。

华夏文明推崇的是“名师出高徒”。有了纪昀（文达）、张受长（兼山）这样的高足，许鹗受到后人的敬仰以及墓碑得到很好的保护也就顺理成章了。

实际上，在民风淳朴的乡里，许鹗“处家庭友爱慈惠，出于至诚”；“宾朋酬酢恂恂退让”，所以，“虽妇孺贩竖，莫不敬爱之”（据《南皮县志》）。或许，这也是许鹗受到后世仰慕的一个重要原因。

（赵树森）



附一：

纪晓岚的恩师——许鹼

一代宗师、文坛泰斗纪晓岚，因清乾隆时期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而闻名天下，可谓风光无限。虽有获罪发配新疆三年瑕疵，但瑕不掩瑜，仍然在中华文学界、史学界折射出灿烂的光芒。2009年，乌鲁木齐市还修建了面积达4000平方米的“纪晓岚纪念园”——岚园。纪念园的碑廊镌刻、展示了纪晓岚在乌鲁木齐流放期间所作的110首杂诗。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古今社会对纪晓岚的充分肯定。

纪晓岚的成功之道，首先有他先天高智商原因。但是，后天的学习、修炼也必不可少。其中，导师的启蒙、引导、开发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纪晓岚的一生中，自师从及孺爱开始，无一日离笔砚。其中拜师求学阶段一直到24岁考中解元为止。从《阅微草堂笔记》篇章揭示，并核对东光、南皮、交河、献县诸县志记载，其授业师有7个（按先后顺序）：及孺爱、刘理、纪容舒、李又聃、霍易书、许鹼、董邦达。

许鹼是南皮县许庄村人，纪晓岚的授业师之一。

民国《南皮县志》卷九《文献志三·儒林六》载：“许鹼，字南金，号比庵，雍正癸卯举人。生平学养兼优，无愧笃行君子。家居教授，慨然以名教风化为己任。出其门者多通儒，献县纪文达公、同邑张兼山都转其最著者也。”

许鹼故里南皮县许庄村，其墓、碑至今保存完好。碑文系乾隆八年（1743）进士张受长（许鹼门生，号兼山）撰文、进士张乃史书，东光进士马兆鳌篆额。摘录碑文如下：

先生讳鹼，字南金，号比庵，宗派源于苏州乌雀桥，渡江来此。为南皮望族。父行先，邑增生，有淳德，为乡里所推重。生二子，长兴周



公出嗣叔父；先生其次也。三岁失父，八岁失母。哭泣至性，发于弱龄；风木悲痛，矢诸移身。从叔父凌云公怜其幼孤，招之家为延师课读。先生即锐志向学，攻苦自立。……三试春闱不第，遂不复上公车。……不治生产，唯以教授生徒兴起斯文为己任。先生德性宽厚、充养和粹，平易近人、终日怡悦。学者侍侧，如坐春风。及其发明理致，通透简要，令人寻味不尽，高下皆有所得；又群饮于河，各充其量，是以及门之士多所造就。

由此看出，许鹪是苦命儿出身，3岁丧父、8岁丧母。靠叔父抚养，自强不息成才。无奈中举之后，三次会试，未能及第。于是不再参加会试。以办书馆、潜心教授门徒为业。从碑文看，门生中至少有进士四人：张受长（兼山）、张乃史、马兆鳌、纪晓岚（文达）。

至于纪晓岚何年从师于许鹪，解析如下：

许鹪先生康熙十九年（1680）生，雍正元年（1723）乡试中举。而后春闱三试不第。按明清的科举制度，乡试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秋季举行。八月九日至十五日考三场，每场三天。考试的场所称为贡院，考试被录取者为举人。

会试于次年春天在京城举行，也称“春闱”。举人有资格参加。从农历二月九日开始，考三场，每场三天。许鹪于雍正元年（1723）考中举人，次年二月参加京城会试落榜；过了三年，第二次会试，又未得中；又过了三年，第三次再考，还是没能如愿。这时他已经50岁了，失去了再考的信心，决心办学校教授门徒。许鹪教书13载，至乾隆七年（1742）去世，教书生涯戛然而止。纪晓岚到南皮读书，师从许鹪，介绍人不须外人：纪晓岚继祖母、生母都是南皮张家闺秀。并且，纪晓岚的母亲还是继祖母的亲侄女，祖籍南皮双庙村（纪晓岚70多岁时为南皮张振斯所撰墓志铭中说“张氏纪氏为世姻”可为证，见民国《南皮县志》第501页）距许庄1里许。笔者推算，纪晓岚在此读书时应为18—19岁。依据是：纪晓岚16岁到东光读书、



17岁娶妻回崔尔庄，不久去京；当年又从北京回老家应童子试；20岁、21岁再回东光读书。这都有史可查。而纪晓岚19岁时，恩师许南金突然去世。用反证法测算，纪晓岚从师许鹑读书，只会在18—19岁。并且，纪晓岚在许庄读书，不必住校。夫妻住在双庙村亲戚家也很方便。

另外，从许鹑墓碑上的门生排名亦可看出端倪。7月23日，笔者曾去南皮许庄考察许鹑墓。在墓碑上留名的50位门生，纪晓岚排在倒数第七名。如果其10岁以前来南皮读书，纪晓岚绝不能排名倒数第七。

许鹑虽不做官，但很有气节，脾气也倔。南皮遗事载：有一次，先生在南皮城街上行走，巧遇县令乘轿路过，许鹑躲避不及，受到衙役呵斥；先生争辩，县令擅权将许鹑囚禁在牢。既不审讯，又不放人。过了几天，狱卒对他说：“你写个悔过书吧，我帮忙求情把你放出去。”许鹑不写，并和狱卒说：“你告诉县太爷，给张道捎个信，就说我许鹑死在南皮牢里了，叫他来给我收尸。”这张道是谁？就是他的门生、后为许鹑撰写碑文的张受长（兼山），此时分授河南彰、卫、怀三府，兼管河北司副使兵备道。南皮人简称“张道”。狱卒告诉了县令，县令大惊。赶紧跑到牢里，给先生作揖拱手，赔礼道歉，派轿将先生送回家中，此事才算作罢。

（刘连清）



附二：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南皮情结

《阅微草堂笔记》(以下简称《阅微》)是沧州市一代文宗纪昀晚年所写的一部文言小说。虽作者自称是“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的无聊之作，但当时却享有与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的盛誉。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肯定了《阅微》叙述“雍容淡雅，天趣盎然”“隽思妙语，时足解颐”的长处。据有人统计，《阅微》共描写了约1200例故事，其中涉及今沧州市范围内就有420多则，表现了他的故土情谊。沧州市故事中南皮占有13件，集中体现了作者尊师、敬贤的南皮情结。

尊师情结

《阅微》在《滦阳消夏录(六)》中有一篇南皮许鹵不怕鬼的故事，无论思想性、艺术性都是一篇上乘佳作。文章虽然短短200多字，集中折射出许鹵“检点生平，不惧鬼魅”的道德情操。原文描叙许鹵先生“在僧寺读书，与一友共榻，夜半，见北壁燃双炬，谛视，乃一人面出壁中，大如箕，双炬其目光也。友股栗欲死，先生披衣徐起曰：‘正欲读书，苦烛尽，君来甚善。’乃携一册背之坐，诵声琅琅，未数页，目光渐隐，附壁呼之，不出矣。又一夕如厕，一小童持烛随，此面突自地涌出，对立而笑，童掷烛仆地，先生即拾置怪顶，曰：‘烛正无台，君来又甚善。’怪仰视不动，先生曰：‘君何处不可往，乃在此间，海上有逐臭之夫，君其是乎？不可辜君来意。’即以秽纸拭其口，怪大呕吐，狂吼数声，灭烛而没，自是不复见”。这则故事在20世纪60年代被收入中科院编辑的《不怕鬼的故事》之中。《阅微》在《如是我闻(一)》中，还记载了许鹵先生的另一则故事。故事大意是：许鹵过阜城漫河时，在一树下打盹，梦见杨宝宁妻汤氏叙述40年前，途遇三健男，因力不敌，啗噬受玷，以死捍拒，被数刃而死，后盗伏法被诛，汤氏却不得旌表，求许鹵先生代为申冤。许鹵在梦中想问其里居，霍然醒来，后各处询问，如大海捞针，无知其事者，故无法彰汤氏烈妇形象。这



则故事体现作者一贯的主张。嘉庆二年（1797），纪昀复为礼部尚书时，曾上疏请求妇女遇强暴虽受污仍量予旌表。同时，也暗喻许鹵的明理正派，扶持弱者，敢为冤者申诉的正直品格，不仅世人公认，更以鬼魂求助彰显之。

许鹵名鹵，字南金，号比庵，南皮县许庄村人，纪晓岚授业师之一。他3岁丧父，8岁丧母，在家矢志苦读。1岁拜师顺天提督学政福建安溪李光地，被补为博士弟子。雍正元年（1723）中恩科举人。后三试春闱考进士不第，遂不复再考，居家教授，治学严谨。许鹵墓碑碑文记载：“先生德性宽厚，平易近人，学者待侧，如坐春风。及其发明理致，通透简要，令人寻味不尽，高下皆有所得，又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是以及门之士多所造就。”许鹵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在附近州县影响很大，向其求学者很多。许鹵先生墓志碑文最后附有50位弟子名单，纪昀依入学先后顺序排在了第44位。光绪十四年（1888）修的《南皮县志》，“在许鹵传”里就特别写有“出其门者多通儒，河间纪文达公……其最著者也”的话。纪昀在许鹵那里如何学习，师生间有哪些具体交往，今天难以考证清楚，但通过《阅微》中关于许鹵两则故事的描写，不难看出纪昀对老师许鹵苦学通儒、正派公道、慎独操守、不信邪秽的赞许。纪昀对老师许鹵尊重推崇之情溢于字里行间，跃然纸上。

敬贤情结

《阅微·如是我闻（三）》写了清太史刘果实的一则故事，评价刘果实襟怀夷旷，有晋人之风。原文说刘果实“晚岁家居，以授徒自给，然必孤贫之士，乃容执贽，脩脯皆无几，箪瓢屡空，晏如也。尝买米斗余，贮罍中，食月余不尽，意甚怪之，忽闻檐际语曰：‘仆是天狐，慕公雅操，日日私益之耳，勿讶也。’”刘果实反问天狐：“君意诚善，然君必不能耕，此粟何来，吾不能饮盗泉也，后勿复尔。”狐叹息而去。什么是天狐？纪昀在《槐西杂志（二）》借狐之口解释说“天狐也，变化神通，不可思议，鬼出电入，不可端倪，其祟人，人不及防，或祟狐，狐亦弗能睹也。”纪昀通过祟人祟狐的天狐悄悄为刘果实运米的反常举动，说明邪不压正，邪也慕正，达



到对刘果实品行操守肯定、赞誉的目的。

刘果实，字师退，南皮县集北头村人，道德文章誉震海内，尤工诗词，善书法。刘果实9岁丧母，哀如成人，13岁入庠，17岁（1676）中十四名举人，主考韩炎叹为旷代逸才，21岁（1680）中十八名进士，选庶吉士，父亡丁忧，三年后授编修。刘果实品行令人称道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男女平等思想。刘果实35岁时妻子亡故，不再另娶，对人言“夫死改适为丧节，妻亡再娶独非失义耶？”独自一人抚育一子二女。二是安贫守道。其父病重时嘱咐刘果实：“吾不忧汝以贫易操，惟忧汝以直贾祸。”果然，刘果实授编修的第二年，便因所谓疏狂迂傲为时所嫌被谪去，避居集北头村，乡居40年，僻巷敝庐，粗衣疏食。安溪李光地任直隶巡抚时，景仰他，使人持币聘请他说：“首善千里，德行文学，无愧先贤者，惟先生一人而已。”使者再邀方至，讲学累日，光地出书一函投诸火，果实惊问其故，李回答，此是平时所著，听公论甚高，愧肤末不足存，应当重写。李光地想聘荐刘果实为文衡，果实力辞，赠馈甚厚，刘果实婉拒说：“清俸余资，当用以穷黎，余固无需此长物也。”以后刘果实的日子越来越窘迫，学问且越来越广博，声望越来越隆大。同榜名士赵执信过其家，出沧酒共饮，作诗“翛然野鹤姿，不著世尘垢”，赞赏刘果实的心迹操守。刘果实则在《小饮看菊偶感》诗中，发出了“陋巷萧条不厌贫”，但“粗枥留宾愧主人”的感叹。三是学识渊博。《天津府志》记载，刘果实读书十行俱下，一过成诵，所著《檀弓》《公穀解义》《南华诸评选》为当时名士推崇，被誉为“瀛海人才真第一，燕台国士更无双”。

《阅微·姑妄听之（二）》云：“南皮郝子明言：有士人读书僧寺，偶便旋于空院，忽有飞瓦击其背。俄闻屋中语曰：‘汝辈能见人，人则不能见汝辈。不自引避，反嗔人耶？’方骇愕问，屋内又语曰：‘小婢无礼，当即答之，先生勿介意。然空屋多我辈所居，先生凡遇此等处，宜面墙便旋，勿对门窗，则两无触忤矣。’此狐可谓能克己。余尝谓僮仆吏役与人争角而不胜，



其长恒引以为辱，世态类然。夫天下至可耻者，莫过于悖理。不问理之曲直，而务求我所隶属人不能犯以为荣，果足为荣也耶？昔有属官私其胥魁，百计袒护。余戏语之曰：吾侪身后，当各有碑志一篇，使盖棺论定，撰文者奋笔书曰：‘公秉正不阿，于所属吏役，犯法者一无假借。’人必以为荣，谅君亦以为荣也。又或奋笔书曰：‘公平生喜庇吏役，虽受赇馊法，亦一一曲为讳匿。’人必以为辱，谅君亦以为辱也。何此时以为辱？先师董文恪曰：‘凡事不可载入行状，即断断不可为。’斯言谅矣。”纪晓岚借用郝子明讲述的狐精主动避人的故事，说明顺理则荣、悖理则耻的荣辱观，赞许、宣扬凡事不可载入行状，即断断不可为的慎独思想。告诫为官者不要庇护悖理的手下人员。

郝子明，名湛，号眉峰，南皮县郝庄村人。郝子明是个艺术全才，诗、词、书、画俱佳。乾隆十二年（1747），郝与纪昀、朱珪、翁方纲同门中举，纪昀是这一科顺天乡试的解元。7年后纪中进士，踏入仕途。郝却淡泊仕进，甘居林泉。纪家推崇郝子明才华，聘郝为纪府私塾先生。教授纪昀自家兄弟子侄达20年之久。乾隆四十七年（1782），郝子明病逝，纪晓岚亲自撰写了墓志铭，福建学政朱珪书丹、司经局洗马翁方纲篆盖。纪在墓志铭中表达了自己对郝子明的赞誉深情。墓志埋葬地下百余年，1975年，郝庄青年单某收获山芋时刨出，垫做台阶石，墓志日渐漫漶，后虽经县文保所所长魏春阁协商收藏于县文保所，但有的文字已磨灭。值得庆幸的是，墓志铭出土不久，同村郝树果先生抄录了完整的铭文。

舐犊情结

《阅微·滦阳续录（一）》中，纪晓岚描写张浮槎之子早亡，其子妻缢以殉，缢处壁上有其子小像的传奇故事，目的是宣传至诚则金石为开的道理。同时，行文中还透露了两个信息：张浮槎，南皮人，名景运。张氏、纪氏为世姻，纪氏之女适张者数十人，张氏之女适纪者亦数十人。在《滦阳续录（六）》最后一则故事中，从评价张浮槎著“秋坪新语”人手，引出悼念



爱子纪汝佶一篇大文。《秋坪新语》记述了纪昀家两件事：纪昀认为第一件记先兄晴湖家东楼鬼事委曲未详，第二件记爱子纪汝佶临死事，十得六七。纪昀认为：“他人记吾家事，其异同吾知之，他人不能知也。然则吾记他人家事，据其所闻，辄为叙述，或虚或实或漏，他人得而知之，吾亦不得知也。”因张、纪是世姻，张浮槎在《秋坪新语》中记纪汝佶之事，受妇女递相述说出现纤毫增减的影响，有了出入。故纪昀用附文的形式介绍纪汝佶幼颇聪慧、能诗善文的相关情况，指出汝佶的遗诗遗文付孙树庭，其他杂记尚未成书。纪昀在爱子汝佶的杂记中简择6则，附录在《阅微》全书末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目的是“以不没其篝灯呵冻之劳，以此著述之词，存其名字也”，父爱如山。书末择录的纪汝佶的6则杂记，都是类似《聊斋志异》的怪异故事。纪昀虽认为其写法百事无成，但又对儿子的文笔非常赞许，通过附文形式，让爱子纪汝佶的文章同《阅微》一起流传于世，舐犊之情会令不少做父亲的汗颜。

其他故事

《阅微》中记述有关南皮的故事还有7例，内容大致如下。《如是我闻（一）》中两则：一则讲南皮张之畏居北京虎坊桥西宅，宅内一井的水在子午两时甘甜，其余时间则不然的怪事。申明从格物学中追寻答案。另外一则记述南皮令居公铉为县州幕20多年，精通官场之术，但居官后便呆若木鸡，一年多时间，便被以才力不及而罢官，罢官后梦蓬首垢面人长揖而别，就又精明如初的怪诞事，宣扬上世夙冤或所谓穷鬼作祟的迷信思想。在《如是我闻（三）》中，又通过南皮赵氏之子为狐所媚之事，对钟馗像能驱鬼镇邪提出了疑问。《滦阳消夏（一）》中，以南皮毒医某阴用毒药，勒索重资，不满所欲就致死人命，其子被雷击死的故事，寓意阴损害人是至恶，祸及子孙后代。《滦阳消夏（二）》则记述南皮张受长副使，在河南开归道为官时，根据“自刳死者，刀迹当入重而轻出，今入轻重出”的道理明断案件，因担心以后误判托病辞归。告诫人们治狱之可畏，处理案件必须慎之又慎，不能



半点马虎。《槐西杂志（四）》中，记述南皮某甲与狐精相昵，约不婚，而后娶妻遭狐祟的故事，劝导人们处事应善始善终。另一则为南皮小集宋蒙泉家偶谈狐事，聂松岩讲纪生与狐精押媒数夕渐为所惑，拒斥狐去的故事，告诫受蛊惑至死者，责在自己，贵在迷途知返。

（杜中洲）



任丘举人边向禧赏游南皮赋“南皮十六咏”

南皮是秦代置县存留至今的全国 56 个古县之一。悠久的历史聚集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县境内，文物、胜迹、遗址不胜枚举，这些美不胜收的人文景观，吸引着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因而就流传下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美丽诗篇。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任丘举人边向禧就曾在南皮赏游并作《南皮古迹十六咏》传世。

南皮古迹十六咏

大台山^①

太行分脉自西来，蜿蜒龙蟠大小台。
踏脊高歌振聋耳，恐惊雷雨划天开。

太史河^②

九河一一受包络，太史支分傍古皮。
沧海桑田任迁变，明明禹德总堪思。

清泉井^③

玉龙蟠处水澄泓，井甃居然不世情^④。
刘宠一钱亦蒙垢^⑤，高风无让隐之清。

钓鱼台^⑥

何事鹰扬困棘津^⑦，经纶大业隐丝缙^⑧。
我来不见占熊者，徙倚荒台赋古人。

古皮城^⑨

一城寂寂隐荒烟，形胜犹堪认古阡。
霸业即今成逝水，归来白鹤四千年。



射雉台^⑩

北伐山戎偶过此，不应大戒犯从禽。
此台合是曹瞞筑，六十三头传至今。

遇士亭^⑪

未论相遇作何语，遥向高风已感人。
不分马群空冀北，合应伯乐识麒麟。

五垒城^⑫

离离禾黍垒城荒，五子荣封自献王。
解识当年箕冶在^⑬，不应遗址首梳妆。

史云居^⑭

清风落落范莱芜^⑮，佩苇居然脱祸枢。
寂寞蜗庐甘绝粒，依稀粪舍隐蜘蛛。

曹公固^⑯

不道脊令犹急难^⑰，阅墙谭尚启兵端。
魏家自收渔人利，何必孙吴属老瞞。

讌友台^⑱

千秋遗恨然燃句^⑲，此地风流讌友台。
陈思不应为介弟^⑳，五官原自解怜才^㉑。

石崇宅^㉒

争奢王恺太淫荒^㉓，瓮牖前贤更可伤。
奴辈利财君不悔，未窥子贡及肩墙。

夜珠高^㉔

五十为诗老达夫，嘉州王李大名俱。
一拳遗址人争羨，且把风流访夜珠。



窦家岭^{②⑥}

别业年来已就荒，嘉名犹自挹余芳。
披图忽接十郎字，仿佛如闻五桂香^{②⑦}。

莲花池

一塘碧水接沧州，可许濂溪问旧游^{②⑧}。
翡翠双飞消息断，劫灰无数获芦秋。

大慈阁^{②⑨}

高阁凌空势欲欹^{③⑩}，危梯十丈费攀跻。
披尘细认慈悲字，诗板翩翩有旧题。

【注释】

①大台山：其东为小台山。志云：白太行分脉者（作者自注）。

②太史河：九河皆在境内，太史河近古城下，渠岸尤明（作者自注）。

③清泉井：水至清，投之以钱，澈底可见。近或讹清钱井（作者自注）。

④井瓮：井壁。

⑤刘宠一钱：东汉会稽太守刘宠将内迁为大臣，山阴县有五六位老人各赠百钱为他送行。刘宠难拂众意，只受每人一钱。后用为称誉廉吏的典实。

⑥钓鱼台：太公困棘津钓鱼台（作者自注）。

⑦鹰扬：像鹰展翅腾飞那样奋起。形容大展雄才。

⑧丝缙：钓鱼的绳。

⑨古皮城：齐桓公伐山戎，缮皮革于此（作者自注）。

⑩射雉台：志云“齐桓射雉处”，说无所据。予按《魏志》，太祖于南皮射雉，一日获63头，台或筑于此也（作者自注）。

⑪曹瞞：指曹操，小字阿瞞。

⑫遇士亭：暴胜之遇隽不疑于此（作者自注）。



⑬ 五垒城：献王五子封侯处。志云：梳妆楼遗址尚存（作者自注）。

⑭ 箕冶：《礼记·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指做事情必须循序渐进。

⑮ 史云居：志名“范丹居”，盖避党锢之祸，投栖于此（作者自注）。

⑯ 范莱芜：即范丹，一作范冉，字史云，东汉陈留人。曾师事马融，通五经。桓帝时为莱芜长，遭母忧，不就。罹党锢之祸，遁迹梁沛间，卖卜为生，清贫自守。时或粮绝，穷居自若。

⑰ 曹公固：曹操攻袁谭，依此为固（作者自注）。

⑱ 脊令：即鹊鸛，水鸟名。《诗经·小雅·棠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喻兄弟友爱，急难相顾。

⑲ 燕友台：魏文帝为五官中郎将，时与吴质诸人燕游之地（作者自注）。

⑳ 燃萁句：相传曹植七步成诗，诗中有“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语，后因取燃萁字，比喻才思敏捷。

㉑ 陈思：即曹植，三国魏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生前曾为陈王，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

㉒ 五官：即魏文帝曹丕，三国魏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曹魏的开国皇帝。曾任五官中郎将，位在诸臣之上。

㉓ 石崇：西晋渤海郡南皮（今河北南皮）人。

㉔ 王恺：字君夫，西晋东海郟县（今山东郟城）人。司马昭妻弟。曾与石崇斗富。惠帝时，官至后军将军。

㉕ 夜珠高：志云“达夫居也”。《达夫传》：“沧州人”，志云“即南皮人”，盖沧、南二志俱载之（作者自注）。按：达夫，即高适，字达夫，唐沧州饶安（原属南皮，今为盐山）夜珠高村人。

㉖ 窦家岭：传为禹钧别业（作者自注）。

㉗ 五桂：古称进士登第为折桂。五桂是对亲族五人相继登科的美称。



北宋窦禹钧之子仪、俨、侃、偁、僖相继登科，冯道赠诗云：“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⑳ 濂溪：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北宋道州营楼濂溪（今湖南道县）人。哲学家。为宋代理学创始人。喜爱白莲，在凤凰山下构亭植莲，负笈其间，参经悟道，作《爱莲说》。

㉑ 大慈阁：初名大悲阁，明知县李正华易今名。上悬李诗草数章，字殊工隽（作者自注）。

⑳ 欹：斜，倾侧。

附：

古文诗作中的南皮八景

南皮既是千年古县，又是文化名县，境内胜迹星罗棋布，许多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流连忘返，留存下了大量的传世诗作。

像戴明说《发沧州之南皮》中的“莺啼新麦浅，雉去暮台高”，刘文煊《河上望南皮作》中的“浮瓜沉李知何处，遥望当年讌友台”，王庭绍《射雉台》中的“射雉台荒叫墨鸦，魏文遗迹久尘沙”，张天衢《皮城览古诗》中的“梳妆楼荒留青草，射雉台空有暮鸦”，黄持衡《重阳校射》中的“讌友台边运叶飞，尘踪无定宦情微”，等等；诗篇接踵，佳句连连。

古皮城是南皮悠久历史的见证。它筑邑达 3000 多年、置县 2000 多年、曾作为渤海郡治 500 多年，由于其数不胜数的美丽传说，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凭吊者，明代翰林王铎《过南皮》诗云：

无端却入蓀阳道，乘兴驱驰渤海前。
树老新虫藏暗窟，禾稠小燕掠流泉。
古皮城下风吹路，太史河边浪接天。
暑退沙衢多马迹，珍花奇草为谁妍。

清康熙十七年（1678）南皮县知事刘址在编修《南皮县志》时，将



“寒冰井”“讌友台”“曹公固”“太史河”“刁公楼”“莲花池”“覆盆井”“射雉台”“钓鱼台”“古皮城”十大景观赋《古诗十绝》并收录志书中，一直流传至今。

在清康熙朝《南皮县志》中，还收录了曾为南皮县知事马士琼的《南皮八景》诗。志载：“景胜有八。知县巴蜀马士琼各赋诗一章以美之。”无独有偶，民国二十一年（1932）编修《南皮县志》时，在选录马士琼《南皮八景》入志的同时，又收录了南皮籍“博学工诗文，著收甚富”的嘉庆癸酉（1813）举人张芝郁的《南皮八景》诗作。根据两者诗文所记，笔者查阅了有关史料，特将八处胜景及马、张诗作附后。

其一 钓台风苇

在南皮县城西去10里地有一村庄，名为“钓鱼台”。相传，商殷时期，姜太公吕尚为商纣王的下大夫，随朝听用。纣王要建造鹿台，姜太公直言相谏：此鹿台工程浩大，劳民伤财，不可兴师动众、贸然施工。为此，纣王动怒，下令要杀太公。姜太公闻讯，含愤离去，隐居此地。其时，这里因是九河下梢，所以到处碧波荡漾、芦苇丛生、群鸟栖息、野兽出没，太公便常在水边的高台之上垂钓。据清康熙朝《南皮县志》记载：“钓鱼台，在城西十里。姜太公困棘津时钓此。”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在南皮赋《过姜太公钓台》的诗：“往事萦情日几回，况逢古迹更徘徊。阴符功业今何在，万载唯存一钓台。”《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称南皮钓鱼台为全国十大“钓鱼台”之首。

钓台风苇

马士琼

突兀荒台傍水头，博闻遗迹证宗周。
弘谟自背光姬策，胜概于今压渚洲。



雨过一川烟浪湿，风回千亩碧云流。
鹰扬事业犹堪问，回首霜天白雁秋。

钓台风苇

张芝郁

西京王业未经收，东海鹰扬已白头。
臣主同心渭滨梦，风尘回首钓台秋。
垂纶自系清明志，投饵空看芦荻洲。
功立试从三青社，棘津非困可封侯。

其二 九河烟草

古黄河曾在南皮境内流淌 600 余年。据《禹贡》记载，其时黄河流到河北平原中部后“又北播为九河”。《尔雅·释水》曰：九河即是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絜、钩盘、鬲津。清康熙朝《南皮县志》记载更为详尽：“九河故道，渠岸尚存。徒骇在西北，太史在古皮城南，马颊在城南，覆釜在东南，胡苏在西城下，简、絜在城西，钩盘在西北，鬲津在东南。”县志进而明确南皮县“居五垒，会九河，东观海波，西带漕流，南控齐藩，北屏津镇。盖水陆要冲，畿辅咽喉也”。故，南皮有九河故道之称。上述诸河均在县境流经，汇流渤海，“九河烟草”就是对九河入海处景色的描写。

九河烟草

马士琼

人间陵谷几移迁，望里晴光接远川。
支派尚留神禹绩，薜萝犹带汉时烟。
槎沉碧落邀明月，雁背斜阳下暮天。
观雒几深怀古意，不堪惆怅晚风前。



九河烟草

张芝郁

一片荒漠古径残，九河回首路漫漫。
洪流直泻龙门险，怒浪分冲碣石寒。
千载堤防人事失，八年疏凿禹功难。
只今若为台山路，烟满平渠草满滩。

其三 五垒斜阳

据清康熙朝《南皮县志》记载，“五垒城在城东五十里，夙呼为垒城村，汉河间献王五子封侯处。今尚有梳妆楼遗址。”民国版《南皮县志》记载：“《輿地志》云：‘汉宣帝封河间献王子雍为景城侯，五子分居城中，俗呼为五垒城。’县城东五十里有垒城村，即此。今尚有梳妆楼、穿衣岭遗址，在芦庄子西。”

相传，汉宣帝（刘询）封河间献王子雍为景城侯，其五子分居城中，俗称“五垒城”。故址西有两阜，一称穿衣岭，一称梳妆楼。因久经兵乱，已被夷为平地，但遗迹依稀可辨。唐开元四年（716）曾在此修古刹长安寺，亦称潞灌寺。明嘉靖二十年（1541）重修，三十四年（1555）立碑文一通。按碑文所记，寺内正中建有大雄殿，内存《法华》藏经，有罗汉、玉皇石像，雕镂精巧。东西为伽蓝、天王殿，设有钟鼓楼台，前为山门，两廊为僧舍斋室。寺院周围碑碣林立，松林葱葱，香烟缭绕，境界幽然。为当地之大观，常有人游此。

五垒斜阳

马士琼

当时甲第接高城，此日凄然蔓草生。
秋冷颓垣喧野雀，春来老树有啼莺。



苍茫落照迷云堞，断续晴烟起角声。
林影渐低归骑缓，沉寥天阔晚霞红。

五垒斜阳

张芝郁

忆昔河间分汉代，清池胜地尚淹留。
垒城此地成千古，歌舞当年乐五侯。
时去浮云连渤海，春来芳草接瀛洲。
斜阳却想梳妆迹，几度回光射画楼。

其四 台山雨霁

南皮是一个平原县，史料记载的城内有大台山、小台山，虽然称之为山，实则为一处高岭。清康熙朝、光绪朝《南皮县志》记载：“大台山在城北，隐隐隆隆，起伏断续，为一方胜概。形家云：此太行分脉，自西南来。”大台山以东有小台山，为大台山的分脉。明代进士、弘治十五年（1502）南皮县知事邓翰（一作汉）曾作诗《登大台山》（节选）“……太行表西岳，发地来东州。隆隆大台山，临眺豁双眸。盘纡转林薄，合杳隐芳洲。昼境明且远，夕霏凄以柔。潜虚虑无碍，抚物兴弥幽。逝即薜萝侣，永辟簪笏俦。高步遂欢悦，息躬冀淹留。白云满丹嶂，终然结绸缪。仆夫促归骑，顿搅离人愁……”值得一提的是，民国版《南皮县志》记述邓翰“慈惠公明，吏畏民怀，及调繁滑县，百姓攀留百余里，后升建阳丞，祀名宦”。康熙年间的推官邑人李腾鹏曾作《过山村》诗一首，既描述了大台山的风景，也表述了当时的风尚。诗曰：“我爱山村好，民风太古前。屋随崖上下，路逐涧湾环。灌蔬引泉水，树禾垦石田。催租无暴吏，门掩日高眠。”



台山雨霁

马士琼

一望清光接翠微，晓山入夜雨中归。
花迎古径幽含露，云隐孤峰淡欲飞。
贪听鸟声啼树梢，任他岚气染人衣。
登临莫厌寻芳事，搔首任吟送夕辉。

台山雨霁

张芝郁

由来渤海少孱颜，望入虚无缥缈间。
安得峰恋堪娱目，但存名胜即为山。
隐隆莎径成虚步，起伏云梯作画攀。
独有晚来经雨霁，四围苍翠夕阳殷。

其五 寒冰沉李

南皮古城（古皮城）西南百步有一古井，名曰“寒冰井”。相传，为黄帝时所穿凿，伯益所修。此井泉水清澈甘冽，即魏文帝曹丕与诸文友沉李浮瓜之处。曾为南皮知县的刘址赋南皮“古迹十绝”时，就专门写有“寒冰井”的诗：“一勺清泉古帝开，浮瓜不用望林梅。自惭劳吏非消渴，日取冰壶玉液来。”在三国时期，魏有一文人名吴质，字季重，文才出众，与建安诸子齐名。魏文帝曹丕做中郎将时与吴质为文朋诗友。他们曾在此地赏游，或“弹笳设棋”，或“吟诗作歌”；或“驰骋北场”，或“旅食南馆”，都同乘共载，朝夕相洽，情不可忘。文彦诸友往往将甘瓜、朱李掷于井中，“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冰”（相当于现代的冰镇食品——笔者注），然后食之，并以此津津乐道，后人常游此怀古，以诗记之。



寒冰沉李

马士琼

十亩闲闲暮霭收，徘徊空忆昔时游。
浮瓜客去豪华散，吊古人来黍稷稠。
废井泥封苍藓绿，岩花露滴小红幽。
殷勤更上高台望，烟树参差动远愁。

寒冰沉李

张芝郁

燕友台荒迹有无，中郎当日胜情殊。
清泉荡漾涵冰境，朱李沉浮耀火珠。
一曲哀笳成往事，半潭寒水没新芜。
年来试访曾游处，烟径深封石发粗。

其六 龙井晴云

据《南皮县志》记载，在城东南 50 里处有一五龙岗。相传，神女曾在此处产下五龙，即青龙、赤龙、黄龙、白龙、黑龙，故而称“五龙岗”。附近有卧儿台、脱裙岭、过街楼、龙湾等遗址、景观。五龙岗下有一村庄名为姚村，村中有一口古井，名曰“覆盆井”（《天津府志》称作“古盆井”），为传说所穿凿，因井中时常出现云雾而得名。“龙井晴云”就是对这一奇观的真实记述。

龙井晴云

马士琼

清泉百韧碧涵青，灵长深阴白昼冥。
一带云光晴冉冉，半泓镜影翠冷冷。



月明五更龙吟响，雨霁群峰水气腥。
圣世不须忧岁旱，会看霖泽起沧溟。

龙井晴云

张芝郁

一从霖雨济殷商，万古晴云护此乡。
掘井深功传传说，覆盆遗迹尚龙岗。
峰看骏馱波间出，鳞想之而浪底藏。
四野苍生多望泽，甘霖何日沛汪洋。

其七 卫滨泊舟

泊镇原名泊头镇，在新中国成立前隶属南皮县。自隋炀帝开凿运河（元朝称御河，后称卫河）以来，为南北水陆要冲，来往船只常停泊于此地，遂形成一个水陆码头，称之为泊头。此处百舟停泊，桅樯林立，水鸟成群。风起水浪拍岸，杨柳婆娑多姿，别有一番景色，常有人来此游赏并吟诗作赋。

卫滨泊舟

马士琼

天马云行下碧空，桅樯遥映夕阳红。
舟维柳岸千帆影，水激晴川万壑风。
鸥队乍连沙渚上，橹声不断月明中。
澄流忽动沧州兴，婉转渔歌思未穷。

卫滨泊舟

张芝郁

弥望金堤下卫川，飞凫来往入苍烟。



风飘杨柳千章合，春去帆樯百丈牵。
舳舻南来江岸阔，舳舻东去海门连。
舵楼晚饭停桡处，共庆安澜近日边。

其八 慈阁梵音

南皮县城的东北角，有一座别具风格的兴化寺，据考，为明初肇建。兴化寺以金刚殿为山门，内置石金刚两尊，东西分立。石金刚连同底座高一丈二尺，围可合抱，镂刻玲珑。东者胸前横铜，双手合十；西者两手扶铜柞地，气势雄伟，神色飞舞。金刚殿的后面是大慈阁，这是个层阁，非常壮观，是兴化寺的主体建筑。阁中上层神龛中立有菩萨一尊，中层为十八罗汉像。清光绪十四年（1888）御制“道达天人”匾悬挂其上。大慈阁前堂柱上有两副对联，一副为清道光年间南皮知县蔡任所题；一副是清观察邑人张之京所题。清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南皮人）为大慈阁书写的“慈云永护”匾，亦悬挂其中。明代侯楹有“登大慈阁”诗一首：“飞阁凌空法界高，登临暂尔息尘嚣。郑玄老去名偏重，孺子狂来兴精豪。多病漫容寻白社，百年殊觉识青袍。持螯共效龙山饮，莫向霜华点鬓毛。”

当年，“慈阁梵音”为南皮八景之一，后因连年兵劫，寺毁阁坍，仅存石金刚两尊。1964年，南皮县重修金刚亭，将石金刚置于亭中，以供游人观赏。

慈阁梵音

马士琼

高阁凌空旭日辉，凭来已觉世环非。
香残古榻僧初定，松偃幽坛鹤未归。
清明岩前疑石动，钟声天外共花飞。
也知最上人须到，对此还应息万机。



慈阁梵音

张芝郁

崔巍杰阁俯城东，百尺丹梯四面风。
透入法门孤月净，参来清楚万缘空。
松荫结处无人到，鹤梦惊回有磬通。
别有文光起东壁，书声音彻夜红灯。

随着岁月的流逝，曾经风光无限的“南皮八景”已不复存在，但值得庆幸的是，古文诗作中的史料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传说，留下了历史的记忆。尽管从两位前人（马士琼、张芝郁）的诗句中表现出了他们对南皮八景的赞美与遐想，也看出了他们心绪的惆怅与无奈。实际上，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也不必对此那么多愁善感。毕竟，它们都真真实实地存在过、辉煌过，就让我们走进历史的长河中去探幽、去寻觅那逝去的胜景吧！

（赵树森）



“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南皮凭吊“绿珠楼”

清乾隆十九年（1754），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罢官后一心想游历天下名胜古迹，当他来到南皮古城时，站在绿珠楼遗址上，放眼望去，但见土城漫漫，大丘重重，荒草迷目，使这位声名大噪的风流才子心中不胜惆怅，遂口吟一绝，对世事沧桑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古往今来岁月深，季伦遗址漫登临；
绿珠楼下香魂杳，径尺珊瑚何处寻。

郑板桥（1693—1766），原名郑燮，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江苏兴化人，祖籍苏州。清代书画家、文学家。康熙秀才，雍正十年（1732）举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官山东范县、潍县县令，政绩显著，后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为“扬州八怪”重要代表人物。

郑板桥一生只画兰、竹、石，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是清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代表作品有《修竹新篁图》《清光留照图》《兰竹芳馨图》《甘谷菊泉图》《丛兰荆棘图》等，著有《郑板桥集》。

郑板桥在南皮还赏游了姜太公钓鱼台遗址并作《过姜太公钓台》诗：

往事萦情日几回，况逢古迹更徘徊。
阴符功业今何在，万载唯存一钓台。

郑板桥在南皮的赏游活动及其诗作，都收录于南皮古县志中。



绿珠是石崇的宠妾，南皮“绿珠楼”（石崇宅）就是石崇和绿珠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石崇（249—300），字季伦，晋渤海郡（今南皮）人，为西晋开国元勋石苞的幼子。石崇少时聪慧，勇而有谋，20余岁时即为修武县令。因有能名，入为散骑郎，后居城阳（治今山东菏泽东北）太守。因征战吴国有功，被封为安阳（治今河南安阳西南）侯。由于才学过人，屡建战功，被晋武帝司马炎所器重，元康初年封为中郎将、荆州（辖境约当今湖北、湖南及河南、贵州、广东、广西的一部分）刺史。在刺史任上，大肆劫掠往来客商而成巨富。后在河阳（治今河南孟州西）置金谷园并与名士潘岳、左思、陆机、陆云、刘琨、欧阳建等人结社，赋诗著文，史称“金谷二十四友”。

绿珠姓梁，出生在广西白州的双角山下，姿容绝艳。当地风俗以珍珠为最上等的珠宝，所以凡生女即称珠娘，生男则为珠儿。绿珠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石崇上任交趾（今越南北部及广西等一部分）采访史时，路过白州，以10斛珍珠买绿珠为妾，对她特别宠爱。

其时，晋朝的宗室封王之间为争夺皇位而作乱，史称“八王之乱”（即：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长沙王司马义、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西晋皇族因争夺政权而发生的变乱）。赵王幕下有个谋士叫孙秀，听说绿珠美貌无比，便向石崇索要。石崇闻听后勃然大怒：“生无所爱，唯绿珠不可得。”恼羞成怒的孙秀便在赵王面前搬弄是非，言称石崇将要谋反。而此时，赵王刚废了晋惠帝，暗疑群臣不服，听后立即派人去缉拿石崇。石崇对绿珠叹道：“我因你而获罪，从此将永诀矣！”绿珠也依依不舍地含泪道：“我愿效死君前，誓不从贼。”言罢，跳楼而死。



尽管有史料记载金谷是在河南的河阳，然而，在南皮关于石崇宅、绿珠楼以及绿珠坠楼的故事却世代相传了下来。

二

历史上对石崇的传说很多。比如：“穷，穷不过范丹（东汉名士，曾寓居南皮）；富，富不过石崇。”“扒了石崇坟，天下没穷人。”等等。查2009年8月版的《辞海》，对“石崇”的注释为：“石崇（249—300），西晋渤海（今河北南皮东北）人，字季伦。初为修武令，累迁至侍中。永熙元年（290），出为荆州刺史，以劫掠客商致巨富。与贵戚王恺、羊琇等争为侈靡。曾与王恺斗富，以蜡代薪，作锦布障五十里，恺虽得武帝支持，仍不能敌。与潘岳等谄事贾谧，为‘二十四友’之一。八王之乱时，与齐王冏善，为赵王伦所杀。”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之前出版的《辞海》中，对石崇的注释并无“与潘岳等谄事贾谧，为‘二十四友’之一”一句，显然，新版的《辞海》对石崇在文学上的成就给予了肯定。另，“与齐王冏善”一句，在旧版的《辞海》中为“与齐王冏结党”。“善”与“结党”的性质、概念大不一样。由此可见，石崇之死并非因结党营私，而主要是为财、色招致杀身之祸。（新版《辞海》对石崇的注释中还有这样一句：“西晋渤海〈今河北省南皮东北〉人。”括号内的“东北”二字，明确地指出了具体的方位。在今南皮县城东北5公里处，正是已筑邑3000多年、置县2200多年的南皮古〈皮〉城。由此可见，古皮城中的石崇宅、绿珠楼应是确信无疑的。）

确实，石崇是一个放胆致富的才干。作为朝廷命官，他敢于在任上劫掠远使的客商，使资财富可敌国。史书记载石崇：“在荆州，劫远使客商，致富不赀。”石崇又是一个敢于放胆露富的人。据《世说新语》等书记载，石崇的厕所修建的华美绝伦，经常有10多个穿着锦绣的女仆列队



恭候客人如厕。客人如厕以后，这些婢女要把客人身上原来的衣服脱下，用各式各样的香水、香膏依次给客人洗手、抹脸，再伺候他们换上全新的衣服才可出去。

王恺是晋武帝司马炎的贵戚，富足的不可一世，石崇却竟与之以奢靡相比而斗富：王恺饭后用糖水刷锅，石崇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40里的紫丝布障，石崇便做50里的锦布障；王恺用赤石脂涂墙壁，石崇使用香椒饰房屋。晋武帝司马炎暗中帮助王恺，赐给他一株二尺多高的珊瑚树，枝条繁茂，举世罕见。而石崇却不屑一顾，随手用铁如意击碎。就在王恺目瞪口呆的时候，石崇已命仆人拿来了六七珠三四尺高、光彩夺目的珊瑚树，任凭王恺选取。王恺自觉颜面尽失，而石崇也由此埋下了祸端。

三

石崇虽然亦官亦盗且放荡不羁，但史上都公认他是一个颇有成就的文学家。清光绪朝与民国版《南皮县志》都将石崇列为“文苑”之首，称其“好学不倦”“著作甚丰”。南皮古县志收录有多篇（卷）石崇的著述，仅《金谷园集》就有10余卷。书圣王羲之写《兰亭序》时，就自比石崇的《金谷园序》。这些文学成就得到了时人的赞誉。

石崇与其外甥欧阳建等“金谷二十四友”结成诗社，赋诗唱和，著书立说。南朝梁文学家、史学家沈约称之为“南皮高韵”。著名诗人杜牧、韦应物、张继等都写有“南皮高韵”的诗。北周文学家庾信曾有诗：“若非金谷满园时，即是河阳一县花。”

石崇在朝中投靠的是权臣贾谧。新版《辞海》注释为“谄事贾谧”，实际上是石崇等人对贾谧进行巴结、奉迎，并由此亲善。永康元年（300），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谋杀贾后等人，贾谧亦被诛，石崇则因为与贾谧结交而被免职。依附于赵王司马伦的孙秀暗慕绿珠，过去因石崇



有权有势，他不敢造次，见石崇被免职，便明目张胆地向石崇索要绿珠。而不识时务的石崇又断然拒绝，结果就在权力争斗和计谋暗算中被“夷三族”，累及母亲、兄长、妻妾、儿女等全家老少 15 人被杀，美艳绝伦的绿珠也落了个坠楼而逝的悲惨下场。

对绿珠坠楼的故事，历代文人墨客多有诗词咏叹。与石崇同时代的嵇绍（为三国时期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之子），官至晋永安朝侍中，他在《赠石季伦》的诗中，坦言陈词，直抒胸臆：“仁者安其身，不为外物惑。”“诗书著明戒，量体节饮食。”南皮籍清嘉庆癸酉（1813）科举人张芝郁曾在古皮城、在石崇宅和绿珠楼遗址前徜徉，并以叹惜和怅惋的心情赋诗《石崇宅》：

季伦才调亦超尘，翻为多才致误身。
金谷名园欢永夜，锦丝布帐炫青春。
也知殖货遭时忌，却自明珠买笑频。
蔓草荒烟一长望，可怜死愧坠楼人。

民国二十一年（1933）《南皮县志》总纂刘树鑫在古皮城登绿珠楼故址时，触景生情，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绿珠一楼存故址，美人姓字长芬芳，
英雄儿女多少事，顿觉百感集衷肠……”

（赵树森）



清直隶总督李鸿章为“范家坝事件”撰碑文

清光绪十二年（1886），清直隶总督李鸿章撰《重修宣惠河记》，并勒石立碑。碑文记述了宣惠河因水患纷争发生械斗的“范家坝事件”。

碑文如下：

重修宣惠河记

宣惠河分两支：北支由石碑河出歧口、南支由金沙岭至海丰，合鬲津故道出古大沽口，皆入于海。河无来源，受德州、吴桥、东光、南皮、沧州、盐山、庆云潦水。上游南运河决辄漫溢为患。乾隆初，孙文定公开北支，地势洼易受水而难泄，沧州数被浸。方敏恪公始议辟南支，岁久失修。近年黄河夺运，决则水大至灌数州县，而东光尤甚。光绪九年，沧州、东光之民因水掘堤，争斗相杀成大狱。于是，议复宣惠河。始议行北支，既议南北分行。十年，乃邀天津道季君邦楨及候补道吴君廷斌、知府萧君世本会勘。北支既病洼，且已成平陆无河形，南北兼修则费巨。乃议定开南支。南支较长百余里，而金沙岭最称高峻难施力。吴君力以为任，因檄与天津道共治之。其海丰境内则移山东巡抚委员会修。季君迁运使，署天津道；胡君燊、万君培因继之。而吴君驻工督理。海丰固谓不患水，知县徐君既承台檄，督民修浚，下游遂通。十一年三月兴工，四阅月而工竣。起自东光于家洼，至盐山入山东界。计工长二万六千余丈，建减水坝一、桥梁十有七。用银六万二千四百余两，视原议节省。而原议不办之工，仍增挑四千七百余丈，全身阔自七丈至十二丈，深自四尺至十六尺，大半视原议为宽深。地中得古墓及旧桥址深入土中者，皆掘出高于今河底数尺，自昔开凿所未及也。河既成，伏秋大雨，运河决老虎仓，水大于九年，众流赴壑，民情静谧。岁修无失，



此后可无患矣。始议者，沮开南支，以为河势高仰、金沙中梗；既测以八线表，则海丰城子镇河底低于于家洼河底三丈四尺。而河入海丰汇鬲津，形势辽阔、天然归墟。则以为下游多沙，旋疏旋淤者，不足信也。自金沙岭至琵琶桥、罗瞳，皆一律深通湍行无滞。则以为无从施功者，又不足信也。方事之殷，沧州、东光牧令各以民情疑惧。至腾牒相抵，水之为患害旧矣。以黄河之水其迁徙关于天运。而汉元光中、宋自天圣以后争河流者如聚讼。武安侯食邑在河北，利河南决而邑多收。河支南北，非人力所能为也。当时势家，且欲回屈以便其私。况于百里之间蚩蚩之氓乎？渠成水至，不知有灾，则信乎不可与虑始可与乐成也。国朝督直隶者敏恪最久。百余年间，余以乡人忝次其后，既喜见旧迹之复，且嘉诸君子集议之善。而吴君力任其难，始终其事，事增而用省，其劳不可没也。爰勒之石，以示来者。光绪十二年。

南皮县地处九河下梢，历史上涝灾频发，而河流两岸亦经常因水患而产生纷争，进而发生械斗，甚至酿成悲剧。清乾隆五年（1740）开掘的宣惠河，其部分河段为南皮、东光的分界线。《南皮县水利志》载：“为宣泄运（河）东吴桥、东光、南皮沥水，清乾隆五年，吏部尚书孙嘉淦、邑人李应元奏开宣惠河。”民国版《沧县志》亦记载：“宣惠河在州治南九十里……乾隆五年，开浚该河。”处于分界线的范家坝为宣惠河堤防险要之处，岸北是南皮县的泊家洼和与之相连的李杲家洼；岸南是东光县的于家洼、源流寺。遇有洪涝，宣惠河上游德州、吴桥、东光之地的沥水奔涌而至。此时，如北岸决口，南皮县李杲家一带 36 个村即成一片汪洋；如决南堤，东光县于家洼一带 18 个村就会全部淹没，而与之毗连的上百个村庄都不能幸免。历史上，宣惠河在这里往往“漫延溃决”，以致“四庐淹没”“尸骨载道”“饿殍堪怜”。为防决堤，两岸民众都不惜一切代价，拼命筑堤挡埝。



光绪九年（1883）七月，因连降大雨，上游洪水暴发，宣惠河宣泄不畅，积水外溢，时有决口危险。为防对方偷掘堤岸，两岸民众发生械斗，淹死打死48人，并有多人伤残，后人称之为“范家坝事件”。《南皮县志》（1992年版）在“大事记”中记载：“（光绪）九年（1883）秋天，宣惠河范家坝，南北两岸居民为决堤放水发生械斗，死亡48人、伤残多人，造成‘范家坝事件’。”民国版《沧县志》在“大事年表”中对该事件的记述为：“（光绪九年）六月大雨涝，七月宣惠河大水。乾隆五年开宣惠河，不数年下游有地名金沙岭淤塞不通。河南（岸）居民每决北堤泄水入沧，沧人苦之。同治初年，知州项桂轮奉檄挑宣惠河下游，工竣后稟请督宪，谕令沧（县）、东（光）沿河居民不准偷掘堤岸，以邻为壑。如有偷掘者，格杀无（勿）论。并镌石堤侧，以垂永久。斯年（光绪九年）宣惠河大水，东光千余人持械渡河掘北堤，沧人辟易。适有送嫁女者，车马仆从驰驱远道，东（光）人望尘惊曰：马队来矣，可急退。纷纷争渡，落水毙命者数十人。”

“南皮·千年文化古县”系列丛书之《历史事件卷》记载得较为详尽：清光绪九年（1883）七月因连降大雨，宣惠河上游洪水暴发，致使河水暴涨，时有决口危险。南岸村民为掌握北岸护堤情况，派两个人到北岸打探，被北岸扣留。第二天，河南岸组织18村1500余人，集合在东源流寺的大寺里。为事后查清人数，院中放一口筐箩，过去一人放一个铜钱。集合后，每人在天灵盖上涂一道白石灰，皆手持铁锨长枪短棍，而后兵分两路，一部分坐船和筏子，直奔北岸；一部分从西面高桥村大桥过河。两部分人都举着用大门做的“挡”，以防北岸土炮。

东光县小吴家村的“崔三把式”兄弟二人是德胜镖局的保镖，带领四五十个会武术的人做先锋，另外还聘请了武术高手相助，气势汹汹奔向北岸。北岸李杲家村护堤的人们见此情景，跑到范家村里，遇到了“把式房”的赵庚、赵武，报告了南岸情况。赵庚答应帮着打。于是他们



历史名人与南皮 ◎ 文化丛书 ◎

抄起大刀、长枪，带领“把式房”的兄弟们和退回来的护堤人，奔向大堤。南北岸的人群相接，混打在一起。

事有凑巧，正在混战之际，南皮县桃源村大地主侯家去董村通书（结婚送礼）的一行人骑马从此经过。南岸人见来了马队，误认为是官府的人，想从高桥村过桥逃跑，桥被截断，只好凫水过河。结果被淹死打死 48 人，并有多人伤残。

清直隶总督李鸿章曾在光绪十二年（1886）撰碑文记述此事。据民国版《沧县志》“宣惠河纪事始末”载：光绪十二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撰《重修宣惠河记》，并勒石立碑。文曰：“光绪九年，沧州、东光之民因水掘堤，争斗相杀成大狱，于是议复宣惠河，始议行北支，既议南北分行……十一年兴工，四阅月而工竣……其劳不可没也。爰勒之石，以示来者。光绪十二年。”

因“范家坝事件”，两岸民众成了冤家对头。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加强了河道治理，矛盾虽有缓解，但仍时有争端。直到 1963 年 11 月，毛泽东主席号召“一定要根治海河”，党和政府经过十几年的治理，彻底清除了水患。如今的宣惠河，已经成为联系两岸人民友谊的纽带。

（赵树森）



清直隶总督李鸿章旌表南皮郭氏匾额

2015年的4月初，南皮县王寺镇罗四拨村发现了一块清光绪年间的匾额，疑为清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旌表匾额。

当时，罗四拨村组织编写《罗四拨村志》，正在广泛搜集比较翔实的资料。这块已有140年历史的匾额，是在村民李清祥家发现的，过去一直不为别人所知。在1964年时，李清祥的大哥为筹备婚事，请木匠制作了部分家具，在做了一个木头柜以后，因没有合适的木板做盖，就随手拿来了这块匾额，又从当中锯开当成了柜盖。后来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这种老式的木头柜因太过沉重，遂废弃不用。这块已经锯成两瓣的匾额，又被当成杂物扔在了一边。直到村党支部、村委会组织编修村志，并在广泛征集史料时，这块匾额才进入人们的视域，引起了关注。

李清祥家发现的这块匾额已被人为地分成了两块，对接后高约55厘米、宽约128厘米。匾文为“孝义兼全”四个字，属旌表类匾额。上款为：“光绪二年岁次丙子孟春上浣穀旦”；下款为：“命直隶制台李宏章乙亥为登仕佐郎李智慧之妻例赠儒人郭氏立”。上款比较容易理解：光绪二年为公元1876年，亦即农历丙子年；孟春是春季的第一个月，即农历正月；上浣，上旬；穀旦，吉利的日子。也就是说，这块匾额是选择在1876年农历正月上旬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悬挂的。而下款则令人费解。

先说“命”，为命令、指派的意思，是指上级对下级的指示。“命”谁呢？是命“直隶制台李宏章”。在清代，以总督为地方最高长官，辖一省或二三省，综理军民要政。而在官场中，统称总督为“制军”或“制台”。也就是说，“直隶制台”就是指“直隶总督”。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任直隶总督的为清末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他于同治九年（1870）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才卸总督任。在光绪二年（1876）悬挂这块匾的时候，正是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制台）之时。我们可以这样揣测，匾额上李宏章的“宏”应为“鸿”字之误。

再往下看，紧接着的“乙亥”是与上款的“丙子”相关联的。“丙子”为公元1876年，“乙亥”为公元1875年。这表明，匾额是乙亥年制作、丙子年悬挂的。下半句“为登仕佐郎李智慧之妻例赠孺人郭氏立”中的“登仕佐郎”为从九品阶。“品”为古代官吏的等级，明清时分一至九品，每品又有“正”“从”之分，故有18个等级。“从九品”为九品中的副职；“例赠”即为按条例（成规）进行赠授（予）的；“孺人”应为“孺人”之误。古代称大夫的妻子、明清七品官的母亲或妻子封孺人。也通用为妇人的尊称。由此来看，称郭氏为“孺人”，只能算是对她的尊称。

把下联全部连起来简而言之，就是命李鸿章为郭氏立匾。问题是，李鸿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能“命”他的只能是当时的光绪帝。然而，光绪又为什么命李鸿章为一个“从九品”小官的妻子立匾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笔者决定从史料中进行查找。因为，能使当朝皇帝命朝廷重臣为他人立匾，这肯定是件大事，在志书中应该有详细的记载。罗四拨村在1945年前隶属沧县，为此，笔者又于4月22日专程到沧县县志办公室，求得一部民国二十二年（1933）版的《沧县志》并进行了仔细翻阅。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沧县志》的《人物》卷之“列女”一目中，终于查到了李智慧及其妻郭氏的讯息。郭氏之所以受到旌表，缘由是她的“贞节”。



遗憾的是，涉及郭氏的只有寥寥的 10 个字！

在“列女”一目中，分为“列女传”和“清贞节表”两部分。郭氏是在“清贞节表”中记载的，用白话表述意为，李智慧之妻郭氏，在 27 岁时立节，守节 72 年，已得旌表。

笔者特意数了一下，在“清贞节表”中列入名录的，竟达 3100 人。换句话说，作为 3000 多人之一的郭氏，并没有入选“列女传”的资格，应该说只是一位平常的贞节之妇。

既然是一位平常的列女，郭氏为什么能引起光绪帝的注意并命李鸿章为之立匾呢？

再回到原点。几经查看，发现这块匾额不单是从当中锯开的，在四边也有锯的痕迹。

按常理，所有匾额在四周都应有雕刻的纹饰图案，这不仅是为了美观，还与身份相适应，而“孝义兼全”匾的四周则平整、光滑，因而人们认为，当初用这块匾额做柜盖的时候，一定是因为匾额太大且由于雕刻的图案凸凹不平，所以就干脆将四边都锯掉了。而随着锯掉的不光是图案，还有可能也同时锯掉了一个字。

这是个什么字呢？以笔者的猜想，很可能是个“受”字。如果真是“受”字的话，那么匾额的下款即为“受命直隶制台李宏（鸿）章……”这样，下款就比较好理解了：是某人“受命”直隶制台而为郭氏所立的匾额，抑或是这种例赠的活动，就是直隶所辖各县根据上命组织的（也许如同现在表彰先进单位、模范个人一样，是直隶省的统一行为）。这就与郭氏的身份、在《沧县志》中所处的位置相对应了。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锯掉的是一个“钦”字。因为李鸿章本来就是皇帝钦命的直隶总督，其旌表行为不过是按惯例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有理由相信，这应该就是李鸿章的旌表匾额。

（赵树森）



相关链接：

对这块匾额，有的人还存在一个疑问。郭氏是在志书中的“贞节表”里列出的，似乎与匾文中所旌表的“孝义兼全”不怎么搭界。旌表贞节之女（妇），一般用贤淑、节孝、贞烈或德、礼、慈、惠、忠、洁等词语，用“孝”特别是用“义”字仿佛就有些词不达意。

于是，笔者再次与罗四拨村有关知情人士进行了访谈。

笔者认为，虽然李妻郭氏在《沧县志》之“贞节表”中只是3000多人之一，但在罗四拨村、在李氏家族中毕竟是一件大事，也是引以为骄的典型事，应该在李氏家谱中有专门的记载。但遗憾的是，罗四拨村李氏家谱已经遗失，无从查找。

为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4月27日，《罗四拨村志》主编罗春达和李清祥二人赴东光县李家楼村进行寻访。李家楼李姓与罗四拨李姓为同祖同宗，在1937年前联系比较密切，后因兵荒马乱断了来往。

然而，罗春达、李清祥到了李家楼一打听，李氏家谱也惜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破四旧”中。

尽管心存疑窦，笔者也不得不就此打住。让人欣慰的是，《罗四拨村志》的编纂者和李氏家族为查清这块匾额，仍然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关于这块匾额的来历，李氏家族还有一种口口相传的说法。

据李清祥介绍，他小时候听姑姑讲，李氏祖上为中医世家，其爷爷李松岚（也就是李清祥的曾祖父）悬壶济世，很有名望。有一年，集北头村刘家有一妇女生病，经多位医生诊治都不见效，后延请李松岚前往，结果药到病除。刘家感激不尽，备下了厚礼，差人到李家答谢。李松岚看了看礼物，二话没说，给了差人赏钱，又把礼物全部退回。刘家寻思，是不是老医生嫌礼物太轻啊？于是，再备礼品，第二次送去。没想到，李松岚又予婉拒。

集北头刘家可是个名门望族。在南皮，就流传着“南皮张，北头刘”的俗语，“南皮张”指的是张之万、张之洞家族；“北头刘”就是请李松岚看病



的刘氏家族。北头刘氏自明代万历年间到近代，中进士者14人、中举人数十人；国民革命军少将、中将8人。

刘家人两次送礼被辞，明白老医生为轻财重义之人，遂命人制作一块匾额送去，以表谢忱。李清祥认为，兴许，这块匾额即是北头刘家所送。

但笔者不这么认为。如果是刘家相送，对象应该是老中医李松岚而不是李智慧之妻郭氏；刘家的匾为私人定制而这块匾明显为官方行为。由此可见，李家应该还有另一块匾，可能是年深日久已经遗失。



史海钩沉



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古城南皮既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也存在一些尘封的谜团，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探究和辨析。

通过“史海钩沉”，人们可以得知燕山窦十郎在南皮建造别墅、汉献王之子在南皮修筑“五垒城”、汉捕虏将军马武在南皮屯兵的具体方位和地点；还可以了解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赏游“高乐城”、东汉名士范丹“落户”南皮以及袁谭别驾王修在南皮义葬主公的情节和故事。

曹操计破南皮城后，南皮境域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迎来了发展的际遇。特别是曹丕等建安文学代表人物在南皮“燕友”之“浮瓜沉李”的活动，使得“南皮朝宴”“南皮之游”以及“寒冰井”“射雉台”“燕友台”都屡屡出现在历代诗作中，成为了文人们笔端赋诗酬酢的一个典实，对南皮传统文化的发展、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燕山窦十郎”在南皮建别墅

在南皮县古皮城北有一处叫窦家岭的地方，史载为窦禹钧的别墅。

窦禹钧在历史上鼎鼎有名，为五代后晋时期蓟州渔阳（今天津蓟县）人，因其排行为十且居燕山脚下，故又有窦燕山、窦十郎之称。其5个儿子全部考中进士，个个身居要职，成为国家的栋梁。中国古时的启蒙书《三字经》赞之：“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正因为窦燕山的声望，所以，他在南皮修建的别墅便成为了一处胜景。

清康熙朝《南皮县志》记载：“窦家岭，在城北五里。相传为（窦）禹钧别业。”

别业即别墅，语出石崇的《思归引序》：“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藪，遂肥遁于河阳别业。”石崇为西晋时期的南皮富豪、大臣、文人，南皮县古皮城至今尚有“石崇宅”“绿珠（石崇宠妾）楼”遗址。石崇在全国建有多处“别业”（墅），河阳（古县名，今属河南孟州）的“别业”——“金谷园”便是其中的一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窦家岭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名胜古迹，已经留在了名人诗作中。

在沧州市政协编纂、河北人民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历代名人咏沧州》一书中，收录有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己卯科举人、任丘边向禧的《南皮古迹十六咏》，其中的《窦家岭》一诗中记：

别业年来已就荒，嘉名犹自抱余芳。
批图忽接十郎字，仿佛如闻五桂香。



窦禹钧出身于丰裕家庭，是当地有名的富户，但开始行为不端，常以势压贫。当有贫苦人家去借粮时，他往往小斗出、大斗进，小秤出、大秤进，明瞞暗骗，昧心行事。民间传说他因为做事缺德，所以到了30岁时还没有儿子。一天晚上，其死去的父亲托梦给他：“你心术不正，恶名昭著天庭，再不痛改前非，不仅一辈子没有儿子，还是个短命人。只有改过从善，广积阴德，才能挽回天意。”

自此，窦禹钧暗下决心，重新做人。他克己利人，广行方便，受到了人们的称赞。一仆人盗钱二百千（旧时钱币单位，一千个制钱为一吊），担心事发，具字将12岁的女儿卖给窦宅，以偿盗钱，后出走不知去向。窦禹钧见小女甚怜，便收为养女，至成年后，为其择配良婿并陪嫁二百千钱。窦禹钧还在家里建起了私塾，延请名师任教，对于没钱读书的贫困人家，他主动将孩子接来并免收学费。他还经常周济贫寒，先后资助棺椁埋葬者27人、资助陪嫁者28户，接济柴、米而得活者不可数计。

从此，窦禹钧果然时来运转，妻子先后生下了5个儿子。他把全部精力用在培养教育儿子身上，尤其注重他们的学习和品德的修养。在他的教育下，5个儿子先后登科及第，成为有用之才。自号“长乐老”的沧州人冯道曾历事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十一君，三次做中书令，居相位20余年。他有感于窦禹钧教子有方，5个儿子都得中进士，便写了一首《赠窦十》的诗：

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

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香。

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著《窦谏议录》，记载窦禹钧为富亦仁、为富亦义的事迹。

窦禹钧是后晋时期燕山一带的富户，在各地建有别业当属自然，但为何选择在南皮城北5里许的地方修建别业呢？



南皮历史悠久，早在商殷时期，南皮人的先祖就在聚落的基础上筑了城邑；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推行郡县制，南皮为首批设县的古邑；东汉建武六年（30），渤海郡制由浮阳移于南皮，此后，南皮古城作为郡治长达 500 多年。悠久的历史积淀，使当时的南皮成为了一座丰饶、繁华的名城。

按此推理，窦禹钧的别业应该建在南皮古城，但为什么偏偏选在城北 5 里的地方呢？对此，编者在古县志中找到了答案。原来，窦禹钧的别业——窦家岭是建在了一个叫“大台山”的地方，堪舆家认为此处是一方风水宝地。

南皮是一个平原县，史料记载城内有大台山、小台山，虽然称之为山，实则为一处高岭。清康熙朝、光绪朝《南皮县志》俱载：“大台山在城北，隐隐隆隆，起伏断续，为一方胜概。形家（堪舆者，俗称风水先生）云：此太行分脉，自西南来。”

大台山以东有小台山，为大台的分脉。明代进士、弘治十五年（1502）南皮县知事邓翰曾赋诗《登大台山》（节选）：

……太行表西岳，发地来东州。隆隆大台山，临眺豁双眸。盘纡转林薄，合沓隐芳洲。昼境明且远，夕霏凄以柔。潜虚虑无碍，抚物兴弥幽。逝即薜萝侣，永辟簪笏俦。高步遂欢悦，息躬冀淹留。白云满丹嶂，终然结绸缪。仆夫促归骑，顿搅离人愁……

明隆庆丁卯科（1567）举人李腾鹏在赏游大台山后，尝作《过山村》诗一首，既描述了大台山的风景，也表述了当时的风尚。诗曰：

我爱山村好，民风太古前。屋随崖上下，路逐涧湾环。

灌蔬引泉水，树禾垦石田。催租无暴吏，门掩日高眠。

正因为这里地处高台、河水环绕，景色秀丽、民风淳朴，所以就成为了南皮的一处胜景。

在清康熙朝《南皮县志》中，收录有南皮县知事马士琼的《南皮八



景》诗。志载：“景胜有八。知县巴蜀马士琼各赋诗一章以美之”。在这八景诗中，就有专门记述大台山风景的《台山雨霁》：

一望清光接翠微，晓山入夜雨中归。
花迎古径幽含露，云隐孤峰淡欲飞。
贪听鸟声啼树杪，任他岚气染人衣。
登临莫厌寻芳事，搔首狂吟送夕辉。

在这样一个环境幽雅的地方，宛如世外桃源，作为富足之家的窦禹钧选择这里修建别业，以供休闲游乐就在情理之中了。随着岁月的流逝，窦禹钧的别业已经荡然无存，但是，“窦家岭”的称谓及其故事却流传了下来，使当今的人们在古志书和古人诗作中还能得以寻觅它的踪迹。

（赵树森）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曾游“高乐城”

在南皮境域内有一处“高乐故城”的遗址，为西汉时期所置高乐县的治所。有附近村民在此劳作时，曾刨出来一枚印章，后经鉴定，这枚质地为和田玉的印章系汉司马迁之遗物。据此揣测，当年，司马迁仰慕高乐城一带的胜景，曾来此赏游，不慎将自己的印章丢失于此。

高乐县设置于公元前140年，撤销于公元25年，历时长达165年。关于置县的原因，史料记载为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封齐孝王刘将闾之子刘越为高乐侯，并置高乐县。县邑治所即今南皮县董村。对此，南皮古县志记载：“高乐故城，在（县）城东南四十里，今董村镇是。汉置。武帝封齐孝王子为侯国，后（东）汉省（裁减）。又名思乡城、西乡城。汉司马师丹封侯即此。”

高乐城为何又称为“思乡城”或“西乡城”呢？这就涉及汉代人事更迭的问题。原来，在公元前6年，汉哀帝刘欣继位，高乐侯被废；同年封左将军、大司马师丹为高乐侯。司马师丹去世后，汉平帝元始元年（1）又封平思王之孙刘修为高乐侯。公元9年，王莽篡位后，高乐城易名为乡城（又称思乡城、西乡城）。汉建武元年（25），高乐县撤销，并入南皮县。

据《南皮县地名资料选编》记载：董村历史悠久，但最初称为“四合庙”。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人陆续在此居住，并逐渐形成了村落。因此地有一香火繁盛的寺庙，名“四合庙”，故村以庙名，四合庙村便应运而生，这当为董村的原始雏形，也是今南皮县辖境内最古老的村落之一。成为县治后，高乐侯在此大兴土木，筑城修殿。累以经年，在修筑县城、



侯府的同时，还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庙宇。因庙宇的主殿为木制结构，且采用的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中的抬梁式，所以在整个殿堂中不见立柱、殿顶亦不见横亘的大梁，故称“无梁大殿”。无梁大殿位于高乐城西北隅，坐北朝南，凌空高悬、气势恢宏，彰显了古代工匠的聪明才智和精湛技艺。

无梁大殿的雄浑英姿，以及绿树掩映、碧水环绕的幽雅环境，吸引了众多朝奉者和文人墨客慕名前来，感受高乐城秦风汉韵的魅力。其时，高乐县城不仅是繁华的县治所在地，而且由于西界长城堤、北邻五垒城，使之成为当时渤海郡内的一大景观。

春秋战国时期，今董村（时称四合庙，汉为高乐县治）附近为齐、燕、赵三国之边境，曾反复归属齐国和燕国。齐桓公为堵塞八（九）河之流，抵御外敌入侵，沿黄河故道用夯土修筑了一条长长的大堤。因是齐人在齐地所修，故称“齐堤”，俗称“长城堤”“黄河堤”，今称“堤崖”。齐堤位于董村西边，呈西南—东北走向，逶迤绵延，巍然壮观。

在今董村北约4公里处，还有一座“五垒城”。汉宣帝（公元前74—50年在位）时，献王之子、景城侯刘雍的五个儿子被封在这里，五子分居城中，故称“五垒城”。因为此城建筑恢宏，景色秀美，使“五垒斜阳”成为“南皮八景”之一。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环境和人文景观，才使得许多达官、士绅、骚人、墨客纷至沓来。这其中，就有大文学家司马迁。

据传，董村西街曾有一农民在“堤崖”附近劳作时，刨出来一枚印章，后经鉴定，这枚质地为和田玉的印章系汉司马迁之遗物。史料记载，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司马迁随汉武帝“泰山封禅”，后寻游至渤海岸边，汉武帝筑台观海，祈神求仙，留下了汉武帝观海的传说（今黄骅境内有遗址）。据此揣测，司马迁素有游历山川、著书立说的宏愿，他仰慕高乐城一带的胜景，却不慎将自己的印章丢失于此。



魏晋时期，高乐城尽管早已不是县邑治所，但当地百姓们有着强烈的怀旧心理，仍然称之为新乡城或思乡城。西晋惠帝永平元年（291），西晋王朝的八个诸侯王为争夺权力而相互残杀，史称“八王之乱”。这场战乱一直延续了16年，北方大部分地区遭到严重破坏。新乡（高乐）城被洗劫焚毁，“无梁大殿”也变成了一片废墟瓦砾。

元朝时，朝廷曾对佛教大力扶持，当时的一些达官贵族，多以修桥建庙为善举。董村镇的乡绅也纷纷捐款赠银，聘请能工巧匠，在“无梁大殿”的原址，又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庙宇。新庙宇虽然是根据史料的记载及传说，仿照“无梁大殿”而建，但其结构布局、建筑规模，远胜于被毁前的“无梁大殿”。整座大殿为砖木结构，其中木结构中的抬梁式，造型独特，气势非凡。整座寺庙有“九九八十一间”，且间间相连、互为贯通。古南皮县志记载，此寺名“兴和寺”，寓为“兴盛和顺”之意。又因寺庙是建于董村的西边，所以俗称“西大寺”。然而，更多的人仍习惯称之为“无梁大殿”。

无梁大殿周围，环境幽雅，林木茂密。殿内晨钟暮鼓，回荡悠扬。来此祭拜的善男信女，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在寺庙举行祭祀大典时，众多游客纷至沓来，在观看这一盛况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到传统的鼓乐、戏曲、杂技等娱乐节目。久之，便形成了早期的董村庙会，而庙会又衍生成了固定的集日。民国《南皮县志》记载：“董村（庙会）十一月会期”；“董村镇集，五、十日”。其时，董村声名鹊起、商贾云集，街市繁华，盛况空前，成为了沧南地区的中心集镇之一。明初“靖难之役”后，沧州一带人烟稀少，满目疮痍，“无梁大殿”亦难逃厄运，变成了一片废墟。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董村西街还能见到高乐古城墙夯基的痕迹，如今已是难觅踪影了。

（赵树森）



袁绍南皮起兵讨伐董卓

南皮在东汉初为渤海郡治。东汉末年，雄霸北方的袁绍曾任渤海太守，因而，南皮就成为袁绍兴兵崛起的发祥之地。

袁绍（？—202），字本初，河南汝阳（今河南商水）人。

袁绍出身于河南袁氏之名门望族，高祖袁安官至司空、司徒，叔曾祖袁敞官至司空，祖父袁汤官至司空、司徒、太尉，生父袁逢官至司空，叔叔袁隗官至司徒、太傅，家族中四世居三公之位者多达五人，故号称“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东晋袁山松著述记载，袁绍为袁逢的庶子，因袁逢的兄长、五官中郎将袁成早逝，袁逢将袁绍过继给袁成。袁逢另有一子袁术，所以在血缘上，袁绍与袁术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袁绍生得英俊威武，不到20岁已出任濮阳县令。后因不满宦官专政，拒绝朝廷辟召（帝王召见并授予官职）。隐居洛阳，暗中结交党人和侠义之士。

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以后，东汉朝廷被迫取消党禁，大赦天下党人。中平五年（188），汉灵帝组建西园新军，设置八校尉。袁绍被任命为中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但大权掌握在宦官、上军校尉蹇硕手中，连大将军何进也要听从他的调度指挥。

中平六年（189）四月，汉灵帝病亡，刘辩继帝位。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未果，反被宦官诱杀。袁绍与叔父袁隗佯称奉诏，合力杀死宦官，死者有2000多人，有些不长胡须的人也被当成宦官杀掉了。

正当袁绍在内宫大肆屠戮宦官的时候，董卓率领军队抵达洛阳西郊，于北邙坂下与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相遇。他拥簇着少帝，带着军队浩



浩荡荡地开进洛阳城。董卓坚持立刘协为帝，袁绍在董卓废少帝立献帝上与董卓闹僵。袁绍惧怕董卓兵强马壮，弃官逃亡冀州。董卓因袁绍家族的势力与影响，也不愿意开罪袁绍，便采取安抚措施，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赐爵位为祁乡侯。

当时，渤海郡管辖现在的青县、沧县、南皮、东光、吴桥及山东、天津的部分区县，郡治为南皮城。无论人口和面积在冀州一带均属首位。袁绍任渤海太守后，招贤纳士、招兵买马，积攒实力、苦心经营，羽翼逐渐丰满。可以说，南皮是袁绍雄起一方的发祥地。

中平六年（189）九月，董卓废少帝为弘农王，立刘协为帝，是为献帝。而董卓自署相国，又自称“贵无上”，他性极残忍，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掠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董卓擅行废立和种种暴行，引起了官僚士大夫的愤恨，他所任命的关东牧守也都反对他。

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州郡牧守起兵讨董。袁绍起渤海雄兵，自号车骑将军，十八路诸侯（一说为十三路）推举袁绍为盟主，州郡蜂拥而起的部队，也都打着袁氏旗号。

董卓见关东盟军声势浩大，于是挟持汉献帝，驱赶洛阳百姓迁都长安，以避锋芒。但是讨伐董卓的各州郡守各怀异心，迁延时日，保存实力。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驻军将领每日大摆酒宴，谁也不愿去与董卓的军队交锋。酸枣粮尽后，诸军化作鸟兽散，一场轰轰烈烈的讨伐不了了之。

（杜中洲）



曹操横刀立马南皮城

建安十年（205），曹操兴兵围攻南皮，袁谭奋力抵抗，终于在曹操的计策与急攻之下战败，为曹纯麾下虎豹骑所杀。

袁谭为袁绍长子。袁绍因宠爱后妻刘氏，有意立刘氏所生的袁尚为继承人，但逢纪、审配一派与郭图、袁谭一派不和。袁绍病亡后，审配等人害怕袁谭继位以后郭图等人加害自己，就假称袁绍留下遗命，拥立袁尚作为继承人。袁谭因不能继位，遂自号车骑将军，带兵进驻黎阳（今河南浚县）。袁尚担心袁谭强大，所以给他的兵力很少，而且派逢纪跟随监视。袁谭请求增派军队，审配等人商议不给。袁谭一怒之下杀了逢纪，袁谭、袁尚兄弟二人便从此逐渐产生隔阂和矛盾。

同年，曹操渡过黄河进攻袁谭，袁谭向袁尚告急求救；袁尚害怕袁谭得到士兵不还，于是留下审配把守邺城，自己率军队援助袁谭，与曹操在黎阳布兵对阵。

建安八年（203），曹操攻打黎阳，大败袁尚、袁谭，二人退回邺城（今河北临漳）把守。曹操攻到邺城，收割其麦田，切断其军粮。这时，曹操依从郭嘉的计策，先撤掉军队静待袁谭兄弟二人兵戎相见、自相残杀。

此战败后，袁谭对袁尚说：“我方铠甲不精，所以上次被曹操打败。眼下曹操撤退，人人想着回家，趁着他们没有过河，出其不意发兵进攻，可以彻底击溃曹军，这个机会不可失去。”袁尚因怀疑袁谭没诚意而没有同意，既不给袁谭增派兵力，又不给他的军队更换铠甲。袁谭心中恼怒，而郭图、辛评又乘机挑拨说：“都是审配用来构陷您的。”袁谭觉得有道



理，就率兵攻打袁尚。双方在外城城门交战，袁谭战败，率领部队退守南皮。

袁谭别驾王修率领吏役百姓从青州赶来援救。袁谭想回去再战袁尚，就问王修：“您有什么主意？”王修说：“兄弟好比左右手，假如一个人准备同人格斗而弄断自己的右手，说：‘我一定胜你。’像这样行吗？丢掉兄弟情分而不相亲，天下还有谁同他亲近？近来有人从中挑拨离间造成争斗，用来谋取一时的利益，希望您堵住耳朵不要听。要是杀掉几个阿谀奉承的手下，兄弟重新亲近和睦，来抵挡四方的敌人，可以横行天下。”王修说得很对，可惜袁谭没有听从；刘表也写信给袁谭劝他与袁尚和好，但袁谭仍不接受。

袁谭部下刘询这时则在潞阴叛变，各地响应，唯独东莱太守管统抛弃妻儿到南皮支持袁谭。尔后，袁尚又率大军进攻袁谭，袁谭兵败退回平原。袁尚大军随后围城，袁谭于是派遣辛毗向曹操投降求援。然而，辛毗见到曹操时反而建议曹操应借此机会吞并河北。曹操采纳了辛毗的意见，于是派大军攻打袁尚，袁尚立即退兵回救邺城。此时袁尚部下吕翔、吕旷已叛变归顺曹操，袁谭却暗中刻将军印绶，意图招降他们二人。

曹操知道袁谭并不是一心归顺自己，但为了不让袁谭再与袁尚联手，就让其子曹整娶袁谭女儿为妻以稳住袁谭。曹操还封袁谭为青州刺史。

曹操围攻邺城期间，袁谭立即叛变曹操，向北掠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间等地。曹操知道后大加训斥，并归还了袁谭的女儿，结束了亲家关系。十二月，曹操征讨袁谭，在平原城门口扎下营寨。袁谭闻听曹操亲自统军到来，恐慌万分，速派人求救刘表。袁谭收到刘表回书，知道刘表也无发救兵之意，又自己预料抵挡不了曹操，于是，袁谭连夜逃往南皮，靠近清河边驻守。袁谭大势已去，乌桓王想领 5000 骑兵援助袁谭，但被牵招说服而不肯出兵，青州各地也纷纷起兵反叛袁谭。

建安十年（205）正月，曹操发兵进攻南皮，包围南皮城逼袁谭决



战，袁谭自以为城门坚固，粮草充足，而曹操远途跋涉追到这里，已兵困马乏，粮草运输补给又艰难，估计不出数月，曹操必定不战自退。于是，深挖沟、高筑垒，坚守不出，想和曹操打消耗战。

曹操见久攻不下，天气又非常寒冷，河道都已封冻，粮船不能运送军需，便索性令当地百姓敲冰拽船。据传，曹操命令每个营寨挑选500军校，星夜挑土筑台，土台表面用芦席封盖，远处望去和真粮台一样。

第二天一早，袁谭登城门眺望曹营，见曹操营内立起很多粮台，顿时魂飞魄散，便仰天长叹：“吾以逸待劳，遂为泡影，怎奈兵微将寡，救兵不至，弹丸孤城，难以据守。”袁谭的军队已成惊弓之鸟，士兵们再无斗志。于是，当夜驱赶南皮百姓，都拿起刀枪听令。第二天天亮，大开四门，军队在后，让百姓在前，一齐拥出。走到城南10里地，曹操埋伏的士兵一齐出动，两军混战，从早晨杀到中午，尸首遍地，血流成河。曹操见状，跳下马登上高处，亲自击鼓助阵，将士见了，士气大增，奋力向前，袁谭大败，百姓被杀者无计其数。曹操大将乐进首先攻破南皮城东门，接着其他城门也相继被攻破。袁谭披头散发，独自出西门死命打马逃跑，追赶他的曹纯所部虎豹骑兵料想他不是一般人物，紧紧追赶。袁谭惊恐中从马上掉下来，回过头来说：“喂，放我走，我能够使你富贵。”话没说完，头已落地。这时候曹操杀了郭图等人，将他们的妻子儿女也杀了。

曹操除掉心头之患袁谭，引兵入南皮城，将袁谭首级挂于北门外。下令凡有哭袁谭的人，杀他及妻子。此时，忽见一人置生死不顾，身穿粗布衣哭于袁谭头下。左右拿下此人去见曹操，曹操经询问方知是青州别驾王修，因进言劝说袁谭不要攻打袁尚而被拒绝，今天知道袁谭已死，所以来哭他。曹操责问他不怕死吗？王修对曹操说：“我受过袁氏的厚恩，如果让我收敛袁谭尸体，然后就死，我死而无怨”。曹操被王修的义气折服，就听从了他，并感慨道：“河北义士，何其如此之多也！可惜袁



绍不能用，若能用，则吾安敢正眼觑此地哉！”然后允许他收葬袁谭尸体，并待王修为宾客。王修跟着曹操到邺城魏王府做官，为司金中郎将。

据古志《南皮县志》记载：袁谭葬于李保民村东，其墓已湮。袁谭曾在古皮城北4里官道西建有“观台”，以供游览，因此台为袁谭所建，又名“袁侯台”。随着岁月的流逝，南皮袁谭墓、袁侯台均已湮没无痕。

在南皮县古皮城附近的张三拨村，于1973年、1978年先后两次出土了两枚印章。一枚刻有篆体“军司马印”字样，另一枚刻有“偏将军印章”字样。据推测，此印章可能为袁谭所遗留。

（杜中洲）



汉献王之子在南皮修筑“五垒城”

在南皮县芦庄子村西北角，有一处“五垒城”遗址，城址呈东西向长方形台地，面积为15万平方米，高出四周地面2—3米。地势南低北高，中部北边有高台一处，高出城北地面8米。可见文化层4米，地面有绳纹砖瓦残片、泥质灰陶壶口沿等。民国《南皮县志》记载，《輿地志》云：“汉宣帝封河间献王雍为景城侯，五子分居城中，俗呼‘五垒城’。县城东五十里有垒城村，即此。今尚有梳妆楼、穿衣岭等遗址。”

两千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因久经兵乱，当初规模宏大的五垒城已被夷为平地，但遗迹仍依稀可辨。清康熙十二年（1673），南皮知县马士琼在重修《南皮县志》时，曾到五垒城遗址实地察看，并以《五垒斜阳》为题赋诗一首，感慨道：

当时甲第接高城，此日凄然蔓草生。
秋冷颓垣喧野雀，春来老树有啼莺。
苍茫落照迷云堞，断续晴烟起角声。
林影渐低归骑缓，沉寥天阔晚霞红。

彼时，五垒城虽已不存，但仍可见“颓垣”“云堞”“老树”“林影”，且其地“古堤环绕，林茂土肥”（清康熙朝《南皮县志》），也不失为一处景观。因而，马士琼在编修县志时，将“五垒斜阳”及“钓台风苇”“九河烟草”“台山雨霁”“寒冰沉李”“龙井晴云”“卫滨泊舟”“慈阁梵音”“等胜迹各赋诗一首，收录于县志《古迹》中。（清康熙朝《南皮县志》记载：“景胜有八。知县巴蜀马士琼各赋诗一章以美之。”）

据南皮县地名办公室1982年12月辑印的《南皮县地名资料汇编》所记，唐开元四年（716）曾在此修建古刹长安寺，亦称潞灌寺（附近



还有龙门寺、焦山寺等寺院)。明嘉靖二十年(1541)重修,三十四年(1555)立碑文一通。按碑文所记,寺内建有大雄宝殿,内存《法华》藏经,有罗汉、玉皇石像,雕镂精巧。东西为伽蓝、天王殿,设有钟鼓楼台。前为山门,两廊为僧舍斋室。寺院周围碑碣林立,松木葱郁,香烟缭绕,境界幽然。为当地之大观,常有人游此。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编修《南皮县志》时,在卷十一《文献志五》中,还收录了南皮籍“博学工诗文,著作甚丰”(民国版《南皮县志》)的清嘉庆癸酉科(1813)举人张芝郁效法马士琼作的《南皮八景》诗文。其《五垒斜阳》诗曰:

忆昔河间分汉代,清池胜地尚淹留。
垒城此地成千古,歌舞当年乐五侯。
时去浮云连渤海,春来芳草接瀛洲。
斜阳却想梳妆迹,几度回光射画楼。

(原书注:“《方輿纪要》载,五垒在清池旧县西南,西去河间一百余里;地有梳妆楼遗迹。”)

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五垒城已荡然无存,但其遗址却得以保存,在古文诗作中还能寻觅到它的踪迹,这已经是实属不易了。值得欣慰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始,五垒城就已被列入县级保护单位,并采取了相应措施。

至今,当地人仍然津津乐道于这个已经逝去的史实,并口口相传着这个永远的故事。

(赵树森)



汉捕虏将军马武屯兵南皮北城拒匈奴

在东汉建武十三年（37）二月，光武帝刘秀曾遣破虏将军马武屯兵南皮北城以防御匈奴。马武为东汉中兴名将，曾随刘秀南征北战、平定四方。刘秀称帝后，给破虏将军，封杨虚侯。马武屯兵的遗址，后人称之为“马武岗”。

马武岗位置在冯家口镇刘文庄村东南500米处，是一个古城遗址，面积约45万平方米。刘文庄村学者张新华在查阅、分析了《汉书》《资治通鉴》的有关内容和注释后，认为此遗址虽然是马武当年屯兵的地方，但不应称为“马武岗”，实际为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酈道元所记述的南皮县的北皮城。

对照清代康熙、光绪两部《南皮县志》的记载，酈道元所说的“北皮城”就是南皮的北城，而“南皮城”就是现在的古皮城。

—

北皮城是沧州地区的一座历史名城，史书上多有记载。但具体在什么地方，却众说纷纭。

北皮城的位置，历史上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东汉时的应劭说，在南皮城北五十里；西晋时的阚骃说，北皮城在章武；北魏时的酈道元说，它是南皮县的北皮城。这三种说法中，酈道元说的方位具体明确，东、西、南三面都有参照的方位和地点，又有古城遗址与古河流遗址，应能佐证他的说法是对的。

说到古河流遗址，需要介绍一下南皮县的另一古河徒骇河，它是古老黄河的主干支流，传说中大禹治水的九河之一。而且自西汉以来就认为南



皮县是九河归一的地方。为此，王莽曾经改南皮县为迎河亭，改渤海郡为迎河郡。其实这里的河还只能叫徒骇河，不能叫迎河。迎河在《尚书·禹贡》《史记·河渠书》中都叫逆河，是指迎纳其他八河一起入海的河。

酈道元说：北皮城在成平县（汉置，在今泊头市齐桥镇北一带）东、南皮城北、浮阳城（古县治，汉置县，隋改名清池，今沧县旧州镇）西南。现在的南皮县刘文庄东南约1华里处的古代城镇遗址，恰好就在酈道元所说的位置，在南皮故城之北，约20里处。

北皮城与南皮城是一对姊妹古城，最早应一个叫南城，一个叫北城。齐桓公缮修皮革于南城，南城得名南皮，北城随之叫北皮。它们应该是同时形成、同时得名的。秦始皇灭齐以后，南皮开始设县，政治地位上才有了轻重的差别，但北皮城是两大河流的交汇口，由于位置重要而特别受到军事家的关注，所以，光武帝刘秀才派遣虜将军马武率军驻扎于此，防御匈奴。当时的南皮城就是现在南皮城东北约10华里处的“古皮城”遗址。

二

1992年版的《南皮县志》在“县城”一节中记：“章武（今黄骅、沧县境内）有北皮亭，故此城称南皮。”该志又引用《河北通志稿》说：“南皮城北50里有北皮城。”所以，结论是北皮城在“今黄骅沧县境内”。把真正的北皮城遗址却起了一个“马武岗”的名字。

最早的一种说法，是东汉末年应劭在他所著的《地理风俗记》中记载的：“南皮城北五十里有北皮城也。”该书早已失传，所述见之于《水经注》中。第二种是晋朝的阚骃在他所著的《十三州志》中说：北皮城在章武（章武在今黄骅境内）。唐代人颜师古在《汉书·地理志》渤海郡南皮县下注有：阚骃云，“章武有北皮亭，故此云南”。这个说法流传最广。第三种是北魏人酈道元在《水经注》中说：“南皮县之北皮亭。”在成平县东、南皮故城北、浮阳城西南。具体见该书“漳水”与“清水”条



目下。酈道元在“漳水”的条目下记：过成平县南、“衡漳又东，左会滹沱别河故渚，又东北清河，谓之‘合口’。又径南皮县之北皮亭，而东北径浮阳县西，东北注也”。在这里，酈道元明确地说：是南皮县的北皮亭，浮阳在它的东北。这与今天存在的城镇及河道遗址是完全一样的。

北皮城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呢？

刘文庄东南的古代城镇遗址，在南皮故城北 20 华里、东北至浮阳故城约 40 华里。据有关史料记载，成平故城在原交河县城的东北 40 里处，应在这处遗址西面不远的地方。地理位置与酈道元的记述完全相符；这处遗址的南面又有一段残存的東西向河流故道，理应是酈道元所说的“滹沱别河故渚”。《汉书·地理志》中，班固在成平县下作注说：成平，“有滹沱河，民曰徒骇河”，应该就是“滹沱别河故渚”这个地方。西汉成帝时的河堤都尉许商也说：“徒骇……见在成平”，可以佐证成平的滹沱河是古代的徒骇河。

十分难得，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沧桑之后，这里还保存了一段可以指认古徒骇河的遗址。据此可以认为这里是原北皮城无疑，也就是那个被称作“马武岗”的地方。

酈道元既然明确北皮城是“南皮县之北皮亭”，又明白地写出了它的位置，为什么在他《水经注》中写到南皮故城时引用阚骜的《十三州志》：“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当写到北皮城时，又引用应劭在《地理风俗记》中有关的记载呢？还进一步说：“《地理风俗记》曰：南皮城北五十里有北皮城，即是城矣。”显然酈道元不是用应、阚二人的说法来证明北皮城是在今天的黄骅或沧县，而是有意地把自己具体而准确的记述与应、阚二人的错误说法放在一起，用来矫正他们的错误。

三

实际上，北皮城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水经注》中已经提到它叫“合



口”。这是因为过去的岁月里，北皮城曾经是两条大河的汇合口。从周定王五年（前 602）起黄河在它的东边流过，滹沱河则在它的南面流淌。同时漳河也在上游不远的地方汇入此河，从此这里就成了黄河与滹沱河汇合的地方。西汉鸿嘉四年（前 17）仍有“渤海”“河溢”的记录。此后，王莽始建国三年（11）“河决魏郡”“遂不堤塞”，黄河又改道了，改到千乘入海。所留下的枯河，至今人们仍称它“王莽河”。但东光以下的河道有清河流入，所以酈道元写《水经注》时，这里的黄河才有了清河的名字。北皮城南的滹沱河也有了变化。东汉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准备东征乌桓，“凿渠自滹沱入泲水”，以解决运粮问题。从此滹沱河也不再流经这里。所以在酈道元的笔下，这条河就成了“滹沱别河故渎”。但这里仍是漳河与清河汇合之处。由于这里长时间是大河汇合的地方，所以在北魏时这里又有了“合口”与“合城”这个名字。《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就有“燕太原王楷、赵王麟将兵会高阳王隆于合口”的记载。

20 世纪 40 年代初，在这条古老河道的南岸（即刘文庄村东南 500 米处）出土了一枚马武印章。那是一位叫白玉山的老人在自家的地里翻土时刨出来的。这枚印章并不说明这里的城镇原来叫“马武岗”这个名字，它只说明这条古老河道是两汉时期的滹沱河故道。马武一生与这里有关的记载只有一次，那是在东汉建武十三年（37）的二月，光武帝刘秀“遣捕虏将军马武屯滹沱河以备匈奴”，但并没有说明具体的屯兵的地点，马武很可能就是屯于此地。当时这里正是滹沱河流入卫河的地方，卫河后来才改名清河。马武印章理应是当年遗物。也许，正是这枚印章成了给这个城镇遗址取名叫“马武岗”的因由。

历史资料显示，东汉马武曾在南皮屯兵；屯兵的地点就是在南皮的北城，也就是后来被称作“马武岗”的地方。

（赵树森 杜中洲）



汉代名士范丹“落户”南皮

在南皮古皮城西，有一处古聚落遗址，志载为流寓南皮的名士范丹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

范丹（112—185），字史云，东汉末外黄（古县名，秦置。今河南民权西北）人，为侨寓南皮的文人雅士。清光绪、民国《南皮县志》俱记载，范丹因“遭党锢，遂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或寓息客庐，或依宿树荫。如此十余年，乃结草庐寓居于邑（南皮）”。也就是说，范丹遭受党锢之祸的牵连，不得不携带妻儿，过了十几年漂泊无定的生活，最后寓居南皮。其住所被后人称之为“范丹居”，并作为一处古迹（遗址），收录于各个版本的旧志中。

清康熙朝《南皮县志》记载：“范丹居在古皮城西。盖当年避党锢之祸，因投栖于此。”1992年版的《南皮县志》对此的记述较为详尽些：“范丹居在古皮城西门外半公里处。面积3万平方米，地面有绳纹砖瓦、陶片等。据传，东汉桓帝时，范丹避党锢之祸，投栖于此。”经过近两千年的历史变迁，范丹的住居虽已荡然无存，但“范丹居”和范丹的一些故事却在南皮流传了下来。

史书载范丹为“范冉”，《后汉书》注，“冉”或作“丹”，南皮都称作范丹。光绪版《南皮县志》记述范丹“违时绝俗，尝慕梁伯鸾、闵仲叔之为人，与李固、王奂亲善。桓帝时，曾为莱芜长，以母忧不到。后辞太府尉（按《后汉书》为“太尉府”），以狷急不能从俗，常佩韦于朝。议者欲以为侍御史，因遁去。遭党锢，遂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



资，或寓息客庐，或依宿树荫。如此十余年，乃结草庐寓居于邑（在古皮城西）。所止卑陋，有时绝粒，不计也”。意思是说，范丹在汉桓帝时，曾为莱芜长，以母丧未到任。后辞太府尉，《后汉书》记为太尉府。

史料说范丹“以狷急不能从俗，常佩韦于朝。议者欲以为侍御史，因遁去”。狷急是性情急躁，韦为皮革。范丹个性鲜明，不随大流、不合时宜。平素推崇、仰慕梁伯鸾（梁鸿）、闵仲叔（闵贡）的人品，与李固、王奂亲善。李固是东汉末“党人”的重要骨干，反对宦官与外戚专权。宦官集团多次打击“党人”，史称为“党锢之祸”。范丹遭受党锢之祸的牵连，受到排斥与挤压，为避祸端推着鹿车（古时的一种小推车），载着妻子，捃拾自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靠捡破烂过那种漂泊无定、四处流浪的日子。有时住宿客舍，有时在树荫下过夜，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度过了10余年颠沛流离的生活。最后，范丹在古皮城西北落脚，用野草、芦苇等搭建了棚子定居下来，艰难度时光。有时粮尽食绝，没有一粒米入口，也绝不向宦官集团势力屈服。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举人、任丘籍边向禧赏游南皮时，曾到范丹故居凭吊，以范丹字“史云”为题赋《史云居》诗一首：

清风落落范莱芜，佩韦居然脱祸枢。

寂寞蜗庐甘绝粒，依稀粪舍隐蜘蛛。

诗文既记述了范丹当时的窘迫境况，也表示了对范丹品行、人格的赞许。

据资料记载，其时，人们给范丹编了歌谣颂之：“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2009年8月版的《辞海》对范丹的注释为：“通五经，尤深于《易》和《尚书》。桓帝时被任命为莱芜长，不就。生活极贫，有时绝粮。被称为‘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甑是古时蒸食物的炊具，相当于现在的竹筲子；釜也是古时煮饭用的炊具，相当现在的锅。你看，炊具上都蒙上了尘土，锅里甚至滋生出了鱼



儿——这是因为粮食断绝、久无炊烟的缘故，也是对范丹落魄生活的一个形象的写照。所以，在当时的南皮乡间很同情范丹，称赞范丹的品行为“贞节”。

二

在东汉之后的西晋，南皮还有一位名人及其居所，这就是石崇与石崇宅。范丹与石崇虽未同处一个朝代，但南皮自古以来便将这两个人、两个人的住宅以及两个人的故事广为流传。南皮古县志记载，明京兆尹王玠曾填过一首《石崇宅》的词，就是将南皮石崇宅、范丹居相对照写的。因词牌俟考，难以断句，根据意思试标点如下：

路西隐微坡，丹也尚遗址（指范丹居）。岿然颓其东，云是崇之里（指石崇宅）。丹崇当日约侈何啻径与庭，究竟同归寂寞荒凉里。胡椒论斛量，珊瑚难比拟。复何疑冢垒垒结构工，似将长夜营营终莫已。何如沟壑早自甘，说甚甑尘鱼在釜。铿铿清苦众所难，皎皎芳名称未死。何况中途更坦夷，移趋漫自东西指。南皮之地再驱车，俯仰徘徊聊赋此。

石崇宅在古皮城西侧（一说在城东北角），范丹居在古皮城西，两处相距应该很近。词中所写石崇宅在东、范丹居在西与实际方位相符。词中描绘石崇、范丹贫富悬殊，可谓天壤之别，身后俱处寂寞荒凉中。

在南皮民间，自古就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富，富不过石崇；穷，穷不过范丹。”石崇（249—300），字季伦，晋渤海郡（今南皮）人。为西晋开国元勋石苞的幼子，西晋时期的文学家、大臣、富豪。石崇少时聪慧，勇而有谋。20余岁时为修武县令，因有能名，入为散骑郎，后居城阳太守。因征伐吴国有功，被封为安阳侯。由于才学过人，屡建战功，被晋武帝器重，元康初年封为中郎将、荆州刺史。在刺史任上大肆劫掠往来客商而成巨富。如果当时也发布富人排行榜，石崇名列榜首应无疑义；说石崇富可敌国从文学的层面上讲也没有问题。比富时他将皇帝赠



给王恺的珍宝“珊瑚树”随手打碎就是证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亦官亦盗的人，惜因奢靡斗富而惹致杀身之祸。其爱姬绿珠不仅落了个坠楼而逝的可悲下场，还被诬为乱党，夷三族，一家老少15口人都被杀害。范丹虽然贫困潦倒，但始终坚持清苦操守。民间的俗语是将石崇和范丹这两位南皮贫富悬殊的名士互为参照对比的。石崇虽然才气过人，成就斐然，但留给后世的却是一个穷奢极欲的反面典型；范丹流传下的则是芳名彪炳史册的正能量，是儒家尊崇的贫富不移的典范。

（赵树森）



曹丕在南皮“讌友”之“浮瓜沉李”

成语“浮瓜沉李”源自于南皮的“寒冰井”，是魏文帝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时与文朋诸彦在南皮进行文学活动的典故。

南皮是秦代置县存留至今的全国 56 个古县之一，而古皮城则是南皮悠久历史的见证。它筑邑达 3000 多年，置县 2000 多年，曾为渤海郡治 500 多年。深厚的文化积淀，聚集了许许多多美不胜收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留下了犹如石崇宅、绿珠楼、范丹居、曹公固、寒冰井、射雉（讌友）台等胜景、遗迹。在这些景观中，最早见于史籍的当属“寒冰井”。

据清康熙朝《南皮县志》记载：“寒冰井，在（古皮城）西南百步。传为黄帝时所穿，伯益所修。即魏文帝沉李浮瓜处。”寒冰井的水清澈甘冽，魏文帝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时与吴质（文学家，汉建安时期为朝歌长，迁元城令，以文才受知于曹丕）等为文朋诗友，他们朝夕共处，相伴同游，抚琴对弈，饮酒赋诗。每食果品，先将甘瓜、朱李掷于寒冰井中，再取出后食之，倍感清凉可口，并因此而津津乐道。有趣的是，将甘瓜投入井水后浮于上，而投入朱李则沉于下，遂成轶闻。后人怀古，将“寒冰沉李”作为“南皮八景”之一，“浮瓜沉李”的典故便由此而来。

查 2009 年 8 月版《辞海》，对“浮瓜沉李”的注释为：“浮瓜沉李。沉，亦作‘沈’。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后以‘浮瓜沉李’为消夏乐事之称。”唐开元年间进士、曾侨寓南皮的萧颖士在《清明日南皮泛舟序》中记：“昔建安中，魏文为王太子，与朋友诸彦有南皮之游。飏鸣葭、浮甘瓜，清泉齠沦，千古一色，此城隅托胜之旧也”（《唐史》）。



清康熙十七年（1678）南皮县知事刘址在重修《南皮县志》时，将“寒冰井”“讌友台”“曹公固”“太史河”“刁公楼”“莲花池”“覆盆井”“射雉台”“钓鱼台”“古皮城”等十大景观赋《古迹十绝》并收录于志书中，一直流传至今。“寒冰井”诗曰：

一勺清泉古帝开，浮瓜不用望林梅。

自惭劳吏非消渴，日取冰壶玉液来。

说到“寒冰井”就必然要提及“射雉台”“讌友台”。春秋时期，齐桓公救燕北伐山戎时曾在此引弓射猎，后将其射猎之处称为“射雉台”（清康熙朝、光绪朝《南皮县志》俱载：“射雉台，在城北半里。齐桓公射雉处”）。汉末，曹操计破南皮城后，也曾在此地射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述：“帝尝于南皮一日射雉三十六（一说六十三）头（只）。”

当时，南皮城北一带水草丰美、群鸟栖息、景色秀丽，时为太子的曹丕常与文朋诸彦在“射雉台”赏游、赋诗，后将“射雉台”改称为“讌友台”。清光绪朝《南皮县志》记载：“‘讌友台’即‘射雉台’。魏文帝为中郎将时，与吴质诸人游赏于此。今尚高峻，居孔道中。”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建安文学”就是由曹氏家族开创并维系的。除曹植外，曹操、曹丕、曹真、曹休等都到过南皮。曹丕为魏太子时携吴质、阮瑀（阮籍之父、建安七子之一）等建安文人曾到南皮进行文学活动，而活动的地点和与之相关联的故事即在寒冰井、讌友台。对此，曹丕的记述为：“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而启路，文学托乘於后车。”阮瑀怀念南皮之游时写下了《感旧》诗：“昔会渤海时，南皮戏清泚。今复河曲游，鸣葭泛兰汜。”曹丕在《与朝歌令吴质书》中回忆：“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箏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之寒冰。皎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共载，以游后



园。”曹丕与“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同为建安文学代表人物)等文朋诗友在南皮的文学活动，深深地影响了南皮的文化发展，并为后世留下了成语“浮瓜沉李”和胜迹“讌友台”。其后，众多文人骚客纷至沓来，赋诗著文，凭吊怀古，并使得“南皮朝宴”“南皮之游”以及“寒冰井”“射雉台”“讌友台”都屡屡出现在历代诗作中，成为文人笔端诗赋酬酢的一个典实。

沧州籍著名学者戴明说为明崇祯七年(1634)进士，后任清顺治年间户部尚书，其在《发沧州之南皮》中就写下了“莺啼新麦浅，雉去暮台高”的诗句。相比戴明说的浪漫，清诗人、乾隆间文林郎张启运在《古皮城》中的“寒井在何处？古人曾胜游。我来只禾黍，青遍古城头”以及清康熙年间南皮县知事马士琼“浮瓜客去豪华散，吊古人来黍稷稠”和清嘉庆举人张芝郁“一曲哀笳成往事，半潭寒冰没新芜”就有些无奈和怅惋了。而清代著名画家、诗人刘文煊《河上望南皮作》中的“际晓层阴半面开，参差烟树隔河来。浮瓜沉李知何处，遥望当年讌友台”以及大兴籍清代诗人王庭绍《射雉台》中的“射雉台荒叫墨鸦，魏文遗迹久尘沙……幼弟东阿悲煮豆，故人智井忆浮瓜”则更多地表现出了斯人的叹惜与感慨。

品味古人诗作，让笔者推崇备至的当数清代诗人刘天义的《南皮咏古六首》，其中一首曰：

前日之游乐，人犹说子桓。一时夸讌友，此地共追欢。

瓜李消天暑，文章耐岁寒。诗林多继起，可续赋骚坛。

你看，诗人在字里行间不仅仅赞誉了曹丕等“讌友”们“浮瓜沉李”、消暑纳凉的“游乐”活动，更敬佩他们在“追欢”中赋写的“耐岁寒”的精品佳作。这些“继起”的文章，甚至“可续”楚辞中的《离骚》！

这虽然是诗人惯用的夸张手法，但“寒冰井”毕竟是真实地存在过。



或许，后世文人墨客们来此凭吊时，追忆和寻觅的不单是“寒冰井”，还有由它衍生出的许许多多传奇而又动人的故事。

（赵树森）



袁谭别驾王修在南皮义葬主公

世俗中多的是锦上添花，少的是雪中送炭，共赴危难则更难。王修在节操大义上是一位勇赴危难的正直名士。

汉末，王修曾寓居南皮。建安十年（205），曹操计破南皮城，追斩袁谭后，将其首级悬挂于北城门外，并下令凡有哭袁谭者，杀其全家。曾为袁谭别驾的王修却置生死不顾，哭倒于袁谭头下。曹操被王修的义气所折服，允许他收葬袁谭尸体。

—

王修，字叔治，北海郡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人，生卒年月不详。汉末曾寓居南皮。王修7岁时，母亲亡于祭神日。第二年忌日时，王修思母痛哭，悲哀至极，邻里感动得都停止了祭神活动。王修20岁左右到洛阳游学，住宿在张奉家里。张奉全家人都生了病，没有人照料，王修昼夜看护病人，直到张奉全家人都病好以后才离开。可能是遗传基因与家风的影响。王修的孙子王裒名列二十四孝人物之中。

汉献帝初平年间，北海孔融征召王修为主簿，代理高密令。王修治理地方抑制豪强、赏罚严明，深得百姓爱戴。高密恶人孙氏素来强横，他的门客屡屡犯法。社会上的抢劫人犯也逃入孙氏门下，吏役们都不敢去孙家捉拿。王修一介文人，毫无惧意，亲自带领吏役包围了孙家。孙氏抗拒防守，王修于是严令申明：包庇贼犯、畏缩不前者与贼人一同治罪。孙氏胆怯了，乖乖地交出了抢劫人犯。于是，当地其他横行不法的豪强也都闻风收敛，不敢再胡作非为。当时，胶东贼寇很多，百姓难得安宁，孔融又调王修为胶东县令。胶东人公沙卢宗族强盛，与官府作对



自立王国，修置营寨壕堑，不听从官府发派调遣。王修果断进行斩首行动，独自带领几个人骑马径自闯进公沙卢家中，斩杀了公沙卢兄弟几人，安抚了惊愕的族人。贼寇闻讯后也都被震慑，或蛰伏，或逃亡他处，胶东遂安，老百姓过上了太平日子。

袁谭任青州刺史，任王修为治中从事。别驾刘献多次诬陷诽谤王修。后刘献犯罪当死，案件由王修审理。王修没有落井下石，经审理从宽免了刘献死罪。刘献大感意外，时人也更加称赞王修。

二

袁绍病亡，袁谭、袁尚兄弟反目，袁谭在南皮曾就攻打袁尚事问计于王修。王修乘机进言袁谭：“兄弟就像一个人的左右手。比如一个人将要与别人角斗，却砍断了自己的右手，反而说‘我一定能胜利’，像这样行吗？抛弃了兄弟，不相亲近，天下人还有谁能亲近！下面有进谗言的人，在你们兄弟之间参与争斗，以求得有朝一日的利益。对此，要堵上耳朵不听。如能斩杀几个奸佞的臣下，兄弟重新亲近和睦，共同抗御四面八方的敌人，可以凭这个横行天下。”可惜，袁谭没有听从。袁绍政令宽纵，执纪松弛。在职有权势的人大多积聚财物，贪污奢靡，养了苍蝇，也喂肥了老虎。曹操攻破邺城，查抄没收审配等人的家财数以万计。曹操攻破南皮城后，察看王修家当，吃的粮谷不满10斛，却有书籍几百卷，其他再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曹操赞赏感叹王修的清廉、好学品格，礼聘王修为司空掾，代理司金中郎将，迁魏郡（今河南安阳）太守，后封大司农郎中令。

三

人的一生有一次勇赴危难，便可豪气毕现，王修多次勇赴危难，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北海郡贼寇谋反叛乱，孔融对左右的人说：“能冒死前



来帮我的只有王修了。”话刚说完，王修就到了。孔融遇到危难时，王修即使在家休养也会马上赶来解困，使孔融免于祸患；袁绍任王修为袁谭的别驾，袁绍病亡，袁谭、袁尚兄弟兵戎相见。袁谭兵败退守南皮，青州各地纷纷起兵反叛袁谭。独有王修率青州吏役百姓营救袁谭，袁谭高兴地说：“成全我部队的人，就是王别驾啊！”曹操破南皮城，追斩袁谭，下令有哭之者，戮及妻子。王修置生死于不顾，身穿粗布衣哭于袁谭头下，曹操责问他不怕死吗，王修对曹操说：“我曾受过袁氏的厚恩，如果让我收殓袁谭尸体，然后就死，我死而无怨。”曹操被王修的义气折服，听从了他。王修收葬了袁谭的尸体，受到时人的普遍赞誉。曹操曾问王修击败袁尚、袁熙之策，王修不答。曹操赞许感慨地说：“燕赵义士何其多也！”王修随曹操到邺城魏王府为官，严才在邺反叛曹操，带队属下攻打宫殿旁门。王修听到兵变就召唤马车，马车还未来到，就急忙率领属下官吏步行来到宫门。曹操在铜雀台上看到有人来，就肯定地对左右身边的人说：“那赶来的人一定是王叔治。”魏相国钟繇对王修说：“过去京城发生变故，九卿是各自居守在官府不出来。”王修回答说：“靠国家的薪俸吃饭，怎么能躲避国家的危难呢？居住官府不出来是符合旧制，但是不符合奔赴危难的大义。”

《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说：“王修忠贞，足以矫俗。”曹操评价王修：澡身浴德。毛宗岗认为，许攸降曹、助曹谋袁，王修则不然，王修贤于许攸远矣。

（杜中洲）



苏轼赋诗叹惋石崇

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轼是宋代文学成就的代表，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有感于石崇因奢侈、斗富而遭遇的祸端，尝作《豆粥诗》抒发了自己的叹息、感慨之心情。诗中曰：

“君不见滹沱流澌车折轴，公孙仓皇奉豆粥。湿薪破灶自燎衣，饥寒顿解刘文叔。又不见金谷敲冰草木春，帐下烹煎皆美人。萍韭豆粥不传法，咄嗟而办石季伦。……”

与石崇同时代的嵇绍有感于石崇的遭遇，写下了《赠石季伦》的诗作，感叹道：

人生禀五常，中和为至德。
 嗜欲虽不同，伐生所不识。
 仁者安其身，不为外物惑。
 事故诚多端，未若酒之贼。
 内以损性命，烦辞伤轨则。
 屡饮致疲惫，清和自否塞。
 阳坚败楚军，长夜倾宗国。
 诗书著明戒，量体节饮食。
 远希彭聃寿，虚心处冲默。
 茹芝味醴泉，何为昏酒色。



石崇（246—300），字季伦，小名齐奴。渤海郡（今南皮）人。西晋开国元勋石苞第六子，西晋时期文学家、大臣、富豪，“金谷二十四友”之一。石崇少时敏慧，勇而有谋。因是元勋之子仕途自然平步青云。20余岁，为修武县令，有能名。后入为散骑郎，迁城阳太守，因伐吴有功，填充安阳乡侯。后累迁散骑常侍、侍中。元康初年，出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在刺史任上劫掠往来富商致富。靠劫商敛财，在河阳置金谷园，召集文人左思、潘岳等结社吟诗。后拜为太仆，出为征虏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官至卫尉卿。外甥欧阳建曾得罪政敌孙秀，孙秀得志后又向石崇索要绿珠，石崇不允，被诬为乱党，夷三族，石崇遇害时52岁。晋惠帝复位后，以九卿礼仪重新安葬石崇。并封石崇曾孙石演为乐陵公。

好学不倦 力谏封赏

石崇20多岁就担任修武县令，以有才能著名。后入洛阳任散骑侍郎，又迁任城阳太守。太康元年（280），石崇因参与伐吴有功，被封为安阳乡侯。他在郡任职时虽有职务，仍好学不倦，后因疾病自求解职。不久，又被拜为黄门郎。

武帝因为石崇是功臣之子，又有才干，非常器重他。石崇的兄长石统因事触犯了扶风王司马骏，有人受司马骏指使，上奏弹劾石统，武帝打算严惩石统，后又赦免他。因石崇没有上朝谢恩，又有人想把罪名再加到石崇身上。石崇便向武帝上表辩白，得以解脱。经屡次升迁任散骑常侍、侍中。

永熙元年（290），晋惠帝司马衷继位，由太傅杨骏辅政，杨骏心里想效仿魏明帝即位时的先例，普遍给大臣们封爵位，以便讨好众人，收买人心。石崇与散骑侍郎蜀郡人何攀一起上奏认为：“陛下被正式立为太子有二十年，现在继承了大业，但是普遍奖赏，赐予爵位，比泰始之初



及各位将领平吴的功绩得到的奖赏还要丰厚，这就使得轻重不相称了。况且占卜得知，大晋传国世代无穷，现在开创的制度，是要传于后世的，如果有爵位就必得晋升，那么几代以后，就没有人不是公侯了。”但他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亦官亦盗 劫商致富

石崇作为古代富豪知名度颇高，人们常谈及的是他和皇亲贵戚斗富及绿珠为之坠楼的故事，导致后人对石崇之富印象特深，而石崇是怎么富起来的，人们仿佛也很在意。石崇的父亲石苞，在晋武帝时曾官至大司马，后曾一度遭受排挤，最终死于泰始八年（272）。从史料中看不出石苞有多富，只知道他生有6个儿子，而石崇是其最小的一个。石苞临死前将自己的财物分给诸子，可恰恰不给这最小的儿子石崇，石崇的母亲对此提出异议。石苞说：“此儿虽小，后自能得。”此话颇有点奇怪，就算石崇从小极敏慧，按常理去想，也应该分得父亲的一份财物。但这奇怪之举却告诉后人石崇的财富不是从他先人那儿继承来的。

石崇后官至城阳太守，伐吴有功，封安阳乡侯。但这不能保证使他富起来，而且能富到压倒贵戚王恺的地步。因为在伐吴过程中得以封侯者为数不少，王濬是伐吴第一功臣，所以刘禹锡写有“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诗句。王濬这人年轻时就好奢侈，因伐吴之功被封为襄阳县侯时，其子同时也被封侯，赐绢万匹，钱30万。但王濬也只是自己玉食锦服，奢侈自逸，以这样的家私还没表现出和人斗富的举动。

石崇的财富何以敌国？武帝死后，昏庸的惠帝继位。石崇出京为南中郎将、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加鹰扬将军。史书中记有这样一笔：“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费。”短短一语，总算使后人明白石崇是怎么富起来的了。刺史是一州的最高长官，商人路过荆州，石崇对他们实施了明火执仗式的抢劫，这种勾当绝对是亦官亦盗，这就是他白手起



家而成为巨富的原因，而后来能建有金谷园就比较好理解了。有在荆州的抢劫垫底，足以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来民间有谚云：“扒了石崇坟，天下没穷人。”

奢靡生活 登峰造极

曾有史料记载，石崇的财产富可敌国，宏丽室宇彼此相连，后房的几百个姬妾，都穿着刺绣精美无双的锦缎，身上装饰着璀璨夺目的珍珠美玉宝石，据《耕桑偶记》载，外国进贡火浣布，晋武帝制成衣衫，穿着去了石崇那里。石崇故意穿着平常的衣服，却让从奴 50 人都穿火浣衫迎接武帝。石崇在姬妾美艳中选择数十人，妆饰打扮完全一样，乍然一看，甚至分辨不出来。石崇刻玉龙佩，又制作金凤凰钗，昼夜声色相接，称为“恒舞”。每次欲有所召幸，不呼姓名，只听佩声看钗色。佩声轻的居前，钗色艳的在后，次第而进。侍女各含异香，笑语则口气从风而扬。石崇又撒沉香屑于象牙床，让所宠爱的姬妾踏在上面，没有留下脚印的赐珍珠 100 粒；若留下了脚印，就让她们节制饮食，以使体质轻盈。因此，闺中相戏说：“你不是细骨轻躯，哪里能得到百粒珍珠呢？”

据《世说新语》等书载，石崇的厕所修建得华美绝伦，准备了各式各样的香水、香膏给客人洗手、抹脸。经常是有 10 多个女仆穿着锦绣，打扮得艳丽夺目，列队恭立侍候客人上厕所。客人上过了厕所，这些婢女要客人把身上原来的衣服脱下，侍候他们换上新衣才让出去。凡上过厕所，衣服就不能再穿了，以致客人大多不好意思如厕。官员刘实年轻时很贫穷，无论是骑马还是徒步外出，每到一处歇息，从不劳累主人，砍柴挑水都亲自动手。后来官当大了，仍是保持勤俭朴素的美德。有一次他去石崇家拜访，上厕所时，见厕所里有绛色蚊帐、垫子、褥子等极讲究的陈设，还有婢女捧着香袋侍候，忙退了出来，笑对石崇说：“我错进了你的内室。”石崇说：“那是厕所！”刘实说：“我享受不了这个。”遂



改进了别处的厕所。

石崇每次请客人饮酒，常让美人斟酒劝客。如果客人不喝酒，他就让侍卫把美人杀掉。一次丞相王导与大将王敦一道去石崇家赴宴。王导向来不能喝酒，但怕石崇杀人，当美女行酒时只好勉强饮下。王敦却不买账，他原本倒是能喝酒，却硬拗着偏不喝。结果石崇斩了三个美女，他仍是不喝。王导责备王敦，王敦说：“他自己杀他家里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石崇为满足自己显摆豪富的虚荣心，竟然草菅人命。

炫富比阔 斗富王恺

石崇曾与晋武帝的舅父王恺以奢靡相比。王恺饭后用糖水刷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40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50里的锦步障；王恺用赤石脂涂墙壁，石崇便用花椒涂刷房屋。晋武帝暗中帮助王恺，赐了他一棵二尺高的珊瑚，枝条繁茂，四面延伸，世上很少有与之相当的。王恺把这棵珊瑚树拿来给石崇看，石崇看后，用铁如意随手敲下去，珊瑚树立刻碎了。王恺看后感到很惋惜，心疼得不得了，又认为石崇是嫉妒自己的宝物，石崇一笑置之：“别心疼了，我现在就还给你。”于是命令手下人把家里的珊瑚树全部拿出来。这些珊瑚树的高度都有三四尺，树干枝条举世无双且光耀夺目，像王恺那样的就更多了。王恺看了后，露出失意的样子。

豆粥是较难煮熟的，可石崇想让客人喝豆粥时，只要吩咐一声，须臾间就热腾腾地端来了；每到了寒冷的冬季，石家却还能吃到绿莹莹的韭菜碎末儿，这在没有保温条件下的当时可是件奇事。石家的牛从形体、力气上看，似乎不如王恺家的，可说来也怪，石崇与王恺一块出游，抢着进洛阳城，石崇的牛总是疾行若飞，超过王恺的牛车。这三件事，让王恺恨恨不已。于是他以金钱贿赂石崇的下人，问其所以。下人回答说：“豆是非常难煮的，先预备下加工成的熟豆粉末，客人一到，先煮好白



粥，再将豆末投放进去就成豆粥了。韭菜是将韭菜根捣碎后掺在麦苗里。牛车总是跑得快，是因为驾车者的技术好，对牛不加控制，让它撒开欢儿跑。”于是，王恺仿效着做，遂与石崇势均力敌。石崇后来知道了这件事，便杀了泄密者。

建金谷园 结社交友

石崇在河南的金谷涧，修筑了别墅“金谷园”，凡远行的人都在此饯饮送别。他前往徐州任职时几乎倾城出动，也在金谷为他设账饯行。石崇因山形水势，筑园建馆，挖湖开塘，园内清溪萦回，水声潺潺。周围几十里内，楼榭亭阁，高下错落，金谷水萦绕穿流其间，鸟鸣幽村，鱼跃荷塘。酈道元（北魏地理学家）《水经注》谓其“清泉茂树、众果竹柏，药草蔽翳”。园内筑百丈高的崇绮楼，可“极目南天”，以慰绿珠的思乡之愁。石崇派人用绢绸茶叶、钢铁器皿等去南洋群岛换回珍珠、玛瑙、琥珀、犀角、象牙等贵重物品，把园内的屋宇装饰得金碧辉煌，宛如金殿，可谓穷奢极丽。金谷园的景色一直被人们传诵。每当阳春三月、风和日暖的时候，桃花灼灼柳丝袅袅，楼阁亭树交辉掩映，蝴蝶翩跃飞舞于花间；小鸟啁啾，对语枝头。所以人们把“金谷春晴”誉为洛阳八景之一。明代诗人张美谷诗曰：“金谷当年景，山青碧水长；楼台悬万状，珠翠列千行。”描绘出了金谷园当年的华丽景象。只可惜历史战乱、沧桑巨变，昔日的名园已荡然无存，无可寻觅。

石崇到下邳后，与徐州刺史高诞争酒互相侮辱，军司上奏弹劾，被免职。石崇后来担任卫尉，与潘岳共同巴结奉承权臣贾谧，贾谧与他们很亲善。贾谧的外祖母广城君郭槐每次出来，石崇遇到时总先下车站在路左，望尘而拜。与当时的名士左思、潘岳、欧阳建、陆机、陆云、刘琨等二十四人结成诗社，史称“金谷二十四友”。

石崇成为“金谷二十四友”之一，是他一生最主要的成就。他的



作品有《思归叹》《自理表》《请微扬州刺史何攀表》《议奏封赏当依准归事》《楚妃叹序》《琵琶引序》《金谷诗序》（收录于《全晋文》）。1992年版《南皮县志》在《历代著述表》中列有《金谷园》10卷和《王明君辞》《思归吟》《大雅吟》各1卷。

宠爱绿珠 遭政敌杀害

绿珠，原姓梁，出生在广西白州境内的双角山下，姿容绝艳。古时越地民俗以珠为上宝，生女称为珠娘，生男称作珠儿。绿珠的名字由此而来。石崇为交趾采访使时，路过白州，以珍珠10斛得到了绿珠。绿珠善吹笛，又善舞《明君》，明君就是指汉元帝时的王昭君。石崇让绿珠吹奏此曲，她又自制新歌：

我本良家女，将适单于庭。辞别未及终，前躯已抗旌。仆御涕流离，猿马悲且鸣。哀郁伤五内，涕泣沾珠缨。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卿，积思常愤盈。愿假飞鸿翼，乘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昔为匣中玉，今为粪土尘。朝华不足欢，甘为秋草屏。使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

词意凄凉婉转，其才情亦可见一斑。绿珠妩媚动人，又善解人意，恍若天仙下凡，尤以曲意承欢，因而石崇在众多姬妾之中，唯独对绿珠别有宠爱。

石崇在朝廷里投靠的是贾谧，他为奉迎贾谧无所不用其极。永康元年（300），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诛杀贾后等人，贾谧被诛，石崇因为与贾谧同党而被免官。当时赵王司马伦专权，石崇的外甥欧阳建因弹劾司马伦与其结仇。依附于赵王伦的孙秀暗慕绿珠，过去因石崇有权有势，他不敢有非分之想。见石崇被免职，便明目张胆地派人向石崇索取绿珠。那时石崇正在金谷园登凉台、临清水，与群妾饮宴，吹弹歌舞，极



尽人间之乐，忽见孙秀差人来索要美人，将其婢妾数十人叫出让使者挑选，这些婢妾都散发着兰麝的香气，穿着绚丽的锦绣，并说：“随便选。”使者说：“这些婢妾个个都艳绝无双，但小人受命索取绿珠，不知道哪一个是？”石崇勃然大怒：“绿珠是我所爱，那是做不到的。”使者说：“君侯博古通今，还请三思。”暗示石崇今非昔比，应审时度势。石崇坚持不给。使者回报，孙秀大怒，劝王伦诛石崇。石崇、欧阳建暗地得知他们的计谋，便与黄门侍郎潘岳暗地劝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冏谋杀司马伦与孙秀。孙秀察觉此事，就假称惠帝诏命逮捕石崇与潘岳、欧阳建等人。当时，石崇正在楼上宴欢，见甲士到了门前，便对绿珠说：“今天我为了你而惹祸。”绿珠哭着说：“我应该在你面前死去来报答你。”遂自投于楼下而死。石崇还自以为是地说：“我只不过是被流放到交州、广州罢了。”直到被装在囚车上拉到东市，这才叹息道：“这些奴才是想图我的家产啊！”押解他的人答道：“知道是家财害了你，为什么不早点把它散发掉！”石崇无法回答。他的母亲、兄长、妻妾、儿女老少等 15 人被杀，石崇遇害时年 52 岁。

当初，石崇家的稻米饭撒在地上，过了一夜，都变成了螺，时人认为这是石崇全家被杀的征兆。有关部门查阅石崇的财产簿籍，有水碓 30 多处，奴仆 800 余人，其他珍宝财货田宅也无计其数。

永宁元年（301），司马伦被杀，惠帝复位后，以九卿礼仪重新安葬了石崇，并封石崇的曾孙石演为乐陵公。

石崇之死 源于权力斗争

石崇之死，应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据史籍记载分析，石崇最后死于“八王之乱”中的权力斗争，绿珠只是送他“上路”的导火线。他那巨大的来路不明的财富足以在乱世中成为被掠夺的对象。既然他在荆州能打劫别人，当别人有了条件时何以就不能打劫他？可怜他死到临头



还抱有幻想，认为最多被流放到交州或广州，等到押赴刑场时才明白弄权贪财害人的道理。石崇的死，表明这场权力斗争带有明显的“仇富”心态。

(赵树森 孙九如)

附：石崇所作《金谷园诗》序（全文）

《金谷园诗》序

余以元康六年^①，从太仆^②卿出为使持节^③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④在河南县界金谷涧^⑤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⑥、鱼池、土窟^⑦，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⑧；及住，令与鼓吹递奏^⑨。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⑩，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⑪，字嗣，年五十，为首。

注解：

①元康六年：公元296年。

②太仆：官名。秦汉沿置，时为九卿之一。掌皇帝的舆马和马政。

③使持节：魏晋南北朝时，掌地方军政的官往往加“使持节”的称号，给以诛杀中级以下官吏之权。

④别庐：本宅以外另建的住所。亦称别业、别墅。

⑤金谷涧：又称金谷，在今河南洛阳西北。

⑥水碓：利用水力加工粮食的机械。

⑦土窟：地下室，或在半山间削石崖为室。



⑧道路并作：众人同时演奏。这里指路上演奏琴、瑟、笙、筑的众乐人。

⑨递奏：轮流顺次演奏。

⑩凡三十人：苏绍以及“金谷二十四友”等三十人，皆当时名流。二十四友是：刘琨、陆机、陆云、欧阳建、石崇、潘岳、左思、郭彰、杜斌、王萃、邹捷、崔基、刘瓌、周恢、陈瞻、刘讷、缪徽、挚虞、诸葛诠、和郁、牵秀、刘猛、刘舆、杜育等。

⑪苏绍：《世说新语·品藻》记载，谢安谓金谷游宴众贤中苏绍最优秀。



明初 43 位翰苑名流题赞《积善堂记》

2011 年 12 月，中国著名戏曲及文学研究家孙楷第（南皮人）之子孙泰来，将孙氏家族珍藏了 600 多年的《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捐赠给国家图书馆。

《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汇集了明代永乐、洪熙、宣德年间一批朝廷重臣、翰苑名流、书法大家共 43 人为“积善堂”的题赞手卷，为稀世墨宝。此卷对明代书法及文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

《积善堂记》全称为《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积善堂是明永乐年间兵部员外郎孙敬在沧州的故居。《积善堂记》汇集了明代永乐、洪熙、宣德朝一批朝廷重臣、翰苑名流、书法大家共 43 人为积善堂的题赞手迹，迄今已逾 600 年，为稀世墨宝。2011 年，孙敬后裔、南皮孙氏族将之捐赠给国家图书馆。后，孙氏家族又把国家图书馆给予的、带有纪念意义的唯一一份《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高仿真复制件捐赠给了沧州文庙保存。

孙敬字克恭，原籍为河北怀来，明永乐初迁沧州后，为奉亲而建宅第，名“尊德堂”，后改为“积善堂”。对此，民国二十二年（1933）版《沧县志》明确记载：“积善堂在公署前偏西，明永乐间兵部员外郎孙敬居也。原名‘尊德’巷，即今孙家胡同。世有承德郎庐陵曾学士棨因匾其堂，曰‘积善’。一时馆阁名公俱有题赠。”

《沧县志》记述的改“尊德”为“积善”并为其匾的曾棨（学士）是明永乐二年（1404）甲申科状元，仕至翰林侍讲、英武殿大学士。他是



根据“积善人家必有余庆”而题曰“积善”的，并于永乐十四年（1416）秋八月既望（十六）日挥毫作“积善堂记”。

孙敬的祖辈皆仁人君子，乐善好施，尤其是在饥荒之年，许多人因得到周济而免遭饿毙，由此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誉。曾棨即是有感于孙氏的善行，遂将孙敬的居所取名为“积善堂”以彰其德，并题以匾额悬于堂中正壁。其后至洪熙、宣德年间，先后又有42人为积善堂题赞。孙敬将这些题赞手迹进行了精心装裱并汇于一卷，珍藏于家中。直至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孙敬九世嫡孙孙国重偶然发现此卷，如获至宝，“拂其尘垢”后，予以题跋并继而珍藏。跋文不长，但将积善堂的由来记述的十分清楚，试标点如下：

不肖一日掇拾遗编，偶于笥中得一手卷，展而披阅之，乃始祖先人所制也。先人家怀来，永乐时内徙沧邑，由胄监历复官员外郎，尝作堂奉亲而难于名称。翰林曾公暨“三杨”相公素嘉先人淳厚质朴、岂第温良。自上世以来，喜周好施，饥谨岁而赖全活者千人，遂以“积善堂”名之，匾于正壁。复为文以记其盛，盖取《易》“积善必有余庆”之意也。一时名公巨卿、缔交旧者咸重其贤，赠以诗歌，烂然盈帙，大都扬休振美，阐幽显微，鸣我先代世德之盛焉。先人遂演而成卷，固以上慰亲心亦以下垂后裔哉。不肖捧读再四，感叹不胜。窃谓子孙于先世有貽谋，弗以知非智也；知弗以永厥传非仁也。非仁非智，罪将奚辞。不肖是用拂其尘垢而珍之记室中，非特爱其诗文之丽，实欲继述先人之家法不坠云尔。时万历辛丑年六月六日九世孙庚子举人国重谨跋。

二

《积善堂记》为珍世长卷，是明永乐、洪熙、宣德年间重臣“三杨”（杨荣、杨溥、杨士奇）、“二沈”（沈粲、沈度）、金幼孜、姚广孝等43人为积善堂的题赞，即《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手卷经历600年，



旧装完好，字迹清晰，墨色如初。其中，被明成祖朱棣授予太子少师的姚广孝手迹，是其唯一传世手迹。在作者所能查到的31位题赞者的个人资料中，曾棨、陈循、李骐、曾鹤龄、萧时中5人为状元。朱孔易因擅长书法，于永乐年间被朝廷选中，授中书舍人，专写内制（翰林学士所掌之皇帝特殊文告），成为当时因书法优秀而入仕第一人。进士出身的王英因书法出众，朝廷制作多出其手，四方求墓志碑文者不绝。为此，皇帝特赐金钏束手，以免应接不暇，只有皇帝需要其书写时才开金钏。沈度为永乐年间翰林学士，善写各体，尤其擅长楷书，风格端正、秀气、圆润，深受明成祖的喜爱。当时朝廷很多金版玉册、重要制诰都出自他的手笔。读书人纷纷效仿，成为流行一时的“台阁体”。

手卷为绢本，纵31厘米，横1605厘米，系明代文史研究、中国古代家族文化研究的重要实物与文献。卷中题赞的43人依次为：庐陵曾棨，南昌胡俨，建安杨荣、毛彪，钱唐王洪，临江金幼孜，莆田黄约仲，华亭沈粲、马伯，庐陵周述，清江张澈，会稽山人刘真，四明陈葵，吴门王进、邓时俊，壶山李基，浙人刘韶，莆易黄察，东吴朱孔易，临川王英，南郡杨溥，范阳邹缉，四明郑复言，庐陵陈循，三山陈仲完，云间沈度、尹凤岐，长乐李骐，泰和曾鹤龄，匡山余鼎，吉水钱习礼，舜江薛常，莆中黄寿，慈溪陈敬宗，庐陵周忱，庐陵萧时中，文江罗汝敬，四明周翰，清江廖端、萧宽，逃虚老人姚广孝，庐陵杨士奇，天台李至刚。其后为孙敬九世孙孙国重于万历辛丑年（1601）为积善堂的题跋。

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版的《沧县志》之《文编》中，收录有金幼孜、胡俨、周述三人在《积善堂记》中的赞文。其中，金幼孜（1368—1431），号退庵，新淦（今属江西）人，建文二年（1400）进士，文渊阁大学士兼翰林学士，官至礼部尚书兼英武殿大学士。他在以“积善堂记”为题的“赞”中记：“予观天下之物，皆有积而后成。水之积由涓流而可以为江河，土之积由寸累而可以为岗峦。人之于善也，今日积



之、明日积之、又明日而积之，进进不已，而其余庆可以及子孙，观之渤海孙氏可见矣。孙之先以忠厚起家，有曰得才者，乐善好施予赍穷恤匮，汲汲焉力行之不怠，乡人目之为长者。得才之子成甫，尤笃志于善，轻利重义，居乡里恂恂焉……”胡俨（1361—1433），明代文学家、教育家，永乐二年（1404）拜为国子监祭酒兼翰林侍讲，掌管国学。为重修《太祖实录》和编纂《永乐大典》《天下图志》等书的总裁官。他于永乐十七年（1419）秋七月在《孙氏积善堂诗并序》中记：“……余闻克恭之祖德（得）才善，居乡乐善好施，老而弥笃，乡人多赖之……”其诗曰：“渤海有孙氏，翼翼弘高堂。累世多积善，奕叶扬芬芳……”周述为明永乐二年（1404）榜眼，他在《积善堂赠孙克恭》中诗曰：“圣代淳风遍，君家世德深。诗书传自昔，庆泽及于今……”这些赞文（诗）都对孙氏家族的善行与义举给予高度的评价，颂扬之词溢于字里行间。

三

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手卷交由孙楷第先生保管。孙楷第祖籍南皮县王寺村，是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的戏曲及文学研究家、教授，先后供职于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图书馆、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195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他曾将手卷请现代著名学者邓之诚、沈兼士、黄侃鉴赏，三人都在卷末题识）。他深知手卷为稀世珍品，因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有将其捐献给国家的考虑，但因种种原因未能遂愿。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郭沫若先生得知孙楷第先生所藏《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中有姚广孝的手迹，颇思一见。应郭老之请，孙夫人携手卷请郭老赏鉴。郭老仔细看后，又请在座的光明日报记者将姚广孝题字拍摄下来，并予留存。

姚广孝虽非仕途出身，但却是一个鼎鼎有名的人物。而且，他在《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中的手迹，是其唯一的传世之作。姚广



孝（1335—1418），幼名天僖，明苏州长洲（治今江苏苏州）人，14岁出家为僧，法名道衍，字斯道，号独庵老人、逃虚子。洪武年间从燕王朱棣到北平（今北京），为心腹谋士。惠帝（建文）削藩，他密劝朱棣起兵，并为筹划军事。成祖（朱棣）即位后复姓，赐名广孝，授太子少师。曾参与重修《太祖实录》与编纂《永乐大典》等工作。工诗文，有《姚少师集》等。病逝后追赠为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朱棣亲为其制神道碑记录其功。姚广孝在《积善堂记》中题赞：“水积成渊沼，土积成山丘。何如积善行，举世无与俦……”

四

在“文化大革命”中，手卷曾一度交由科学院学部文研所军宣队收存，“文化大革命”后期手卷又回到孙楷第手中。其时，他已年逾古稀，虽捐赠初衷未改，但这一心愿直到去世都未能实现。近年来，经孙楷第之子孙泰来先生与族人反复商讨，决定将手卷捐献给国家。

为将传家宝尽快顺利地捐献给国家，孙泰来先后辗转找到了同为南皮老乡的王蒙。在王蒙先生的积极联系与协助下，终于完成了孙楷第先生的未竟之志。

《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捐赠仪式于2011年12月29日在国家图书馆红厅举行。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南皮孙氏家族代表出席了仪式，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主持了活动。仪式上，孙泰来等代表孙氏家族将《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捐献给国家图书馆永久收藏。周和平代表国家图书馆接受了捐赠，并向孙氏家族颁发了捐赠证书。王蒙先生对此次成功捐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

周和平馆长在捐赠仪式上对孙氏家族的义举表示了感谢。他指出，



《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是孙氏家族的传家宝，他的捐赠对于国家图书馆在补充馆藏、提供名家手迹标本与文史研究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国家图书馆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机构，一直履行着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职能，诚挚地期盼更多的文献通过捐赠转让等形式入藏，希望更多的社会贤达加入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队伍中来，共同为社会发展、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不懈努力。

国家图书馆为褒扬孙氏家族的义举，给予20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据介绍，孙氏族人已把200万元无偿捐献给南皮县教育事业，用于建设王寺小学。经协商，王寺小学命名为“王寺积善堂小学”，由建设方为捐赠方（渤海孙氏积善堂后人）立功德碑一通。南皮县人民政府也于2012年10月向孙氏族人颁发了荣誉证书，以资谢旌。孙氏家族还把国家图书馆给予带有纪念意义的唯一一份《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高仿真复制件捐献给沧州文庙保存。

南皮县志办公室在搜集县志及年鉴资料时获悉了南皮孙氏族人将珍藏600年的稀世墨宝捐赠国家图书馆的信息，便找有关人士进行了访谈，并将征集的史料收录到《南皮年鉴》中。

（赵树森 杜中洲）



清内阁学士陈宝琛撰写张之洞墓志碑文并书丹

清末重臣张之洞仕至军机大臣兼管学部，诰授光禄大夫、体仁阁大学士。宣统元年（1909）去世，晋赠太保，谥“文襄”。翌年归葬南皮。其墓志铭由赐进士出身、诰授荣禄大夫、总理学馆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闽县陈宝琛撰并书丹；赐进士出身、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实录馆正总裁、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天津徐世昌篆盖。

张文襄公墓志铭

铭文

景庙西狩回蹕之六年，庶政整新，顾朝臣无足与图深规远者，乃诏召体仁阁大学士、湖广总督南皮张公入赞枢机，兼管学部，寻充经筵讲官。逾年，上疾大渐，孝钦皇太后仍弃群臣，醇亲王监国摄政。公以顾命重臣镇绥内外，海内望新治。而公积忧劳成疾，十阅月，遽薨于位，朝野震騫，如倾梁栋。盖公抱体国之忠，救时之略，膺疆寄垂三十年，英流硕彦，群冀公持钧轴奠区夏者，殆十年、二十年，而需迫归迟，重夺之速，天之不吊，何如也？

公讳之洞，字孝达，一字香涛。举咸丰壬子顺天乡试第一。同治癸亥廷对，用直言时政，擢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历官国子监司业，詹事府左中允司经局洗马，翰林院侍讲、侍读，詹事府右庶子、左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擢内阁学士。出为山西巡抚，擢两广总督，移湖广，再权两江。平日论学言政，以法圣崇王为体，以进夷予霸至国富强为用。官翰詹时，使俄大臣崇厚定俄约不详，失伊犁地数百里，疏争数十，卒



改前约，还伊犁。他所指陈，皆关至计。山西旧有土铁出洋之禁，民间岁输官铁、潞绸，又苦充驿，公至，一蠲除之。经略边外七厅蒙地，为兴屯练兵计，继者踵其法，事遂办。法越之役，朝议和战不决，法乘隙扰台湾及闽。公至粤，则建攻越救台之议，大举洋债，以强半助滇、桂、越、台诸军，而特遣冯子材、王孝祺两军援桂，遂克谅山，法以就款。初，铁路议兴，言者或疑其非便，李文忠公小试于京津，公谓宜大兴卢汉，以经南北之脊，则粤汉、川汉、宁沪、苏杭次第可举。在粤，奏上之，于是朝廷移公督楚。公之督粤也，注边海之防，越事定后，汲汲奏移广西提督驻龙州，建钦、廉、镇南关炮台，设守琼州，经营榆林港。于粤、闽厂造兵船十数，设水陆师学堂以练将。清关税、盐课，铸银币，榷烟膏以裕餉，严治道以清奸。及移楚，则一以路政、工业为务。大冶产铁，江西萍乡产煤，公设炼铁厂汉阳，既奏开之资路用兼造炮械。以荆壤宜桑、棉、麻、梟而饶皮革也，因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制革诸局。佐之以堤工，通之以币政，用尽地利，抵洋货。而中东事起，上下议变法新学科武备。始，公典试提学浙江、湖北、四川，迄任疆帅所至，创立书院，以通经学古，提倡士风，谓求才必由学。于鄂于蜀，有经心、尊经；于晋有令德堂；于粤，有广雅；比督楚，复创两湖书院。其权江督也，巡阅江防炮台，察南北营政，于陈台窳炮、骄将惰兵，悉与更易，募德弁，练江南自强军。至是，乃首采东西规制，广立文、武、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学堂，遣游学，设将校讲习所，筹款造船。又以邪说诬民，著《劝学篇》辟之，虽丛忌毁，不顾矣。洎夫拳乱召戎，大局危岌，而公计益纡，忠益明，心乃益苦矣。于时，中外沸腾，公迭请剿匪护使馆，不报；则急电各国外部，及来华水师将领暨各领事，立约保护东南。测联军必入京，督抚中有联名阻乘輿西幸者，公闻大惊，急电撤銜疏论之。俄乘拳乱，占东三省，胁将军增祺定新约，关东权利尽失。联军和约成，迫全权画押有日矣，公力争得寝。既日俄



争东权构兵，或邀公出劝止，拒之。两国定约，兵解，东三省以全。其振大纲、断大计类此。

公为政，经画恢宏，而综理微密，千条万端，一心默识。用财浩繁，大率取之中饱私规，不竭民膏，不侵库款。其对外，如拒赫德之议，设沿海巡航，加农赋，免税厘；英提督贝思福之代练华兵，美员精琦之图揽币政；联军各国之请浚吴淞口；日、德商船之逾越汉口码头；收回美、比合兴公司之承办粤汉铁路，皆据理抗争，务以保全国权为主。抗怀千载，所在祠其名贤先哲，若晋杜成侯，陶桓公，唐裴、李，宋韩、范、司马，无日不流连心口间。为学兼师汉、宋，去短取长，恶说经袭公羊。文字抚六朝，谓为权诡乱俗，癸卯入觐，怵然于中学式微，道法将坠，手订学堂文章程，于经、文两科尤注意焉。比还朝，益亟亟于普建存古学堂、图书馆。呜呼！公之忠规密谏，关系斯文之兴坏，匪独天下安危而已。薨于宣统元年八月丁酉，春秋七十有三。公以谅山之捷，赏戴花翎。论保全东南疆土，功赏加太子太保。今上御极晋太子太保，赐紫缰。遗疏闻，赠太保，谥文襄。曾祖讳怡熊，浙江山阴知县；祖讳廷琛，福建古田知县；考讳镛，署贵州贵东道，赠太仆寺卿，皆追赠如公官。曾祖妣氏傅，祖妣氏王、苏；妣氏刘、氏蒋、氏朱，皆一品太夫人。配石夫人，继配唐夫人、王夫人，前公卒。子六：权，戊戌进士，礼部郎中，赏四品京堂；颢，附生，前卒；仁侃，邮传部员外郎，赏郎中；仁涑，一品荫生；仁实，主事；仁蠡。女三，长适卞绎昌。孙五：厚琨，早卒。厚璟，拔贡，赏主事。厚琬，厚璵，厚瑜。孙女二。曾孙三：遵骥、遵驥、遵骐。

初，宝琛与公接膝京师，谬引同志。里居，一访公广州，前后契阔几三十年。前岁入都，见公道孤志厉，气郁虑煎，私用恹汉，孰图会遭而诀遽哉！公子权等，将以宣统二年十二月乙酉，葬公县西南原新阡，乞文纳圻。思公谁嗣，乃最其政绩，志事于右，而系以铭。铭曰：



宋庸乐喜，邻国寝兵。陶恒淹广，晋业不宏，相才俾镇，如栋作楹。老毗匪晚，顾大宁盈。昔居禁中，槃槃公望。卅载封圻，忠勤无上。忠实勤止，遇特艰哉。浅迂公谔，检忤公猜。帝曰相予，及公未耄。公发已皤，公精未耗。国有大恤，赖公而绥。移山逐日，期月曷为？公存郁纡，公没谁继？独其宏心，天蟠地际。埋辞幽宫，永贞百世。

附：

张之洞墓及重修张之洞墓园纪事

清末重臣张之洞的墓地在其原籍双庙村北的张氏祖茔，整个墓群占地达千亩，曾为南皮的一大园林景观，很多人慕名前来拜谒、凭吊。在“文化大革命”中，张之洞坟墓遭到损毁，尸骨亦下落不明。20世纪90年代，中共南皮县委、县人民政府曾重筑张之洞墓，惜为一座空坟。后经多方努力，张之洞遗骨终被找到。2011年4月21日，“南皮县第四次张之洞学术研讨会暨张之洞墓园落成仪式”在南皮举行，这标志着南皮县重修张之洞墓园的工作已经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别号壶公，又号香岩居士、无竞居士，晚自号抱冰老人。祖籍南皮县刘八里（原双庙）乡双庙村。

张之洞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生于贵州，1863年中进士，列一甲三名，授职翰林院编修。历任湖北学政、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太子太保、太子少保等，以清流健将、两朝重臣而影响晚清30年。他的业绩、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历史车轮的前进，在客观上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了准备，起到了重要作用，奠定了革命的基础。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称之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2006年，张之洞被评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河北省十大名人之一，沧州地区仅此一人。

张之洞于1909年10月4日病逝，6日谥号“文襄”，晋赠太保；翌年



归葬南皮。

张之洞的墓地坐落在南皮县城西南、双庙村东北里许之处，此为张氏的祖茔，这里埋葬着张氏先祖、明河南按察使张淮，明陕西按察副使张谥，张之洞之父、贵州兴义府知府张镛，以及清道光朝丁未科状元、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张之万等显赫人物。张之洞的墓在其父张镛的墓旁、张氏祖茔的东北角。先他而逝的石夫人、唐夫人、王夫人与其合椁共葬一墓。墓高3米，底部直径约7米。有4通碑立于墓前，其中两通是神道碑，一通为纪念碑，一通是门生故吏捐资所建的遗爱碑。遗爱碑的碑阴刻有张之洞兴学育才的事迹及捐资者的名字，在捐资者中即包括了后来的反清先锋、中国民主革命家黄兴和革命元老董必武。在神道两旁布立着青石雕刻的石像生，有石马、石猴、石羊等。墓地中松柏、杨柳、马尾松、白杨等各类品种的树木纵横交错，构成各种图案。四周松墙，内为柳城，与其他坟墓连成了一片。

张氏家族迁南皮已逾600年，为当地的名门望族。几百年间，共出举人50多人、进士20多人、探花1人、状元1人，既有七品知县，也不乏一品大员，达官显贵、沿袭不衰。其祖茔历经营造，占地达千亩，坟冢连绵、碑石林立，苍松翠柏、遮天蔽日，宛若一片园林，郁郁苍苍，颇为气派，来此凭吊的社会名流络绎不绝。

令人痛心与惋惜的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由于“大炼钢铁”、修水闸、建礼堂等需要大量木料，整个墓地的林木逐渐被砍伐殆尽，石碑也都被推倒、砸毁。“文化大革命”中，张之洞墓地碑刻被捣毁，坟墓被挖开，后了无痕迹，他与三位夫人的尸骸也下落不明。

1992年冬，中共南皮县委、南皮县人民政府为谋划“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决定筹建张之洞墓园。墓园规划占地500亩，需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为此，首先在张之洞原墓地筑起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平毁的坟墓（空坟），在墓前立起复制的4通墓碑，并于1993年10月4日（张之洞逝世84周年忌日）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



历史名人与南皮 ◎ 文化丛书 ◎

当时，为建设张之洞墓园，社会捐资再加上县财政的投资，共筹集到三四十万元。然而，修墓、立碑、搞纪念活动等就花去了其中的一大部分，至公祭活动结束后，所筹资金已所剩无几，县财政无力承担后续费用，筹办活动陷入窘境，难以为继，筹建委员会及办公室亦在不声不响中撤销解散。

时光进入新的世纪，传统文化的回归再一次成为热潮。社会上，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张之洞在 100 多年前提出的“中体西用”的文化价值。而在南皮，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加入到张之洞研究之中，许多老干部、有识之士始终没有放弃对张之洞墓园（张公园）的兴建。

2004 年 5 月 21 日，南皮县成立了张之洞研究会；2005 年 5 月成立了张之洞书画院；2006 年张之洞纪念馆落成开馆；2007 年 10 月，在南皮县第一中学（前身为张之洞于 1907 年捐资建立的“慈恩学堂”）隆重举办了百年校庆；2008 年 10 月 4 日，在初步建成的张公墓园举行了张之洞遗骨安葬仪式（为再建张之洞墓园，南皮县委、县政府委派张之洞研究会承担寻找张之洞尸骨的任务。历时一年，几经周折，最后找到了当年亲自保护、掩埋张之洞尸骨的知情人，终于找到了准确的掩埋地点，使逝者入土为安）。张公墓园占地 15 亩，自 2007 年下半年开始筹建，至 2008 年 10 月即完成了一期工程，使墓园粗具规模。墓园修建在张之洞墓原址，坐北朝南，周围垒造院墙，园内筑建张公墓，墓高 3 米，墓前竖立 1993 年雕刻的 4 通墓碑。墓区内墓道、广场、公路业已修通并予硬化，栽种了国槐、塔松及花草。园内建有张公祠，为仿古建筑，祠内塑有张之洞像以及张公生平功业的文字、图片等资料，园门匾额“张之洞墓园”为原文化部部长、南皮籍著名作家王蒙所题。遗爱碑移于墓园门前 [此碑原立于张公墓前约百步，为宣统三年（1911）九月贺县林世焘撰文、天津华世奎书丹、固始吴敬修篆额。“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重修张公墓时，依照民国《南皮县志》所记之碑文重刻]。

张之洞墓园的再建与重修，不仅是对这一重要历史文物古迹的恢复，也体现了人的理性及传统文化的回归，更是思想、认知上的进步和蜕变。它使



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了正确树立历史观的重要、法治建设的重要和社会秩序的重要。随着张之洞墓园的落成以及张之洞纪念馆、香涛公园的建设，南皮县的张之洞研究活动日益深入，通过研究，充分展示了张之洞的务实创业精神，并为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以资借鉴的经验及有益的启示。

（赵树森）



康有为盛赞《刁遵墓志》碑刻

在南皮县刁公楼村出土的“缺角碑”即《刁遵墓志》，全称《魏故使持节都督洛兖州诸军事平东将军兖（洛）州刺史刁公墓志铭》，为北魏龙骧将军、洛州刺史刁遵（谥曰“惠侯”）的墓志铭，因出土时右下角残缺，俗称“缺角碑”。

“缺角碑”碑刻书法浑穆舒畅，是北魏碑志中著名书迹之一，被誉为“魏碑之冠”。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把此墓志碑刻书法列为精品，赞之“如西湖之水，以秀美名寰中”。

—

刁遵（441—516），字奉国，北魏渤海饶安（今南皮刁公楼村）人，为官宦之家，名门望族。其先祖刁恭在三国时任曹魏齐郡太守，刁恭之子刁攸在晋武帝司马炎时为御史中丞，刁攸之子刁协（？—322）是刁遵的高祖，曾任晋镇东将军、尚书左仆射、尚书令等职。东晋元帝年间，刁协在宅院中建造了一座楼，名曰“尚书楼”，时人尊称“刁公楼”。其后，由于来此地的居民逐渐增多，形成了村落，遂取名为“刁公楼村”。

刁遵的曾祖刁彝为晋侍中、徐州牧，祖父刁畅官居晋右卫将军；父刁雍因伯父刁逵与后来成为宋武帝的刘裕结怨，投奔北魏，后被封为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刁雍于北魏太和八年（484）因病去世，终年95岁，谥曰“简”。刁遵承袭父爵，例降为侯。民国版《南皮县志》记载：“遵袭雍爵，太和中例降为侯。景明中除相州魏郡太守（《魏书》）。临下宽明，德洽于民。还为太尉谏议参军。年七十，志力不衰。延昌三年迁司农少卿，寻拜龙骧将军、洛州刺史。遵招诱有方，梁新化太守杜性、



新化令杜龙振、平阳令杜台宣等率户三千归遵。熙平元年七月卒，年七十六。”

刁遵去世后，“朝廷痛悼，百僚追惜。赠使持节都督兖州诸军事、平东将军、兖州刺史，侯如故，加谥曰‘惠’，礼也。唯公为子也孝、为父也慈，在臣也忠、居藩也治。兄弟穆常棣之亲，朋友著必然之信，尊贤容众，博施无穷，载仁抱义，行藏罔滞，温恭好善，桑榆弥笃”（《刁遵墓志》）。刁遵于北魏熙平二年（517）冬十月（南皮县志载“以二年岁次丁酉冬十月己丑朔九日丁酉”）归葬南皮。据阮氏《山左金石志》记述，刁遵墓志文词简质，书更遒媚。

二

《刁遵墓志》出土于清雍正年间，民国版《南皮县志》记曰：“此石（即刁遵墓志）高三尺二寸，广二尺八寸，字二十八行，行三十字。清雍正间，南皮县刁公楼村耕者得自于刁氏墓中，后沦于南皮夜珠高村土地祠神座下。”根据史料记载，《刁遵墓志》在刁公楼村出土后，当时并没有人认识到它的巨大价值（清光绪《南皮县志》叹曰“殊不知爱惜”），长期废置，无人问津。多年后，离刁公楼村不远的夜珠高村（原属南皮、今属盐山）修葺土地祠，因找不到合适的石料，遂捡去做了神座的底石。乾隆二十七年（1762），乐陵刘克纶从友人处访得，并以木板补残缺处，刻跋于其上，不久又毁，其后总存高氏家。咸丰四年（1854）十二月，高佩持赠叶廉访圭书。叶氏以素石补其缺角。光绪三年（1877）冬，南皮张主事官祥又从叶处得之。光绪己卯年（1879）归南皮宰相状元张之万家收藏。

《刁遵墓志》是记述刁遵家世政绩的墓志铭文，为什么在出土后历经辗转、多次易手呢？而且出土时右下角已残，缺150余字，中间浸漶20余字，可以说是残缺不全了。众人之所以竞相收藏，答案就是其重大历



史及文化价值。众所周知，魏碑是指元魏（北魏、东魏、西魏）碑志造像等石刻文字，代表了北朝的书法水平，而其中以北魏最高。元魏碑石以其特有的慷慨、豪迈的气势和广博雄厚的规模，在悠久的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在清代中期，书法界就提倡学习魏碑，书风因而为之一变。被誉为“稀世之宝”的、俗称南皮“缺角碑”的《刁遵墓志》其特有的风格和美妙精绝的天姿，载誉魏碑，代表了元魏碑石的最高水平，成为魏碑中的一朵奇葩。

《刁遵墓志》为楷书，其提按使转雍容自得，用笔方圆结合，遒劲有力，起笔收笔以及转折回环之处变化多端，每字各不相同，字形端正，结体茂密，圆腴厚劲，具有端庄古雅之美。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把此志列为精品，赞之“如西湖之水，以秀美名寰中”。著名古籍版本专家、书法家杨震方的《碑帖叙录》云：“六朝墓志以峻劲胜，此志有六朝之风而无其习气，转折回环居然两晋风流。唐人若徐浩、颜真卿等皆胎息于此。”清代著名书法理论家包世臣赞誉此碑与魏碑的另一名石《郑文公碑》为“魏碑之冠”；近代学者叶昌炽在其所著的《语石》一书中，称“北朝墓志《刁惠公》第一”。

三

《刁遵墓志》出土已近 300 年，它的面世，反映了南皮厚重的文化积淀。上文提到，乐陵举人刘克纶曾对此碑进行了考证，并题跋数行，由高氏镌木补其缺。现在看来，此举虽有些不伦不类（其后南皮宦官叶圭书又以素石补其角，但终无成效），但也看出此碑的价值和人们的珍爱。刘克纶的“跋”文曰：“按刁氏志铭，镌于元魏熙平间，历隋、唐、五代、元、明以迄今日，盖千余年矣。……质之洛南薛尺庵先生，先生曰：‘况晋帖尽是摹临，唐碑率多勾勒。兹志端楷古秀，盖去晋未远而风格犹存。且今之书法，自唐而溯晋，此志书法则由晋以开唐希（稀）世之宝，’



显晦有时，其公诸世。’ ”

清咸丰元年辛亥科（1851）举人潘震乙曾作《刁上舍持刁公墓志铭一帧装潢工致来求题跋因走笔题四绝》诗，第一首为：“龙骧阅阅著千秋，渤海名家姓字留。片石陆离荒塚没，刁公故里只传楼。”其后亦有“松门石马尽凋残，字古铭从魏晋传”“古墓残碑金石寿，珍藏什袭子孙功”的诗句，由此，即看出作者对刁氏故里（含墓园）凋残的惆怅，也流露出对此碑文的赞赏。

值得一提并让人深感欣慰的是，《刁遵墓志》虽历经坎坷，但自从“光绪己卯归张相国之万家”（民国版《南皮县志》）以后，再没有易手，此碑一直存放在南皮城张之万状元府内。1937年“七七事变”，状元府全家搬到天津，此碑被藏在状元府会客厅的夹皮墙内。至1945年南皮县城解放后搞土改运动，始被扒出，由南皮县政府派人送到当时的渤海军区驻地惠民。之后几经辗转，后由博物馆收藏。

作为南皮出土的最有影响的碑石之一，《刁遵墓志》现已被拓成各种字帖，广泛流行，受到了众多书法爱好者的青睐。

（赵树森）



徐世昌撰文、华世奎书丹南皮张氏双烈女碑

在天津市河北区中山公园的西南隅，有一座碑亭，亭中矗立着南皮张氏双烈女碑。撰写碑文者是清军机大臣，后任北洋政府国务卿、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书丹者为清末正二品阁丞、著名书法家华世奎。

—

南皮张氏双烈女事件在民国初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当时，在“双烈女”事发地天津和其家乡南皮都建有“烈女祠”。

南皮的“双烈女祠”在南皮县城原文昌阁东，俗称“张氏双烈女祠”。双烈女祠建于民国六年（1917），立碑两通。据民国版《南皮县志》所记，其中的“南皮张氏双烈女碑”由清监察御史张瑞荫（清状元宰相张之万子）撰文，诰授荣禄大夫、内阁阁丞天津华世奎书丹并篆额；“南皮张氏二烈女碑记”由诰授荣禄大夫、赐进士出身、前都察院都御史、山西巡按、翰林院编修张曾敷撰文，敕授文林郎、举人、候补知县张榛书；诰授资政大夫、赐同进士出身、二品衔候补、四品京堂张权（清末重臣张之洞子）篆额。

天津的“烈女祠”建于西门外明费官人墓侧。由徐世昌撰写碑文，华世奎书丹。

这么多的朝廷重臣、权贵为双烈女碑及碑记撰文、书丹、篆额，二女子的生前身世一定极为显赫。

其实不然，民国版《南皮县志》记载：“张氏双烈女，南皮人。家赤贫，其父绍庭携妻金氏及三子两女客天津。长女张立、次女张春。绍庭佣工自给。一日失业，夫妻相对泣。”这就明白无误地说明，张绍庭一



家离乡背井，外出谋生，不仅默默无闻，而且已经到了贫困潦倒的窘境。其二女死后之所以引起轰动、关注、赞誉以至于风光无限，这里面就包含了一个惊心动魄、令人震撼的真实故事。

在央视十二频道于2007年8月12日20:20分播出的《南皮张氏双烈女》节目中，将张氏双烈女的故事作为《民国天津八大奇案》之一。介绍这个事件的文章还登载在2007年8月6日出版的《中国电视报》的《艺海拾贝》栏目里。

二

故事主人公双烈女的父亲叫张绍庭，婚后育有两女三子，长女张立，次女张春。张绍庭初来天津时，以拉黄包车为生，而两个女儿则协助做点针线活以补贴家用，一家人自食其力，勉强糊口。后来，张绍庭把车弄丢了。丢了车就等于丢了饭碗，夫妻俩急得抱头痛哭。张绍庭在气郁之下身染重病，生活处境更加艰难。

张家有一个邻居，名叫戴富有，他有两个儿子，父子三人专靠拐卖妇女的肮脏勾当谋生。民国版《南皮县志》载，“戴富有者，乃津之土豪，曾诱良家子教歌曲为利藪”。戴富有一直暗中打着张家两个女儿的主意，可苦于没有机会。这次看见张家有难，不由心中窃喜，就一步步实施他的诡计。

戴富有借张绍庭久病不起，又无力还钱之时，找人向张家给儿子提亲，想以这样的名义将两个姑娘骗到家里，然后再伺机转手卖掉。张绍庭急于还钱、治病，无奈之下答应了婚事。

为了将骗局设计得像模像样，戴富有还按照当时民间的习俗和规矩下了聘礼，立了婚书，准备把张立接到自己家中。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张绍庭病重并撒手人寰。张绍庭一死，戴富有立马假惺惺地跑到张家哭丧，还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我大哥不在了，但



是姑娘已许给了我儿子，就是我戴家的人，我会像亲生女儿一样待她。你们家不富裕，干脆就搬到我们家吧。”

母女三人信以为真，即搬到了戴家。据“张氏双烈女碑记”所载：“戴遣其妻迎金与同居，既又欲离异其母女，劝金再醮，复令两女习歌曲。金觉有异，知为戴所给，即挈子女别居。”也就是说，金氏母女被骗到戴家后，戴富有故意不予完婚，一方面诱使金再嫁，一方面请人来家教张立、张春唱曲。

目睹戴家的所作所为，金氏母女方知被骗，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赶忙搬离。“戴反以金悔婚迭婚控于所谓地方高等两厅，伪造书券诡称两女字其二子，嗾其党为证。高等厅遽判两女皆归戴。戴旋遣人来，将定期迎娶，势张甚。金讼既不得直，又被逼，愤恚不知所出。”（张氏二烈女碑记）

原来，奸诈险恶的戴富有早就做了准备，不仅拿出了以前的“婚书”作证，还另伪造一纸婚书，辩称张绍庭早已将两个女儿许配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还唆使其党羽出庭作证。

在所谓的“物证”“人证”面前，与戴勾结的旧司法衙门的法官便“理所当然”地判决戴富有胜诉，将两女判归戴家（民国版《南皮县志》记述：“斯时母女相持，呼天大痛，而无如戴何也”）。当天下午，戴富有就气势汹汹地找到张家要人，声称明天早晨不见人，就来抢婚——实际是要将两姐妹卖到妓院！

金氏母女吓得抱头痛哭，张立、张春两姐妹相对无语，“乃相与私约食磷药求死。毒发，邻人觅药来救，拒之碎杯于地，姊妹遂宛转同死。时丙辰（1916）三月十七日也”（据《南皮县志》）。

三

张氏双烈女服毒身亡的消息，顿时传遍了天津城，也惊动了南皮张



氏族人。天津民众对反动司法人员枉法乱纪、与土豪恶霸相勾结而逼死人命的罪行十分痛恨，群情激愤。当时的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与地方士绅、张氏在津族人为张氏姐妹出了一场大殡，“葬之日，送者数千人”（据《南皮县志》）。《张氏二烈女碑记》云：“迨举殡，道旁观者为之流涕。”在难计其数的挽联和匾额中，天津秀才刘道泉写的挽联“直隶高等审判厅伤天害理；南皮张氏双烈女杀身成仁”格外引人注目。

张氏姐妹葬于天津西门外明费宫人墓侧，后建有“烈女祠”。在今天津谷物场大街还保留有“烈女祠胡同”，成为当年故事遗留的线索和见证。其时，有人以双烈女的事迹为题材，编排了文明戏（新戏）《双烈女》，在演出后轰动一时，与《杨三姐告状》剧目一样，都深深地吸引着津门的观众。

在文章开头提到的南皮张氏双烈女祠，是金氏在津葬女以后，于次年携三子回到南皮，南皮的张氏族人及戚党出资在县城文昌阁东建“双烈女祠”，立碑两通（即“南皮张氏双烈女碑”“南皮张氏二烈女碑记”），分别由张瑞荫、张曾敷、华世奎、张权、张榛撰文、书丹或篆额。其族人张瑞桓捐祭田 20 余亩赡养金氏一家。

张氏双烈女的故事已经过去了百年，双烈女祠也已在兵荒马乱中湮没，仅有一张双烈女祠的旧照留存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出版的《南皮县志》中。但这个轰动一时的故事却流传了下来。在民国版《南皮县志》中，收录有南皮籍清末重臣张之洞大儿媳刘文嘉的《咏双烈女》诗：“玉骨归蒿莱，正气还天地。”同时还收录了侯光黎的《咏张氏双烈女》的诗：“……惆怅无计愁中宵，拼将一死轻鸿毛！同饮火磷毒骤发，精魂浩渺出云霄。邻佑侦知增感叹，双烈一门真罕见。长年十七幼十四，辉煌史册人称羨……”由此可见，这两个花季少女死于非命的悲惨命运，折射出了旧中国黑暗势力的邪恶，彰显了张氏姐妹在当时求助无门的情



历史名人与南皮 ◎ 文化丛书 ◎

况下，宁死不屈的抗争精神。或许，这一点才是当时以及后人们对其屡屡赞叹的真正原因。

(赵树森)



逸闻传说



古老的南皮，曾是历史沧桑的见证。在漫长的封建制度下，南皮人民创造过辉煌，也饱尝了兵匪战乱和自然灾害带来的困苦。所以，他们在战乱中祈求和平，就有了杨六郎在南皮大摆“牝牛阵”、穆桂英“泊家洼”斩杀白天祖的传说；在灾荒中希冀生存，就有了秦始皇修筑防水堤和孙臆、庞涓斗法建河堤的传说。

这些在历史变迁中演绎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已经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至今仍在口口相传。



明正德皇帝纳妃钱庄村

南皮县有一个李皇亲村，这个村名的由来，还要从明朝正德年间武宗皇帝朱厚照说起。

“李皇亲”原名钱庄，位于南运河（南皮段）东岸。这里风景秀丽、交通便捷，吸引了很多游客和往来的客商。村西头有一家小店，是村里的李老汉所开。此人厚道热情，买卖公平，很受顾客赞许，生意做得十分兴隆。李老汉膝下无儿，只有一女，唤作风姐。

这风姐不仅聪明勤快、性格开朗，且姿容秀美，做得一手好饭菜。尤其是她做得长寿面，细如发丝，味道鲜美，堪称一绝。方圆百里皆闻其名。

明正德四年（1509），明武宗朱厚照乘船沿运河南下，途经钱庄时，听下人们说起李风姐及其做的长寿面，便好奇心起，要亲口品尝一下。

众人进店后，点名要吃长寿面。待端上饭桌后，只看得皇帝目瞪口呆，但见那长寿面细如发丝，白如凝脂，香气浸腑，不由得食欲大振，一连吃了三大碗，这才罢休。尔后，定要风姐出来一见。

待风姐出来时，但只见身似杨柳，面如芙蓉，口若樱桃，眼赛丹凤，心中暗暗称奇，遂决定纳风姐为妃，并驻蹕店内，与风姐同床共枕。其后，皇帝便赐名，将“钱庄”改为“李皇亲”。



穆桂英与南皮泊家村的传说

南皮县乌马营镇有一个泊家村，关于村的来历，史料记载为明永乐二年（1404），有泊氏奉诏从山东即墨县迁此立村，故取名“泊家”。除此之外，在民间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

北宋时期，辽国在侵占了宋朝的燕云十六州后又大举南侵，并在沧州一带陈兵。宋廷命杨门女将穆桂英率兵北上迎敌。

穆桂英带领 10 万人马，浩浩荡荡，晓行夜宿，在一处叫作马家岭的地方安营扎寨，与辽兵对阵。

马家岭距离沧州只有四五十里路，辽军统帅得报后，便借宋兵长途劳顿、立足不稳的机会，派大将白天祖领兵攻打马家岭。其时，穆桂英虽身怀六甲，但却气势昂扬，越战越勇，白天祖两次讨阵都铩羽而归。

这白天祖原是宋朝降将，曾与杨五郎交深。杨五郎在金沙滩血战以后，因心灰意冷而跑到五台山当了和尚。杨五郎有一个神钵，乃为法宝，持有之人只要念动咒语便收发自如、大小随意，把人扣在钵下，五时三刻就会化为脓血。

于是，白天祖便心生毒计，编织了谎言将神钵从杨五郎那里骗去。

这天，白天祖又来叫阵，穆桂英并不搭话，拍马上前迎敌。二人战了几个回合，白天祖渐感不支，拨马便逃，穆桂英则紧追不舍。奔跑中，白天祖偷偷在囊中取出神钵，随即向空中抛去，口中还念念有词。那神钵在空中越飞越大，似山呼海啸，遮天蔽日。穆桂英一见白天祖祭起神钵，识得厉害，便掉转马头即走。那马四蹄蹬开，如腾云驾雾，瞬间就跑出了十几里路。穆桂英本已身怀六甲，加之一路颠簸，突然觉得腹中



疼痛，随即离鞍下马，但听“哇”一声，孩子落地了。那神钵乃洁净之物，遇到腥污，一下子给“冲”了。就听“呜——”的一声呼啸，向西飞出了50多里地，一下子砸了个40里地方圆的大洼，时称“钵砸洼”。久之，民间谐称“泊家洼”。再后来，有人在洼边上建房居住，逐渐形成了村落，人们便以此“泊家洼”定村名——就是现在的“泊家”。



杨六郎在南皮大摆“牦牛阵”

相传，南皮县万牛张村为宋代杨六郎大摆“牦牛阵”之处。

北宋时期，辽兵屡犯边境，杨六郎奉旨率兵抵御。为巧妙消灭来犯之敌，杨六郎秘密差人购买了万余头牦牛，以草人腹内装饲料，穿戴辽兵服装，诱牛以角所绑之刀挑开草人腹部吃料。如此训练百余日，众牛见到穿辽兵服装者便猛用角挑，如是习之如故。

杨六郎见训练成熟，便下令将牛饿三天三夜。然后派兵去辽营挑战。待辽兵追来，即将万头牦牛放出。饿极了的牦牛冲入敌阵，见人就挑，辽兵死伤无数。宋军大获全胜。

从此，此地得名“牦牛阵”。后因村中多居张姓，又称“牦牛张”，1951年改名“万牛张”。

1958年，该村在兴修水利时，曾在村前挖出喂牛的石槽以及锅台、饮牛大缸等物。



林冲发配途经南皮“野猪林”

在《水浒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情节：豹子头林冲在发配沧州的路上经过“野猪林”，二解差要杀他，幸得花和尚鲁智深及时出手相救，才保住了性命，故有“鲁智深大闹野猪林”之说。据传，当年的“野猪林”旧址，就在现在的南皮县冯家口镇东林子和西林子两村一带。

据南皮县地名办公室于1982年12月编纂的《南皮县地名资料汇编》记载，在明代之前，现东、西林子村一带并无村庄。此地有一片绵延不绝的树林子，古树参天，茂密成荫。燕王朱棣称帝后，于永乐初下诏移民，孙氏应诏迁居至此，在林旁建村，故取村名为“林子”，后分为东、西林子村。

在《水浒传》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中写道，两解差与林冲“看看走不动了，早望见前面烟龙锁雾，一座猛恶林子，但见：

枯蔓层层如雨脚，乔枝郁郁似云头。

不知天日何年照，惟有冤魂不断愁。

这座林子有名唤作野猪林，此是东京去沧州路上的一个险峻去处”。

《水浒传》的故事发生在宋代，“林子”建村在明初。林冲刺配沧州时，此地还没有人家，到处林木莽莽，无边无际；飞禽聚集，野兽成群，并常有野猪出没，因而，有人揣测，施耐庵便在编撰《水浒传》时，将此林唤作“野猪林”。

另外，说“野猪林”就在现在的东、西林子村一带，还有一个佐证。在《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中，写林冲



过了野猪林后又走到了柴庄子，遇到了柴大官人（即“小旋风”柴进），并在柴庄子村与洪教头比武，棒打洪教头之经过。从行走路线上说，林冲发配是由南往北走，奔沧州的方向，过了“野猪林”往北就到了柴庄子。而按现在的实际地理位置看，在东、西林子村往北十几里处，正有一个柴庄子村（隶属南皮县冯家口镇），与《水浒传》中所写的位置相同。由此可见，当时的“野猪林”应该就是现在的东、西林子村一带。

当年的“野猪林”为什么不复存在了呢？对此，人们众说纷纭。比较倾向一致的说法是，“靖难之役”（民间称之为“燕王扫北”）时，燕王朱棣率大军在南皮过境，陈兵鏖战，往来冲杀。因朱棣担心“野猪林”中藏有伏兵，便将林子烧毁。除此以外，还有两种说法：一是天火烧林说。即遭雷击后起火将树林烧毁；一是毁林造田说。即在明永乐年间，朝廷下诏迁移人口，被迁来的移民暂住“野猪林”一带，落脚的移民在建村立户时，伐木造房，毁林种田，久而久之，就把“野猪林”慢慢毁掉了。

究竟现在的东、西林子村是否就是当年的“野猪林”，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野猪林”与林子村的相关故事却经过口口相传而保留下来；在当地人们的习惯称谓下，“东林子”和“西林子”两个村庄的名字也一直沿用至今。



纪晓岚南皮建绣楼

南皮县翟官屯村的黄德焜是康熙年间进士，历任山东邹县知县，兼署滋阳、藤县印务，后升任广东化州知州。其子黄坤娶献县（今属沧县）崔尔庄候选府同知纪钰之女，此女便是《四库全书》总纂纪晓岚的姑奶奶。

黄德焜是一位清官，虽然当上了知府，却落得家境一般，儿孙们仍住着土房旧屋。他的儿子黄坤是个读书之人，没有什么功名，生活很是清苦。这南皮距离崔尔庄不过百里之遥，来去倒也方便。有一天，纪夫人回娘家了，一住就是40天。纪家人很是纳闷，往日只是住个十晌半月，这次怎么住起来了呢？

父母都是知书达理之人，便婉转地询问女儿。纪夫人见问，于是将家中窘况向二老述说了。

纪家姑太太在南皮住房破旧的事儿很快在纪府传开了，不久又传到了在京城做官的纪晓岚的耳朵里。纪晓岚闻听后，感到非常心疼，就从自己的积蓄里拿出了几百两银子，吩咐下人送到了南皮姑奶奶家。

黄坤就用纪晓岚给的几百两银子盖起了一幢二层小楼。至今，翟官屯村上年纪的人都知道过去黄家有一座小楼，人称“黄家楼”。纪晓岚给姑奶奶盖楼的故事，一直在黄家世代流传。



《施公案》中的薛家窝

《施公案》全称《绣像施公案传》，又名《施公案奇闻》《百断奇观》。写的是清康熙年间施仕纶任江都知县至通州漕运总督时的断案故事，为长篇小说。

在《施公案》中有 19 个章回写到南皮的薛家窝，在全书中占有重要分量。

薛家窝是南皮县冯家口镇大运河岸边的一个小村，是一个近百户，四五百人的清代旗屯。薛家窝地理位置很重要，绅民在运河上设有义渡。清代运河汛防在薛家窝设有把总 1 员，马兵 4 人，守兵 22 人。清代绿营军制营以下为汛。《施公案》一百八十八回为薛家窝进行铺垫。施仕纶升任总漕，顺运河南下淮安，沿途查访办案。案犯麻面和尚于七改名薛酬，逃到薛家窝，与薛家五虎认了同宗；《施公案》从二百一十五回到二百三十三回专写薛家窝之战。小说描述薛家窝风水极好，应出虎将。薛家窝五虎薛龙、薛虎、薛凤、薛彪、薛豹以及薛凤妻谢素贞均是高来高去之人。薛家窝机关密布、危机四伏。施公追查于七，被薛豹捉住置于庄内水牢中，引发黄天霸等人三进薛家窝，格杀五虎、擒获谢素贞。故事情节被改编成京剧《薛家窝》。



孙臆、庞涓斗法筑河堤

山东、河北交界的漳卫新河，在古代叫鬲津河。据传说，鬲津河堤就是孙臆、庞涓斗法筑起来的。

孙臆和庞涓一同跟着鬼谷子学习兵法、战策，十年功成。两人论武较艺、排兵布阵都不错。出师下山前，鬼谷子想要看看他们的应变才能。于是说：“我在山上坐着，看看谁能说动我下山。”

他俩一听，就知道师傅是在测验他们的智慧。庞涓争强好胜，抢先说：“师傅，山下河里的鱼有两个脑袋。”他认为，这么蹊跷的事，师傅肯定下山去看看。然而，鬼谷子听了后，只是笑了笑，根本没有动弹。

这时，孙臆说：“师傅，我确实说动不了您下山；但是，我能说动您上山。”鬼谷子不信。孙臆说：“不信咱就试试。”鬼谷子捋着白胡子说：“试试就试试。”说完便走下山来。

这时候，孙臆拍手说：“师傅，我把您说下山来了！”

庞涓没有比过孙臆，心里非常不服。就说：“师兄，咱还是比比真杀实砍的功夫吧。”

孙臆说：“师弟，就请出题吧。”

庞涓说：“鬲津河是一条水沟，没有大堤，因而常犯洪水、为害百姓。这河长千里，咱比赛筑堤，谁快谁赢。”

孙臆说：“好！咱这比赛也是为百姓做好事。一河两堤，师弟先挑吧。”

鬲津河地势南高北低，地势高的当然省劲。所以，庞涓就抢着说：“我筑南堤。”



孙臆说：“那我就筑北堤了。”

两人约定好动工的日期，就各自准备去了。

开工这天，庞涓动用了成千上万的百姓来筑堤，为了抢争时间，太阳还没露头庞涓就领人干上了，一直到太阳落山还不断地招呼：“快点干！快点干！”

后来，又用“定阳针”把太阳钉住。那天可长了，干活的人们一天吃了12顿饭，还不见黑。虽然累死了好多人，可大堤筑得倒很快。但看看北岸，一个人影也没有。庞涓心想，这回该我赢了吧。

庞涓很快把大堤筑成了，天也黑了下來。这时，孙臆才赶着他那头老牛，慢腾腾地来到北岸。但只见牛背上驮了一个布袋，里面装满了土，布袋留一个口，牛边走，土边流，工夫不大，就走到了河的尽头。转眼之间，一条又高又宽的大堤就像巨龙一样蔓延到了海边。

庞涓一看，北岸的河堤比南岸高出很多，这才认输。

现在的漳卫新河北边，相隔不远便有一块大洼地，传说就是当年孙臆装土袋子筑堤留下的。



秦始皇修筑防水堤

在南皮境域的宣惠河南，亘古就有一道高高的大堤（即《沧县志》所记“宣惠河南古堤一道”）。此堤自宁津经东光，进南皮，过孟村、黄骅，直达渤海。大堤就像一条巨龙，弯弯曲曲、绵延东去。据老辈人口口相传，这条大堤是秦始皇修筑的。

据传说，秦始皇每逢单月就同张天师一起，穿上登云鞋，顺着天梯上天庭去朝见玉皇大帝，禀报人间的情况。有一次上天，秦始皇一路风尘，觉得有些疲惫，当路过一清水河时，就洗了洗手脸，立觉神清气爽。

回来的路上，秦始皇把洗脸的事对张天师说了，并问：“那是什么神水？”张天师也不知道是什么水。他就按天条规定，待再次上天见到玉帝时，便把秦始皇在天上清水中洗脸的事说了一遍。玉皇大帝听闻勃然大怒，一拍桌子：“好个秦始皇啊，那是天河！是天上众神饮用的水。你竟然在天河洗手洗脸，弄脏了河水，我岂能容他！这水不能要了，明年雨季把水倾下，淹他七州零七县。”

张天师心想，开了天河那还了得！回来以后，就把玉皇发怒并要在明年某月某日倾天河之水的事向秦始皇说了。秦始皇说：“那不怕，我自有办法。”秦始皇布告天下黎民百姓：明年天河要开，今年所有的地都种成萝卜。百姓们哪个敢不种？等收下萝卜各家各户都把萝卜切成片，晾干堆放到了场院里。收下萝卜，秦始皇布告各州县要赶紧筑防水堤。工程太大了！朝中大小官员都到民间督促筑堤。秦始皇还请张天师上天盗来定阳针，把太阳钉住，让百姓赶筑大堤。那天可长了，一天吃72顿饭。结果提前将大堤筑成。

转眼到了来年的某月某日，天河真的开了。天连水、水连天，遍地



历史名人与南皮 ◎ 文化丛书 ◎

汪洋、沦为泽国。百姓们都躲到了预先筑好的防水堤上，搭好窝棚住在里边。水一大，晒的萝卜干就漂了起来；风一刮，都漂浮到了堤边上。百姓们饿了，就捞萝卜干片吃。由于大堤筑在了高处，水顺洼地流，很快排除了洪水，人们免遭一场灾难。打这以后，就留下了那道高高长长的防水堤。

后记

经过近一年多的辛勤笔耕，《历史名人与南皮》已经付梓，这是南皮县挖掘弘扬历史文化成果的展示，是全县文化工作的一件喜事。

南皮县历史悠久，物华天宝、地灵人杰。百度百科《沧州古镇南皮》记述：“南皮出人才。这里出了太多大人物，许多人几乎都是能文能武经世致用的大才，他们的文章功业，多影响过中国历史进程。单单南皮古镇，清末就出现了张之万、张之洞这样的人物，一代文宗纪晓岚的老师许南金也生活在这片热土上……”

正是由于南皮人才渊薮、俊哲辈出，并在历史舞台上尽显风流，才得到了诸多帝王将相、达官显宦、名士贤人等历史名家的赞赏。比如：周宣王擢拔尹吉甫、汉昭帝赞赏隽不疑、太武帝奖掖刁雍、唐太宗旌表贾耽、宋太宗赏赐贾黄中，孙中山、毛泽东称颂张之洞，等等，不胜枚举。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南皮县境内星罗棋布、美不胜收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流连忘返，传承下了许许多多魅力四射的诗篇和传奇而动人的故事。这是南皮深厚文化底蕴之所在。

在文化兴县、文化强县的大背景下，如何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不仅中央的同志要讲，而且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讲；不仅宣传部门要讲、媒体要讲，而且实际部门都要讲，各条战线都要讲。”



由此可见，让南皮人民群众在知晓、了解南皮历史的同时，大力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发全社会对南皮优秀历史人物的关注和认同，让优秀历史文化为南皮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精神财富和智力支持，增强南皮文化的竞争力、影响力和感召力，是一项急迫的任务。

为讲好南皮故事，南皮县挖掘弘扬历史文化资源领导小组从2020年10月开始，即组织专门人员，在编纂《南皮历史文脉探研》的同时，坚持研寻史牒、采掇輿记、广征博闻，于2021年5月整理、编纂完成了《历史名人与南皮》。6月，送出版社审读；11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和文化工作者的关心与支持。中共南皮县委书记董继华欣然为本书作序；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挖掘弘扬历史文化资源领导小组组长边疆在本书的选题、设计、修改等方面多次予以指导并提出具体的意见；杜中洲、赵永生、孙九如逐字通读，参与集体研究讨论；赵树森、戈延华、叶书龙坚持一丝不苟、几易其稿、反复修改，保证了该书的权威性和“存史继学，资政育人”的史料价值。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本书参考、选录了杜中洲、孙九如、赵树森、叶书龙、戈延华、周宝华、李士利、刘桂茂、郭其武、孙福军、刘连清、李建春、杨静然、李忠智、应超等人的文章，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该书涉及人物、事件众多，时间跨越两千多年，尽管编纂者沉下心来在浩繁的旧籍、书海和文献中寻觅甄别、析疑淘金，并循着古迹去探访，但终因资料的缺失加之编者学识有限，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斧正，以期再版时逐步完善。

编者

